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在全国尚有170余万土匪没有放下武器……



剿匪大纪实

（下）



冯力 编著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
在全国尚有170余万土匪没有放下武器……

剿匪

大纪实

(下)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剿匪大纪实/冯力编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4

ISBN7-228-06373-2

I.剿… II.冯…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134 号

剿匪大纪实(上、下)

冯 力 编著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830001

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郫县蜀林印装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0.75

字数:400 千

插页:16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责任编辑:徐晓琳

封面设计:刘梁伟

书号:ISBN7-228-06373-2/I·2336 定价:38.00 元



由北路向昌都挺进的部队徒涉卡江。



1950年10月19日，我军解放了由西康通往西藏的要地昌都。这是我军给被俘藏军官兵发放路费后遣送回家的情形。



部队翻越大昭雪岭，向拉萨前进。



部队在行进中。



进藏部队一边抢修被破坏的桥梁，一边用橡皮舟渡江。



后勤人员利用绳索，涉过激流。



进藏部队翻越大雪山。



从南线进藏的部队，为配合北路大军进行昌都战役，向江卡疾进。



第四十二师辎重
二团，经过横断山的
狮子岩。



南路进藏部队在竹巴笼，这是我军的机枪阵地。



巴塘地区藏民在金沙江边手捧各种食品，慰劳进藏的解放军部队。



控訴匪特惡霸的群眾大會。



被我剿匪部队緝捕的川東匪首黃云卿等。

前 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由此，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军继三年解放战争之后，又抽调出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百万大军，在全国各地实施剿灭土匪的一系列重大军事作战行动。在历时三年的剿匪作战中，我军在西北地区歼匪9.09万人，西南地区歼匪116万余人，中南地区歼匪115万余人，华东地区歼匪24.6万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

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史实，以纪实手法再现了我党我军在这一重大举措中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充分显示出了新生政权的强大生命力。

本书作为一部为纪念建党80周年而撰写的纪实性读物，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疑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编 者

目 录

〔下 卷〕

第十二章

雪域险

- 第 45 节 国民党驻藏大员被驱，新华社发表严正声明：西藏当局以“反共”为借口，企图混水摸鱼，是一件极其冒险的蠢事 …… (3)
- 第 46 节 访苏期间，毛泽东急电二野迅速进军西藏。18 军军长张国华奉刘邓之命，开始远征
…………… (10)
- 第 47 节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格达活佛前往拉萨途中被特务分子下毒暗害 ……
…………… (17)
- 第 48 节 邓小平会见阿沛·阿旺晋美，重申和平诚意，班禅大师一腔爱国势情感天动地 ……
…………… (27)

第十三章

和平颂

- 第 49 节 毛泽东会见西藏代表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 (41)
- 第 50 节 张经武将军赴藏，达赖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8 军开进拉萨 …… (49)
- 第 51 节 “治安会议”“军火被劫”，叛乱分子挑起邪恶之火，美国向西藏地区空投武器装备及物资…………… (59)
- 第 52 节 军委下令，迅速平叛，我军一举扫平山南叛乱分子巢穴，粉碎纳木湖地区叛匪顽抗…………… (82)

第十四章

瑶山青

- 第 53 节 四野铁军，出击两广，“总指挥夫人”受命组织暴乱，摇身成为十万大山女匪首 …… (93)
- 第 54 节 大瑶山大，兵匪合一，小诸葛白崇禧封其为桂绥第二支队上校司令，代号“4423”…………… (111)
- 第 55 节 召开会议，继续顽抗。善于伪装，多次躲过我追剿部队围捕，发电台湾“予以接

- 济” (118)
- 第 56 节 天罗地网，没吃没喝，瑶民拥护政府剿匪，
顽匪林秀山骨瘦如柴，下山偷挖红薯，面
对他的却是一排黑洞洞的枪口 (122)
- 第 57 节 恭城暴乱，群匪猖獗，围攻县城。土匪气
焰嚣张，难挡我剿匪铁拳打击，钟祖培终
落法网 (124)

第十五章

缚苍龙

- 第 58 节 大战在即，密使临阵，蒋介石下令陈明仁
“大义灭亲”，长沙山雨欲来风满楼
..... (137)
- 第 59 节 长江决战，松山大捷，八年抗战将星闪耀，
大闹官邸蒋介石对其又爱又恨 (142)
- 第 60 节 坚守四平，平白获罪，苦闷中看到新生希
望，毛泽东致信：站过来就好，我们还要
重用 (153)
- 第 61 节 长沙起义，陈部改编，十八万湘匪被宋希
濂整编为 3 个暂编军，12 个暂编师，妄图
靠匪力维持“湘鄂川黔边防线” ... (166)

第十六章

湘匪乱

- 第 62 节 乌龙巨匪，凶悍刀客，流窜湘黔，杀人如麻，血债累累，我军十面埋伏，毙其于偷渡船上 …… (173)
- 第 63 节 拥兵万人，周旋帮会，以匪谋官，把持地方数十载，为患一方 …… (185)
- 第 64 节 收编被骗，拖枪反水，国民党对其打打拉拉，养虎为患，匪势一天天严重 … (191)

第十七章

荡穷寇

- 第 65 节 越剿越多，剿抚难奈，湘西巨匪瞿伯阶发展到近二万人枪，肆虐湘鄂川三省沿边地区 …… (197)
- 第 66 节 风雨飘摇，接受收编，程潜委其为暂编第 10 师师长，惊闻属下叛乱沉疴难起，临终授命族弟执掌指挥大权 …… (201)
- 第 67 节 节节败退，群匪无首，宋希濂命其接防，程潜劝其弃暗投明，两相权衡，瞿波平决心交出队伍接受解放军改编 …… (208)
- 第 68 节 杀人魔王，受封“师长”，抗拒解放，杀我

干部群众，多行不义天怒人怒，追剿途中 一枪毙命	(216)
----------------------------------	-------

第十八章 肃海匪

第 69 节	纵骑东南，席卷千军，三野大军分兵进剿 苏皖浙闽各路股匪，战报频传	(227)
第 70 节	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台湾当局认为时机 已到，组织兵力窜犯大陆，海匪武装甘为 蒋介石急先锋	(240)
第 71 节	敌“以大吃小”，猛攻东山，我军坚守沿海 前哨阵地，狠狠打击蒋军海匪联合进攻， 毛泽东盛赞东山岛之战是“全国的胜利”	(249)
第 72 节	战舰破浪，海上歼敌，东南沿海岛屿在年 轻的人民海军护卫下，海匪就歼，有力保 证了共和国海上生产的安全	(255)

附录

西北地区剿匪大事记	(265)
西南地区剿匪大事记	(295)
中南地区剿匪大事记	(305)
华东地区剿匪大事记	(315)

下 卷

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军在以横扫千军之势解放全中国以后，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垂死挣扎，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珠江两岸到十万大山，从天府之国到西南滇、黔，与顽匪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西南军区 18 军进军西藏，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平息叛乱，迎来了雪域高原的春天。中南军区投入 4 个兵团，12 个军部，1 个纵队和 46 个师的兵力；华东军区和三野投入 5 个军、19 个师、1 个旅又 5 个团和海军一部，兵歼匪 140 余万……

第十二章 雪域险

第45节 国民党驻藏大员被驱，新华社发表严正声明：西藏当局以“反共”为借口，企图混水摸鱼，是一件极其冒险的蠢事。

拉萨，这个举世闻名的高原古城，初夏的季节总是凉爽宜人的。从3月初开始，来自川康甘宁和前藏后藏的大批教民和僧侣们就陆陆续续地涌进了这个藏传佛教地中心，开始一年一度的藏传佛事活动……

每到这个喜庆的季节，大街小巷，寺院广场，到处是车水马龙，香火转铃，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脸上无一不刻着神圣和虔诚的神色。他们千里迢迢到此地来，为的就是想祈求子孙安宁，家庭祥和。因此，三四月的拉萨，总是笼罩在一片热闹而吉祥，隆重而神圣的宗教气氛之中。

吉祥之光保佑着千千万万的虔诚教民一年年按照古老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从春天到夏天，从3月到7月。然而，当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个初夏来临之时，这座高原古城却突然降临了一场风暴……

1949年的7月8日，正当八角街上一群群转经朝拜的人们虔诚地跪在石板地上一步一下地磕着头，念着祈祷词的时候；

剿匪大纪实

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藏军气势汹汹地冲上街头，二话不说，见人就推，见摊贩就赶，见挡道的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滚开——滚开——”

“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许上街来！”

“所有人统统散开，八角街戒严了！”

顿时，吆喝声，打骂声，摔扔货物声四处响起。朝拜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东躲西藏，到处奔逃。

只见一个头戴毡帽的领头人指挥着这群手持双叉步枪的藏军沿街布岗设哨，三五步就设置一人。

紧接着，那个领头的人又亲自带着几十个藏军匆匆跑到一幢全木结构的三层楼藏式房屋前边，把房子团团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领头者挥动着手枪叫道：“不要放走了一个汉人，把他们全部围起来，不许任何人随便走动！”

藏兵团团围住的房子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国民党政权驻拉萨的正式官方机构——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领头者气汹汹地冲进办公室，提出要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

到底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陈锡璋——这位国民党驻藏的中央大员顿时紧张起来。他强作镇定地走了出来，与藏军领头人见了面。

“请问，你们是奉谁的指示，未经允许就闯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

“别说那么多了，我奉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通知你们。所有汉人在拉萨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立即离开拉萨，限

期返回内地!”

“什么!”陈锡璋呆住了,他根本没料到西藏地方政府竟敢对自己下达这样的逐客令。

“这是噶厦的命令,不容违背!”发话者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了。

陈锡璋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楞……

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是1934年筹建起来的。在此之前,国民党政权没有在拉萨设立正式的常驻机构。1934年,国民党政府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藏祭吊十三世达赖,祭吊活动结束后,双方商定,中央政府正式在拉藏设立一个驻藏办事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以交通部商业电台的名义在这儿架设了一个电台,开办了拉萨小学,供进藏经商和派驻的工作人员子女入学读书。

蒋介石对驻藏办事处是十分重视的,仅从他曾委派他的侍从室心腹沈宗廉任办事处处长看,足见其对西藏地位的重视程度了。

沈宗廉调离后,国民党政府又决定由办事处主任秘书代理主任一职。

但是现在,这位堂堂的主任竟然面对被赶出西藏的尴尬处境……

陈锡璋顾不了许多,急急忙忙地赶到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要求约见当时正在主持政务的噶伦。

尽力克制住自己的一肚子火气,陈锡璋在外边等了许久,这才被准许进去。

首席噶伦然巴和索康、嘎雪巴等人一齐接见了。双方见

剿匪大纪实

过礼后，照例在大厅内坐了下来，没等陈锡璋开口，首席噶伦然巴先开了腔：

“主任先生，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走到哪儿，共产党就追到哪儿。因此，我们噶厦对贵处驻藏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责。”

“这是什么话？我是堂堂的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呀！”

陈锡璋不满地据理反驳道，他心里对已全面溃败的国民党政府的处境是知道的，但他此刻仍要保持心目中那个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的位置。

然巴目不斜视，一本正经地回答道：“鉴于共产党在内地步步逼进，国民党一退再退的局势，我们噶厦决定暂时断绝同国民政府的政治关系，请陈主任以及所有的汉人官员在两周内启程返回内地去。”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陈锡璋愤愤然。

“据说西藏境内的汉人和康巴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谁是共产党。总之，西藏是佛教圣地，是绝对不容许共产党进来的！”

然巴补充完这一番话后，断然站起身来，用不容反驳的语调说：“你们必须照办，两周以内离开这里。”

看来是无法挽回了。在藏供职五年，阅历不浅的陈锡璋仿佛觉得头上滚过一阵炸雷。他想了想，还想继续回旋一下。

“那么，让我电告中央政府，等到回电后再作答复行吗？”

“你不必再去电了！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了。况且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

陈锡璋一听大为愤懑，他拂手丢下了一句话：“我没有接

到上司的命令，这样撤退是不行的！”说完就悻悻离去了。

从噶厦出来后，天色已晚，拉萨街上四处戒备森严，一片冷清。陈锡璋满脸焦灼地四下打量了一下，这才发现不仅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的电台等处有藏兵严密守卫，连发电机也给拆得七零八落了。

办事处的人员向他报告说，市区内凡是汉人的住宅、商店都被粗暴地搜寻抄查过了。

陈锡璋仰望天空，苍然叹道：“完了，我们算是完了——”

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来说确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月。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推进。大半个中国在夏天来临之前已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蒋家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

在1949年8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头版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引起国人震惊的新闻：

“7月8日，西藏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令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经商的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这消息很使人诧异，拉萨哪里有如此多的共产党势力。

……为什么中央驻藏的所有机关学校人员甚至和尚皆遭驱逐出藏？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这张《中央日报》不仅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外的舆论关注，也引起了世界上关心中国西藏地区命运归宿的人士注意。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代的版图上，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9年下半年，以摄政势力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

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那位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串通，想乘我解放大军尚未抵藏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垮台之时，策划一出“西藏独立”的闹剧，以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完成统一祖国的解放大业。这就是他们制造这场驱赶汉人闹剧的真正原因了。

1949年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一场阴谋便在少数妄图制造分裂的中外势力中间开始策划了。

一个昏暗的夜晚，印度驻西藏总领事理查逊神秘地来到噶厦办公楼里，向噶厦的“外交局长”柳霞、土登增巴、索康、旺钦次登等人透露了一个“机密消息”。

他说：“不知噶厦知道不知道，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现在拉萨有许多共产党派来的人。如果把他们留在这里，将来他们会充当接应共产党的人，会将汉人解放军引进来。”

对真情一无所知而又带着狭隘偏见的两位噶厦要员一听，惊得目瞪口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仿佛一场灾难就要临头一样。

“领事先生，我们不知道这种事情呀——”

“领事先生的情报是否可靠？”

“千真万确，完全属实。”理查逊煞有介事地掏出了一张名单来：“这是我们掌握的名单和住址。”

“真是这样！”土登增巴倒抽了一口冷气，感到太可怕了。

“领事先生，你认为现在噶厦应该怎么办才好？”旺钦次登不得不向这位英国人请教了。

理查逊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把两位“局长”召到面前，阴险地托出了一条条策划已久的阴谋，说得两位“局长”连连

点头称是，感激不尽。

就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在这间阴森森的大厅里几盏摇摇晃晃的油灯下，一个全面驱除汉人，割断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关系，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方案，终于在外来分裂势力的插手之下炮制了出来，并很快得到了亲帝势力的摄政要人的认可、批准。

初夏的拉萨古城，开始刮起了一场阴风邪雨，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就这样“正式”地接到了噶厦的最后通牒，规定从8月7日起的两周内撤走全部人员和汉人。

形势异常严峻，在压力和威胁下，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不得不分成三批和所有被驱赶的汉族人员一道由拉萨到亚东，越边界抵达印度，再从印度回到内地。

在所有被驱赶出藏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官员和派遣进藏的特工人员，真正的商人和和尚很少。由此可见那位居心险恶的印度总领事先生提供给噶厦的“汉人中共产党很多”的情报纯属编造，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七八十人的离藏人员中，倒真有一位共产党员，当时是拉萨小学的教师。

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就“驱汉事件”发表了严正声明：

“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发动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剿匪大纪实

西藏地方当局以‘反共’为借口，发动叛乱，企图混水摸鱼，是一件极其冒险的蠢事。”

新华社的严正声明犹如雷鸣，响彻在巍巍的喜马拉雅山脉，久久回荡在全世界都瞩目的“世界屋脊”上。

第46节 访苏期间，毛泽东急电二野迅速进军西藏。18军军长张国华奉刘邓之命，开始远征。

1949年的10月1日，对当时年仅10岁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班禅不得不逃离西藏长期居住在青海栖身以来，班禅一行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临近解放之日，年仅10岁的十世班禅毅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他去台湾的威胁，留在大陆迎接家乡的新生。

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首都北京宣告成立的消息传来时，远在青海西宁的班禅和他的堪厅（班禅行辕机构）全体成员高兴得欢呼起来，这些爱国僧侣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雄伟壮观的塔尔寺寺院内外数千教徒们都在袅袅香火前、佛像下为人民的新生，为藏区的解放祈祷着，祝愿着……。

这时，避居在青海牧区历代班禅香火地——香日德的班禅，立即指示堪厅要员起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这位灵性非凡的小活佛再三指示说：“这封电文一定要在当天发出去！”

于是，电波载着迫切企盼着藏区能早日获得新生的西藏僧

侣和人民的心愿，越过千山万水，飞向北京，飞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

电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策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11月23日，从北京发来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班禅大师的联名复电。这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西藏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并把这一事关祖国统一前途的大事，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复电内容是这样的：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历史新的一页即将拉开序幕，古老而美丽但又是灾难深重的西藏即将获得新生，这是不容阻挡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包括

剿匪大纪实

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一致愿望和要求。

1949年的冬天，中国大地暖流滚滚，云开雾散，到处一派新生的喜庆气氛，四亿五千万同胞中的大多数人已彻底挣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解放的日子。

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已插向了祖国的大西南，云贵川三省相继解放。整个辽阔的西南疆域除西藏和极个别地方之外，已完全回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

1950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急电刚刚胜利结束了成都战役不久，正在四川乐山、眉山地区集结的第18军主力部队：

“命令你部除以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新津、邛崃一线外，其余部队均立即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军长张国华同志火速来渝领受新任务……”

张国华军长一接到命令，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西进的重大使命可能要落在自己带领的第18军全体将士身上了。他看完电报后，刻不容缓地马上按二野司令部的命令做了紧急布置之后，马不停蹄地带领几个随从火速向重庆方向进发……

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泥泞山路上飞速奔驰着。张国华军长一个劲儿的催促驾驶员：“快点，再开快一点！”

警卫人员开玩笑说：“首长恨不得这小车再长出四个轮子来。”

“你知道什么？”张国华瞪了警卫员一眼，正色地说：“刘邓首长急电我们赶赴重庆接受新任务，这个任务说不定是一项特别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使命呀！”

“是西进吗？”警卫员连忙问了一声。

“刘邓首长八成是要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我们第18军了？”又有人紧接着问张国华军长。

张国华神秘的笑了一下，挥挥手，不置可否地看了大家一眼，转身命令司机道：“再开快一点，务必在今天赶到重庆。”

吉普车像一阵风似地奔驰起来，车速快得几乎连帽子也戴不稳了……。

张军长稳稳地手扶椅把，正视着前方，深沉地思索起来。

他带领的18军是二野的一支主力部队，这支英勇善战，功勋累累的部队组建于解放战争初期，曾跟随刘邓首长挺进大别山。以后18军又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等地战场，在解放中南和大西南的艰苦战斗中屡建战功，深得刘邓首长的信任。

当风尘仆仆的张国华出现在重庆二野司令部办公室里时，张军长满身都是灰土，他一进门就向等候在那儿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行了个军礼，精神抖擞地报告道：

“报告首长，18军军长张国华奉命赶来接受任务。”

刘伯承和邓小平高兴地上前握了握这位爱将的手，亲切地招呼他坐下来。邓小平又亲手倒了一杯热开水递给张国华，笑眯眯地说道：

“国华同志，你大概已从电报中闻到一点什么风声了吧？”

“首长有什么指示请放心的交给我们第18军，再艰巨的任务我们也能保证圆满完成。”张国华信心十足，坚定地表示着自己的决心。

“好好好！坐下谈。”刘伯承挥挥手示意张国华坐下后，用兴奋的语调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

剿匪大纪实

从苏联拍来了电报，决定把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了！”

“好哇！”张国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异常振奋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18军的信任和关怀，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保证把解放的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邓小平点了点头，用严肃而深沉的语调对张国华指示道：“到西藏去，不仅要靠勇敢和机智，更要紧的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是生命，是解放西藏的本钱。你要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张国华目光炯炯的看着邓小平政委那严肃而凝重的表情，用心体会着这番语重心长的话。

邓小平挥动着手，进一步说道：

“西藏是个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要用党的民族政策和实际行动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真正把广大的僧侣和爱国群众团结到爱国、反帝、统一的大旗之下”。

刘伯承司令员也指示张国华说：“这次进军西藏不比以往的仗好打，除了在军事行动上要尽可能周密布署之外，特别要抓紧做好进藏部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工作。”

张国华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把刘邓首长的指示全部记录下来，当即保证要一字不漏地传达到18军全体官兵中，用实际行动来完成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重庆山城的夜色是迷人的，张国华军长伫立在窗前，望着满天满地的星火与灯光，久久地凝望着这座刚刚回到人民手中不久的西南第一大城市，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50年代第一个初春的川西北，到处翻滚着解放全中国、进军西藏的热潮，集结在眉山一带的第18军遵照二野首长的指示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进藏准备工作，到处是一片请战的火热情景，全军上下都抱定一个信念，为早日解放西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全力以赴，进军西藏！”

“为早日解放西藏出力尽心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赫赫醒目的大字标语在第18军的驻地到处可见，使人随时随地置身于一种亢奋的战前状态之中。

1950年2月3日，一支由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正式出发了。

进藏先遣部队的任务就是以开路 and 侦察为主，这支先头部队曾遇到了种种困难与阻力，但他们都抱定宁死不回头的决心，为大部队的正式进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8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日子，18军主力部队正式进军西藏的日期就定在这天。

四川眉山的三苏公园内，第18军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在这个孕育了中国宋代伟大爱国诗人三苏父子的地方，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整装待发，精神百倍的列队在台下，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这天，碧蓝的天空格外晴朗，朵朵白云在头顶上悠悠飘动，和煦的阳光把温暖投射在一个个笔挺站立的将士的身上和心中。

大自然是公正的，它把最好的祝愿赐给了为了祖国统一和西藏新生的这支正义之师。

“轰——轰——轰——”

隆隆的礼炮响了起来，震得大地微微地颤动。紧接着，雄壮的军乐高奏起来了，激昂、振奋的旋律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前徐徐升起来，用鲜血和生命染就的旗帜在蓝天白云中猎猎飘动着。

年轻的战士们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举手面对红旗，发出了朗朗誓言和宁死不屈的坚定决心……

“为了全中国的彻底解放，为了千千万万藏族人民的幸福和未来，我们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顿时，“把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的口号声响彻云天，久久回荡不息。

第18军政委谭冠三大步走上主席台，面对全军将士，铿锵有力地大声问道：

“同志们，刺刀磨快了没有？”

“磨快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枪擦亮了没有？”

“擦亮了！”又是一阵崩天裂地的呼应。

“好！那我们就出发，向西藏进军——”

战斗的号角吹了起来，这支肩负着光荣使命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出眉山三苏公园，向着祖国的西南边陲——西藏进发了……

第47节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格达活佛前往拉萨途中被特务分子下毒暗害。

进军西藏是一次异常艰巨的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第18军的这次进藏多次亲自过问和下达指示。

根据西藏的历史、社会、地理、民族等种种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示第18军在进军西藏中要“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在进军途中要“一边修路，一边进军”。

为此，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曾有多少个夜晚没有睡过好觉，他对解放西藏统一全国的这次重大战略行动在许多细节问题上都做了认真的考虑。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完部队行动进程的汇报后，久久不语，他为这次异常艰巨的进军所遇到的一连串困难而焦虑不安，他甚至作过这样的建议：甘孜和昌都地区是否有力量能随着部队的进军速度修好公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一个机场？那儿是否适宜用空投物资增援进藏？

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飞机，用于支援进军西藏的行动。

当时，从北京到各地，从沿海地区到西南西北各省区，都为进军西藏伸出了支援之手。

在第18军的征程上，又是一副异常悲壮而动人的进军画卷了……

巍巍康藏高原，地势险恶，进无道，退无路。第18军的

剿匪大纪实

数万人马，在风雪中向着千山万壑的高原地带前进着，长长的队伍携带着沉重的车辆和物质，走一段路修一段路，漫长的队伍足足绵延了百里之远。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和补给的艰难就加大一层，供应日益困难起来。人马缺粮缺草的问题日益严重，伤病员和倒下的战士也开始增多起来了。在高寒缺氧的山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了下去，永远没有再醒过来。有的军马鼻嘴吐出白沫，直挺挺地躺倒下去，片刻之间就断了气。

数百辆卡车终日在刚开出的险恶道路上艰难行进，风雪一来，暴雨一过，车轮就整个陷在深深的泥泞之中。这时，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在泥里水里手推肩抵，人拉马拖，一个个变成了只有两个眼珠子在转动的“泥人”，不少人就是在这种巨大的负荷与挣扎中，倒在车轮边，永远起不来了。

当那些军马眼睁睁的陷在泥泞中慢慢沉下去时，我们年轻的战士心疼得失声痛哭呼号，有人甚至冲进泥泞中不顾生死的救马，最后和心爱的同伴一起永远埋在了雪域高原上……

千里高原，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烈日，时而铅云密布，时而又是冰天雪地。在这一望无垠的崇山峻岭之中，风天雪雨的康藏高原上，一串串坚定的脚印在向前延伸着，一队队沉重缓慢的大军在前行着。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为了第18军的行动，尽了最大的努力保障后勤供给。他们把从成都战役中缴获的胡宗南部队的五百多辆卡车全部充实给了第18军。每个师还抽出上千头骡马组成运输队，专供第18军进藏急需。

后勤部门在川西平原上昼夜奔波，为第18军筹集军粮，

还特地在重庆赶制了 10 万公斤饼干和干粮送了上去。总之，全军上下一条心，千方百计保证进藏部队的补给需要，完成好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

尽管这样，由于气候和道路的阻碍，进藏部队还是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粮荒，先遣部队刚到甘孜就没有了粮食，全军上下从军部首长到下面的连队战士，都用野菜、瓜果甚至田鼠等可食之物来充饥。

就这样，克服了诸多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第 18 军主力按预定计划内完成了进军西藏的第一步行动。战士们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理塘、巴塘等地，最后抵达了金沙江东岸——西藏的最前哨。

张国华军长沿着滔滔奔流的金沙江远望而去，看到那片企盼解放的土地就在眼前，不由得感慨不已地说：“我们终于到了！”

在如何处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的问题上，毛泽东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和平解放西藏，尽可能不用军事行动或少用军事行动，为此，他亲自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和计划。

但是帝国主义是不甘放弃他们侵略西藏分裂中国的野心的，他们在全中国临近解放前夕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风浪，妄图达到分裂中国领土的目的。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为了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统一，驱逐西藏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全面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有利的条件，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不惜付出艰巨的代价，让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主席亲手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西南

局和西北局关于向西藏进军及管理西藏事务的指示。

当时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的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不仅带去了许多有关西藏的资料和情况介绍，而且对进军西藏的时间、军力配备、线路确定、后勤供给，以及藏族干部的培训使用等一系列具体问题都做了周密安排和布置。

毛泽东多次明确指示：“进军及管理西藏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进军开始后，凡是涉及民族、宗教和策略性的问题，毛泽东都要亲自过问，并且十分慎重，做出精心的布置和及时的指示。

1950年5月13日，进军西藏的序幕拉开时，毛泽东主席看了一份关于西藏情况的汇报材料后，发现北京当时开播的藏语广播节目有不太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地方，他当即批转李维汉同志，指示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宣传方针”。

1950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给中共西南局及中共青海省委的一封指示电文中，特地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对派出西藏工作和帮助班禅工作的人员，要加以选择和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热忱帮助西藏人民的决心和良好的工作态度。如有和西藏人民不能团结者，须予撤回。”

正是因为18军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一系列指示，沿途在所经之地模范的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这才使得这次艰巨的进军任务得以按期完成。在长长的康藏线

上，沿途都得到了爱国藏胞和各族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使党的民族政策在藏胞中和广大僧侣中很好地扩散和影响开来……

在进藏大军的漫长征途上，第 18 军始终和西藏的爱国上层宗教人士保持了紧密的团结和合作，无数藏胞和宗教人士为西藏早日解放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格达活佛就是其中的一位光辉代表。

1950 年 7 月初，进藏大军抵达甘孜，这是一个富饶美丽，山青水秀的藏区。在离甘孜城西约 35 里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它座落在幽静秀美的一片密林之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利寺。格达活佛就在这座寺庙中。

格达活佛在当地威望极高。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爱国爱民，曾在 1936 年红军部队过路时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草，并且主动收容红军的伤病员，安顿治疗后，又发送路费送他们去追赶大部队。

第 18 军军长张国华早闻这位爱国活佛的大名。部队一到甘孜，张国华等军首长就特地赶到几十里外的白利寺去拜见格达活佛。

当张国华等军首长微笑着来到树木葱茏的白利寺寺院前时，身体结实，满面笑容的格达活佛身穿崭新的黄袈裟远远地出门相迎，陪同 18 军首长们来到经堂。他没等部队首长开口，就主动的布置派人去为部队筹备粮草牲口，乐呵呵地忙了半天才坐定下来。

格达活佛为张国华等人送上奶茶后，笑声朗朗地说道：“好呀！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这个当过几天红军时代博巴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活佛从心里感到高兴呀。”

张国华客气地对他说：“活佛为国为民操心操劳，值得钦佩，我们也从心里感谢您呀！”

“正义之师，理当拥戴。”格达活佛认真地对张国华说道，“尽管你们是无神论者，但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的欢迎大军，拥护大军！”

在热气腾腾的奶茶飘香中，张国华和格达活佛畅谈了许多许多，气氛十分诚挚和热烈。

格达活佛兴致勃勃地从佛龛内取出一张精心保存下来的1936年的红军布告，已微微变色的布告上字迹依然清晰明了，全文如下：

布 告

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入内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中国抗日红军司令员陈昌浩
公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张国华看到这张保存下来的红军布告，深为格达活佛的拳拳爱国之心所感动，他向活佛敬上了一碗奶茶，格达活佛接过一饮而尽。

活佛放下碗后，又谈起了西藏人民的悲惨生活，谈到动情之处，他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抬起袈裟拭着眼泪说：“西藏人民的生活太苦了，毛主席要是再不派大军进藏来，那我们

西藏民族真要快给人毁灭了啊!”

活佛再也说不下去了，他含着泪水，双手合掌，向着东方连声祈祷着，祝愿着……

目睹此情此景，张国华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安慰了格达活佛，向他表达了全军将士誓把解放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的坚定决心。

第18军首长的话给了格达活佛极大的信心和勇气，他重抖精神，拿出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的劲头，四处奔波，为大军西进出力。

格达活佛的行动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高度赞赏和信任，他被推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大业，他决心亲自前往拉萨，去做一直不对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电报表态的噶厦当局的说服工作。

前往拉萨去做工作，格达活佛自然知道是凶多吉少，但他表示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宁愿万死不辞。

7月10日清晨，太阳的光芒刺破了低垂的云层，汹涌不息的金沙江滚滚向东流去。在长长的江边上，甘孜军民为格达活佛的拉萨之行送别。深深爱着西藏人民的格达活佛神态庄重，衣着一新，站在金沙江边默默的祈祷着，祝福着……

一位妇女感动得大哭起来，她泪痕满面地跪倒在活佛面前，向自己深深爱戴的大活佛施礼叩拜，祝愿他一路平安。

格达活佛义无反顾地率领着甘孜僧侣代表，向着金沙江边走去，向着藏区大地走去，他走得那么坚定，那么从容，眼里闪烁着神圣的光采……

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终于到达了藏东重镇昌都。然

剿匪大纪实

而，正在当地策划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的英国特务福特煽动昌都行政当局，把格达一行人全部软禁起来，整日关在楼里，既不许与人见面，又不许他们继续西进。

格达活佛愤愤地斥责了昌都当局。他要求见拉萨方面的使者。就在这时，歹毒阴险的特务分子对格达活佛下了毒手。

8月21日，特务给格达下了毒药。格达中毒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五孔出血，在8月22日圆寂了。

一位爱国的活佛，就这样死在了特务手中。福特等人为了消灭罪证，还将格达尸体焚毁，并将其随行人员押送去拉萨。

格达活佛之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悲愤，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治丧活动，邓小平同志题写下了“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格达活佛的被害更加激起了进军西藏的第18军全体将士的愤慨和求战情绪，战士们面对着一江之隔的西藏土地，面对着妄图与解放大军西进相抗衡的藏军部队，恨不能马上打过金沙江去，为格达活佛报仇。

面对复杂尖锐的斗争局面，第18军首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心在昌都给妄图顽抗的藏军一点厉害看看，为和平解放西藏争得主动权。

昌都，是西藏东边的大门，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18军进藏的第一仗就选择在这个地方。

为了阻止进藏大军的推进，帝国主义者挑动噶厦欲与我进藏大军决一死战、顽抗到底。他们用全部藏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即相当于整整七个团的代本兵力，外加另三个代本的一部

分和地方民团共 8000 多人，由两名噶伦大员亲自督阵，准备在此破釜沉舟拼死一战。

这些自恃强悍善战的藏军认为，凭借金沙江上游的险恶地形，准备了足够的弹药和粮食，完全可以与我解放军抗衡了。因此他们终日饮酒作乐，毫无戒备之心。

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室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就昌都战役召开了专门会议。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

1950 年 10 月 5 日午夜，是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光，只有滚滚奔泻的金沙江在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着。

一阵寒风吹来，金沙江东岸的树林发出一阵阵悉悉的响动声。就在此时，我第 18 军 52 师的一支偷渡部队，从东岸的邓柯悄悄乘牛皮船，向西岸划去。

江水在轰鸣，夜风在呼啸，四下仍是漆黑的一片，没有异常的动静。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西岸仍然毫无动静，在东岸指挥作战的 52 师师长吴忠不由得感到纳闷起来：“怎么过了这么久了，还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呢？是不是偷渡部队遇到了意外情况？”

正在吴师长焦虑不安时，突听得警卫人员小声的叫道：“师长，你看，信号弹！”

吴师长抬起头来一看，只见西岸的夜空上升起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长长的光亮划破了江空，向着东岸飘来了。

“好！成功了，偷渡部队已顺利的占领敌方阵地了”。吴师长一拍大腿，兴奋地转身对等待了整整一夜的主力部队下达了命令。

“各就各位，立即渡江……”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几十条木船、牛皮船一齐出动，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向着西岸进发。

就这样，5天之内，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威胁的抵抗，第18军的一个师就全部进入了西藏地区。过了江后，全军将士昼夜兼程，横扫残敌，冒着高寒地区作战的种种困难，猛追逃跑的藏军主力，日行军达到了85公里的速度，直扑昌都。

昌都的藏军根本没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像神兵一样地降临在他们面前。这些平时不可一势的藏军经不住解放大军的猛烈进攻，10月18日，在隆隆的炮火轰击和一阵阵猛烈扫射后，昌都城的守军总司令率领四个代本和卫队，急急忙忙地弃城面逃，妄图往西撤走。他们万万没料到，自己已全部钻进了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第18军的先头部队和西北骑兵团已抢先截断了敌人的西逃之路，这些西逃之敌不是被阻就是被歼，不堪一击。

由于我南边部队抢先占领邦达地区，南逃藏军的去路也被截断，这些由大量散兵游勇组成，无论在训练素质、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上根本无法同强大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比的藏军，刚一接火就溃不成军了。

至此，十个代本的昌都藏军兵力除少数逃窜之外，其余全部被包围在我军撒下的天罗地网之中。从昌都城西逃的2700多藏军在西去无路南逃无门的情况下，躲进山沟里密林中向佛

主祈祷，以求能逃脱活命，但这时我 52 师已将包围圈团团缩小了。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2700 多名藏军和包括福特在内的少数英、印特务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武器，举手投降，走出了山沟。

第 18 军漂亮地结束了进军西藏的第一仗，一共歼敌 5700 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为全面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牢牢地掌握住了主动权。

10 月 19 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昌都的上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顽固势力，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 48 节 邓小平会见阿沛·阿旺晋美，重申和平诚意，班禅大师一腔爱国热情撼天动地。

在我进藏部队强大的压力下，1951 年 1 月 25 日，我驻印大使馆得到消息，在印度滞留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有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的动向，但情况还很复杂，上层人士中对立的观点和势力仍然在争执不止。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接到消息后，微微地笑了，他胸有成竹地说：

“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

当然，党中央对此是有耐心等待的……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噶厦的官员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了，布达拉宫内整天被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笼罩着，这些

平时威风凛凛的噶伦们不知所措，围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祈祷着神灵庇护。

这一天又是一次祈祷仪式，布达拉宫内油灯闪闪，诵经声响成一片，人们不知道有什么厄运将要临头，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佛主的保佑之上。

经堂内灯火闪闪，人声喧沸之时，布达拉宫的后院内正在召开着一个紧急的会议。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仅 17 岁，没有坐床理政，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年过 70 的亲英派摄政势力达扎手中。

此刻，所有噶厦的高级官员们和来自三大寺院的堪布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着对策，听着达扎的部署和安排。

会议刚开始了一会儿，对立的意见就吵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

“西藏是神的庇护地，是圣地，有佛主的保护，谁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有人仍然在盲目地夸夸其谈。

“我看大兵压境，解放军打进拉萨城已用不了多久了，还是想想办法才行啊！”一些胆小的长者焦虑地直诉着自己的看法。

“汉人要是打进拉萨来，我们当中谁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有人担心地说。

“怎么办呢？”他们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谁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达扎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闭起惺忪的眼睛，静静地思索了好一阵子。他明白，此时此刻能拿主意的也许只能是他了。眼下大军压境，局势危急，他自己确实也想不出一个两全

其美的好主意来。

大伙儿的目光一阵又一阵地紧紧盯着达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我看只能这样办了——”达扎睁开了眼睛，停止了手中捻动的佛珠，长声叹息着说道：“我西藏是佛教圣地，自古以来万物生灵皆按神的旨意办事。眼下时局危急，我看也只有请乃穷、噶东两路神明为我们指点出路了。”

笃信佛教的西藏上层决策人士每逢大事总要先向神明讨教，尔后方可行事，眼下在一筹莫展之时，不得不再次请出乃穷与噶东这两大名寺中的神汉来定夺大局了。

达扎见众人无反对的意思，立即下达了指令：“马上把乃穷、噶东两寺内的神汉请到这儿来为我们请教天意，占卜凶吉。”

不一会儿，两位穿红挂黄的“神汉”被宫员们领到了达赖喇嘛寝宫跟前，他们向神王达赖施过礼后，就开始准备跳神以讨教天意了。

几位噶厦和泽仓（宗教最高机构）的主要官员忧心忡忡地跪在地上，向他们讨教着……

“当今我们西藏政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还请神灵朗示，教给我们救急的对策！”

话音落下，香火升起，在袅袅的烟雾和喃喃祈祷声中，乃穷的神汉先开始跳了起来……

只见他一本正经，神情严峻，手舞脚踏，东跳西奔地忙了好一阵子，神灵像降身了，他双目紧闭地停了下来，合住两掌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念着咒语。

剿匪大纪实

官员们一看，忙呼地一下纷纷跪倒在地，边拜边向神灵讨教起来。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呀，为保政教兴隆，我们下一步是宜战还是宜和为好？”

“这——”乃穷的神汉想了想，闭目念诵道：“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为好。”

官员们听得糊涂起来，怎么神灵会说这等模棱两可的话呀？他们不甘心地又问道：“在这危难之际，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为好？”

乃穷的神汉似乎没有理会官员们的提问，仍在念叨着什么：“还是要多念经书，保民平安……”

泽仓们急了，还要想问个明白之时，突然，乃穷的神汉双手一挥，神情沮丧地站了起来甩手说道：“别问了，今天不灵了，不灵了——”

人们顿时傻了眼，无奈之际，又把那位噶东的神汉请出场来。谁知这位神汉竟然想溜之大吉，急得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忙上前拦住他，再三郑重言明道：“眼下是我们西藏政教生死存亡的关口，事关众生的未来之命运，我们肉眼凡胎实难决定，还是请神明展开慧眼，给我们指一条路吧！”

这位神汉半晌说不出话来，无奈之际，他猛地抽出长刀，在院子中一阵乱砍乱叫后，突然冲到达赖喇嘛跟前，蓦地跪伏在地，大声说道：“神王达赖喇嘛是全体佛教弟子的智慧和主宰，只要您能亲自出掌大权，西藏众生就能渡过难关，幸福安康，前途光明……”

看来神意已定，摄政达扎不得不下台了。十几天后，噶厦

召开了西藏全区大会，宣布了神的旨意，公布了达扎的辞职请求，最后达赖本人也同意自己亲政了。紧接着，噶厦要员又秘密研究，认为达赖不宜久居拉萨，决定请他出国依附英美，以保政教不衰，一个秘密计划就这样开始悄悄地制订了。

在西藏地方政府面临摇摇欲坠之时，17岁的十四世达赖顺从“天意”，出面亲政，然而他毕竟能力有限，不能控制住噶厦内种种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局势一天天混乱下去……

正当17岁的小神王一筹莫展时，在昌都战役中转向了党和人民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决心选择一条爱国统一的光明之路，他承担起了向拉萨的达赖喇嘛做动员工作，促使和平解放西藏大业早日完成的光荣使命。

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派出一名信使火速赶到已经乱作一团的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呈交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亲笔信。

信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能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教派和谈代表赴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拉萨，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于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侣完全可以担保。”

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把阿沛·阿旺晋美的亲笔信件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呈报达赖后，又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有人为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所打动，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了，然而少数掌握了实权的人仍然执迷不悟，他们决定按原定的秘密计划，给正在印度的一位孜本拍去了电报。这位孜本就是噶厦的财政大员夏格巴

·旺久顿典，电报要他拟请达赖出国，令他做好准备，选择好达赖的住处。

几天以后，一封回电从印度传到了拉萨，告知噶厦说：对于达赖的出国，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帮助，印度政府也答应派兵在中印边界来接应。在达赖出国前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是解放军包围了拉萨，美国将派直升飞机前来营救，希望能在布达拉宫后修一块停机坪。

噶厦当局对夏格巴的回电信以为真，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为应付变故在拉萨做了相应的准备。

举棋不定的十四世达赖在他身边的实际掌权人物左右下，一边考虑着准备和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一边又在暗中与国外分裂势力串通，做着出国的准备。

此时，尚在青海的西藏另一神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爱国诺言，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努力工作着。

1950年的冬天，寒气逼人，年仅13岁的十世班禅和他的堪厅成员不顾严寒风雪，四处奔波，协助中央人民政府为和平解放全西藏而努力，同时也在做着返回西藏的艰巨的准备工作。

在听到拉萨方面的动态后，班禅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表示坚决拥戴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

年幼的班禅大师身着黄缎藏袍，庄重坚定地表示：“自前世班禅离开西藏以来，已快三十年了，为了完成前世的遗愿，为了西藏民众的世代幸福安宁，我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下

尽快早日返回西藏!”

班禅动情的话语，使得堪厅的成员们无不牵动心绪。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自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后，从1923年就跟随九世班禅逃到内地的。快三十年了，思乡之情时时牵扯着他们痛楚的心。

大厅之中，有不少人禁不住失声痛哭了，行行老泪在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面孔上流淌着。

堪厅成员一致同意马上致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严厉谴责拉萨当局中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吁请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并坚定表示“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而奋斗到底”。

在西藏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西藏的两大神寺处在不同的心境之中，面对北京一次次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吁，各持不同的态度。

历史上，原来整个青藏高原的藏区都归政教合一的达赖管辖。清雍末年（即1728年），清廷于平定西藏内乱之后，下令将西康东部的康定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西康南边的中甸等地划归云南，同时又下令将西藏的日喀则以西至阿里一带交给班禅管理，直接受朝廷驻藏大臣领导，从此，前藏达赖后藏班禅的局面就此形成了。由于九世班禅出逃内地，西藏全部领地已受控于达赖的管辖之中。此时，年仅17岁的十四世达赖在西藏面临历史性巨变之际，被迫接受“天意”，要亲自坐床主政了。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

礼。

隆重的典礼在表面上一片热热闹闹、庄严神圣，面实际上却在潜藏着的巨大的不安气氛中结束。回到布达拉宫的寝宫后，达赖与秘书长群培土登等人紧急磋商，认为还是应该给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年轻的达赖喇嘛考虑再三，亲自写下了一封给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信件。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侣民众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达赖终于在西藏面临全面解放前夕亲政了，但围绕着捍卫还是分裂祖国的斗争却没有停止过。

17岁的十四世达赖无论从政治经验还是治理能力上都是不成熟的，那些围在他身边的亲帝势力从未善罢甘休，他们坚持要达赖按照原先秘密制订的出国计划行动。

由于达赖喇嘛出走的计划也是在神前打卦抽签决定下来的，所以年幼的神王本身也无法在刚一坐床理政就违背“天意”，因此，他不得不同意踏上这条充满不安因素的风险之路。

藏历11月11日，达赖喇嘛仓促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和孜本鲁康娃。泽旺饶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换上了普通衣服，避开众人的耳目，悄悄地从布达拉宫出走了。

一出拉萨，天气骤变，阴云压顶，狂风大作，风过后又是一场暴雨和大雪，使得道路变得异常难走，这可把年轻的神王折腾苦了，他是从没有吃过如此的苦头的……

1933年10月30日，58岁的十三世达赖圆寂。由于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朝东方，“神意”降旨说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寻访也要在东方。按照神命之意，1935年5月，噶厦政府终于在青海湟中县南40里的一藏族农民家寻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就是今天的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

拉木登珠5岁被接进布达拉宫内精心供养，学习藏传佛教，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至高地位上，从未吃过苦。然而今天他在出走外国的风雪道路上却历经了诸多的磨难和折腾……

无奈，不能违背“神意”呀！

漫长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达赖一行终日跋涉，疲劳不堪，看着牲口与随从不停地在他身边倒下去，神王只能双手合掌，坐在马上为他们的亡灵超度祈祷了……

经过了数日的风雪行进，达赖一行人经江孜抵达亚东，这儿距离印度只有一山之隔了。

随行官员决定在这里通过印度驻锡金的大臣，致电印度政府，请他们帮助把达赖喇嘛接往印度居住。正是有这个所谓的“靠山”，噶厦中的少数人才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十四世达赖仓促出走。

天有不测风云，这大概是神意也难以预先料到的了。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高原上的这一连串政治波动，当时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关注，一些公正的外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英、美、印等国家中某些人和噶厦当局的不正常交往发出了谴责之声。在这种特定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明目张胆插手策划达赖外出活动，都必然要引起公众的斥责。

剿匪大纪实

鉴于这种情况，印度政府接到达赖随员的电报请求后，举棋不定了，对原来的许诺再不敢轻易兑现。

当然，印度政府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果达赖真的留居印度，那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班禅势必重新返藏主政，大权旁落，后果更是难以设想……

印度政府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正式对已到亚东的达赖一行人做出了明确答复：

“……按照国际上的有关惯例和作法，达赖喇嘛为了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可准许其在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收留对待……”

电报送到了达赖和随员手中，他们一下怔住了。

“把我们作为难民对待，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决不接受！”

“不讲信誉，原本说得好好的，为什么一下子全变了？”

“现在我们是进退不得，陷在亚东这山沟里，神也保护不了我们了。”

随员们个个怒气冲冲，但又无可奈何，人马已到了印度大门口了，可对方又不想接待他们，把至圣至高的“神王”困在这小小的山沟里，实际上是落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

大家万般无奈、心急如焚地全都跪在年轻的神王面前，向他乞教，希望达赖能拿出个好主意来。

17岁的达赖坐立不安，满脸焦虑，一筹莫展。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治理政务并不比在布达拉宫深院内苦读经书容易。他平静了一下，向着佛祖祈祷了好一阵子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此等一等，视天意而再作定夺之举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印方没有任何松动的表示，达赖一行

人只有在此苦苦等待别人的恩准。堂堂西藏政教之尊，竟落到这样的境地，实在难以想象呀！

这一天，一股东风终于吹来了，但它却是来自自己的祖国。

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路经新德里返回西藏时，我国当时驻印度的大使袁仲贤约见了这位在达赖身边举足轻重的上层人士，向他再次阐明了党和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贯立场和我党的民族政策，并且把一封毛泽东主席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交给了群培土登。信中，毛泽东主席向达赖亲政表示了祝贺，并又一次希望能和平解放西藏。

信件言辞恳切，人情人理，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和耐心。

群培土登来到亚东，拜谒了困在这儿的达赖喇嘛后，亲手把这封信呈交了他。

祖国的关怀和人民政府的热情给亚东这个偏僻的地方吹来了一股暖人的热风，达赖喇嘛随员中的大多数人仔仔细细地传阅了这封毛泽东的信函，不由得深为感动，联想到他们日下的艰难处境，有人悄悄地落泪了。

“还是自己的祖国好呀，要靠还是只能靠祖国才行啊！”一位老噶伦感叹道。

“是呀，外国人的话信不得，连达赖喇嘛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拒之于门外，还指望什么呢？”有人颇有同感地附和起来。

群培土登见多数人都有回心转意的念头了，忙向达赖建议道：“我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派人去北京和中央政府谈判？”

达赖略为思忖了一下，点点头。

剿匪大纪实

经过反复讨论商量，达赖终于批准噶厦当局派昌都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藏军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僧官土丹旦达、僧官土登列门、第二代本桑顿·登僧顿珠5人为谈判代表，前往北京就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为了达赖能尽快全面的了解和谈过程，达赖的姐夫作为汉语译员也随代表同赴北京。

5人小组分成两路向北京进发，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3人由甘孜经康定、雅安到重庆，再从重庆赴京。

另两名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以及达赖姐夫尧西·德措扎西3人从印度经香港前往北京。这三人按照噶厦的意图，带了一封达赖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取道新德里时专程去拜望了尼赫鲁，请他为这次北京谈判给予指导，希望印度能充当汉藏和解的所谓“证人”。前往北京之路是不平坦的，但终于还是启程了。

1951年4月1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谈判代表等人到达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重庆，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和谐友好坦率的气氛中，邓小平政委在西南军区热情接待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土登列门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深有感触地对邓小平说：“共产党确实伟大、英明，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你们能说又能做，深得民心呀！”

邓小平笑着回答：“我们共产党要做的一切，都是为全中国广大人民着想的，我们主张西藏和平解放，为的是西藏繁

荣、稳定、昌盛。”

阿沛·阿旺晋美同意地点了点头，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位很开明，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人，他对邓小平说道：“根据目前西藏的形势，争取达赖能早日回来是上策。不得已时，可以打通从印度来的另外两位谈判代表的思想，以求得和平进藏，以免生灵涂炭，这样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表示赞同阿沛·阿旺晋美的想法，他说：“藏族同胞长期以来受过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对我们进藏有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

邓小平握住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达赖回去对和平进藏大有好处，也希望你们能把道理向从印度方向来的另外几位代表讲清楚。我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

阿沛·阿旺晋美望着这位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西南军区政委，从他那充满信心和诚恳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

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抵达北京，开始了谈判的准备工作。

4月28日，取道印度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等人也到达了北京。这时，他们把噶厦发给阿沛·阿旺晋美的代表证书正式交给了阿沛·阿旺晋美，并把临行前达赖对谈判的一些指示也告诉了这位首席谈判代表。5人小组进行了几次反复的磋商，就谈判中可能碰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阿沛·阿旺晋美坚持要光明正大、言行一致地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协商解决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为此，几个人曾一度发生了争执，由于阿沛·阿旺晋美是首席代表，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责任，

这才统一了意见。

4月29日，中央派出了以李维汉同志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代表团开始了正式的谈判。双方在一种亲切坦率，不含偏见的气氛中开始谈判，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和阿沛·阿旺晋美的爱国立场，使许多原则问题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但是在我人民解放军进藏这一问题上，却许久未协商下来。噶厦当局再三指示，对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不能轻易许诺，因此，谈判一度陷入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张经武等同志按中央的布置，并不马上要求对方立即答应下来，而是提出休会，建议轻松一下，再继续会谈。

第十三章 和平颂

第49节 毛泽东会见西藏代表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

1951年的5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从西藏谈判代表一到北京就非常关心他们。他不仅亲自接见了谈判代表和审阅修改中央的谈判草案，而且特地在“五一”节这一天邀请西藏的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参加首都人民庆祝“五一”的活动。

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西藏代表团，他紧紧握住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北京啊！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

西藏的代表们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向他表示问候和敬意，表示一定尽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

从毛泽东的诚恳态度中，西藏代表开始真正领悟到了中央人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极大诚意。他们当中有人一度害怕休会期间我人民解放军不宣而战直逼拉萨，像清王朝那样派兵一到拉萨就夺权的种种疑虑和担心慢慢消失了。

此间，阿沛·阿旺晋美再次询问了中央进军拉萨的意图。中央代表又一次阐明人民解放军的宗旨，解释了进军西藏的目

剿匪大纪实

的和任务，并拿出历代中国政府的文件，指出中央是有权派军队入藏的。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谈判，西藏代表团终于全部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

5月23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他没有来得及再征询噶厦方面的意见，仍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

签订协议的仪式结束不久，北京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重要消息。新华社的电波很快传遍了五洲四海，顿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那些认为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解决好西藏问题的外国人，目瞪口呆了。

与此同时，西藏谈判代表也把“十七条”的内容发电报给了达赖和噶厦当局。

阿沛等人发完电文回到住所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阿沛坐在椅子上久久的思考着，准备接受亚东方向可能传来的不祥之音。

为了使谈判和签字全过程都让达赖清楚，达赖的姐夫——尧西·德措扎西自始至终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

5月24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西藏代表。他再一次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帮助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去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來找我毛泽东好了！”

一席话像暖流在西藏代表心里掠过。他们连连向毛泽东表示敬意和感谢。毛泽东笑着和气地挥挥大手说：“不用谢我，我们汉藏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同参加接见的还有从青海赶到北京来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他

的堪厅成员。

班禅是第一次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献上了一条哈达，并赠送了锦旗、金盾、长寿铜佛、银曼礼、藏香，以及本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等珍贵礼物。

毛泽东握住年轻的班禅的手，连声说着“好呀——好呀！”

毛泽东与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向代表们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说明了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工作宗旨，就是为了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边说边用生动的语言和手势，为西藏代表们描绘着一个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美好明天，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

几个正在等待着噶厦方面对“十七条”条文内容答复的西藏代表，开初心里一直像压着一块石头，毛泽东的一番话好像春风吹散了阴云，心里渐渐开始安定下来了。

坐在最前边的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对毛泽东的话听得十分认真，深怕漏掉了什么重要的内容。

最后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大声说道：“好哇，今天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的十七条具体内容，还要靠我们的共同努力呀！”

话音落下，掌声四起，怀仁堂更加热闹了……

为了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5月24日晚，毛泽东主席特地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来北京的藏族同胞出席，一起庆祝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协议的签订。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宴会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民族食品，军

乐团奏起了欢快的乐曲，欢迎藏族同胞参加盛宴。

宴会开始之前，毛泽东又同阿沛·阿旺晋美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拿出一本国民党时期出的地图册，指着其中一页的西藏地图，语重心长地对阿沛·阿旺晋美说：“你看，国民党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划到了工布达江的一带，以东是西康，以西为西藏。我们今天还是打算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金沙江以西为西藏。”

阿沛·阿旺晋美看着毛泽东，心里一阵激动，他开始认识到，这位人民领袖已经开始对新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在考虑了。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决策，昌都地区过去实际上也一直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这样一来，就名实相符了。

宴会开始了，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有时候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我们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和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也先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当年轻的班禅大师手端酒杯，身穿黄色缎袍，迈着庄重的

步子走上讲台时，许多藏胞兴奋不已，为这位藏民心中的另一神王鼓着掌。热烈的掌声像波涛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久久不息……

班禅举起酒杯，神态庄严地说：“……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

这是十世班禅在政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讲话，反映出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宴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西藏同胞频频举杯祝酒，互致祝贺，气氛热烈极了。

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篇社论的发表，他亲自修改了几次，并且加写了许多重要的段落和文字，再一次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西藏发展的方针与措施。向世界各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圆满地处理与解决好西藏这一中国内政问题。

社论中强调指出：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民族宗教政策，必须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社论还说：

“……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如果

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就应该负责即时纠正。”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十七条”的正式签订之时，尚未返回拉萨、云集在亚东小山沟里的噶厦成员对北京发来的“十七条”内容一下子愤怒了。他们认为谈判代表“出卖了西藏的地方利益”。

有人恐惧不安地向达赖建议：“现在这样的协议，丧失了我们的所有利益，我们不如干脆从亚东直接出走外国好了。”

达赖也感到事情难办！他四顾左右，只有向神灵乞求，以求保佑了……

当天下午，噶厦要员们在寺院内吵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给谈判代表中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发出了一份电报，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请示就签订了协议。命令他们立即将全部文件副本和会谈材料发回亚东，等待噶厦的决定，并且不许他们返回西藏。

电报发出以后，不少人还在拍着桌子大骂谈判代表无能，要求达赖喇嘛处置他们。年轻的神王一愁莫展，只能对着佛祖祈求庇护了。

电报发到了北京，凯墨和土丹旦达一看电文。火从心头升起，猛地把电报狠狠地扔在桌上，坐在屋里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西藏谈判代表就此紧急进行磋商，一致认为协议的签订没有什么过错，而且觉得噶厦的处理方法太简单，从北京向亚东联系是很费时间的，电函信件要经过印度的中转，并非几天、十几天能办到的事情。

代表们关起门来商量了很久，觉得如果真的要照噶厦的意思办，可能什么也办不成，真吃亏的还是西藏民众。于是便采取一种强硬的语气声称：“北京与亚东的电函信件联系极为不便，不可能事事请示；协议和附件系国家的机密文件，不能用电报发出，只能由我们带回。噶厦当局如果不同意协议的内容，可以另派人来京商谈，我们将按原订方案返藏。”

西藏代表团的电报，是有理有节的，亚东方面接到北京的电报后，又气又无可奈何。他们拿不出正当理由来拒绝代表团的要求，只好接受了这一不想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谈判结果。

协议已经签字生效，斗争远未结束。

毛泽东对于这一情况是早有所料的。协议刚刚签订，他在接见中央准备派往西藏的代表张经武、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时就明确指示：“你们的工作还很艰巨，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时，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才行。”

在中央的精心安排和布署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进展顺利。

1951年的5月，北京是一个美好的春天。这天傍晚，下了一场淅淅的春雨，春雨过后天气清爽，华灯初上时分，一辆吉普车缓缓地开进了中南海大门。

车上坐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往西藏的全权代表张经武。张代表一身整齐的军装，精神饱满的跳下车后，径直向丰泽园走去。

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是应召到这儿来听取毛泽东对进藏工

作的重要指示的。在此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专门接见过他了，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尽管协议已经正式签订了，但围绕承不承认这一协议，如何贯彻执行这一协议，西藏是否能真正的和平解放，还存在严酷的斗争。”

最后周总理站起来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后，目光炯炯地扬起剑眉对张经武具体指示道：“经武同志，此行事关重大，千万要谨慎从事，当前你进藏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火速赶赴亚东，做达赖喇嘛的工作，一定要劝说他回到拉萨去。”

周恩来握住张经武的手再次重复了一句：

“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尽快回拉萨。”

张经武牢记着总理的话，又到中南海听取了毛泽东的指示，他深深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是非常重大的。

毛泽东和张经武长谈了许多，从西藏的历史谈到了现状，从祖国的发展谈到了党的各项政策，一直谈到了夜深人静之时。

最后，毛泽东亲自把张经武送到门口，满怀希望地嘱咐他：“经武同志，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贯彻爱国一家的大政方针，一定要说服达赖回拉萨去。”

在回住处的途中，张经武反反复复的思考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下来。作为党和人民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到西藏去工作的全权代表，他觉得有一种严峻的使命感，有一种非得全力做好工作的责任心。

夜很静，首都的街上已没有人影，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几声火车汽笛，悠长而深远，显得那么深沉，那么平静。

就在北京和亚东之间为协议签订后的事宜各自进行准备

时，十世班禅也在配合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方针进行努力。

5月30日，十世班禅在北京向亚东发去了一封祝贺电，高度评价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胜利签订，十世班禅大师在电报中向达赖喇嘛明确表示：

“……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在亚东的达赖接到班禅的贺电之后，也向他致了复电，复电中说：

“……5月30日来电，此间于6月4日获悉，甚慰……我占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之化身。决定后已公布扎布伦布讷。……现在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实后，先来电为荷。”

在西藏和平解放已成大势所趋之时，自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30年后，这是彼此第一次向对方表示了友好的态度。

达赖和班禅“圆寂”后，他们的转世灵童必须得到彼此间的承认，宗教上才算合法。达赖的复电宣布了正式对班禅的承认，这对于中央代表进藏和和平解放西藏都有着积极意义。

时机成熟了，中央代表踏上了进藏之路……

第50节 张经武将军赴藏，达赖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8军开进拉萨。

1951年6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简装便革，登上了进藏之路，与他同行的有第18军联

络部部长乐于泓等人和将经印度返藏的西藏谈判代表凯墨等人。从北京到亚东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行程，张经武等人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兼程，经广州、香港、新加坡、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绕道于7月14日到达了中印边界的小镇亚东。

这个地处边界的小镇虽然十分偏僻落后，交通极为不便，但位置很重要，是中国通向印度的门户。

在亚东滞留已久的达赖及噶厦成员们住在镇外山上的一个寺院内。张经武等人到达亚东后，暂住在镇上的藏族群众家中。

年仅17岁的达赖虽然是流落在这儿进退两难，但他毕竟还是西藏政教的最高领袖，噶厦当局首先向张经武将军提出了一个会见时的礼仪规格问题。

张经武此时的身份是中央代表，而噶厦仅仅是地方代表，一些噶伦提出的见面礼仪却是按照一般使节来向达赖朝拜安排的，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首席官员，张经武明确指出：“这次会见是中央代表与地方政府的见面，要体现出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确关系，而不能本末倒置。”

面对张代表的意见，噶厦当局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反驳，不得不又向达赖请示，不得不又多次磋商，最后作出了一些让步。

张代表看完噶厦当局重新安排的见面礼仪后，有理有节，而又平心静气地说：“客观地讲噶厦方面的重新安排仍然不能正确的反映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但中央人民政府派我来亚

东，为的是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出于以大局为重的考虑，我们同意这种安排。”

7月17日，在四面环山的亚东小镇边的洞噶寺院前，举行了张经武与噶厦当局的会见仪式。

当神态坦然从容的张经武衣着整洁，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寺院门前时，噶厦的官员们迎上前去向他献了哈达，表示欢迎。

张经武代表首先同噶厦官员举行了初步的会见和交谈。他们在临时支起的大帐篷内休息了一会儿后，由噶伦们陪同，一齐走进达赖的内室会见这位年轻的西藏神王。

达赖的内室内，布置得神圣肃穆，洋溢着浓厚的民族和宗教气氛。达赖坐在较高的位子上，他一见张经武进来后，很有礼貌地走下座位来同张经武握手，互致问候。

达赖请张经武入座后，双方开始了交谈。

张经武拿出一封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亲手交给他，说：“您能亲自派代表赴北京参加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是爱国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对此非常赞赏。”

达赖一听此言，也高兴地笑了起来，他忙恭敬地对张经武说：“还请张代表代我向尊敬的毛主席致以敬意，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双方的气氛是平和而坦诚的，张经武代表就“十七条协议”的贯彻和请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亲政等关键问题，同他直接交换了意见。

谈到协议的贯彻时，达赖表示说：“我想等阿沛·阿旺晋美他们把协议及文本材料带回来后，认真看看，然后交噶厦讨论

并执行。”

在谈到尽快返回拉萨的问题上时，张经武原以为还要做较为艰苦的说服工作，不料达赖喇嘛竟然像早经过了深思熟虑，十分爽快地对张经武说：“请张代表放心，我们已经决定了，就在藏历本月 18 日动身启程，尽快返回拉萨去。”

“好，这就好了！”张经武高兴地点点头，表示十分赞同达赖喇嘛的主张。

原来在张经武抵达亚东之前，面对十七条的签订和中央代表的人藏，噶夏内部已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达赖经师为首的少数亲帝分子上书达赖，策动他外逃印度，并抵毁十七条的内容，他们召集了 30 多人开会想策划进一步的对抗行动。

会上，面对少数人一再攻击和谈代表与和谈内容的言行，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一拍案桌站了起来，大声反驳道：“你们不能随口胡说了。我们派出去谈判的代表都是在西藏上层中有威望、有本事的人。他们决不会仅仅为一杯酒就牺牲西藏民众的利益，‘十七条’的内容我看很好，应该遵守。”

“不行！西藏的政教大权已经丧失尽了，达赖喇嘛不能再回拉萨，应该到国外去斗争。”顽固分子与群培土登等人吵了起来，会场顿时炸开了锅，一片混乱。

“要出国去，活佛一定要出去”

“不行，我们不能让活佛出国！”

这时另一位显赫人物则活雪康·顿珠多吉站出来了，他坚决支持群培土登的意见，义正辞严地大声问众人：“你们想一想，夏格巴原来说什么到印度去将会受到如何热烈的欢迎，可

事实上呢？我们在亚东困了这么久，已到了他们的国门口上，为什么一直看不到他们的行动呢？依靠外国来帮我们是不会有什好结果的，我看还是祖国可靠。”

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困在这边界小镇上的艰难处境使许多人渐渐开始转向了。

群培土登又说：“我们还是回拉萨去才有出路。”

“对！要走就往回走，我就是再吃多大的苦头也要回拉萨去。”顿珠多吉也大声赞同道。

就此，多数人表示了赞同十七条，请达赖喇嘛回拉萨去的态度。会后把这一结果报告了达赖，并且又请达赖按抽签结果来重新定夺行动方向。

万幸，抽签的结果和会议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神意与人意都统一起来了，少数亲帝势力的梦想被打破了，达赖终于决定重返拉萨。

在达赖与张经武会见后，经过一番短暂的准备，滞留亚东的达赖终于重新踏上了返程。

8月17日，中央代表和达赖一行返抵拉萨。

张经武代表8月抵达拉萨后，便单枪匹马地开始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他把全部精力用在上层官吏和贵族僧侣间的奔波宣传上，对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宣讲，使许多人从恐惧、疑虑的心情转为支持“十七条”的立场。

按照西藏的惯例，张经武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仍然抽出时间到拉萨各大寺院去发放布施，把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到实处，得到了多数僧侣与民众的支持。

1951年9月9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先头部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拉萨。这天上午，在拉萨城外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

在鲜艳夺目的红旗引导下，一队队解放军将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全副武装，迈着庄严威武的步代，雄纠纠气昂昂的开进了这座著名的高原古城，得到了各界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

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率领的第18军主力部队也胜利到达了拉萨，从此，这块古老的土地宣告和平解放，开始了它的新的一页。

随着解放大军的正式进驻西藏，拉萨混乱的政局有了好转，但是上层人物中的敌对势力仍然在到处活动与进行反宣传，加上一些群众长期以来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一时还不能对解放军有正确的认识，拉萨市区内，时常发生一些敌视、侮辱我进藏部队的事件。

本着以大局为重的原则，部队严格执行了民族、宗教政策，没有与之发生对抗和冲突。

10月20日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再三要求下，噶厦当局终于同意召开300多人的大会，听取赴京代表报告会谈全过程及“十七条”的内容，讨论对“十七条”公开表态的问题。

面对少数人的无理责难，阿沛·阿旺晋美坦诚地向与会全体人员说：“我们五位代表愿意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作保证，‘十七条’的协议对达赖喇嘛的宏业，对我们西藏的政教，对全藏的人民利益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大会能证明协议有什么损害，则请惩办我们不经请示、自作主张之罪”

土丹旦达也站起来补充说：“我们签订‘十七条’是一件

很重大的事，如果是成功的，对达赖和全藏民众都有极大的好处，如果真是不利的，我们可用生命和财产来抵罪。”

一番话语入情人理，说得不少人点头称是。经过大家的认真讨论，会议认为“十七条”的确对西藏的前途是有利的，是很好的，应该表示拥护。

会上，通过了呈报达赖的报告，报告说：

“……签订的‘十七条’，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

达赖喇嘛看了这份报告，心情是复杂的。在张经武代表反复耐心的说服下，终于答应公开表态拥护“十七条”。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电文中说：

“……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侣、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10月26日，毛泽东从北京复电达赖喇嘛，感谢他对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努力，这使得年轻的达赖再一次感到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极大诚意。

随着达赖和噶夏当局向国内外舆论公开表态拥护“十七条”之后，西藏的局势开始日渐明朗化。一方面多数爱国人士和民众准备真心诚意地拥护解放；另一方面顽固势力也更加紧了活动，但我进藏部队和全体人员，信心坚定，更加尽力地开始了贯彻“十七条”的工作，书写西藏新的历史一页。

西藏和平解放了，巍巍喜马拉雅山展示了新颜，滔滔雅鲁藏布江唱出了欢歌，古城拉萨也焕发出了青春风采。

但是西藏还远非歌舞升平之地，亲帝势力分裂分子同人民力量的较量远未完结。

随着我数千人民解放军和内地干部开进西藏，粮食供应矛盾尖锐的摆在了面前。往拉萨等地运送粮食，全靠人背骡驮，后勤工作相当艰巨。尽管人民政府投入了一个进藏人员由 6、7 个后勤人员保障的巨大代价，粮荒还是发生了……

拉萨市区，一些破坏分子到处造谣中伤我进藏人员和部队，贵族们也屯积粮食，抬高粮价，以造成市民对我党我军进藏的不满情绪。

面对困难局面，我进藏人员采取了紧急对策。一边派人数次向噶厦当局交涉，指出有人故意破坏局面，把几百万、上千万斤粮食屯积腐烂，制造混乱，一边希望噶厦当局能从大局着想，帮助我军尽快筹粮。

在义正辞严，唇枪舌剑的交锋后，噶厦当局不得不答应为进藏部队筹粮，并且出面去安定民心。

在进藏部队最困难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不顾威胁和压力，毅然打开自己家的粮仓，献出 14 万公斤青稞面给部队救急，他还主动出面向各寺院担保，请寺院为部队筹借一部分粮食。

阿沛·阿旺晋美挺身而出的爱国行动教育了不少人，他们也主动出来帮助进藏部队，这场可能导致危机的粮荒终于安然渡过去了。极少数顽固势力面对阴谋又一次被挫败，仍不甘心失败，一个更大的阴谋又在酝酿着……

1952年3月，传统的大法会期间，几个打着“人民议会”旗号的人向布达拉宫递交了一份所谓的《西藏人民请愿书》，要求修改“十七条”，撤走解放军。一时，拉萨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4月1日上午，噶厦当局派人前往张经武代表驻地，态度强硬地呈交了这份“请愿书”。

当晚，千余藏军和武装喇嘛突然出动，团团包围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张经武住所，并在墙上、屋顶上都架起了一挺挺机关枪，枪口直对着我驻藏人员。与此同时，武装的藏兵也包围了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这一突变，张经武镇定自若，他一方面电话通知张国华军长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把所有的噶厦要员请到了他的住处。

张代表镇定地指着外面重重包围，全副武装的藏军，严正地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武装人员突然包围这儿，这是有预谋的行动，是一次分裂祖国的阴谋，背后有人策划，对比西藏地方政府必须立即制止。”

噶伦们一个个都被张经武的镇定自若和大义凛然所震慑了……

张代表进一步语调严肃地说：“我们是在严格按照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办事，力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有人执迷不悟，一味扩大事态，我们将被迫自卫，其后果将由肇事者自负！”

在场的噶伦们这时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连声说要“好好商量”，“不要冲突起来，伤了和气”。

在这紧要关头，北京的毛泽东再次对西藏的形势进行了精辟地分析，指出：“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侣、人民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做好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经武又把全体噶伦请去。他走到窗口，背靠着楼梯说道：“伪‘人民议会’破坏团结，违反协议的行动，我们已掌握了可靠的证据，证明是二司曹暗中策划的。他们干了大量坏事，我们一直忍让，现在已到了不能再让的地步了。”

张经武指着身后窗外的楼下说：“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现在我们已无法与二司曹合作相处了，请把我的话向达赖喇嘛传达，请他作出处理吧。”

紧接着，张经武又决定亲自上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

高耸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悠久文化艺术和历史的杰作。这里是历世达赖的行宫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今天，布达拉宫内外重兵布防，从山上到山下的长长阶梯两侧，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远远望去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藏军士兵。

行宫内外，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达赖喇嘛在这儿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地位和尊严的至高无上。

张经武，这位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将领面对满山满坡气势汹汹的藏军枪口毫不畏惧，他只带了两位警卫员和一名藏语翻译，从容不迫地迎着几百支枪口，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布达拉宫。藏军士兵们简直被张经武那种凛然的正气所震慑住了，一个个手端长枪，不知所措。

达赖喇嘛在宫里目睹了这一场面，不由得也对这位中央代表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意。他站起身来，主动向这位临危不惧，

从容不迫的中央代表走去，把他迎进宫内坐了下来。

张经武神态严肃，他首先向达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这一事件的有关指示，然后有理有节地彻底揭露了伪“人民议会”的背景和阴险用心，一针见血地向达赖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在张经武面前，达赖喇嘛实在拿不出任何理由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二司曹辩解了，他表示一定要认真严肃的处理这件事。

果然不久，达赖接见了噶厦全体成员，宣布撤消了这两个分裂活动制造者的司曹职务，正式解散伪“人民议会”。

这一事件的解决，给了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开展团结爱国人士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藏的政治局面由此从动乱开始走上了逐步稳定的道路。

到此，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性壮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步力量和爱国势力渐渐强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新西藏的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 51 节 “治安会议”，“军火被劫”，叛乱分子挑起邪恶之火，美国向西藏地区空投武器装备及物资。

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性记载中，西藏的和平解放给整个大陆版图的新生记上了最后的光辉一笔。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不甘心失去他们千百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美妙天堂”，1959年3月10日，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国家，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立场，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武装叛乱。10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平息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斗争。

从1959年3月20日开始，到1961年11月为止，我军在中央的统一号令下，同西藏人民一起，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坚决地贯彻了中央关于“边平边改”的方针，一边平息武装叛乱，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坚持军事打击、政治争取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彻底全面地夺取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驻藏部队仅仅用了47小时就完全平息了叛乱分子在拉萨的叛乱行动。首先摧毁了反动上层集团的指挥中心，而后又全面进行清剿，一举捣毁了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的另一指挥中心。以后又进一步平息了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的叛乱活动，到1961年年底彻底肃清了其余边沿地区的武装叛乱，夺取了在中外当代军事史上在极为艰巨和复杂局面下的进行平叛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庆祝平叛胜利的万人大会上，我军负责人向全世界宣布：

“随着平叛斗争的胜利，百万农奴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在平叛地区深入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了三大领主的统治，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西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太阳照到了千年雪山，云层中的阴霾却还没有完全消散，斗争和较量时时在展开着……

百万农奴急切地欢迎解放军工作队进驻各地各村寨，尽快

搞民主改革，早日砸碎千年铁链。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有关条款是这样规定的：

“有关西藏的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要采取同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

有关条款还规定：

“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祖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

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觉醒的百万农奴急切盼望早日进行民主改革，呼声遍及全区，无以数计的藏族群众，争相在他们起草的《强烈要求早日在全区实行改革书》上盖上自己的手印，并在西藏的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一切极大地震动了西藏的上层统治集团。

一个不平凡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照在布达拉宫那辉煌的金殿上面，达赖喇嘛正在做着清晨例行的佛事活动，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报告：

“报告，宫外有一大批民工和僧侣代表要求喇嘛接见他们，劝也劝不走。”

“把他们赶出去好了。”管家不屑地说。

“不行，他们人很多，说是代表了几千名民工要向达赖喇嘛呈递什么文件。”

“什么文件？”达赖这才抬起了眼皮问了一句。

“我不清楚。”

“那就叫他们进来。”达赖下了指示。

几位民工代表和下层官员代表被领进了达赖的行宫，他们

向达赖呈交了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文件。

达赖打开一看，渐渐地变了脸色。

这是一份以修建西藏当雄机场的 6500 名藏族民工和下层官员全体名义写成的《要求早日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报告》。文稿中充分表达了藏族人民再也不甘受封建农奴制度压迫欺辱的强烈愿望，呼吁西藏上层集团早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民主改革。

达赖看着这份文件，久久不发一言，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之中……

不断涌起的改革呼声，形成了一股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时代潮流。“17 条协议”明确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这一时机，应该说已日渐开始成熟了。

1955 年 3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根据中央精神，西藏组成由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解放委员会、中共西藏工委参加的“三面四方”。而后这“三面四方”又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反复酝酿，充分协商和多方准备，取得了一致意见。

1956 年 4 月 22 日，带有政权性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了。中央派出了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应该说，这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是，在这道初升的曙光而前，仍然沉积着浓厚的阴影，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曲折和艰难。

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上层分子，越来越对“十七条协议”开始了由暗到明的公开反对和破坏。他们千方百计阻碍着西藏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当时中央还是采取极为稳妥和谨慎的态度。

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上层拼死维护着“美妙而神圣”的农奴制度，而帝国主义势力极力鼓动的“西藏独立”活动，一直在明里暗里进行着，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尤其是有些人公开打出了“保卫政教”的旗号，更有着不可轻视的欺骗性和煽动性。

我军进藏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随时警惕着外国势力对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事务的暗中插手，并反复耐心地规劝着西藏上层人士不要做不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否则将后悔莫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起来。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暗中操纵下，妄图再次在达赖与班禅两人中制造不和，从而搞倒反帝爱国立场坚定，拥护中央的班禅大师，造成西藏解放后的大混乱。

1955年秋，分裂主义者首先演出了一起树立假班禅的政治闹剧。

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循化找到了转世灵童宫保慈母，并经过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确立为十世班禅，这一切是完全符合西藏历史惯例和宗教程序的。

但在此同时，西藏噶厦政府在四川理塘也找了一名灵童，但未被确认，又不甘放弃，于是他们就设法将这名灵童安置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甲康村，立为“列当活佛”。现在，分裂

主义者又将这个列当活佛抬了出来，说成是“十世班禅”的真正替身。

于是乎，一场谣言大战就在西藏全区展开了。有人大肆渲染说：“由解放军护送回来的班禅是假的，是汉人强加给西藏的。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是列当活佛。”

1955年10月初，这股谣言风浪形成高潮时，假班禅列当活佛突然从扎什伦布寺失踪了，去向不明。

为此，在我西藏工委办公室内，张经武将军召集了紧急会议，与有关领导磋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

“根据情况分析，假班禅很可能被人裹挟逃往国外去了，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在国外把他列为真班禅，”有关同志在会上分析道。

“是的，这很可能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如果假班禅出逃成功，将会严重损害班禅大师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望，对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局势带来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与会者个个心急如火，纷纷要求西藏工委与解放军进藏部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分裂分子的政治阴谋。

经过紧急磋商，西藏工委领导又请示了中央，决定立即向各边境口岸、关卡致电通令，要求我军各边防哨卡马上组织力量，严密查截，一旦发现假班禅的行踪，立即用适当的方式坚决劝阻其出逃到国外。

一道道电令发出了，一个个边卡戒备加强。

10月24日上午，在位于中国和锡金交界的边境口岸的青

丕村桥头的东侧，我国亚东外事处分处，一片熙熙攘攘，人流不断。

那些进出口岸的商人、马夫、边民们挤在窗口等待着办理出境的签证时，有三个商人打扮的藏胞在一边静静的等候着，神色显得有些不自在。

他们的行踪引起了边防人员的注意，当他们等到中午12点过境人少了些，上前办理签证时，两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和蔼地走了上来。

“对不起，先生，我们有点事想找找你们。”

“有什么事，我们等着出去办货呢！”

三人勉强来到室内，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经过藏族边防站长卡达十几分钟的耐心热情的谈话，三人中那位中等身材，白净脸，行态拘束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终于揭开了自己伪装的商人身份，他羞愧地说：“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假班禅列当活佛，这次是他们安排我暗中过境到印度去的。”

“你到印度去干什么呢？”

“我……我也不清楚。”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答应别人强加给你的事情呢？”

“我不好意思，很多人都说我是班禅，但我最清楚我不是什么班禅，也不希望自己去争班禅的位置。”

经过反复的宣传我党的有关政策，列当活佛同意不再去印度了。为了防止意外，我方同意他暂住亚东，然后由西藏工委派人前来，在缜密的措施下将列当活佛护送回日喀则，满足了这位活佛的愿望。

叛乱前有人制造的这起假班禅事件破产了……

为了保持西藏的稳定，周恩来还在访问新德里期间会见了达赖和班禅。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前往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这个佛教盛事前几天，拉萨的空气极不正常，已转入地下活动的分裂势力组织“人民议会”恢复了公开的活动，他们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造谣鼓动，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一时间，拉萨市区风云滚滚，山雨欲来……

年底的一天，我军领导接到了分裂主义势力企图一边在西藏密谋武装叛乱，一边企图在印度包围达赖和班禅，要求他们留在印度公开出面搞“西藏独立”，把达赖和班禅推到没有退路的境地的有关情况报告。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张国华、张经武两位将军毅然决定立即向北京请示，并组织力量与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央为了表明最大的诚意，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宗旨，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再次决定作出重大让步。

中央决定：

“尽量说服西藏已觉醒要求尽快进行民主改革的广大藏族群众，并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

这就是说，为了用和平的方式推进民主改革，中央把耐心

等待的期限一直延长到了 1967 年。

但西藏反动上层人士把局面越搞越复杂，拉萨的形势日渐动荡不安。此时，达赖和班禅都在印度，西藏的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为此，中央电令张经武、张国华：

“我驻藏各人民解放军部队指战员，在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的同时，要尽力团结藏族群众和上层爱国力量，投入更加艰巨的政治斗争。”

几乎与班禅和达赖同时在印度访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临时决定在自己的访问日程上增添一项新的内容——会见达赖和班禅。

周总理在新德里与达赖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别向他们转达了中央准备推迟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决定，希望他们携手团结，为建设新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达赖听了总理的谈话，表示：“一定认真考虑中央政府的意见。”

班禅则坚定地向周总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愿意尽全力执行好中央的指示，走爱国爱人民的光明道路！”

周总理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和坦诚的态度，为西藏局势的转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连一些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访印期间对达赖和班禅的谈话，其作用不可低估……”

班禅大师首先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他不顾国内外分裂势力设置的重重阻碍，机智勇敢地排除了干扰，毅然回了西藏。

随后不久，达赖喇嘛也离印回国。

又一起分裂势力的阴谋被粉碎了。

西藏反动上层对一起起阴谋被粉碎并不甘心，尽管中央人民政府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仅宣布推迟民主改革，而且还减少了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分裂活动和叛乱活动，一场更大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1957年，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上层反动分子，在噶厦政府的默许下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的叛乱组织，以统一策划和指挥全藏的叛乱活动。

1958年4月，这个组织与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三大寺及藏军中的首恶分子，分别签订了叛乱计划和同盟书，各自划定发动叛乱的地区。从此，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与流血事件开始了。

6月，山南地区来了拉萨的叛乱分子，打着保护宗教的幌子，成立了所谓的“卫教军”。

7月，叛乱分子在格桑地区以西的争莫寺附近，伏击我军的运输车辆，造成重大损失。

9月17日，叛乱分子又在麻江伏击西藏军区门诊部的车队，将我军16名医护人员全部杀害。

12月18日，叛乱分子在贡噶再次伏击我军车队，杀死我军官兵37人，杀伤22人。19日又在扎郎伏击我军执勤小分队，杀害了我军副团长殷春和以及官兵96人，杀伤13人，制造了一起罕见的血腥暴行。

1959年1月，叛乱队伍又围攻中共扎木县委，杀害我方干部家属，造成重大流血牺牲。叛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

恶不做，仅在墨竹二卡地区，就有 84 户藏族群众被抢被害。在泽当附近的一个村子，叛乱分子奸污了大部份妇女，连老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在乃东，叛乱分子竟然把群众的心脏挖出来示众……

这场血腥行动从康巴藏区逐渐扩大，一些被蒙骗者在农奴主高额的悬赏下也武装了起来。

刚刚被我军修通的公路被破坏……

进藏的大批军用民用物资被抢、被烧……

新架起的桥梁被拆毁、烧坏……

我军驻地和不少工作队驻地被袭击……

更有甚者，我军单独执行任务的战士和国营农场的职工，与工作队接近的群众以及工作队队员，常常遭到叛乱分子的偷袭、围捕和残杀。叛乱分子对抓住的人严刑酷罚，用最野蛮的挖心、点天灯、剥人皮等残忍不堪的方式将他们杀害，罪行令人发指……

邪恶与残暴在蔓延着、扩大着。

面对我方的严正态度，达赖指示噶厦政府官员协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一起去康巴藏区做工作，但噶厦政府的官员在昌都对叛乱者进行了安抚。

在噶厦政府中，有的人本身就是策动支持这场叛乱的头目。其中噶厦政府常务负责人孜本朗色林就与叛匪勾结，以佛事活动为名，给叛乱分子提供经费。到 1959 年年底，由康巴藏区开始的叛乱已扩大到了山南地区。

达赖指示噶厦政府，通过西藏工委向中央请示：“请中央直接出面处理康区的叛乱问题。”

剿匪大纪实

中央当即明确回电：“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但西藏的社会治安，还是应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负责解决。”

达赖授意噶厦政府改革局、政府官员、藏军军官为主的“治安会议”组成机构“解决这一问题。”

在噶厦政府的议事厅里，灯火明亮，各路官员纷纷赶来，但均属一些分裂势力的代表。会议开得神秘阴森，许多议题吵成一团，这个议论“治安问题”的会议成了支持叛乱要挟中央的会议了。

“叫我们地方政府出面平息叛乱也可以，但中央必须给钱给武器，有了武器一切都好办了。”

“对，叫中央拨枪支弹药，越多越好，不行‘借’也行，我们需要大量的武器。”

“应该让解放军与叛乱者谈判，让他们也尝尝康巴人的厉害才行，至于说武器嘛，只要我们到了手，怎么用他们管不着。”

“对，有了枪就有用处，到手后再看情况。”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治安会议”开完时，所有人得到的指示竟是“严格保密，会议内容不得外泄，大家必须用生命来担保”。

几乎就在“治安会议”召开的同时。1958年6月的一天，山南地区叛乱者首领贡布扎西率领1000多名骑兵，打着“卫教志愿军”的旗帜，率人南木村县包围了甘丹曲郭寺庙，毫不费力地“抢劫”了噶厦政府四年前破例设在这儿的一座秘密军火库，将封存完好的500多支英式步枪、两门小炮、数挺机

枪、一批德式步枪和大量的弹药“洗劫”一空，堂而皇之的全部拉走。

然后，贡布扎西还在寺内大院公开宣布：“凡是参加队伍的人，每人可马上得到一支步枪和 53 两藏银，家属还可以论功行赏。”

第二天我西藏工委得知了这一情况，根据许多证据表明这起“抢劫军火库”的事件完全是噶厦政府与叛乱分子内外勾结上演的一出闹剧，当即向他们进行了严正的交涉。对方支吾着搪塞了事。

1958 年开始，反动上层分子导演策动的这场武装叛乱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先是在康区昌都一带，尔后丁青、黑河、山南均出现了叛乱的武装分子，叛乱一步步很快扩大到了全区。

这年秋天，叛乱分子公然在山南地区成立了他们所谓的“根据地”，打出了“自由独立卫教志愿军”的旗号。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尽最大努力保护着国家利益和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西藏军区的会议室内，各地报来的叛匪残害人民的材料使得指挥员们愤慨无比，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声讨叛乱分子的罪行。

一位干部用愤怒地声音向大家报告着说：

“……这些叛乱分子名为‘卫教’，实乃烧杀抢掠。他们恫吓、威胁、裹挟甚至绑架进步的宗教上层人士，迫使他们参加叛乱。不少活佛被囚禁、毒打、甚至杀害，山南的叛匪竟用银元化成的水把一位坚持爱国立场的活佛灌死。他们占据寺庙，

剿匪大纪实

抢掠僧侣财产，还奸淫僧尼，对一些年幼的僧童也不放过，实在太残忍了。”

从黑河和浪卡子地区赶来的同志报告说：“叛乱者强迫各地的群众给他们提供粮草、牲口、酥油，还把人民政府发给各宗（县）的救济金一抢而空。德格的一个叛匪为了抢粮，竟然一口气杀了七位藏族百姓，他们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恨，群众纷纷自发起来与叛匪斗争。有一次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包围了一支叛匪队伍，把二十几个叛匪捆起来扔到了河里。”

听完大家的情况汇报，军区领导同志站起身来，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说道：“同志们，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这场自小而大的武装叛乱是有深刻背景和国际势力插手的，这不是一般简单的骚乱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听从中央的指示，严格执行各项政策，统一行动。所有部队要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

我军面临的这场武装叛乱的确复杂尖锐，除了西藏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划外，国外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也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1950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华盛顿宣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自己的国土西藏是“一种入侵行为”。英、印某分裂势力也长期插手西藏，给分裂分子提供经济、军事、政治上的支持。

当这场叛乱开始前后，美国政府更是直接“有力的支持”这场叛乱。他们不断向西藏地区空投各种物质、武器和人员。仅在昌都地区的一个县内，美国军用飞机就数次空投，扔下了

八个架次的军用物质，其中有大量的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枪支、电台、服装和弹药。

拿着美式装备的这些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了，他们公开向人民解放军部队发动进攻和袭击，疯狂屠杀我进藏干部、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

1958年12月，叛乱分子对驻守在泽当地区的我军某部发动突然袭击，我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祖国这片神圣的土地。

在越演越烈的进攻和袭击下，我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开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一次次叛匪的袭击。

疯狂的叛乱者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为我军忍让可欺，变本加厉地推进着他们的全面武装叛乱计划……

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队伍开始不断汇聚，并向拉萨靠拢。

“人民议会”分子在拉萨的活动达到高潮，各种传单、报纸、舆论弥漫了拉萨的大小街头。

各种武器装备和叛乱人员秘密的、公开的潜入了拉萨。

大量由国外敌对势力提供的叛乱物质也被人偷偷运进拉萨附近的大小寺院和有关地点藏匿起来。

连日以来，西藏地方政府连连召开各种秘密会议，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内各种神秘人物进进出出，一派紧张气氛。

此时，藏军的全部主力已进驻了拉萨。

西藏的地方军队——藏军，曾经在多次抗御外侮，捍卫祖国疆土的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过光辉的一页。但随着藏军的领导权逐渐被西藏上层亲英势力所控制，一切效仿印

剿匪大纪实

军的殖民武装模式，逐渐从外观到实质都发生了异变，开始成为一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镇压农奴起义，残害劳苦群众，从事分裂活动的反动工具。

截止1950年，藏军编制共有17个代本（团），兵力17500人，这支用英式装备，毫无组织纪律，缺少正规训练，形同百姓，酗酒斗殴，拖儿带女，战前须占卦问卜，队伍中充斥着60多岁士兵、50多岁排长的怪胎军队，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

1950年10月7日，我人民解放军对叛乱藏军发动全面反击，犹如摧枯拉朽，藏军不堪一击。

战斗在沿金沙江正面藏军摆开的1000里防线和西昌的700里纵深地带激烈展开，7月14日，战斗全部结束。

据《解放昌都战报》公布：

“昌都战役历时18个昼夜，经过各种规模的大小战斗21次，全歼藏军主力6个代本（团），完全摧毁其余3个团的战斗力，共歼敌578人。格桑旺堆率领藏军第9团600余人阵前起义。吕部守军在溃逃过程中，又有2700多人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共缴获山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50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质。”

正是昌都战役的胜利，促成了西藏和平解放计划的实现，促使藏军开始了另一种道路的选择。

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一部份。”

但由于西藏上层势力和国内外分裂主义者的极力干扰阻碍，这一改编计划一直没能实现。

1952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又自行将藏军剩余部队中的老弱病残裁减，保留了五个团的建制，共有兵力3200人，其中有178名军官。西藏地方政府极力保存这支武装，将他们始终控制在自己手中，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表明我党我军的诚意，尽管没有改编，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军衔时，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仍然为藏军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代表国防部宣布向藏军各级军官授予相应的解放军军衔，并享受同样的解放军军官待遇。

在此之前，已经担任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阿沛·阿旺晋美被授予少将军衔，昌都战役起义的格桑旺堆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获得二级解放勋章。

其余藏军五个团的6位（代本）团长，当时均被授予中校和上校军衔。

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和藏军中的顽固派，并没有被中央的诚意所感召，他们一直在密谋拉起这支武装搞叛乱。在1958年大规模叛乱全面爆发的前夕，驻扎在拉萨的2600余名藏军官兵，按照噶厦政府的密谋，积极进行了充当全面武装叛乱战斗主力的各种准备活动。

这些目空一切的藏军，秘密分成若干行动支队，到处收集情报，绘制地图，侦察我军的动向，他们甚至把额外部分的武器装备和枪支弹药偷偷地运到各叛乱组织的驻地，一一分发给潜入拉萨的叛军队伍和市区的“卫教军”反动组织。

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脱我军的眼睛，不少藏族同胞也纷纷主动向我军指战员提供叛乱分子的活动行踪，要求协助“金珠玛米”的行动。

我军领导同志坦然的告诉这些真心拥护西藏新生的各阶层人士及藏族群众，“凡是背地里干违反‘十七条协议’的人，不管他们自认为自己有多大本事，到头来最终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分裂主义分子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决不会看着他们破坏国家利益不闻不问的。”

尽管我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反复向蠢蠢欲动的阴谋分子发出一次次严厉的警告，但自恃有外国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还是我行我素。

一场流血的政治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藏历3月初，是西藏人民传统的“驱鬼节”。

这一天，布达拉宫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跳神活动，应达赖喇嘛的邀请，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各位首长前往布达拉宫，观看了隆重的跳神表演。

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西藏军区首长出于礼节，向达赖喇嘛也提出了回请。

“我们军区礼堂最近也有演出活动，请达赖喇嘛抽空来军区礼堂观看我们文工团的节目。”

“好！我一定在参加完藏历1月的传召大会以后，就来军区礼堂观看节目。”

军区首长和达赖喇嘛相约之后，友好地握手告别。

但就是这样一种正常的来往礼节，竟然成了噶厦政府煽动群众情绪，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借口。

达赖喇嘛刚刚回去不久，一片危言耸听的谣传立即传遍了拉萨的大街小巷，闹得来人心惶惶，局势大乱。

“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要进军区，这是解放军设下的圈套要抓他，大家快起来保卫达赖喇嘛！”

“解放军借请达赖喇嘛看演出，要武装绑架他，人民快去阻拦他！”

“解放军要对达赖喇嘛下手了，大家千万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一时间，整个拉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不明真相的人纷纷涌上街头，要求保护神王，局势顿时呈现出险恶紧张的气氛。

在混乱中，反动上层集团唆使叛乱分子乘机对前去迎接达赖的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同志大打出手，把他打成了重伤，并残忍地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爱国人士索郎降措，灭绝人性的将其拖尸示众。

当天下午，叛乱分子指使一些人在大昭寺、八角街游行示威，高呼：“汉人滚出去！”“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气焰汹汹，不可一势。

紧接着，叛乱首脑人物在罗布林卡开会，由绒郎包、堪仲土登降秋、孜本雪苦巴、索安旺堆等人主持，一致决定宣布公开叛乱，“从10日起就正式站出来，同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大干一场！”

此时，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藏军和三大寺的武装喇嘛共计7000余人，在叛军指挥部的号令下，一举占领了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要地，并大筑工事，将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自治区筹委会团团包围，作好了一切进攻准备。

叛乱分子在拉萨市内抢劫财物寺庙，破坏公共设施，奸污尼姑，焚烧房屋，捣毁村舍。一群叛军将噶丹群科寺的尼姑奸污后当场杀死。在尼木等地，他们将群众仅有的粮食一洗而光。在大昭寺附近，他们将群众的牲口也全部抢走，还奸污了甲兴村的所有青年妇女。

一伙人闯入大昭寺内，在经殿内拉屎撒尿，摔坏佛像，屠杀喇嘛，抢劫文物。一次就抢走 30 多尊金佛像，还当场枪杀了护寺的饶钦巴喇嘛，打伤了格桑旺杰等喇嘛。

整个拉萨市内外，一片黑云滚滚、腥风血雨的恐怖气氛。西藏广大群众对叛军深恶痛绝，他们一致反对叛乱，恳切要求解放军采取行动。但此时，中央还在尽力做着工作。

3 月 9 日深夜，西藏军区首长接到了叛乱马上要发生的消息，全体指战员无不愤慨万分，他们纷纷向军区领导请战，要求与那些不可一势的叛乱武装拼个高低。

“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忍无可忍了。”

“对！只要军区一声令下，我们完全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叛乱武装。”

“现在他们已完全控制了各地的制高点 and 主要交通，我们部队的驻地已完全隔绝，请首长快下命令！”

“下命令吧！”

“下命令吧！”

各部队指战员早已怒火中烧，整装待命了。

但此时的张国华司令员和张经武将军却出奇地冷静，他们严令各部队不要开第一枪，以最大的忍耐做好工作，用行动证实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指示的最大诚意。

3月20日凌晨3点45分，拉萨的叛乱指挥部自认为“胜利在握”，下达了向西藏军区、中共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几千名叛乱分子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分成三路向我方冲了上来。

枪炮声震动了拉萨整个市区，到处是横飞的枪弹和弥漫的硝烟，此时，我军的全面反击和坚决的平叛战斗也正式宣布开始。

“坚决，迅速、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央的命令下达了。

早已作好准备的军区司令员手握电话机，斩钉截铁地向各部队命令道：“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

“乒乒——”两声信号枪响起，上午10点正，已经与叛军相持了6个多小时的我军部队，向着叛军猛烈地开了火，并从几个方向向包围我党政军机关的叛军冲了上去，很快将他们团团的反包围住。

叛军先是凭借地形顽抗了一阵，但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很快便不堪一击，纷纷溃逃四散。我军进攻部队乘胜追击，将市区内的各处叛军分割开来，完全控制了局面。

11点左右，驻郊外的我军平叛部队按照军区首长的命令，调集炮兵向叛军控制的药王山等叛军主要据点一阵猛烈的炮轰。愤怒的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在叛乱分子头上，敌人阵地上一阵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轰隆隆的炮火掩护下，我军步兵分成两路向着药王山猛冲上去，经过了一番激战后，先头部队夺取了制高点，并且切断

剿匪大纪实

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打乱了敌方的阵脚……

捷报传到了我军司令部：

“药王山主阵地完全被我军控制。”

“叛军主力已逃散，只有零星抵抗在继续。”

“市区的公路要道已夺回，敌军在逃窜。”

面对着迅速扭转的战局，军区首长抓住时机，果断命令部队：“乘胜追击，尽快夺取叛军的指挥中心——罗布林卡。”

罗布林卡是达赖的夏宫，叛乱前两天，达赖出逃后，叛军在这里设立了总指挥部，并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叛乱武装，此时叛军头子恶狠狠地命令道：“谁守住阵地就重赏谁，谁要逃跑就杀他全家！”

顽固的叛乱分子用重火器封锁了宫前全部道路，并在外围设置了若干个火力点据守。

我平叛部队占领药王山后，马上调集一支力量向罗布林卡外围据点发起进攻，一一扫清了外围据点，使叛军总指挥部完全暴露在我平叛部队的火力打击下。

19点30分，随着一声令下，我军向罗布林卡发起了猛烈冲锋，步步逼近宫门。叛军眼看抵挡不住，外逃又无路，只得缩回罗布林卡宫内，我先头部队乘势一举随其突入宫内，与叛乱分子展开了一场近战。顿时，罗布林卡内枪声大作，四处冒烟，敌我双方部队凭借宫内建筑物撕杀着，战斗十分激烈。1小时后，我军西头部队也攻入了院内，叛军再也无力抵抗，纷纷逃跑，弃路奔命而去。叛军总指挥部被彻底粉碎，叛乱武装群龙无首了。

黎明时分，叛军在拉萨的主要据点和主力武装随着药王山

阵地和罗布林卡的失守，走向了全面溃败之路。

凌晨，军区首长命令：“集中兵力，迅速扫清市区内的叛乱武装。”

攻打罗布林卡的步兵将肃清残匪的任务交给了汽车兵分队后，立即按统一部署，投入了市区内的战斗。此时，军区调动的部队，于3月21日早上7点以前，对拉萨市区的叛乱武装形成各路合围之势。

一部分叛乱武装见大势不妙，开始向郊区夺路逃跑，路上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进行着垂死的顽抗。

而市区内的顽固分子和藏军部份主力，仍然凭借着寺庙和坚固的民房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一场激烈的巷战就这样你死我活地展开了……

盘踞在小昭寺的叛乱武装气势很旺，他们公然在寺庙顶上打出了“雪山狮子旗”，颇为嚣张。这些叛乱分子边用枪猛烈射击，边大声乱叫着：

“汉人快滚出去！”

“我们要和你们血战到底！”

为了坚决打下这伙叛乱分子的嚣张气焰，下午3点正，我军将他们彻底分割包围在大昭寺与小昭寺之间后，开始发动了进攻，激战半小时后，歼灭了这一股叛乱武装。

此后，我军组成小分队相继向市中心挺进，到下午4点30分，先后攻占了恩珠仓宅、郎加多吉宅、木耳寺等地的叛乱武装据点。

剩下的叛乱分子纷纷躲进大昭寺内，不敢再恋战。正当我军气势旺盛，准备一举歼灭最后的顽固分子时，军区首长下达

了命令：“停止进攻，采取政策攻势，促使他们缴枪投降！”

于是，一场强大的政策攻心战开始了，我军指战员团团围住叛军这个最后的据点，轮番喊话。从3月21日晚上11点30分开始，我军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宣传政策，耐心争取，打了一场近七八个小时的政治仗。

上午7点左右，许多叛乱分子见大势已去，纷纷爬上楼层和屋顶，扔下枪支，挥动哈达，表示投降。被平叛的解放军打得做鸟兽散的藏军一个个从街头巷尾灰溜溜地窜了出来，跪下向步步进逼的解放军战士缴械求饶，那种不可一世的疯狂劲儿不知到哪儿去了……

经过了17小时的激战，3月22日早上9点，太阳刚刚升起在雪山顶上时，我军平叛部队正式宣市：“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平息！”

3月23日，中央军委下令解除藏军武装，彻底地挖去了反动上层集团发动叛乱的根子。

第52节 军委下令，迅速平叛，我军一举扫平山南叛乱分子巢穴，粉碎纳木湖地区叛匪顽抗。

随着拉萨的武装叛乱被我军彻底平息，西藏其余地区的叛乱分子尤如惊弓之鸟，他们一边作垂死顽抗的准备，一边选择失败后流窜国外的逃命之路。

中央向西藏军区发出了断然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根据中央命令，我军指战员

刚刚结束了拉萨的平叛战斗，即刻挥师东南，向叛乱武装除拉萨外的另一个主要巢穴，被称为叛军“根据地”的山南地区进军。

山南地区南与印度、不丹接壤，有 24 条道路可通向国外，北边紧依雅鲁藏布江，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西藏主要的产粮地区。叛乱集团早就把这里作为理想的“根据地”，从 1958 年起开始经营。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及部分溃逃的叛乱武装云集山南，与当地叛乱武装会合，成立了另一个总指挥部。

为平息这股作恶多端的叛匪，西藏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首先命令平叛部队截断叛乱武装可能的逃跑的渡口等要道，采用分进分击的办法，调集几路部队同时向叛匪的据点合围，以全歼这股叛乱武装。

中央还指示：“平叛后还须实施分区清剿，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并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

1959 年 4 月 4 日，我浩浩荡荡的平叛大军分成 4 路，由集结地区向山南开进。部队渡过雅鲁藏布江后，第一路溯江向曲松、哲古方向进击；第二路分左右两翼迅速插至隆子宗、达马宗、铝那宗一线地区，切断叛匪南逃之路；第三路进行正面攻击；第四路捕歼白池、浪卡子、打隆地区的叛乱武装，防其西逃；第五路担任机动任务，防止叛乱武装越川藏线逃跑。

军区首长明确指示：“各路部队要协调行动，力求围歼叛乱武装主力于隆子宗、曲松一带地区。”

山南地区的这一股叛乱武装十分狡猾，他们将其主力分成几股队伍活动。他们建立基地，强化组织，接受外国的武器和物资的援助，到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山南地区的人民一提

起他们无不切齿痛恨。

这股叛乱武装在末日来临之际，仍然妄图与我军进行顽抗。他们加紧围攻泽当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央驻藏代表的派出机关，控制了雅鲁藏布江通往山南的渡口，并在曲水到泽当的公路沿线构筑工事、据点，扬言要和解放军平叛部队“拼个你死我活！”

由于在我平叛部队的行进过程中，遇到气候、道路等等多种没有预计到的突然情况，部队的行程有了变化。第二路的右翼部队进展很快，顺利到达，但左翼部队却能按期到达指定地区。因此，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三路部队主力，就地等待休整两天，以期汇合两翼部队。

军区首长不得不随即变更部署，重新调整各部队的行动，准备将叛乱武装逼至隆子宗以北一带阻击围歼。

狡猾的敌人也为自己留了一条逃向境外的路，随时准备逃窜……

果然，战斗打响后，十分激烈，但很快惊慌失措的叛乱头子便意识到完全不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对手，恋战一会儿，就纷纷逃命，夺路向境外奔去。因此，我平叛部队未能全部歼灭山南叛乱武装，尽管如此，这个叛匪的指挥部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终于彻底完蛋。

山南地区的人民含着激动的泪花，感谢解放军再一次把他们从叛匪的残害下解救出来。一位藏族老阿妈紧紧拉住我军某部一位连长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菩萨兵！菩萨兵呀！你们要是再不来，我们这儿没有人能逃脱叛匪要我们到国外流浪的命运呵！”

我军平叛部队又在山南地区经过连续奔袭，不断清剿，将残余的叛乱分子一一挖出，缴了他们的武器枪械，解除了他们作恶的装备，并完全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荡平了叛匪多年经营的这个据点。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其余地区叛乱分子外逃和与国外联络的通道，为进一步彻底平息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军又粉碎了纳木湖地区叛乱分子的顽抗。

6月19日，在青龙地区聚集的叛乱武装见拉萨、山南两个叛乱指挥中心相继被我军扫平，个个如惊弓之鸟，他们汇同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重点地区的叛乱力量，避开我军平叛部队的追剿，沿纳木湖北岸和西岸往南边逃跑。

这股叛匪所经之处，狼烟滚滚，村庄一片火海，城镇一片废墟，他们猖狂地残害各地的藏族群众，欠下了一笔笔的血债。

我平叛部队奉命追击，紧紧咬住逃窜的叛乱武装，力求将其全歼。7月1日，平叛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对纳木湖南岸的叛乱武装形成前堵后追东西夹击之势。此时叛军头目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命令部下“构筑工事，拼死一战，决不缴枪”。

3日上午，我军开始了对叛匪的进攻，平叛部队在军区的指挥下，分东西两路进行合击歼敌，将匪军的主力牢牢困在包围圈中。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顽固的叛乱分子拒不放下武器，凭借他们熟悉的地形拼命抵抗着。

军区当即命令：“行进至羊八井、当雄一线的部队，立即分路由南向北攻击，封锁全部公路和交通线，将敌人彻底围

歼。”

7月6日，我军以果断的行动将叛乱武装全部人马围在了纳木湖以南的山里，开始了最后的进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平叛部队个个奋勇当先，猛冲猛打，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战斗打得极为艰苦，敌人分成小股分散顽抗着，一直到7月8日下午，我军终于歼灭大部份叛乱武装，其余敌人溃散在两道山沟里，分散隐蔽行动，寻机逃跑。

“不让一个叛乱分子逃掉！”我军命令一下，各部严密封锁所有山口要道，在包围圈内逐地进行搜索。这场艰难曲折的搜索战又打了21天，直到7月21日，终于将纳木湖4000余人的叛乱武装全部歼灭。此战中，我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围剿中一律采取包围喊话，不抵抗就不开枪的原则，并利用俘虏喊话劝降。一个叫甲巴的俘虏，一次就劝说238人放下了武器向我军投降。

这次战斗，基本肃清了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保障了青藏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接着我军又对麦地卡地区展开平叛斗争。8月26日，我军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忍着风雹狂风高原缺氧的困难，昼夜兼程快速行进，仅用一天时间就对麦地卡以彭措湖为中心的5000余名叛乱武装形成了包围之势。

8月27日，围歼这一地区叛匪的战斗打响，经过7昼夜的军事打击和政策攻心，终于歼灭了叛军主力，转而投入了全面的清剿之战。在清剿中我军分片包干，以政策宣传为主，让俘虏住帐篷吃干粮，我军战士却住露天吃野菜，用实际行动揭穿了叛乱头目的反动宣传，很快赢得了人心和人民的大力支持，

到9月15日为止，顺利地结束了这一地区的平叛战斗。

10月底，我军又先后平息了昌都东南一带的武装叛乱活动，从而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到1954年年底，西藏各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已基本平息，中央指示：“再接再厉，迅速平息边沿地区的叛乱武装，不留下后患。”

驻藏部队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于1960年2月15日起，对西藏东北部恩达一带高寒山区的沿边叛乱武装展开了攻势。

由于这些沿边地带交通闭塞，漏网的叛匪顽固分子纷纷逃到这些地区，利用国外分裂势力提供的武器、电台等物质援助和特务分子的训练，成立了叛军的各级建制机构，活动十分猖獗，扬言要在这里“与解放军最后一决高低”！

2月29日起，平叛部队采用从边沿地带进攻包围的战术，逐步将叛军队伍全部压缩到100公里的范围内，严密地围了起来。3月15日，进攻开始了。当逼近拉孜时发现叛乱武装有逃跑的迹象，我军某营指挥员毅然下令：

“全体人员放弃走道路，改从山下滚滑到山底堵截叛军。”

一声号令下，全体指战员个个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从海拔800多米高、坡度为五六十度的山顶雪峰上滚了下去。那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场景呀！

数百名战士抱着枪，掩住头一个个在雪坡上滚滑下来，有的撞伤了仍然一步步爬行着下滑，有的昏迷了醒来又继续前进，还有的战士用自己的身子在坚硬的岩石上垫底，掩护战友。

剿匪大纪实

雪坡上、岩石上、山沟里，到处都留下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在阳光反射下夺目耀眼。

抢先下到山底的战士堵住了叛军逃路，与敌人展开了堵截激战。我军排长易乃红率3个战士冒着敌人七八挺机枪的密集火力，顽强的钉在那里打退了叛军的一次次反扑，为大部队赶到争取了时间。

这股叛军终于没能逃脱我军的打击，4月15日，全歼了所有叛乱武装，此后，平叛部队又分进包围，逐一对沿边地区温泉、那曲、巴青的叛乱武装进行了平叛，10月底，肃清了昌都东南等沿边地带的叛乱活动。1960年年底，西藏全区仅剩下1000余名零星的叛乱分子，这些人多数系叛军首领和骨干死硬分子，他们聚结在昌都东南、班戈乃墨脱等最边远的地区继续与我军对抗。

中央进一步做出了指示：“对于这些人主要是靠政治，靠发动群众，同时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来实施斗争。”

平叛部队化整为零，组成若干个小分队，深入当地群众之中，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工作，并相机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这一部份最后的叛乱分子多数投降，少数被歼灭。至此，历时3年的平息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斗争宣告结束。1961年年底，叛乱武装大部份被我军歼灭，少数人逃往了境外，全区的叛乱彻底被平息下来。

平叛斗争得到藏族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班禅大师代表西藏广大僧俗群众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声讨叛乱行径，拥护平叛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西藏人民支援解放军平叛行动达 1.58 万余人次，计约 43.9 万余个工日，支援畜力达 10.4 万余头（匹），计约 286.62 余个工日，他们为平叛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有力保证。

在平叛斗争中，我军部队认真执行了 1959 年 3 月 21 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把军事打击、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认真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俘虏政策、宗教政策。

我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于一切放下武器者，就地实行优待，受伤的治疗、投诚的欢迎。对于一些被胁迫的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他们的大多数脱离叛军，回家生产，并提供物质条件。平叛部队不住寺庙，不动经书、不摸佛像，不触及群众的一针一线，用行动挫败了反动上层集团制造的种种谎言。

历时 3 年的西藏平叛，我军部队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这场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正如西藏军区前司令员张国华将军所说的那样：“西藏平叛斗争，将作为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载史册！”

中南军区自 1949 年 5 月起，即组织部队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进行剿匪作战。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南军区共投入 4 个兵团部、12 个军部、1 个纵队（两广纵队）部和 46 个师的兵力，至 1952 年 6 月止，中南军区共歼灭匪特 115 万余人。

第十四章 瑶山青

第53节 四野铁军，出击两广，“总指挥夫人”受命组织暴乱，摇身成为十万大山女匪首。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第四野战军主力于1949年4月中旬由平津地区南下，6月上旬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行程1200公里。而先遣部队则将战线推到长江三峡、桃源、安化、湘乡、安仁、汝城、定南一线。此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四野和二野第4兵团迅速向两广挺进，争取在11、12月内解放两广，彻底消灭国民党白崇禧、余汉谋两大集团主力。

为此，四野指挥部决定，兵分三路出击，力争在白崇禧集团主力撤退广东境内之前与之决战。

我第13兵团率第38、第39军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广西百色、南宁，执行断敌西退滇、黔的战略迂回任务。以第15兵团、二野第4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夺取广州，而后由第4兵团继续西进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大的钳形包围。同时以第12兵团率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军为中路军，首先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势，牵制敌人，尾敌进入广西，协同我第4兵团和第13兵团歼灭白崇禧

集团于广西境内。

与此同时，军委命我第47军主力位于湘西北之永顺、大庸以南，监视鄂西宋希濂集团，以保障湘桂前线的侧翼安全，并掩护二野主力入川前的集结。二野第5兵团（含配属四野作战的第18军）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在湖南地区投入与敌作战。

值此，挥师南下的四野大军，犹如三支利箭，射向已成惊弓之鸟的白崇禧集团。

9月13日，四野西路军由桃源、常德一线出发。一路攻击前进，先后占领沅陵、溆浦、辰溪、泸溪、芷江，并于30日晚夺取怀化。而我中路军亦于30日奔袭永丰地区之敌71军等部。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发觉我军进击衡阳、宝庆两地的意图后，当即排兵布阵，将其第7军沿衡宝公路西调，并又将其耒阳、乐昌地区之第48、第46军四个师相继北调，欲集中主力乘机围攻我突出挺进部队，以夺取局部主动。敌开始以第48军一个师、第71军两个师为第一梯队，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妄图攻打我由永丰南下的第12兵团第41军，当攻击受挫后，又将主力东调，欲攻打我从金田向渣江地区前进的第12兵团40军。具体部署为：以两个师于渣江以南阻我前进，以另五个师兵力由其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指挥全面出击，同时以其第126军、第97军各一个师西调至武冈、常宁一线，以阻击我右路兵团东进。

白崇禧的这一战术，正合我四野在湘南地区聚歼其主力的战略意图。于是，我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衡宝地区与敌主力

决战。但为避免第一线部队因分散和过于突出而遭敌袭击，以及准备诱敌北进予以聚歼，因此，我军于10月5日上午命令各部队暂停前进，以利于集中兵力、调整部署和查明情况。

调整的部署为：令西路军由会同、黔阳东进至宝庆、祁阳地区；二野第18军越过粤汉路向常宁、祁阳挺进，以阻敌渡过湘江；第12兵团46军向耒阳地区迫近，从右侧钳制敌人；二野第5兵团第16、第17军向渣江地区集结。各部在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后，即准备投入战斗。

10月6日，在四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西路军已进占芷江、安江、洪江，彻底截断了敌西窜入黔的通路，而以第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的我军，亦以多路迅速攻入粤北。白崇禧自诩为牢固的“湘粤联合防线”至此已被我军从左右两翼撕开。

白崇禧遭此当头一棒，自知与我在衡宝一线决战等于自寻死路，忙于10月7日零时下令集团全线撤退。

然而，此时要走谈何容易？

10月10日，我军以十三个师的兵力从北、东、西三面展开了全面大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至10月11日下午，将被围之白崇禧主力第7军军部及第171、第172师和第48军之第138、第176师等部2万余人全部歼灭。

尽管作为东路军的第15兵团等部队未直接担任在衡宝地区面向敌人作战的任务，但在四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战略全局的眼光协同一致，勇猛攻击，敢拼敢打，在东线有力保证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有关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海南的战略方针的实施，为随后实施的两广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初，蒋介石任命总统府参军长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他们两人一上台就大肆扩充兵力，重建原粤系部队62军、63军和64军，并把全省的保安团扩编为五个保安师、四个暂编纵队，以加强据守广东的兵力。随后，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等一批军政要人，皆集中于此。

8月23日，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人物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举行会议，商讨“两广合力固守广东”事宜，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改称华南军政长官，赋以其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巩固粤北，确保广州”。

当时，余汉谋属下有正规军三个兵团十一个军二十八个师，计12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2万余人，总兵力约15万人。其部署是：以39、63军防守以曲江（今韶关市）为中心的粤北地区，构成第一道防线，前沿伸至南雄和乐昌；以沈发藻指挥的13兵团（辖23、70军）布防英德、翁源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以刘安祺指挥的21兵团（辖32、50军）在花县、从化地区组织防御，构成第三道防线，以109军及警卫团、宪兵团，维护广州市区的安全，以胡璉指挥的12兵团（辖第10、18军）集结于潮安、汕头地区，以策应广州方面作战；以62军驻防湛江市，守住通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以64军驻守海南岛。由于这些部队各怀打算，又处于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中，余汉谋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很难实行。

中央军委将广东战役作为向中南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7

月17日，中央军委在给四野领导人林彪、邓子恢的指示中，命令陈赓率领的第4兵团三个军和邓华、赖传珠率领的第15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指挥，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用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

四野前指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赋予陈赓指挥的东路军实施广东战役的作战任务。

9月7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陈赓在江西赣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分三路挺进广东：第4兵团辖13、14、15军为右路，首先夺取曲江，尔后主力沿粤汉铁路南进，以一部兵力沿北江西岸取捷径直插三水，切断广州守军西逃之路；第15兵团辖42、44军为中路，先占翁源、新丰，然后主力沿粤汉铁路东侧直插广州，以一部兵力出增城，截断广（州）九（龙）铁路，防止广州守军东逃；两广纵队由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率领和粤赣湘边纵队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率领为左路，以部分兵力切断广州与潮汕地区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主力沿东江两岸进至东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南面构成对广州的包围。

9月8日，毛泽东签发给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人的《关于占领广州的指示》指出，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赓兵团预计11月进至梧州区域。

9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四野领导人林彪、邓子恢，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曲江、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赓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这些指示为东路军实施广东战役规定了明确的步骤。

参战部队经过40天的适应南方作战环境的休整，于9月

中旬向预定地域集结。第4兵团向汝城、仁化、南雄开进；第15兵团向南康、信丰开进；两广纵队向兴国以南开进。接着，各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向广东展开了迅猛的大挺进。

曲江位于北江上源浈、武两水的汇合处，有粤汉铁路通过，南制广州，北控衡阳，是粤北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除把39、63军部署在曲江地区外，还在粤北大力扩编地方武装，规定每县成立一个自卫总队，每乡成立一个自卫中队，并任命63军军长刘栋材兼任粤赣湘边区“剿共”总指挥，统一指挥粤北地方武装，实行所谓的“整体防御”。

解放军逼进粤北，国民党广州当局大为震惊。

代总统李宗仁于4日和7日先后召开军事会议，尽管料到大战在即，但却苦无对策。余汉谋也深知，凭十几万军队是阻挡不住我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况且自己真正能够指挥得动的也只有62、63、109军等粤系部队。因此，他在粤北告急后，立即将39军调至英德以南地区，仅留63军在曲江，准备沿粤汉铁路节节抗击，破坏交通，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南进。但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北、西三面进逼曲江。63军惧怕被围歼，仓皇弃城南逃。

在右路的第4兵团向曲江奔袭合围的同时，中路的我第15兵团43军由大庾出发，经南雄、始兴，于10月6日进抵翁源；44军由龙南出发，经启南（今全南）、连平，于10月9日进抵新丰。接着，这两个军又根据兵团指挥员的决定，按预定进军路线，向广州攻击前进。左路的两广纵队10月9日在龙川与粤赣湘边纵队会合后，经河源向广州以南地区长驱直进。

余汉谋得悉我人民解放军向广州推进的消息后，急忙将其南撤的 39 军置于英德和佛冈地区，将 63 军置于清远地区，与从化、花县地区的 50、32 军以及增城地区的 109 军一起，在广州正北和东北的 100 余公里宽的正面上，部署了一道所谓“最后防线”。余汉谋、薛岳等还煞有介事地在广州市召开宣传大会，叫喊“誓死保卫广州”、“决与广州共存亡”。

为迅速解放广州，陈赓命令各路部队兼程急进，力争在广州外围多消灭一些国民党军。

国民党 39 军 91 师 272 团团部及两个营，在英德车站和遥步圩铁路大桥防守，另一个营在大桥南岸的高地防守。遥步圩大桥横跨浦江，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一座铁桥，国民党军准备在英德车站失守后将这座大桥炸毁，在鸿江南岸凭险顽抗。

10 月 9 日，我人民解放军第 15 军 45 师 133 团进至英德附近，以 1 营攻打英德县城；以 3 营和师侦察连向桥头迂回，夺取遥步圩铁桥；以 2 营沿铁路实施正面攻击。当日 19 时，3 营 7 连和师侦察连迅速插入车站和桥头之间，堵住了国民党军的退路，与从正面攻入车站的 2 营一道，将敌守军 272 团击溃，俘获 200 余人。22 时，3 营 9 连抢夺遥步圩铁桥。该连 1 排打得机智灵活，迅速攻克两个桥头堡。排长王长水腹部受伤后，用手按住外流的肠子仍坚持到战斗结束。

10 月 10 日，第 15 兵团 43 军 127 师冒雨奔袭佛冈，于 11 日拂晓抵近城郊后，立即对据守佛冈的国民党 39 军 103 师 307 团展开包围。379 团插至佛冈城以西，以 1 营迂回至城西南，381 团插至佛冈城南，切断国民党军退路，380 团担任正面攻击。16 时，127 师发起总攻。战斗至 19 时半结束，敌全部美

械装备号称“钢铁团”的307团尽数被歼。12日，43军128师在奔袭花县途中，歼灭国民党50军36师106团3营及琶江保安营。13日拂晓，该师占领花县县城，全歼县保安营。当晚，该师382团急袭并抢占了花县通往广州的人和圩公路大桥。12日，44军132师追击广州东北良口、从化的国民党军，在水底村附近歼灭国民党军321团一个营后，即沿广从公路向广州推进。131师追击派潭、增城的国民党军，全歼国民党一个保安营，击溃一个团，于13日解放增城。接着，该师又奉命抢占石滩车站，切断了广（州）九（龙）铁路。至此，解放军从北、东两面逼近了广州城。

在余汉谋“最后防线”崩溃的前夕，李宗仁于10月11日召集阎锡山、顾祝同、薛岳、余汉谋和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开会，决定将由南京迁来广州不到半年的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将广东省政府迁往海南岛。

12日晚，敌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广州东山余汉谋公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守城部队分两路退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会议一结束，国民党高级官员争相逃命，李宗仁逃往桂林，阎锡山、顾祝同逃往台湾，余汉谋、薛岳逃往海南岛，整个广州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4日，国民党当局在逃离广州时，不仅炸毁了白云机场和石井仓库，还炸毁了连接珠江南北两岸、耗资102.2万两白银建成的海珠桥。当时，海珠桥上行驶的车辆、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和江船，无一幸免，死伤达2000余人。广州市民对国民党政权溃败前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无不切齿痛恨。

为迅速歼灭广州的国民党军，第15兵团命令43军，以一

部分兵力攻占白云山等山头阵地，主力沿广（州）花（县）公路向广州攻击前进；命令 44 军，一路沿广（州）增（城）公路、一路沿广九铁路向广州攻击前进。14 日下午，第 15 兵团又命令 43 军的先头部队 128 师、第 44 军的先头部队 132 师，快速进入市区，追击国民党军。128 师 382 团以每小时 11 公里的速度前进，于 19 时半进抵广州东北郊沙河圩，然后分路搜索前进。21 时，该团占领了总统府、省政府、警察局等国民党政府的高级机关及中山纪念堂等重要建筑，并派出小分队警卫各主要街口，接应后续部队。

这时，国民党 50 军 107 师和联勤税警民等残部 1000 余人，以及满载着汽油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数十辆汽车，拥挤于黄沙车站，妄图渡江乘广（州）三（水）铁路的火车西逃。我人民解放军 382 团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追击，经两小时激战，将这股逃军歼灭，并击沉江面上满载国民党军的 3 艘大船，数只小船。与此同时，132 师亦从东郊进入广州市区。接着后续部队源源进城，占领了广州全市各重要目标。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三补给区监护二营 500 余人，被迫投诚。至此，广州全城宣告解放。

在中路我第 15 兵团解放广州的同时，左路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经河源、博罗直抵惠州，解放了东江两岸的广大地区。他们在博罗县龙华地区包围了国民党 109 军 154 师，迫使该师副师长郑荫桐率领 3000 余人投诚。随后即向东莞、虎门挺进，切断了广州国民党溃军沿珠江南逃的通路。

当第 15 兵团进入广州市区时，第 4 兵团的先头部队也进抵广州西郊。陈赓当时判断，国民党军由于船只不够，肯定不

剿匪大纪实

会从珠江口逃跑。他们逃跑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越过佛山、开平，沿海边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另一条是经三水、高要，逃向广西。因此，陈赓命令第4兵团所有部队一律不进广州，立即马不停蹄地向西南追歼逃军。

10月15日，第4兵团以六个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分3路向粤西追击。西路由三水经高要、阳春迂回阳江西侧，断敌入桂道路；东路由佛山经鹤山、台山插向阳江南侧，防敌从海上逃跑；中路第15兵团由三水经高明直出恩平，向阳江追击。该部克服种种困难，日夜兼程猛追，24日，将国民党第21兵团部及四个军的残部共4万余人包围于阳江地区。25日，敌第21兵团集中三个师向西突围未逞，第4兵团主力从三面发起攻击，于26日将其全歼。我第4兵团一部继续西进，至11月4日，先后占领了罗定、信宜、廉江等地，切断了广西白崇禧部向海南岛的退路。此时，驻潮安、汕头之国民党军已由海上逃跑，闽粤赣边纵队随即解放潮汕地区，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五个兵团十二个军共15万余人，由湘南退守广西，企图在逃至粤桂边境及湛江地区的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部约4万人的策应下，以桂林为中心，沿全县至柳州铁路两侧组织防御，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入桂。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指挥9个军共40余万人，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决心分3路向广西突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11月6日，我人民解放军西路第13兵团第38、第39军由湘西南出发，10日分别攻占靖县、通道2城。国民党军第17兵团仓皇西逃，我第13兵团乘胜追击，于15日经黔南楔入广西，向河池、百色疾进，切断国民党军西逃云南、贵州之路。南路第4兵团第13、第14、第15军和第15兵团第43军，分别于10日和15日向廉江、茂名（今高州）、信宜推进，切断国民党军逃向海上的通路。北路第12兵团和第40、第41、第45军进至湘桂边境，一部于10日袭占全县县城。这时，我第二野战军已突破国民党军川黔防线。白崇禧在处境孤立、西逃无望的情况下，急调第3、第11兵团共五个军由荔浦、恭城南下玉林、岑溪地区，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发动“南线攻势”，以打通撤往海南岛的道路，并令其第1、第10兵团由桂北南撤。我第四野战军决心趁机在粤桂边境围歼敌第3、第11兵团，令南路部队以一部兵力在廉江至信宜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主力隐蔽待机；令西、北两路部队迅速南进，策应南路作战。

11月24日，国民党军第3、第11兵团开始向廉江、茂名、信宜等地实施猛烈攻击，受挫后，又不得不龟缩回去。

10月27日，我人民解放军南路主力从廉江、茂名、信宜突然出击，并乘胜猛追，攻占容县、玉林、陆川等地，歼敌第11兵团一部。

30日，第15兵团第43军一举突入博白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3兵团部，俘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3兵团司令张法。随后，会同第4兵团主力将敌第3兵团所辖3个军的大部围歼于博白、陆川地区。此时，余汉谋残部乘隙袭占廉江城，我人民

解放军第13军立即回师歼敌一部。此际，我军西、北两路亦急速南下，在桂滇黔边纵队配合下，先后攻占河池、桂林、柳州、梧州等城镇，继而又进至东兰、宾阳、贵县一线。白崇禧“南线攻势”失败后，不得不仓皇撤退。白崇禧令第1、第10兵团分别撤到南宁、钦州地区，第11兵团残部退向钦州，企图从海上逃跑。为全歼白崇禧残部，12月2日起，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胆渗透，长途奔袭，继续猛追，先后占领百色、南宁、灵山、合浦等地。

12月7日，我军将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第1、第10兵团及其他残部围歼于钦州和小董圩地区。至14日，我军先后胜利占领镇南关（今友谊关）和爱店，战斗结束。此役，国民党军被歼约17.3万人，约2万人窜逃国外。

广西是中南解放最晚、匪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军自1949年12月中旬开始进剿广西境内的土匪，并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以和平改编和劝降等方式，仅在两个月内，即收降改编国民党残余武装20股，计1.4万余人。其中有国民党桂西军政长官莫树杰、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滇桂边区司令张光伟及所部。对于顽抗到底，拒不投降的敌残余武装，则坚决予以歼灭。如在广西战役中侥幸漏网的国民党军17兵团司令刘嘉树，率领兵团部及100军残部6700余人于1950年1月25日由靖西县逃往越南后，又于2月1日窜回广西水口，企图取道逃往越南的法军占领区，在中越边境地区长期作乱。我第45军134师掌握其情况后，即采取远距离的分进合击战术，突然将该部在平而关正南一狭小的河套中四

面包围，经3天时间的激战，刘嘉树以下6100余人被俘。

广西以十万大山著称，自古就是土匪出没之地。广西战役结束后，在十万大山中，尚有20余股共2万余人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土匪和敌特分子，这些人趁山区刚刚解放，我基层政权始建，群众觉悟不高，不断组织暴乱，疯狂攻打我区乡政府，杀害干部群众，使十万大山阴云密布。

在十万大山的土匪武装中，女匪首韦秀英曾成为呼风唤雨于一时的风云人物。

韦秀英是广西邕宁县台马人，幼时随父母举家迁往南宁，母亲勤俭操持家务，父亲是个靠卖力气吃饭的铁匠，是个安分的手艺人。韦家当时居住在当阳街，与一张姓人家为邻。张家有一子名叫张瑞贵，比韦秀英大几岁，常带她在街上玩耍，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

张瑞贵18岁时，正值北洋军阀割据，无法谋生的他便投军当兵，在广西军阀陈济棠部开始了其戎马生涯。由于张瑞贵作战勇敢，很快当上了陈部的连长。这时，念念不忘邻家那个俊秀女孩的他托人回家说媒，娶韦秀英为妻。

韦秀英此日已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家里正愁择婿之事，突然听说做了军官的张瑞贵托媒说亲，自是高兴。

然而，到了迎亲拜堂之日，张瑞贵又派人捎话，由于军务在身，无法离营回家了。这一下，搞得让韦家众亲友一时不知所措。

“韦大爹，吉日不可错过，这婚礼要办哟。”亲友们喜气洋洋的来了，一班吹鼓手和轿夫也眼巴巴守在家门口，族人中有人仍坚持要举行婚礼。

“人不来，有何办法。”韦父叹道。

“抱着公鸡拜堂，也一样的。”媒婆主张按家乡习俗完成自己的“职责”。

“那好吧。”韦父见众人都同意这样做，只好打消了择日再行婚礼的打算。

就这样，韦秀英在一番吹吹打打的戏闹之中，与丈夫的替身——一只大红公鸡拜堂成亲了。

张瑞贵自娶了韦秀英之后，实际上很少回家。这倒并非他对妻子有何不满，只是因为军务繁忙。他一个小小的连长，在你争我夺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中，不过只是一个东奔西走的走卒而已。

1925年，张瑞贵当上了陈济棠手下的一名团长。兴许是官大脾气长，兴许是长期在外，一次张瑞贵在合浦县驻防时，又相中了一个陈姓的姑娘，决定纳其为妾，带在身边。

北伐战争开始后，陈济棠公开反蒋，遭到国民革命军的征讨，陈济棠战败，幸好张瑞贵及时带兵救援，方才得以逃命，于是，陈济棠视张瑞贵为心腹亲信，又将其提拔为师长。

张瑞贵当上师长后，这才想起家乡的结发之妻韦秀英。由于时局暂时没有大的变化，他便派人将韦秀英接到了广州的官邸。

然而，当上了师长太太的韦秀英在广州却天天难以开心。因为张瑞贵之妾自恃得宠而不容她在家中，两人不时争吵，闹得家中无一日安宁。

张瑞贵知道韦秀英虽不识字，却是个性格倔犟的人，绝不肯向小妾低头，于是只好以军务太多无法照顾家人而让韦秀英

搬到从化的一幢府邸去居住。

1936年，张瑞贵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当上了军长。不久，由于抗战爆发，军队频繁调动，张瑞贵又叫韦秀英搬到锁县的贵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杂牌军出身的张瑞贵，官场失意，被蒋介石一纸命令解除了军职，从此在从化过着寂寞的闭居生活。这期间，他与韦秀英的来往也不多，韦秀英仿佛早已被他遗忘了。

张瑞贵虽然闲居，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顶着原有的“军座”头衔，终日与社会上层人士及地方武装头目走动，称兄道弟，大有将来东山再起的雄心，因此，当地一些有头脸的人物，倒也对他敬畏三分。

1948年底，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蒋下野，张瑞贵为桂系军人，此时果然受命“复出”，被委任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张瑞贵事实上对蒋介石政权的大势已去并非不明白，但这个顽固反共、死心塌地的家伙，却甘愿此时跳出来为“党国效命”。上任伊始，他便利用早已笼络的地方游杂数千人，打出了“剿总”旗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锁县城内，大肆招兵买马，煞有介事地组织操练。为了表示不辱使命，1949年初夏，张瑞贵竟指挥其属下，大张旗鼓的对我十万大山中的游击军展开围攻。对于张瑞贵部的进攻，我两广纵队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贵台一战中，张部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得逃向北海。1949年底，南下我军横扫两广，白崇禧部争相逃命，那里还顾得上张瑞贵这个临时启用的什么“剿总”武装。

“秀英，我要随白长官他们走了。”逃跑之前，张瑞贵在贵台与韦秀英匆匆分手。

“去哪里？”韦秀英担心的问。

“大概是海南岛吧。”张瑞贵忧心忡忡。

“还回来么？”

“当然要回来。”

“那我在这里怎么办？”

“这些年你并不显眼。不过，以后有些事情就全靠你了。”张瑞贵自知小妾上不了阵，只有韦秀英遇事尚沉得住气，于是交待了一番：“我走以后，会派人来和你联系。手下的弟兄们只是被打散了，一招呼，他们还会来响应的，要是你为党国立了功，自然也会被人另眼相看。”

“只要我不死，就会听你的，和共产党干。”韦秀英见丈夫此刻居然如此郑重其事的向自己做交待，不禁激动不已。因为，这是结婚20多年来的头一回，于是当即表态道。

张瑞贵跑了。先到北海，后又逃至海南。

1950年1月，逃至海南岛不足一月的张瑞贵果然派人来与韦秀英接头了。

“张夫人，总指挥此次派小弟回来，就是要马上把队伍拉起来，和共产党干。”从台湾潜人广西贵台的特务李成威一见面，即将派遣令掏出来。

韦秀英不识字，但她却相信丈夫是一定会打回来的。故连连点头道：“总指挥叫咱们怎么干，你尽管说。”

“总指挥交待，先把黄正球、韦雨庄、朱广畴三个和他们手下的弟兄召集起来，组织“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特意说，请夫人当总指挥。”李成威毕恭毕敬的说。

韦秀英一下子飘飘然了，自己已是个 50 出头的老妇了，丈夫过去那显赫一时的头衔，今天竟这么毫不费力地落到自己头上，这真飞来的大喜事呀。于是，她故作平静地说：“那么，有些事李先生你可得帮我。”

“夫人尽管吩咐。”李成威其实并没有把眼前这老妇人当回事，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允许自己出头露面，就让她在后台唱戏吧。

这天夜里，潜伏特务李成威与韦秀英商量，定于 3 月 1 日组织大暴乱，首先将在各村征粮的解放军工作队消灭掉。在此之前，尽快把“救国军”组织起来……

经过近半个月时间的密谋策划，2 月底，长滩镇匪首杨茂培、官著勋两人纠集 1000 余匪众，公开围攻袅村，一次即杀害解放军征粮工作队 41 人。其后，大寺、那蒙、那彭、那里、那香及沿海一带的匪众均先后发动了暴乱。至 1950 年 6 月，韦秀英的手下竟然扩充到了 2000 余人。

韦秀英之所以一时得逞，一是依仗十万大山方圆百里山峦起伏、谷深林茂、周旋余地大，二是由于我军主力一路向贵州、四川、云南境内挺进，进剿兵力不足。于是，她才得以四处设卡、阻断交通、疯狂残杀群众，嚣张至极。

由于韦秀英匪部在长达近半年时间里未遭受重大打击，使受到台湾当局直接支持指挥的“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似乎成了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留下的“正规军”，流窜于十万大山中的各股土匪武装不得不表示臣服，纷纷携枪人伙，韦氏顿时成了群匪之首，队伍也陡增至 5000 余人。韦秀英在台湾派遣

剿匪大纪实

特务的出谋划策下，很快将手下的土匪编为两个师、四个纵队、二个支队，频繁攻打钦防地区的区乡人民政府，袭扰县城，抢粮抓人，无恶不作，一度甚至使我一些区乡基层政权瘫痪。

十万大山匪患严重，引起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此，毛泽东两次对广西下达剿匪指示，限于1951年“五一”节前，务必彻底肃清广西境内之匪。

1950年11月，广西省委、军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击破”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大力进剿十万大山股匪。在广东钦廉军分区的配合下，我军首先堵住了匪部逃窜越南的去路，对十万大山股匪布下天罗地网。对于我军的作战部署，韦秀英全然不知，仍沉迷于酒肉之中。11月下旬，横县、灵山、合浦股匪被我军逐个消灭。消息传开，韦匪人心浮动，何去何从，举棋不定。直至韦匪所属朱广畴被我军消灭后，她才预感末日将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2月初，韦匪骨干1000多人，向着十万大山以西方向流窜，企图入越，在宁明被我452团赶上迎头截击，围于九特、俊仁、太平、公安等地。韦匪多次突围，被歼过半，残匪自知入越无望，便向防城、那勤方向回窜。刚到那勤，又被我军“五一”大队断其去路，韦匪迅速占据大包岭高地顽抗，战至黄昏，匪势不支，不得不向大篆方向逃窜。是夜，我军三营获逃匪情报，由当地地区中队引路，连夜向大篆方向进发。

12月13日早晨，我军在厚村将韦匪包围。14日11时，我军展开猛烈攻击，一时枪声大作。“不要怕，要顶住——”

丰秀英一面招呼手下，一面大声给他们打气，指挥一些顽匪转移到另一间楼房负隅顽抗，我军战士的攻击再次出现伤亡。这时，452团战士郭善林见状，怒不可遏，在密集的枪声掩护下，乘梯爬上楼顶，掀开瓦面投下一捆手榴弹。“轰隆”的一声巨响，烟火弥漫，最后的匪巢开了花。战士们冲进去后，经辨认，只见10多具匪徒尸首，七横八竖地躺在血泊之中，其中一50岁出头农妇打扮的女尸躺在门坎上，正是罪恶累累的女匪首——韦秀英。

曾猖獗一时的十万大山股匪，在我军民的大力进剿下，于1951年5月宣告肃清。

第54节 大瑶山大，兵匪合一，小诸葛白崇禧册封林秀山为桂绥第二支队上校司令，代号“4423”。

1949年6月初，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抵达桂林，召见桂林绥署主任李品仙面授机宜，令其从速在广西各地收罗潜在势力以防不测。这次招兵买马中，大瑶山惯匪林秀山被委任桂绥第二支队上校司令，代号4423（即“秀”字明电码）。林秀山随即又推荐林德奎、黄汉雄为第2支队副司令。该支队编制，相当于三三制的步兵团建制，附有机枪连、迫击炮排、通讯排等。

6月间，桂绥第2支队司令部成立于鹿寨。接着，招募兵员，时经两月，募集千人。其中有土豪劣绅的子弟、散匪头目、失意军人、趋附之徒，以及无知受骗群众。8月，林秀山奉令将募集兵员开赴柳州点验，配发武器装备后仍开回鹿寨，

分驻思贤、岭背、二兴、二坪一带乡村，并对所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

惯匪林秀山究竟为何许人也？

林秀山出生于广西鹿寨县雒容乡二兴村，5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与哥哥林燕山依靠叔父母抚养。林秀山自小在山区长大。家境的贫困，使他12岁时即开始浪迹鹿寨、雒容、柳州一带。

1914年春节，林秀山在鹿寨甘王庙与人聚众赌钱，欠下赌债，便溜回岭背村，从姨妈家弄得两个双毫（银币4角），赶到东泉买了把骨柄的五寸刀，配上皮鞘，捆起时兴的三角黄布绑腿，穿上牛头短裤，渡河到尖山脚隘口，蹲在“鹧鸪塘”的乱草丛中，干起伺机拦路行劫的强盗勾当。

一天傍晚，柳州到鹿寨的大路上，商旅正在赶路。一个湖南人，肩挑货郎担，由雒容走向鹿寨，行抵尖山脚隘口，林秀山手持雪亮的五寸刀，一跃而出，大喝一声：“拿钱出来”！这个湖南人一愣，吓得呆立不动。林秀山跃身上前，当胸一刀捅去，顿见血流如注，货郎担摔在一边，林秀山将货郎身上的铜板悉数抢走。这个做小生意的湖南人重伤苏醒后，自寻草药敷住伤口，死里逃生，到鹿寨报了案。

林秀山杀人越货后，潜逃柳州。这一年，15岁的林秀山投效柳州驻军沈鸿英管带部，充当一名勤务兵。穿上戎装的林秀山更是耀武扬威，时常外出赌博，间或诈骗钱财，肆无忌惮。时值沈鸿英由管带升督带，又由督带升帮统，便提拔林秀山为马弁，充当保镖。

1916年间，林秀山跟随沈鸿英由湘桂边境入广东，沈鸿

英部改编为护国军第3军，沈鸿英任军长，林秀山编入军部卫弁排。他恶习不改，涉足港澳，出入青楼酒馆，四处敲诈勒索，而且在每一驻扎之处，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搞一次化装打劫的勾当。

1920年初秋，粤军陈炯明部从闽南奉调回广东，沈鸿英部被打得七零八落。部队整编之后，旋奉令开拔湖南永州驻扎待命。时值1921年春节，沈军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和战问题，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林秀山跟随在沈鸿英的马前马后，在弥漫的战火中疲于奔命，出生入死，但他心中自有一番盘算。春节前后，他结识了湘南匪首陈光忠，他们互相勾结，策划潜往山区要隘，拦劫烟土。1921年1月中旬，林秀山终于串联卫弁排的冯某等5人，挟带驳壳枪10支，每支配子弹40夹，更换便装，深夜从永州西门外潜逃。行约1公里，到一所香磨坊，见一老者，经威胁利诱，给老者5个光洋，强迫老者次日早晨，趁送香粉之便，将枪弹藏于箩筐底，混过了盘查哨。林秀山等人持械奔到东安、新宁后，伙同陈光忠匪众，窜到武岗山区巴寨，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由于林秀山气焰嚣张，陈光忠怕被鹊巢鸠占，又想一山难藏二虎，于是，逼迫林秀山离开武岗。林秀山只好带20余人，离开武岗山区，沿着湘、桂、黔边境，经溶江流窜贵州。在湘、桂、黔边区的密林山崖中，林秀山成了有名的土匪头目。此时他已吸食鸦片成瘾，在贵州呆了一年多后，又窜回了广西。

1926年，林秀山曾向鹿寨镇商会“打单”，要借2000元伙食费，被商会会长张兆卿严词拒绝，为此他怀恨在心。1927年，广西桂、柳公路开始通车。有柳州朱姓鸦片商人（当时国

剿匪大纪实

民党政府对鸦片实施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装运一辆汽车的鸦片，从柳州运往桂林，途经鹿寨投宿。朱某与林秀山为赌友之交，因而登门拜访。林秀山留餐款待，当晚，他便暗中布置劫车。第二天早上，汽车行到寨沙、瓦窑附近时，事先埋伏的匪徒开枪拦车，将鸦片洗劫一空，朱某侥幸逃脱保全性命。林秀山劫掠大批鸦片之后，流窜平乐、八步一带，出售毒品，获得巨款，大肆挥霍，并增购枪械弹药。鹿寨镇商会会长张兆卿知晓林秀山劫车的底细，为此，林秀山更视张兆卿为眼中钉。1929年4月，林秀山从桂东潜回鹿寨，随带亲信黄奇、丘三、梁木保等，大白天在大码头抢杀了张兆卿。因当时的地方政府，对林秀山无可奈何，未加追究，林秀山得以逍遥法外。1928年北伐军平定东南各省，广西政局相对稳定。平乐区民团指挥官尹承纲，曾一度招抚林秀山为连长，驻扎平乐，稽查水运木排。林秀山借机勒索中饱私囊，并以嫖赌为能事。在平乐妓馆，以重金赎妓女华氏为妻。后来林秀山又因作恶多端，畏罪潜逃，纠集原班武装喽罗，再度落草为寇，为此，被平乐区民团指挥部再度通令缉拿。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湖南军阀何键进军广西“讨逆”，何利用湘南匪首陈光忠当先遣司令，长驱直入广西。陈光忠到桂后，寻找林秀山参与其事，后林秀山随湘军直趋柳州。湘军在柳州河南一带，开始与桂军交战。由于地形复杂，不明情况，湘军大败，幸得林秀山引路脱逃，免于全部被歼。但广西当局对林秀山深恶痛绝，悬赏大洋2000元缉拿。

1930年冬末，林秀山的拜把兄弟武馆头目邓宝山，有两个徒弟在贺县八步比武打死了人。榴江县府为此传讯邓宝山，

这事惹怒了林、邓两人，他们纠集匪众，围攻榴江县府。县长毛仲诚仓惶应变，一面向守县府，一面向邻县雒容告急求援。雒容县民团副司令谢映棠率领武装常备队，驰赴榴江县府解围，战斗相持两日，谢映棠被打死，县长毛仲诚幸得寨沙乡绅设法搭救，免遭于难。林秀山匪众泄愤之后，呼啸而去。1932年3月初，林秀山潜回老家二兴村吃喜酒，雒容驻军警卫团团团长冯璜得报，决心缉拿林秀山归案，兴师围捕。

黑夜沉沉，雒容城厢营房内响起一阵紧急集合号声。冯璜警卫团的两个连轻装步兵，向二兴村出发。拂晓，二兴村被包围，步兵一排进村搜捕。一个班长带士兵两名，在村犬狂吠中，直抵林秀山住屋门前，匪徒从门缝开枪顽抗，顿时枪声大作，惊醒村民和外来吃喜酒的客人，村中一片混乱，喊声、哭声、犬吠声，响彻山村。那时，林秀山随身的喽罗20多名，都带有驳壳枪，分住林秀山住屋邻近。林开枪打死那名班长之后，指挥匪众将住屋的内墙挖通，用墙泥堆成掩体，与军方对抗。林秀山还在后屋，挖掘地道一条，作好突围的准备。

上午，警卫团增援的步兵赶到，并调集雒容、鹿寨的民团常备队，以及鹿寨商会的护商队，共约300人，加强了包围力量。

中午，警卫团向村中高声喊话，命令外来吃喜酒的客人和村民，按指定的通路即刻离村，声言下午就要炮轰全村房屋。但仍有些村民不愿离家。下午，警卫团向村中发炮数发，但未打中林秀山的住房。入夜时分，二兴村的周围燃起草堆，蔗楂堆，火光冲天，恍如白昼。

林秀山率匪众于凌晨突围，向鹿寨山麓逃窜。被突破的这

段防线，为雒容县民团副司令何晶山防守，何晶山与林秀山素有深交，暗中有意放跑了林秀山。

拂晓，警卫团命令全面缩小包围圈，发动总攻，分四路入村搜捕，结果扑空。林秀山逃窜的下范村，离二兴村5公里，雒容驻军很快获得这个情报，连夜驰往围捕。但当天傍晚，林秀山在下范窝家吃饭之后，立即转移附近田野稻草堆中歇息。因此，警卫团入村搜捕，遂又扑空。林秀山见在广西难以立足，决计远走高飞，将老婆安顿后，从梧州经广州逃到香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流亡在香港的林秀山，从香港潜回广西雒容县导江，寻找何次山谋出路。何次山原是广西军阀沈鸿英属下的团长，后任广西平乐区民团副指挥官后，辞官家居。抗战开始后，广西当局赋予何次山招抚地方势力的权力。1938年，经何次山推荐，林秀山当上柳州师管区补充团中校代团长，驻雒容县招募新兵。三个月后，募集新兵1800人。7月，林带补充团到鄂东战区黄梅、广济等地。当时驻湖北浠水的国民党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召见林秀山，将该补充团改隶李品仙第11集团军第84军补充团，交林秀山率领。原该补充团团本部人员，组成鄂东第12游击支队司令部，升任林秀山为上校支队司令，令林秀山回广西临桂、义宁两县，招募新兵，分批送往鄂北老河口。1939年，林基本完成招募千余人的任务。由于林秀山所部连同补充团经济混乱不堪，于1940年秋，被饬令回桂林办理报销手续。林秀山随即离职，回到老家居住。他由匪而官，名声大噪，自此以后，鹿寨一带的老百姓专称他为“二司令”（称其兄林燕山为大司令）。

林秀山乡居日久，静极思动。于 1942 年，到鹿寨强买房屋几间，修建住宅，并且公然开辟赌场，从中抽头。这时，虽然政府早已明令禁止赌博，可是地方执政者，慑于淫威，对他无可奈何。更有地痞流氓甘愿听从林秀山的驱使，从中渔利，巴不得接受“土皇帝”的庇护。从此，林秀山长期豢养一帮门客，为他当谋士作打手，称兄道弟，结成一股气势汹汹的恶势力。

抗日烽火弥漫广西后，林秀山欲讨个头衔作护身符。他奔走桂林，拜访老朋友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黄绍立，商量此事。黄绍立推荐林秀山为该部副指挥官，呈报广西绥署。1944 年 8 月，林秀山走马上任，由桂林回鹿寨，竖起了所谓“桂林区民团副指挥官部”的牌子。

1944 年 9 月 21 日，日军侵入鹿寨，林的“桂林区民团副指挥官部”在三天前已转移到鹿寨附近的龙巢、大旦、黄豆山一带安营扎寨。鹿寨大部分居民都自动避难于此。林秀山大施淫威，在大旦赌场上，枪杀了谭老五。不久又以“汉奸”罪名枪毙了韦焕枢、罗明两人。前鹿寨镇长吴某等人，身遭拘禁，形同绑票。

林秀山手下的联队长黄老七，在龙巢、大旦、黄豆山一带，巧立名目，以所谓子弹费、伙食费、放哨费等向避难群众摊派。

不久，林秀山部转移导江，收容了榴江县驻鹿寨县警武装和鹿寨镇警武装，扩充武力，驻扎象县水晶、桐木一带，在避难区大开赌场，征收赌捐。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林秀山赶回鹿寨发“接收”财。如鹿寨镇商人

李某，疏散前购存洋纱一批，隐藏在家，林秀山竟以查抄敌伪财产为名派人到李某家将洋纱通通搬走，据为己有。

由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林秀山时兵时匪，时官时盗，确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第55节 召开会议，继续顽抗，善于伪装，多次躲过我追剿部队围捕，发电台湾要求“予以接济”。

“衡宝战役”之后，我军长驱直入广西。

1949年11月初，鹿寨出现从桂林溃退的国民党梁名德团（686团）约五六百人，他们佯言无路可逃，只得投靠林秀山部安身立命。不久，梁团跟随林秀山部进行一次所谓战略性转移，从思贤、岭背、二兴、二坪出发，沿鹿寨山麓开往大河、六谷，行程约二三十公里。路上又遇上了交通警察总队（即军统的特务部队）约千人，自荔浦溃退而来。于是林秀山部、梁团及交警总队纠集在一起，由大河、六谷折回鹿寨附近驻地，梁团及交警总队驻洛清江西岸。

11月中旬，我第四野战军天津支队由黔、桂边境自从江、丹洲直趋柳州。粤汉部队进入桂北，从正面南下指向柳州。22日，林秀山率所部及梁团、交警总队共约3000人转移平山。

林秀山转移平山路经石村的时候，回家与妻华氏商量后事，把所有的黄金白银、港币美钞，悉数交与其妻，让她外逃港澳，并吩咐身边的一个东泉人吴启基跟随华氏照料。吴启基原在柳州开设“建基行”商号，一向与林秀山过从甚密，可称“二司令”麾下的经济走卒。于是，吴与华氏一起经广州潜往

港澳。

林秀山部窜抵平山时，与国民党华中长官部恢复了电讯联络，接获命令，将林部、梁团、交警总队合并编成第1独立师，任命林秀山为少将师长、梁名德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并命令他们向北进入黔桂边境，迂回至我天津支队的后方，潜伏待命。

1951年1月8日，林秀山的第1独立师集结平山整编待发。当时我柳北剿匪部队438团进行突然攻击，经一个晚上的激烈战斗，林秀山全线溃败，伤亡甚重，残部向泗顶狼狈逃窜。

林秀山溃窜泗顶，尚未喘息，又遭到我四野天津支队的迎头痛击，堵住去路。泗顶战斗打响后，林秀山拟在泗顶附近，依山恃险，负隅顽抗。林秀山亲自指挥师部及所属非战斗人员百余人，速往山上一个大岩洞躲避。泗顶近郊一时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林秀山见势不妙，临阵脱逃，将部队交由副师长兼参谋长梁名德指挥。战斗不到4个小时，原来的交警总队、梁团、尤其是4423部，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各自抱头鼠窜。原梁团所部又遭遇我柳北总队14、16中队截击，大部被俘，梁名德落荒南逃。躲避在岩洞的非战斗人员百余人，全部投降。

林秀山残部，先后从泗顶窜回鹿寨石村、龙坪一带，然后陆续东渡洛清江，经导江往象县，向大瑶山移动。林秀山、梁名德及师部暂留石村活动。

1950年1月，林秀山在石村接获“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派陶松专送的函电，任命林秀山为126军军长，邓海山为

剿匪大纪实

副军长，古绍雄为师长，令该部活动于鹿寨、象县边境地区。同时，任命潘荣斋为 125 军军长，活动于修仁、寨沙一带，覃丽天为 127 军军长，活动于中渡、柳城之间的昇场地区。向天雷（何宗超的化名）为 128 军军长，活动于柳州、雒容边境地区。由此，桂中地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十分猖狂，各股匪按自然村定额派粮，定员要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鹿寨镇人民政府查悉林秀山与梁名德隐藏石村的情况后，立即派遣武工队配合当地驻军，连夜驰赴石村围捕。但狡猾的林秀山，当晚已从外石村转移到里石村惯匪梁三的家住宿。驻军包围外石村时，梁三获讯由外石村飞跑回里石村家中，背起林秀山亡命奔逃，住在外石的梁名德从梦中惊醒，企图拒捕，当即被擒。

事过半月，林秀山仍潜伏在离鹿寨 15 里的大汾村后，继续进行阴谋活动，造谣惑众，扰乱人心。

鹿寨驻军获悉林秀山住大汾村后，次日拂晓前往围捕。部队进村时，被林秀山的了望哨窥见，人村报信。林秀山急忙带领几个警卫向村外奔逃。途中，林秀山急中生智，离村边不远，就地滚下一个牛粪坑，全身浸入污浊水中，仅露出面孔，用些乱草遮盖，混过搜索，又一次脱逃。

林秀山从大汾村脱逃，窜往导江一带，纠集 126 军匪众，先后流窜水晶、桐木，仍想执行白崇禧的以大瑶山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部署。

1950 年 1 月，林秀山与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少将副司令甘竟生取得联系，曾到金秀开会，参加开会的还有国民党 48 军军长杨创奇，平乐、藤县、昭平、蒙山、荔浦、修仁六

县清剿指挥部司令韩蒙轩，副司令黄品琼，以及参议员陶国钧等人，他们痴心妄想，企图以大瑶山作为基地，策动游击战，负隅顽抗。

我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肃清瑶山外围股匪的同时，相继肃清在桂中地区活动于鹿寨、寨沙一带的 125 军匪部与活动于中渡、柳城之间的昇场地区的 127 军匪部，以及活动于柳州、雒容边境地区的 128 军匪部，只剩下狡猾的 126 军林秀山匪部。他们善于流窜，武装力量较大，出没于大瑶山附近的西南地区，四出骚扰，企图死灰复燃。

1950 年 10 月间，126 军匪部（包括部分交警总队和梁团），已集结 2000 多人于象州县大乐附近，蠢蠢欲动。剿匪部队获悉情报，立即去了五个连围剿，匪部溃败大乐圩，伤亡甚重，林秀山的养子、匪团长林忠发及匪众三四十人被俘，却不见老奸巨猾的林秀山。原来当我剿匪部队向大乐圩总攻时，林秀山化装成老妇，钻进一条大暗沟，沿沟向外逃窜。我剿匪部队分头向大瑶山方向追击，并组成一条强大封锁线，封锁流窜大瑶山的林秀山残部及其他股匪。

1950 年 12 月 17 日，大瑶山的匪首甘竟生、林秀山、韩蒙轩、黄品琼在金秀召开了一次支队以上的匪首会议，商讨对付人民解放军进剿的对策。甘竟生曾写信给台湾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吹嘘说，已“率所部转入基地，策动游击，转战几年……现已扩展 58 个县乡组织，有人枪数万之众。”要求郑转告在香港的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从速返桂主持”，还要求蒋介石“指示机宜”，“予以接济”。

第56节 天罗地网，没吃没喝，瑶民拥护政府剿匪，林秀山骨瘦如柴，下山偷挖红薯，面对他的却是一排黑洞洞的枪口。

林秀山所率残部，在我军民进剿之下，四处挨打，疲于奔命，但林秀山一向诡计多端，惯施狡兔三窟的伎俩，一夜转移几个住处。他走遍了金秀、老山、下孟、平竹、罗运、圣堂山等处，我剿匪部队紧跟追捕，历尽艰辛。当时虽传出很多谣言，说林秀山已逃出瑶山，但剿匪指挥员没有轻信，断定这些都是林秀山放出的烟幕，认为他仍在大瑶山里。

为了消灭林秀山股匪，剿匪部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将林秀山的外貌特征及活动规律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号召动员群众查其踪迹。这时，林秀山藏在大湾村的深山，没吃没喝，饿得骨瘦如柴，靠吞鸦片苟延残喘。饿的实在受不了时，他只得冒走漏消息的风险，深夜派勤务兵摸黑下山，到瑶民地里偷红薯吃。第二天，瑶民发现红薯地被人挖过，警惕起来，立刻报告驻大湾驻剿匪部队。夜晚，战士们潜伏等待，果然抓住了一个勤务兵，从他身上搜出一个口袋，装着林秀山的“官印”，证实了林秀山就在附近山里。

当晚，驻大湾剿匪部队的飞行组长孙永富率组员们连夜奔上大山，在深草丛中埋伏下来。进剿以来，他们不知熬过多少这样的夜晚，东方渐渐发白了，眼看这一夜的辛苦又白费了。突然一个战士发现不远处有被人踩倒的野草，立刻跟踪追寻，这时全连的战士都上了山。瑶民们也守在山顶、隘口，扛着鸟

枪，扬着腰刀，摇晃着小红旗，呐喊助威，只听到漫山遍野一片喊声：“不要走了林秀山！”

飞行组长孙永富他们沿着踩倒的野草步步搜索，到了中午，却又回到早晨发现脚印的地方，再也找不到新脚印了。线索断了。战士们不灰心，不急躁，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热情。

以后，剿匪部队指挥员变换搜索的办法，以逸代劳，由一部分战士埋伏，一部分战士举着火把，到山间闹闹嚷嚷的搜索前进，一位副排长忽然高声埋怨地说：“真倒霉，听风就是雨，叫我们瞎搜十几天，林秀山早就跑了，大家回去罢。”战士们随声附和：“早该回去了，走呀。”于是，大家都撤走了。

林秀山在山林间窥见一切，一直伏着不动，四顾张望，直到一片静寂，方定下神来。此时面黄肌瘦的林秀山，鸦片烟顶不住饥饿，决定摸黑下山，搞些红薯充饥。他怕被潜伏哨发现，弯腰弓背且行且止。谁知刚到红薯地里，突然一声：“不许动！”好似晴天霹雳，四枝冲锋枪已对准了林秀山，他手中光亮的左轮枪同时被缴。

“你是谁？”战士们大喝一声！

“我……林秀山，准备……下山投降”。

这是1951年2月26日的事。

这时的林秀山穿着一件国民党军队的黄色棉大衣，下着黑色便裤，拖一双布鞋，背着两张小猿皮，腰带上绑着半块烟土，衣服又破又烂，身上被山蚂蝗咬烂化脓，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已经没有人样了。

剿匪部队专备一艘小汽轮并派一排全副武装战士，将林秀山从导江押解到柳州专署。

1951年3月24日，柳州专署决定将林秀山示众于柳州市区中心的十字街头，那里放一张八仙桌，上面再放一张靠椅，林秀山就坐在椅子上亮相。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男女老少都想一睹这个著名匪首的真面目，围观人群络绎不绝。

3月25日上午，林秀山被押赴柳州市北校场（今五一广场）公审。

公审大会人山人海，热闹空前。柳州地区所辖鹿寨、忻城、象州、武宣、来宾、融安、三江、金秀等八个县都有代表参加。公审大会开始了，林秀山跪在台上，3万民众聆听苦主们愤怒控诉了林秀山的种种血腥罪行。最后宣判对大瑶山匪首，国民党126军军长林秀山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第57节 恭城暴乱，群匪猖獗，围攻县城，土匪气焰嚣张，难挡我剿匪铁拳打击，钟祖培终落法网。

广西土匪暴乱中，号称“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的钟祖培土匪武装发动的恭城暴乱，是有影响的一次土匪暴乱。

钟祖培，号植轩，1890年出生于恭城平安乡对河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兄弟7人。青年时考入陆军小学，与李宗仁同窗。军校毕业后，钟、李又同在护国军第6军第2师第13团供职。钟祖培任团部上尉副官，李宗仁当连长，常在一起聊天，交情比一般人深得多。

后来，李宗仁组织精锐营，经过多次挑选，仍缺一位连长人选，钟祖培屈驾做了李宗仁的手下。不久，陈炯明东江起兵，把桂军打回广西。李宗仁、钟祖培率领一支队伍逃入十万

大山隐蔽。

从此，钟祖培与李宗仁成了患难之交。1921年李宗仁自封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委钟祖培为第一支队第二统领兼第1营营长；李宗仁自称“定桂总指挥”时，又委钟祖培为第三纵队总司令。后来在北伐战争中，李宗仁青云直上，钟祖培也官场得意，提了旅长又升师长。1927年，钟祖培因受白崇禧排挤，闲居上海，暂时离开了李宗仁。

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被迫退回广西。钟祖培趁此机会，于1930年在香港会同张一气、陈绍虞、杨久发起了“拥李倒白”活动，企图捞取大权。可惜，桂系不久和广东陈济棠建立了联盟，稳定了广西的统治。蒋介石查明钟祖培不可靠，撤了他第8军军长职务。钟祖培又厚着脸皮跑回广西向桂系找事干，李宗仁给了他一个总司令部高级参谋。1934年又调他任梧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官。钟祖培接事后，专事敲诈商人。

1935年，钟祖培被梧州商人告发，李宗仁只得把钟祖培调到龙州任对汛督办。

1936年，钟祖培又被调离龙州到平乐区任民团指挥官，在任上大肆捞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宗仁开赴前线作战，钟祖培失去了后盾，平乐民团指挥官这个肥缺很快被田良骥夺去，钟祖培不得不回乡长居故里。

钟祖培回到家乡对河村后，仍不忘沽名钓誉。常常邀来村上六旬老人饮茶叙旧，施舍恩惠。

1947年，钟祖培串联莫遗贤、张春霆、余祖培、林培深、

剿匪大纪实

黎绍棠、骆绍鹤等十人参加伪国大县代表竞选，当选为伪国大代表。

抗日期间，钟祖培以抗日为名招收的自卫队，不去打近在咫尺的日寇，却把到八步进行抗日活动的一个同情共产党的老国民党人何香凝女士当作共产党，发布文告指责八步专员容留何香凝，并以此为借口，劳师动众远道讨伐李新俊。

1949年10月，白崇禧在衡宝战役中失败退回广西，妄图以恭城为屏障，阻止解放大军入桂，保卫桂东。钟祖培组织民团联合桂系的一些残兵败将拟定了“广泛游击战”计划，借给湖南反共救国军第12军军长陈平裘机枪3挺，步枪50枝，子弹5箱，派出民团副团长余伟年率2连与股匪欧十三，配合陈平裘残部向湖南解放军进犯，围攻解放军驻粗石江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后，钟祖培在恭城召开全县乡绅会议，组织所谓“恭城自卫委员会”，把全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宪兵特务、恶霸地主、流氓惯匪网罗起来，想继续镇压革命群众，阻挡解放军入境。

1949年12月11日，钟祖培及在恭城的部分国民党兵被迫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145师434团3营的全体指战员，在营长梁士忠、教导员周福禧的率领下，分兵东西南三路，占领了恭城县城。接着，各乡也建立了人民政权，恭城县全境解放。

鉴于钟祖培同桂系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以及我人民解放军到来时能主动投诚，我党把他作为重点统战对象。

但是，钟祖培仍然忘不了他恭城第一人的地位。

12月25日，钟祖培的油榨坊突然热闹起来。林绩勋、田

民丰、余伟年、张明琳、钟士奇、黄琬、莫癫子等钟祖培的老部下和民团头目十余人聚集在大厅内，围着一盆炭火，四周门窗紧闭。王素芬把刚煮好的油茶端上，不停地催客人们：“趁热喝，趁热喝”。

“好苦啊！”黄琬端起油茶呷了一口，皱起眉头连连叫苦。

“不要怕苦，这是头茶，越苦越祛寒暖身。”王素芬娇声娇气地解释道。

“哼！以后怕连这苦茶也喝不成了！”钟祖培从外面走进来听说茶苦，拉长声音说。

王素芬立即帮钟祖培倒上一杯二道油茶。

钟祖培端起呷了几口后煽动说：“几位，今天我叫钟士奇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想与大家商量件大事。大家已有体会，自共匪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向你抽粮，明天向你借枪，没过一天好日子，将来更没有好日子过。你们也知道，共产党就是共产，将来我们的田地要全部充公，就是脑袋也难保。听说北方一些富人就给共产党杀得差不多了，何况我们以前与共产党作过对。还听说，前几天莲花乡一个较富点的人，说工作队抽粮太重给打死了……”

“是啊！今后该怎么办？钟主任请快拿出个主意吧！”在坐的一些匪首听钟祖培这么一说，感到十分害怕。

“诸位不要慌，我们可以自救嘛！”钟祖培喝了口油茶，站起来走了一圈，用神秘的口吻说：“前天，白长官的特派员梁赓与我取得联系，送来活动经费黄金二十两，指示我们趁机暴动，到时他们派飞机运人运物援助。”

“对！等着是死，不如暴动自救，即使死了也值得！”钟士

剿匪大纪实

奇等几个匪首站起来抢着说。

经过激烈的争吵，众匪决定成立“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设参谋、秘书、军需、副官四个处及五个队若干中队。钟祖培任总指挥，田民丰为副总指挥兼第2大队长，林绩勋为秘书长，钟伟人为军需处长，钟士奇为副官长兼第一大队长，张明琳为参谋长兼第3大队长，余伟年为第4大队长，张兴贵为第五大队长。

第二天，商人打扮的钟士奇，向平乐方向走去；余伟年向黄坪方向走去；张兴贵拿着柴刀上了西岭。

几天以后，各地土匪再次聚集。这次黑会是钟匪举行暴动的总动员会。到会的匪首很多，平乐惯匪欧十三、余继光，西江、西岭匪首陈荣仔、李黑子等都到了。各路匪首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各自的情况，由于匪徒俱增，决定增设六、七两个大队，分别由欧十三、余继光充当大队长。

会议后，恭城接连发生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血案。

1950年1月19日，莲花工作队队长刘禄盛由县城返莲花途中，在蜈蚣岭遭匪拦截，与匪徒英勇搏斗，被连砍数刀壮烈牺牲。

1月24日，驻三江解放军战士9人返回莲花，途经单竹，遭匪伏击，牺牲6人。

同日上午，嘉会乡泗安村地主何振德纠集匪徒一百多人，袭击我征粮工作队。

.....

1月25日黄昏，土匪300人包围了和平乡公所，枪声大作，鸡犬乱叫。由于部队和地方领导麻痹轻敌，工作队员对土

匪暴乱毫无准备。

等工作组明白过来，组织突围时，钟匪已用机枪封锁住大门。由于寡不敌众，除队长王宏家率领郑兢革、小梁冲出包围，向县城奔去外，其余人员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被打伤俘虏。

1月26日早上，钟祖培秘密将土匪指挥所移至距县城只有1.5公里远的路口村李家祠堂，下令围攻恭城县城。

面对土匪的进攻，我恭城县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点防御，固守待援。

会议决定：派两个班抢占文庙岭和武庙岭制高点，以交叉火力，阻敌前进；在县政府大门构筑工事，配合一个战斗小组阻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以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为掩护，配备一个战斗小组，固守政府大院。县大队的一个班自告奋勇，接受保护老庙粮仓的艰巨任务。

县委书记田继航带党政军几位负责人来到前沿阵地，鼓励战士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沉着应战，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立新功。

入夜，县城内外静得出奇，只有倒春寒刮起的寒风，偶尔带来几声野狗拖长声音的吠叫。

这是激战前夕的可怕静寂！

晚上10时许，城北的道公山腾空燃起三堆熊熊烈火，这是匪徒进攻县城的信号！

“轰，轰”两声迫击炮声，紧接着县城四周枪声大作，匪徒们左臂捆着白布条，分四路向县城疯狂扑来：东路由匪首钟士奇、钟双福、钟伟人、黄子挽率匪徒600多人，从凤凰山、

剿匪大纪实

金鸡寺、江欠村、东渡浮桥，攻入兴隆行；南路由匪首欧十三、张兴贵、莫癞子、陈荣仔率匪徒 600 多人，由鹅山亭、燕子岩、狮子头、南渡浮桥，直逼十字街；北路由匪首田民丰、李黑子、冯杰、刘汉光率匪徒 200 多人，越过下里洞，向窑钵岭高地进攻，与匪首陈荣仔一股汇合后，再向武庙岭进攻。

匪徒们一边放枪，一边嗷嗷狂叫，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撒泼肆虐。

霎时间，匪徒的叫骂声，婴儿的惊叫声，妇女的哭喊声，乱成一片。

27 日凌晨 3 时，各路匪徒集结于十字街，包围圈缩小到县政府四周，企图一举拿下县人民政府。

守城解放军面对数十倍于我之敌，人人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匪徒不接近不打，瞄不准不打，弹无虚发，一连三次击退了匪徒的疯狂进攻，阵地岿然不动！

在路口村李家祠堂坐镇指挥的钟祖培，接到前方战报后，气急败坏，发出命令：

连夜从莲花、西江、世平等地调来匪徒 1000 多人增援围攻县城；集中兵力，抢夺武庙岭阵地，以此为突破口，攻下县政府大院，并派出自己贴身的 30 多名精悍匪徒，配备二挺机枪前往助战。

27 日拂晓，3000 余匪徒迂回到了县府西北的武庙岭下，将进攻的重点集中到抢夺武庙岭高地。

武高岭高地在政府大院西侧，是政府阵地最重要的制高点。固守高地的 9 班战士面对着山下人头攒动的匪徒，毫无惧色，连续作战 19 个小时，击退了匪徒十多次的轮番进攻，终

因弹尽力乏，于上午 11 时主动退出阵地与县政府主力汇合。刚刚撤出阵地，县府即受到土匪火力的严重威胁。县委书记田继航审时度势，立即作出了誓死夺回武庙岭阵地的决定。

田书记和县委副书记贺万年、副教导员丛明德、副指导员李树亭，身先士卒，亲自带领 9 班战士，在 7 班火力掩护下，出敌不意，分两路夹击敌人。战士们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仅 20 分钟的激战便夺回了阵地，接着以猛烈的火力将潮水般溃逃的匪徒追到城郊的西河口。

在县政府战场鏖战正酣的同时，距离县府不远的老庙粮食仓库的 12 名县大队战士与 1000 多匪徒浴血奋战。为了保卫这个极其重要的据点，副中队长周建辉带领 11 名战士，击退了匪徒的数次进攻。天亮后，涌入县城的匪徒越来越多，轮番进攻。而对蜂涌而上的土匪，战士们无所畏惧，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棍棒、砖头、石块与匪徒肉搏。

固守粮仓的 12 位忠诚的人民战士牺牲了！

27 日黄昏，县城西面突然枪声大作，我增援队伍从平乐闻讯赶来。

围城的匪徒见我军援军到来，惊恐万状，四散奔逃，后知援军不多，于 28 日再度攻城。我守城战士分东南、西南两路神速出击，匪徒如惊弓之鸟，溃退 5 公里，但县城仍在匪徒的包围之中。

粮将完，弹将尽，同志们互相鼓励，尽量节约子弹和粮食，沉着固守阵地。

土匪围攻县城的同时，各乡土匪也开始暴乱。

25 日下午，1000 余匪徒包围我嘉会乡政府，大肆叫嚷：

“打死一个工作队员奖大洋 300 元，打死一个解放军奖 600 元，打死一个领导干部奖大洋 1000 元至 2000 元。”

面对土匪的进攻，工作队队长刘长江与解放军方排长采取了撤离转移的果断措施。

撤离时，由解放军程班长带一个战斗小组，以猛烈火力杀开一条血路，后面由排长亲率一个小组掩护。队伍冲出了乡政府后，过嘉会河，走中村，经大洞，进苏陂，沿途数次遭遇土匪，匪徒均被击溃。

26 日晚，队伍沿黄帝岭崎岖山道，爬七星界，翻四仙塘，攀龙颈界，进入阳塑境内。队伍无一人伤亡到达兴坪。

26 日清晨，东寨乡谣言四起，出现了许多行迹可疑的人，乡长侯杨智觉得情况不妙，立即安排干事黄自益等人收拾文件准备撤离。此时，在蒲源村下乡工作的乡指导员李秉天、杨绍德匆匆赶了回来，突然枪声大作，匪徒狂叫，乡政府遭到土匪的包围。侯杨智因掩护其余三人从后门冲出，不幸被捕。

侯乡长与另外二名被匪徒在路上拦截抓到的工作队员，壮烈牺牲于杨梅潭。

26 日下午，1000 多名匪徒包围了莲花乡工作队住地。解放军、工作队 40 余人在副排长毋连才等的指挥下，凭借乡政府的一间炮楼，与敌激战一个通宵。

第二天清晨，匪徒改用火攻，同志们从滚滚浓烟之中冲出。因是白天，又见匪徒中夹杂着群众，我突围战士不忍伤害群众，在穿越公路时队伍被打散。除二人冲出外，副排长毋连才、副乡长李志儒等 30 多位同志全部英勇献身。

同日傍晚，朝川乡征粮工作队正在东面村召开群众大会，

杨溪村一农会会员神色紧张，匆匆递给八连二排长谭凤武一张字条：“见字火速返回西岭。”

谭凤武带领工作队员快速离开了东面村，沿崎岖小道，爬山涉水，于27日凌晨一时到达坪头山。只见西岭上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队伍止步稍事休息。

过了一会儿，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岭工作队已遭到几百名匪徒的围攻，西岭回不去了。”

到哪里去呢？谭凤武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往平乐方向突围！”

为了避免匪徒截击，队伍不走大路爬山路，进八岩村、过门楼寨、经十里坪，沿途均遭小股匪徒伏击，大家不敢恋战，且战且退，终于来到龙泉岩。

龙泉岩一边依山，一边傍水，中间是一条羊肠小道，匪徒在河对面和后山上用密集的火力交叉封锁，妄图全歼突围的征粮工作队。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解放军和工作队员们团结一致，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更加密集的火力压得敌人不敢抬头，同志们一边射击一边跑步强行冲过龙泉岩，于掌灯时分胜利到达平乐县人民政府。

……

1月25日恭城暴乱发生后，紧接着，平乐、玉林、宜山、宾阳等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土匪恣意攻打我区、乡政府，围攻县城；烧民房，抢公粮，强奸妇女，破坏交通；袭击我分散小部队，捕杀我政府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据玉林、平乐、梧州三个地区不完全统计，2、3月间，参加暴乱者达一万多人，损失公粮35万多公

剿匪大纪实

斤，我军及地方干部、进步群众约 3000 人惨遭杀害。

对各地土匪暴乱，我军立即予以了果断镇压。

第一个被击溃的便是最先煽动暴乱的钟祖培匪部。

1 月 27 日，中共湖南省永明县委和当地驻军，接到从土匪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恭城县副县长赵国土的紧急求援报告后，立即派出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与栗木乡突围的 60 余解放军战士和工作队员一道疾驰恭城增援。

当天下午，援军抵达嘉会。

28 日抵达西岭乡，西岭乡解围。

29 日，援军抵达恭城县城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围城匪徒发起猛烈进攻。我守城指战员听到援军吹起的冲锋号声，立即跃出阵地出击。在内外夹击之下，击毙了一批肆虐的暴徒，大批匪徒心胆俱裂，纷纷溃逃……

恭城县城重新获得了解放。

钟祖培逃至瑶山小源冲香竹坪后，仍不甘心失败，与林绩勋、田民丰、钟士奇收集残匪，派人与隐匿在黄坪的国民党十二军军长周天雄联络，写信向富川匪首曹天乐求援，准备再次攻城。

平乐地委掌握此情况后，立即派出以地委副书记晁福祥、公安处长田春和 145 师参谋长赵峰组成工作组，率领一批党政干部及 145 师的一个主力团 3000 余人奔赴恭城围剿残余土匪。他们一到恭城就向全县发出了《告人民书》，在匪乱重点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匪特的欺骗宣传和杀害我军人员、基本群众的罪行，宣讲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

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主动规劝参加匪乱的亲人投案自首；

一些受匪首欺骗宣传迷惑参加暴乱的群众觉醒了，主动向我党坦白交待。仅几天功夫，钟祖培撤到瑶山的土匪减少了一半。

同时，人民解放军对钟匪进行了重点武装进剿和驻剿，一些土匪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下山投降，一些土匪自动散伙。

钟祖培龟缩在小源冲香竹坪，惶惶不可终日。

这天，一阵“嘭嘭嘭”的敲门声把钟祖培惊醒，他开门一看，是在平乐地委工作的女儿钟锦雯的舅舅。钟祖培忙请他进屋。

“不客气，不客气。你女儿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钟锦雯的舅舅把信递给钟祖培……

钟祖培看完女儿的信，两手颤抖起来，忙问钟锦雯的舅舅：“这封信是谁叫我女儿写的？”

“是公安处田春处长叫我送来的。这封信是县委叫你女儿写的，意思是叫你回去，坦白交代，向人民认罪。”

在我军的威慑下，4月的一天，走投无路的钟祖培自动走出了瑶山。

钟祖培虽然自动走出了瑶山，但他在暴乱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却是不可饶恕的：

杀害解放军、工作队员、县大队战士和干部 179 人，杀害工作人员家属 28 人，杀害群众无法统计。

抢劫县城商户一百余家，损失布匹、棉花、芝麻、衣服等物资折合当时人民币 3.29 亿元（旧币）。

烧毁东寨乡上炉村房屋 78 间。

政府损失粮 50 万公斤。

剿匪大纪实

钟祖培落网后，群众联名控告者达 2238 人，鉴于此，不惩办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不足以平民愤。1951 年 2 月 27 日，广西省人民法院桂北分院庄严开庭审理，判处钟祖培死刑。

第十五章 缚苍龙

第 58 节 大战在即，密使临阵，蒋介石下令陈明仁“大义灭亲”，长沙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9 年 7 月底，长沙。

酷暑难耐，久旱无雨，道路尘土飞扬。在城墙上和市区的主要交通中心，除了光着黑瘦脊梁在搬运沙袋修筑工事的国民党军士兵，骄阳下难得见到几个行人。

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颠簸着从郊外驶入城内。

车上坐着两位颇有气势的人物——蒋介石的亲信、国防部次长黄杰和政工局长邓文仪，他们上午刚自衡阳乘专机飞抵长沙。一路上，除了偶尔向车窗外张望几眼，对匆忙走过的几队士兵有一句没一句地议论两句外，他们便紧抱胸前的牛皮公文包正襟危坐，沉默不语。

吉普车飞快驶入市区湖南省政府大院内，在后楼前嘎地一声刹住，奉令接客的副官跳下驾驶室，替两位特使打开了车门。

这时，早已恭候在楼前的一身戎装的陈明仁迎上前来，连声招呼说：“两位长官辛苦，快请，快请！”说着便与黄杰、邓文仪寒暄着步入楼内。

午宴已经备好。

尽管餐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但黄、邓两人仅仅是随便地动了动筷子，让并不感饥饿的肚皮又平添了几分饱胀，便催促主人起身前往省政府的小会议室商谈要事。

陈明仁神态轻松地落座后，挥了挥手，让送上茶水、水果、点心的勤务兵们立即退下。

小会议室内只剩下了他们主客三人。

“陈总司令，”黄杰抗战时当过陈明仁的集团军总司令，算得上是老上司，故大大咧咧地在沙发上双手轻拍，舒适地伸直了双腿，掉过脸来，开口说话了，“我与邓公这趟公差，可不是要检查你的长沙防务，打仗的事，是不必我们操心的，是吧？”他向正品香茗的邓文仪抛去了话头。

“对头。”邓文仪知道现在是一唱一和的时候了，赶忙放下茶碗，慢悠悠地接话道，“长沙有你在，是大家都放心的事。不过眼下我们内部实在存在着很大问题，委座此番要我们来长沙，一是带了些现款给你，二是落实一下你们所需要补充的武器，这第三嘛——”邓文仪说着打开公文包，从中抽出一封信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陈明仁接过来一看，见是蒋介石专门写给自己的一则手令：

“弟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将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雪冰面告。”

陈明仁目光在手令上停留了片刻。“雪冰”即是邓文仪的字号。他当然明白蒋介石搞的这套“敲山震虎”的把戏，也清

楚手令上所说的“不惜大义灭亲”指的是谁。

黄杰和邓文仪在静静地观察着他的神态举止。

“委座是信任你的。”邓文仪因是陈明仁讲武学校和黄埔同学，又是蒋介石指定的主要说客，当然要将话挑明了才好回去交差，因此趁机侃侃而谈，“明仁兄现已身任湖南最高军政长官，时下共军来势很猛，如能打好长沙这一仗，对党国的军心民心的鼓舞作用都是非常之大的。因此，委座派我们做代表，以示关怀。当然，必要时也可退守衡阳再战。”

“请两位放心，长沙之战，势在必行。不过，我的意思是应与共军在城外作战，以免祸及无辜。”陈明仁开始表态。他说得入情入理，与平时的直率语气无二。

“好，我们来就是要听陈总司令这句话。不过，有一点，想必白长官已经在电话上告诉你了，千万要当心啊。”邓文仪压低了嗓音，话中有话地用手掌拍了拍陈明仁的手背。

陈明仁心里明白他话中的含意。3天前，白崇禧曾从衡阳打来电话，告知他：“程潜已回长沙，你要住在省政府内不要出来，更不要去他那里，免遭暗算。”他手握着电话听筒，一面连声感谢白长官的关照，一面暗自替程潜担心，看来蒋介石、白崇禧对程潜早已有心除去了。放下电话后，陈明仁马上叫人备车直奔程潜住地——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将白崇禧来电内容详细告诉了他。对此，程潜一笑了之。自中共第四野战军以钳形攻势进逼长沙以来，7月21日白崇禧要他随军撤出长沙退守邵阳，但他29日又带随从悄悄返回，此事令白起了疑心。

7月30日，白崇禧再度致电陈明仁：

剿匪大纪实

“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缴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

陈明仁收到电报后，又通知了程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陈明仁刚刚回到家中，副官又急忙送来两封广州发来的急电。

此时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

第一封电报内容为：“湖南省主席程潜辞职照准，任命省政府委员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第二封电报内容则为：“长沙绥靖公署撤销，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任命陈明仁兼绥靖总司令。”

程潜主持的湖南军政事务的大权，全部被蒋介石剥夺了。

陈明仁见事情紧急，顾不得擦把脸，赶忙又穿好衣服，乘车再次前往水陆洲。

见到程潜后，陈明仁掏出那两封电报，态度坚决地说：“颂公，只要有你在，我决不主政湖南。”

“哪里话，现在我已行动受限，担子放在你的肩上，就不必多虑了，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程潜对陈明仁的坦诚甚为感动，庆幸自己这许多年来毕竟没有看错人。想当年，自己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长时，曾派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好友李明灏和柳漱风两人到湖南去为即将创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收学员。当时的学员中并没有这个湖南醴陵人陈明仁。陈明仁赶到广州时，学校早已名额满员，而要求入伍的人仍然很多。因此，程潜下令不能再招自己家乡醴陵的学生了，以免人们误解自己只讲乡亲关系。幸好时任学校教育长的李明灏爱

才，仅在长沙招收的学员中，即有后来在国共双方都成为将星的一批精英，如陈赓、左权、宋希濂、李默庵、邓文仪等人。李明灏替陈明仁出了个主意，叫他不要填醴陵籍贯而改填浏阳，并亲自报请程潜校长批准，校方才破例收下了李明灏所说的这个“有用之才”。

为了办好这所讲武学校，程潜曾将军政部官员的伙食费节约出一部分作为办学经费，有时甚至还卖掉自己家中的金银首饰补贴学员伙食。

1924年9月，孙中山指挥北伐时，程潜担任鄂军总司令随队出征，讲武学校拟与初创的黄埔军校合并，由蒋介石任校长。具体安排为：讲武学校3、4队学员奉命毕业，编入总统卫队营，而1、2队学员则进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业。此事引起了3、4队学员的强烈不满，大家一致推举平素在学员中颇有威信的陈明仁、李默庵等12人为代表，不顾学校的反对，冲出校门前往黄埔求见蒋介石，要求入学受训。

蒋介石接见了陈明仁等人时，当面一口一个“将才难得”，说得12名讲武学校的年轻人心里热乎乎的，背后，讲武学校却决定以“违反校规”为名将他们开除。消息传出，数百名学员齐聚校长办公室，要求与校方评理，陈明仁一怒之下，率12名代表愤然离校。结果还是有心拉人的蒋介石派人将他们悄悄接入黄埔，编入第1期6队受训。

尽管程潜事后对自己亲手创办的讲武学校发生此类“捣乱事件”有所耳闻，但他还是对陈明仁这个热血青年抱有好感，认为年轻人敢作敢为，才有出息。后来大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没有错。

陈明仁在程潜住处谈了许久，对时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商量回去后如何应付那两名“钦差”。

“颂公，陈某向往和平大事已久，请相信我决不会半途而废。”陈明仁见夜已深了，遂起身告辞道。

“子良老弟，”程潜拉着老部下的手，叫着他的字号，寓意深长地说，“白崇禧这个‘小诸葛’不好斗，你要小心提防些才是。”

“知道了。”陈明仁说罢向门外走去，上了汽车。

程潜站在台阶上，一直目送着陈明仁的吉普车开出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的大门，才重又返回屋内。

第59节 长江决战，松山大捷，八年抗战将星闪耀，大闹官邸，蒋介石对其又爱又恨。

陈明仁自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东征西讨，战功卓著，备受青睐，与蒋家结下了难解之缘。

如果说陈明仁当初率学员代表冲出讲武学校校门求见蒋介石要求入黄埔之际，蒋满口夸赞“将才难得”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假之词的话，那么，1925年夏季开始的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的几次重大战役，却使蒋介石暗自庆幸自己的“预言”到底还算是说准了。

当年9月，东征军攻击广东东莞。此时已由见习排长升任第1军第2师第4团1营3连中尉排长的陈明仁，竟以重病之躯，率一个排冒着密集的炮火，勇猛突上东门高地，赶羊般地

缴了敌军一个营的枪支，为东征军攻克东莞立下头功。消息传到黄埔，蒋介石等黄埔将领均赞许不已，并着令对该团予以嘉奖，但蒋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当时的实际场面，因而也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则不同了。1925年10月12日，蒋介石亲自挂帅挥师攻打叛军陈炯明占据的惠州城。惠州四面临水，城高墙坚，仅有一桥直通城门，可谓易守难攻。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的蒋介石，在俄国顾问鲍罗庭及何应钦等大批黄埔高级将领的簇拥下，身披黑色大氅，腰佩指挥刀，本想借攻打惠州之战显示一下自己的指挥艺术，结果由于求胜心急，竟不待炮兵火力完全压制住敌军的射击，即下令发起冲锋。大批革命军士兵在桥畔割草般地被叛军机枪扫射倒下，短短几个钟头，伤亡竟达数百人！

蒋介石站在一处高地，神态颓然而尴尬，一个劲儿冲着身边的2师师长张民达嚷嚷着：“拿下来，一定要拿下来！你有什么办法？”

“报告总司令，我去组织敢死队！”2师师长见自己的部队伤亡惨重，心里早已火起，转身对传令兵吼了一声，“去告诉4团团长刘尧宸，叫他组织一个连的敢死队，爬城突进去！”

蒋介石见有了办法，脸色这才好看了些，不时举起望远镜朝惠州城上的敌军军旗观察，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要把那个旗帜搞掉，插上我们的旗帜！”

将领们全都没有吱声。此次东征，最难打的就是惠州，叛军凭险顽抗，能否光靠人数不多的敢死队解决战斗，谁的心里也没有底。

刘团长是陈明仁在黄埔的军事教官，自第一次东征以来，

剿匪大纪实

陈明仁即在他手下作战，并由刘在不长的时间内将其连升三级，从见习排长到排长至本团第3连连长。

敢死队经刘尧宸亲自选定由陈明仁连担当，并在刘团长亲自率领下攻城。

激战复又开始。

3连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抬着云梯，高声呐喊着冲上桥头，直扑城边。尽管不断有人在敌人炮火下倒下，但还是一鼓作气冲到了城墙下。云梯竖起来了，城头上的敌军不断朝下投掷手榴弹，一时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刘尧宸团长身先士卒，背插大刀，手提驳壳枪，怒目圆睁，昂着头迅速攀上摇晃不定的云梯，几下便登上了城头垛口。

后方阵地上，蒋介石见状，神情为之一振，对身边的将领们不住地说：“唔，打得好，敢死队敢拼敢打！”

“总司令，刘团长和敢死队全体官兵已留下遗书，不攻下惠州，誓不生还。”2师师长从旁慨叹道。

“要向他们看齐，要向他们看齐！”蒋介石感动了，频频点头嚷道。

正说话间，突见刘团长在垛口上身影猛地一晃，便仰身摔下城来，随之不少在云梯上的士兵也被子弹击中跌落下来，有的云梯竟被城上的敌兵用竹竿木棒掀翻……

后方阵地指挥部的气氛又凝重起来。

“娘希匹！”蒋介石放下望远镜，铁青着脸，从牙缝间挤出一句骂声。声音虽不高，但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知究竟他是在骂陈炯明的叛军，还是在骂自己的部队不争气。因此，更没有人敢发议论。

“总司令快看！”一直站在靠前位置的2师师长张民达突然叫道。众人忙举起望远镜，知道如没有好消息，他是不敢在这种时候贸然惊驾的。

蒋介石不大情愿地又举起了望远镜。此刻，映人镜头的是一名身手矫健的青年军官，腰间缠满了手榴弹，腋下挟一面青天白日大旗，正率众扑上城头！

这一次的攻势，完全是拼命。守城敌军全然没有想到对方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竟敢以残部再度登梯攻城。

陈明仁率领十几名敢死队员翻上城头垛口后，刀砍枪打，甚至与蜂拥面上的敌兵展开殊死肉搏！

敢死队员们呐喊着不断攀上城头，守城敌军见已无法坚守，纷纷弃枪而逃。陈明仁一面命令战士们乘胜追歼，一面直奔城楼，将随身携带的大旗迎风展开，以鼓舞城下的各路攻城部队发动攻击。

“这个拿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蒋介石这下子抑制不住欣喜，语气亢奋地问。

“2师4团1营3连连长陈明仁！”站在蒋身边的总指挥部参谋、黄埔教官李明灏赶紧送上一句。因陈明仁既是他招收来的小同乡，又是自己在讲武学校和黄埔的学生，所以很是自豪，故回答声也格外响亮。

“将才难得，将才难得。”蒋介石连连点头，他对已有所闻的这位湖南籍青年军官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总司令，黄埔学生倘人人像他，何愁军阀不灭！”何应钦这时即将升任第1军军长，为博得蒋校长欢心，有意将“黄埔学生”4个字加重了语气。

“唔，这个意见很好。黄埔精神就是要以少胜多。要为此个黄埔学生庆功，大振我们黄埔军威。”蒋介石从何应钦的话语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此时身边除了黄埔军校和由军官教导团扩编组建的第1军，再无本钱，何不借机炫耀一番给其他几路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看？

果然，打下惠州后，蒋介石便叫人将东征军全体官兵集合在城东空地上，隆重举行祝捷大会。在这个庆功仪式上，一队司号兵奉命吹3次军号向陈明仁致敬，蒋介石在嘉奖部队攻城胜利的讲话结束前，还振臂带着身边的将领们一齐高呼：“向陈明仁看齐！”顿时全军官兵一齐举枪向陈明仁致敬。末了，蒋介石当场宣布，将陈明仁晋升为营长。

蒋介石的此番刻意提携，从此使陈明仁在蒋的嫡系军事集团中，备受器重，官阶不断上升。

也正是因为这样，陈明仁在知恩图报思想指导下，从此更加骁勇善战，卖力冲锋。然而，陈明仁是个只懂打仗而不会耍政客手腕的人，因此，在蒋家军事集团的倾轧排挤中，也不免受到孤立和打击。

1931年，蒋、冯、阎大战期间，陈明仁率独立第3旅官兵，不顾第3师师长陈继承的反对，毅然立下“提头来见”的军令状孤军深入，以1旅之兵力一举打垮9倍于己的石友三部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缴获甚丰。

蒋介石闻捷后，当即表示要将他提升为89师师长，只因陈继承的妒忌作梗，罗列罪责，使其最后仅升任为88师副师长兼238旅旅长。

1933年，陈明仁30岁之际得以升任88师师长，随之率军

讨伐粤军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州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打败陈、李后，他又奉令参加对中共江西苏区中心根据地的进攻。因对指挥官蒋鼎文将 88 师主力分散使用损失惨重不满，破口大骂总指挥部的联络官，甚至扬言“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官司打到蒋校长那里也不怕”，因此开罪了蒋鼎文。蒋鼎文将一纸恶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说陈明仁“一贯骄傲、不服调遣”……

蒋介石对陈明仁又爱又恼。爱的是他能用兵打仗，是黄埔出身数得上来的一员猛将；恼的是已有不少指挥或管辖过他的自己的嫡系将领指责其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为了平息内讧，蒋介石只得下令暂调陈明仁去庐山军官训练团培训。而该军官训练团更是蒋的心腹亲信的聚集所在。蒋介石此举既平息了蒋鼎文的怨气，又继续笼络陈明仁为其效忠。

从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后，陈明仁被调往 2 师任参谋长。此番降职使用，据宋美龄透露，也是蒋为了磨一磨他的“傲气”。在 2 师时间不长，又调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议。

1935 年，陈明仁奉调入陆军大学第 13 期学习。3 年后毕业，一举升任国民党军政部副部长。此时，九江战役打响，中日长江大决战迫在眉睫。陈明仁主动请缨上前线。由于国民党军事集团内的将领对其多有妒忌心，他只能到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仅由贵州省保安团拼凑而成的预备 2 师任师长。陈明仁在湖北咸宁走马上任后，即率预 2 师奔赴九江战区。部队驻防后，他便下令各部同时抓紧战前练兵，并反复向官兵们强调坚守阵地的重要性，要求官兵们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果然，战幕一拉开，蒋军在日军精锐部队的猛攻

下，共有8个师死伤惨重，溃不成军，败逃而去。而陈明仁率预2师这个“杂牌军”浴血抵抗，坚守不退，终于在援军增援下完成了阻敌作战任务。

1941年春，陈明仁以中将军阶率领预2师开赴云南，编入中国远征军准备赴缅作战。在昆明，他又一次顶撞了蒋校长。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蒋介石在昆明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所有到会的将领均着黄呢军装，黑色马靴，戴白手套，惟独陈明仁身穿破旧的士兵棉衣前往。

“陈明仁，你看看，你还像个师长吗？不成体统！”蒋介石本来兴致很好，准备在会上表扬“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的预2师，但见陈明仁来开如此重要的会议，竟穿得像个勤务兵，不由大为光火。

“又不是检阅部队，这棉衣蛮好的。”陈明仁没有留意到蒋的不快，不以为然地回答，弄得在场的将官们面面相觑，认为他是故意不给蒋介石面子。

说来也巧，会后蒋介石率卢汉、宋希濂、杜聿明等将领去西山龙门游览，车过碧鸡关，只见公路旁抢修工事的预2师官兵人人均穿着破烂军装，形如一伙码头苦力。蒋介石忙招呼停车，下来探问。

预2师的士兵见到身穿便装的蒋介石，虽停下了手中的铁锹、锄头，却无人向他敬礼和上前报告。

“不像个样子——”蒋介石独自向前踱了几步，放眼望去，公路两边尽是穿着破烂不堪军装的士兵，随高声斥问道，“这是谁的部队？”

“陈明仁预2师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报告说。

“上车。回去叫他来见我。”蒋介石气乎乎地说了一句便登车而去。

然而，宋希濂第11集团军属下的预2师师长陈明仁并没有将上司的通知放在心上，仍在阵地上指挥抢修工事，而没有去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说陈明仁居然受命不来，当即下令撤去陈明仁预2师师长之职，改任毫无实权的71军副军长，限两日内交割手续，立即到任。

命令下达后，过了两天，陈明仁仍没有来见蒋。蒋介石沉不住气了，派人到距昆明30里外的安宁去找陈明仁。

陈明仁心知此事是因自己和部队穿破烂军装而起，但却没有想到，大战在即，蒋会为这等区区小事处分自己，因此也动了肝火。

陈随车到了昆明，进了会客室，蒋介石劈头一句：“你这个师长没有当好嘛。”

陈明仁正在火头上，脖子一梗，顿时提高嗓门反问道：“我什么地方没做好？我不明白！”

这句话倒是把蒋介石给问住了。作战、训练、纪律，预2师历来都是拔尖的，就连蒋自己也多次给予嘉奖，说预2师的陈明仁没当好师长，确实有悖情理。可是这个陈明仁，就是不给自己台阶下，居然敢在官邸晋见时当面顶撞，这还了得！

“你的部队衣服没有穿好，像群叫花子，军容风纪太差！”蒋介石继续高声斥责道。

“你发的被服太差，穿不到几个月就烂了，去年只发4成新的，士兵换不下衣服，这是后勤部的问题！”陈明仁还是大

嗓门地据理力争，他这种态度，令站在门边的侍卫们都替他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蒋介石从没有被下属当面顶撞过，而且还是一个区区师长。他一下子气得嘴唇哆嗦，手指发颤，连声吼道：“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陈明仁见事情扯开了，一味发火也无济于事，便放缓了语气解释说：“你来昆明前，宋长官就来电话，叫我不要让穿烂衣服的士兵外出，我当时就反对这种装面子的事。我这样做，是想让校长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

蒋介石见陈明仁态度缓和了，火气未减地又训斥道：“别的部队为什么没有穿烂衣服的？你不想办法就是你的问题！”

“想办法？我手里没有钱，怎么想办法？难道去偷去抢不成！”陈明仁说着说着又火了，话更是难听。

“来人——”蒋介石被陈明仁抢白得勃然大怒，一声厉喝，“押起来！”

静候在会客厅门外的宪兵营长得令，迅速带领几名宪兵冲进来抓住陈明仁的手臂。

陈明仁面无惧色，在离家晋见蒋介石之前，他便向家人作了“兴许难以归家”的交待，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此时见蒋命人将自己抓起来，干脆豁出去了。他一挥手挣脱了宪兵的手臂，当即将衣领上的中将领章撕下来扔在地上：“这是什么国军中将？我犯了什么罪？我这个中将师长是流血流汗拼来的，不是骗来的！”说罢，双手一伸，对宪兵营长说：“好，现在就把我送去法办！”

“不成体统！不成体统——”蒋介石见陈明仁就是不服软，

军中无戏言，只得让宪兵们将他押了下去……

事后，龙云来见，谈及陈明仁“侮辱领袖”之事，蒋从龙云口中方才得知，陈明仁不管是见谁，一直都是穿着破军装的。连龙云也曾以为他是预2师的伙伕，并夸奖他的部队士气高、军纪好。蒋是个爱听好话的人，见龙云这个云南省长也夸中央军治军有方，便已消了一半怒气。后来，关麟征等将领也在蒋面前抱怨后勤被装确实有质量问题，让士兵穿破旧衣服修工事并无大碍等，才使蒋也觉得战前为一点小事抓人有些小题大作。接着细想陈明仁说话的目的也是想让自己了解实际情况，算得上“忠言逆耳”，才对待从室主任吩咐道：“叫陈明仁回去好了。”

陈明仁大闹蒋总统官邸一事，已在将领们中传开，不少人慨叹他这个改不了的牛脾气迟早会断送前程，纷纷为之惋惜。预2师的官兵更是为师长的安危担心。可是，忽又听得宋希濂和杜聿明已奉蒋之命派车将陈明仁送回了师部的消息，一下子又给弄得莫名其妙。

几天后，陈明仁在几位上司的劝说下，跟随宋、杜两位长官再次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已得知陈明仁求见，便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在会客室见了她。

“这次不要吵架。我是了解你的，到71军去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没有？”蒋介石一生长袍马褂，率先以和蔼的师长语气问道。

“前次是我态度不好，在言语上对校长多有冒犯，应该检讨。”陈明仁见蒋已无意追究前嫌，反而先以爱护的口吻与自

已说话，立即恭敬地认了错。

“那是没有关系的。坐吧——”蒋介石见陈明仁这次态度恭敬，语言诚恳，又高兴起来。

这时，坐在一旁的宋美龄也插话打圆场：“陈师长，校长责备学生是爱护学生嘛。学生呢，在校长面前发脾气只要认了错，也就没事了嘛。”

“师母说得对。明仁当谨记。”

经过这场“脾气风波”，陈明仁更是在抗战中拼死效忠，一时在蒋军中声名远扬。

1942年冬，由卫立煌上将率领的中国远征军20余万人马浩荡出征。陈明仁奉命率全副美械装备的71军及预2师所部，坚守怒江江防阵地，与精锐日军隔江对峙，使之无法向前推进一步。

1944年夏，陈明仁率部攻击滇缅公路要冲——松山要塞。此处由日军精锐松井旅团把守，经昼夜激战，陈明仁部终于全歼日军，迫其旅团长松井切腹自杀。

打下松山要塞后，远征军又在回龙山受阻。蒋军第200师和第9师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连美军战地联络官也觉得无望，打算取消空投援助。这时，接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黄杰要陈明仁率71军出战。陈明仁当即以“3日不拿下回龙山就死在山头上”为誓，当场向美军联络官作了保证。随后便以该军88师为主力，向回龙山日军阵地发动猛攻，经反复拼杀血战，终于在第3天下午4时攻克了回龙山，胜利结束了滇西抗战的最后一役。从此，陈明仁也以抗战名将而蜚声中外……

第60节 坚守四平，平白获罪，苦闷中看到新生希望，毛泽东致信：站过来就好，我们还要重用。

8年抗战结束后，已升任71军军长的陈明仁奉命参加进攻解放区的大规模内战。

在东北四平，陈明仁因仅以2万余兵力守卫四平抗击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10余万兵力的攻击而又获得了“国军英雄”的称号。

四平战役，实际上东北野战军已突破了陈部的核心阵地，并活捉了71军辎重团团长、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5天时间内即已攻占了四平的大部地区。陈明仁第71军此时已打光了军直属队和警卫团，眼看无力支持，但由于林彪指挥失误，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和蒋军的增援部队第53军的赶到，陈明仁才在四平战斗中幸免一死。

在整个东北战场，蒋军主力连战连败，惟四平之战令蒋在美国人面前多少挽回了一点面子，故蒋介石下令将陈明仁升为兵团司令。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刘翰东因在解放军攻城时企图外逃遭到陈明仁的拒绝，与陈结怨甚深。后来陈诚陪同美国顾问团前往四平视察，美国顾问见大量美援的面粉、大米竟被陈明仁下令垒做工事之用，当即向陈诚提出了诘难，使陈诚当时非常难堪。刘翰东乘机也在一旁污陷陈明仁纵兵抢粮，还发动四平工商界一起联名控告71军……

陈诚回到南京后，将此事大肆渲染，要求查办陈明仁。

“这个陈明仁，就是无法无天。”蒋介石听后下令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调任总统府任参军。

内战烽火越燃越猛。

此时陈明仁却得以在南京赋闲休养，了不少军中互相倾轧的烦恼。

蒋介石在急需用人之际又想到了陈明仁，他还得靠已为数不多的战将支撑起蒋家王朝。

这天，蒋介石下令召见陈明仁。

陈明仁不知蒋的用意，但还是遵命前往。

“这一段时间你在看什么书？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啊？”蒋介石东拉西扯，随口问道。

“都看些闲书，无事可做。”陈明仁对仕途多少已心灰意冷，敷衍着。

“你知道你的兵团司令是谁撤的？”蒋介石话锋一转，突然抛来一句。

“国防部。”陈明仁淡淡地回答。

“我是支持你的。”蒋介石见陈明仁谈兴不浓，又开始了惯用的笼络人心的手法，“你是有功劳的，这件事要查。”

陈明仁不愿多说，闲谈几句，见蒋有事要外出便辞别离去。

陈明仁此时对蒋介石的两面手法已经心知肚明，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据理力争表示效忠了。蒋这个人，既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守住后却又要在美国人和军内外捞面子而推罪于人，更可恨是陈诚等少数亲信为贪功邀好不惜出卖同僚与下属。

陈明仁乐得清闲。不久，在四平被捕的胞弟陈明信被解放军释放回南京，他还专门带来了中共方面李立三的口信，叫陈明仁认清时局，“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

在这一段时间，71军的上层军官和过去的一些黄埔好友在登门造访中，也不时告诫他不要寄希望于蒋介石，应抓一点实力，另谋出路。

1948年9月，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后，蒋介石军队连吃败仗，时局已趋明朗，蒋家王朝的彻底崩溃指日可待。

在这风雨飘摇、时局动荡之际，陈明仁自感无路可走，只有终日借酒浇愁。幸好长期跟随他的兵团经理处长温汰沫和兵团人事处长李君九等老部下不时劝慰，使他逐渐情绪开朗并下决心与蒋氏集团彻底决裂。当年10月，陈明仁命温汰沫约集了七八位好友及老部下在南京明孝陵山上秘密商谈对时局的看法，向大家表示了不会再跟蒋介石走下去的决心：“现在国家和人民都需要和平，我们身为军人，也要替老百姓着想，不能再作某一个人的工具，再打下去是毫无希望的！”

陈明仁向来说一不二，此言既出，大家心里都舒了口气，认为老长官在这危难时刻深明大义，不会为蒋家王朝陪葬了。

我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态势的形成，使蒋介石军事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各保地盘和不丢实力，胡宗南第一个想到启用陈明仁这员战将去协助其加强西北防卫，不仅来电相邀，而且还寄来了旅费；而徐州“剿总”刘峙和杜聿明则因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首当其冲，更是求将心切，亲自乘车登门拜访，请陈明仁去指挥一个兵团作战；而刚刚开始筹建华

中“剿总”的白崇禧，这时也请陈明仁去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弄得陈明仁此刻一时应接不暇。

到底何去何从，他找到温汰沫等老友商议，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白崇禧与蒋介石积怨甚深，到白部可利用其矛盾掌握主动权和自主权，回旋余地较大。

主意打定，陈明仁欣然接受白崇禧之邀，于10月中旬率随员来到武汉就任。陈明仁到职后，仍像当年一样，以“坚决保卫武汉”、“要战至最后一人”的口号迷惑白崇禧。

陈明仁推辞蒋家军事集团诸位要员的邀请，毅然“投入”桂系军阀出身的白崇禧部的做法，自然在当时的整个军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蒋介石、陈诚等人认为，既然陈明仁愿在武汉为白崇禧卖命，不如拉其为蒋氏集团卖命，故于陈明仁就任武汉诸职之后不久，又突然提出恢复已撤编的71军并成立1兵团，同时发出一纸委任状，任命陈明仁为1兵团司令，下辖第29军与第71军。同时，为了防止白崇禧实力过大，又任命与桂系矛盾极大的程潜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长，以免桂系在湖南扎下根来，但程此时业已倾向和平，并下决心反蒋投共。

这时，解放军各野战军发起的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

中国的战局，已决出分晓。

程潜在湖南主持军政事务后，便暗中派他的族弟程星龄代表自己去与中共湖南地下党工委领导人周里、余志宏取得了联系，将自己将要采取的一切投向人民、争取和平的行动事先通告中共方面。

为了稳定湖南局势，防止仍握有重兵的白崇禧集团威胁湖南局势，程星龄根据中共的意见，与程潜商议如何在华中“剿总”内部打开缺口，争取有实力的蒋军上层军官加入起义行列时，程潜首先想到了陈明仁。

“陈明仁这个人，会用兵打仗，为人也很好，就是被陈诚排斥，我看他还靠得住。”

“颂公与他既有师生厚交，又和咱们是同乡，平时关系也好，不如设法将他拉到湖南。就是不参加起义，我想也不会与颂公翻脸成仇，总比白崇禧到长沙要好。”程星龄表示赞成。

“陈明仁跟白崇禧瓜葛不多，他现在孤军在桂系地盘上，想必也不会久呆。看看用什么办好调他来才好？”

“让刘斐出面好了，他可以向白崇禧提这个建议。”程星龄想到了与程潜很有交情又能够在蒋介石和白崇禧面前都说得起话的刘斐，但当时却不知刘其实是为中共做秘密工作的人。

“好，就请刘斐去走一趟吧。”程潜与程星龄商议妥当，就找到刘斐，请他辛苦一趟去武汉面见白崇禧并向陈明仁转达程潜的邀请。

刘斐当即起程，来到武汉。

在华中“剿总”军政长官公署，刘斐在与白崇禧的交谈中，巧妙地向白建议将刚刚成立，从兵员、武器到训练都极差的1兵团移防湖南，以利用湖南的乡土关系对部队进行就地整训，以充实力量。

白崇禧对1兵团是否能够担当固守武汉的重任本来就没抱多大的希望。此时就连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不敢妄谈能守住哪个城市了，更不用说像1兵团这样临时拼凑起来的班底了。

“白长官，1兵团到湖南既可稳定湖南局势，将来又可屏障广西，此举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刘斐说着，处处显得是在替桂系着想。

“唔，我看华中迟早也是保不住的。让1兵团提前入湘，对我们今后退守西南也是有好处的。”白崇禧为刘斐的建议所动，当即答应让1兵团离开武汉。

刘斐与白崇禧周旋了几次，又找机会登门看望了陈明仁，当面对他转达了程潜十分盼望陈明仁返湘，大家合作共同寻求出路的意思。

陈明仁认真考虑了刘斐的话，痛下决心，决定回湖南跟着老上司干。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1兵团29军和71军入湘整训，并将兵团司令部设在长沙。

1兵团驻防长沙后，陈明仁最初毫无顾忌地与程潜频繁来往，后经程潜提议，双方又改为由陈明仁方面的温汰沫与李君九两人出面与程潜方面的程星龄进行秘密联络。

1949年4月，程潜提议让陈明仁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担心白崇禧起疑心，专程赶赴武汉向白报告此事，并向他表示，不经他的同意，自己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任命。

白崇禧对陈明仁为此事专程来武汉向自己请示十分满意，认为自己已拉拢了陈明仁，或许陈真的因自己的推荐重又当上兵团司令而知恩图报吧。

“子良，长沙警备司令一职很重要，必须牢牢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连我也会退守长沙，你要先有个准备。”白崇禧亲热地叫着陈明仁的字号，反而开导起他来。

“那我这个华中公署的副长官，又怎能接受长沙绥靖公署的任命呢？”陈明仁显出为难的神态。

“这个好办，只要有我和颂公的联名任命就行。这一点你大可十二分的放心。”白崇禧认为陈长期受陈诚等人的排挤，此次投靠桂系，也是迫不得已，收买了陈明仁并让他驻防长沙，本身即为桂系在程潜的势力范围内打入一个楔子，对程的控制作用极大，何乐不为？

在陈明仁赴武汉的前夕，还发生过一段“险情”。此事还差一点使程潜对陈明仁产生了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4月22日晚上，程潜决定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商议时局问题。这个会议并不保密，召集的范围也相应扩大了些，陈明仁亦被告知到会。

“诸位，当前国共和谈已经破裂，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湖南怎么办？我现在也不清楚该如何应付，因此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程潜召集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在上层军官中摸底，试探一些人是否有愿与中共方面合作争取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态度。

但是，陈明仁一进门就看到了在座的竟然有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及高参杨继荣等蒋介石安插在程潜身边的坐探，非常担心程潜过早暴露行动意图，因此一声不吭地找了个位置随便坐下。

程潜见陈明仁到了，或许为使会议开得热烈些，便说：“子良，你先给大家说说湖南该怎么办？要不要搞‘和平自救运动’？据我所知，长沙最近就有人要搞示威游行。”

陈明仁见不说话不行了，只得硬着头皮起身说道：“子良

剿匪大纪实

是个军人，军人就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中央说打就打，说和就和，别的事，没有什么好多谈的。”

程潜对陈明仁的话，一下子感到有些意外，也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以为他对和平起义的态度发生了“急转弯”。

“颂公，各位长官，子良告辞了。”陈明仁环视了一下与会者，简短地道了声告别，便起身离去。

会后，程潜叫人去找陈明仁问个究竟，这才得知他已连夜回老家醴陵去了。第二天，温汰沫、李君九等驱车赶到，见到了陈明仁，不待说明来意，陈明仁即先批了他们一顿：

“颂公真糊涂，丢了性命还不晓得是如何丢的哩。昨晚的会，来的人很复杂，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白崇禧眼下虽然打不过共军，但现在要对付我们还不算费力，干大事，操之过急是要出问题的！”

脾气发过了，陈明仁觉得此事必须向老上司解释清楚，以免发生误解和不快。

回到长沙后，陈明仁当晚独自上门拜见程潜，除了解释前晚会上的话是出于无奈，言不由衷外，还恳切地对程潜交了底：自己起义决心不变，只是为了行动安全，只要有第三人在，就不承认有此事，包括程夫人在内……

“唔，此事是需保密。”程潜对陈明仁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和赞同。

果然没过多久，解放军攻克武汉，白崇禧率20余万败军退入湖南，令湖南的形势顿时严峻起来。

陈明仁自接任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一职后，中共湖南地下党工委更抓紧了对他的亲信老部下温汰沫和李君九两人的策

反工作。

温汰沫早年即在陈明仁身边任书记官，深受陈的信任。1933年陈率88师进攻福建时，“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就曾给陈明仁发来密电，指出时任师军需科长的温汰沫“言论反动”，“有通敌嫌疑”，命陈明仁将其迅速押往总部“侦办”。陈明仁当即将密电扣下不批，并对温说：“你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为此事蒋鼎文与陈明仁结了怨，故才有后来蒋向蒋介石告他“一贯骄横，不服调遣”，并将陈撤职一事。

温汰沫担任了陈明仁与地下党的联系人后，经常将从中共方面获悉的对形势时局的看法观点传达给陈，同时辅助他应付各种突然发生的情况。

程潜因蒋介石、白崇禧早已对其不信任，故也公开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致使不少事情均表面化了。

程星龄密赴香港会见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章士钊让程星龄带给程潜一封亲笔信，信中除了他本人对程、陈两人的明智选择给予高度赞扬，同时还转达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对他们所寄予的厚望。并专门就陈明仁所担心的“四平问题”，转达了毛泽东的看法：“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带回章士钊先生的信后，令程潜和陈明仁很是兴奋，感到中共不咎既往的宽阔胸怀与毛泽东的仁义和信任。从此，他们更加积极地与中共合作，加紧策划起义行动。

白崇禧退守湖南后，对程潜公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大搞“湖南和平自救运动”大为恼怒，但迫于形势又不敢与程彻底摊

剿匪大纪实

牌，故与蒋介石密谋将其调往此时已“迁都”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去任考试院长，同时将湖南一批追随程和倾向和平的高级军政人员全部撤换掉。

程潜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他起义决心不改，于当年6月起草了湖南和平起义备忘录，而第一个在备忘录上签名的就是言而有信的陈明仁。

备忘录经中共湖南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后，毛泽东于1949年7月4日便发来了回电：“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相继取得了宜（昌）沙（市）、湘赣两次战役的胜利，并迅速攻占了平江、醴陵、安乡等10余个县，对长沙的钳形包围态势业已形成。为此，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四野前一阶段的作战实际情况，专门就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致电四野前指：

“……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并判断：“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

毛泽东的战略分析是极其正确的。

退踞中南地区湘西、湘南的白崇禧集团20万人马，在前一阶段的宜沙、湘赣两次战役中，由于行动狡猾迅速，极力避免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一直未受较大的打击，其五个兵团共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部队的战斗力始终未减。

1949年7月21日，白崇禧从长沙撤往邵阳（当时称宝庆）。

在邵阳，白崇禧将其集团的二十六个师的部队在湘南的衡

阳至邵阳公路两侧和粤汉（今京广）铁路的衡山至乐昌一线展开，大有依托资水、湘江、永乐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以衡宝地区为中心，东起粤北乐昌与广东余汉谋集团 12 万人马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与宋希濂集团 10 万兵力相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南进。

白崇禧调兵遣将，走马布防，其实都是做给蒋介石看的。他这个“小诸葛”，到底还是让毛泽东给看穿了。

白崇禧为防程潜“投共”，在去邵阳前逼程和自己一道出发，并指明要陈明仁代任湖南省主席。

白崇禧此举的用心十分奸诈。其一有程潜为人质，陈明仁即使要反也会投鼠忌器，况他在湖南的根基不如程深厚；其二，陈明仁不是桂系部队，其损失与否无碍其集团；其三，如若陈死守住了长沙，既能对集团从容后退布防争取时间，同时也能因自己的指挥有方而取悦蒋介石。

算盘打定，白崇禧临行前专门给陈明仁下了一道命令：“死守长沙，如实在坚守不住，再往湘西后撤……”

陈明仁当然知道白崇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白前脚一走，第二天他便在省政府召集高级军政官员开会，专门向众人强调了“程主席现去外地，本人奉命代理主席职务，但一切仍须秉承程主席旨意办事。”使因程潜不在而出现的群龙无首的不安得以平息，坚定了大家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心。

尽管程潜被挟持离开长沙，但他和陈明仁策划的起义事宜却从未间断，相反还加快了步伐。

程潜派往汉口联系和谈事宜的代表刘纯正此时已随四野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

代表团抵达平江。刘纯正到平江后迅即赶回长沙向陈明仁汇报了联络情况，提出湖南方面也要组成代表团，准备和谈。陈明仁当即派程星龄赶往平江邀李明灏先来长沙商议。

程潜由邵阳秘密返回长沙后，一直住在城外与陈明仁保持着联系，商量第一步行动方案。

1949年8月1日，陈明仁送走了蒋介石、白崇禧派来的“督战官”黄杰和邓文仪后，当天下午又在省政府召开大会，向广大军政官员动员讲话：

“各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这是大家所关注的。当然，不愿意再打内战，也是全省三千万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政府主席，宁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我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市内听不到枪声。请大家都要以我所说的话为行动目的，做对得起家乡父老的事情。”

……

参加大会的军政官员们，此时绝大多数人已听懂了陈明仁话语中的深刻含意，会场极为肃静。会议一结束，长沙市的大街小巷便一下于传遍了：

“湖南和长沙要和平解放了！”

“陈省长开会说长沙不会打仗！”

“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城了！”

……

在即将举行起义的前夕，程潜和陈明仁两人都极为忙碌。他们既要随时掌握部队动态，稳定军心民心，又要制定一旦不测的应急方案，并保持与解放军方面的联系。可谓马不停蹄，昼夜运筹帷幄。

1949年8月3日下午，陈明仁召集手下重要亲信在麻园岭住地开会，商讨拟写宣告起义电文内容等事宜。

电文由陈粹劳执笔，包括《告第1兵团全体官兵书》及给台北草山蒋介石、广州行政院阎锡山、国防部顾祝同、衡阳白崇禧等人的多份文件。

上述电文均以陈明仁个人名义发出，正式明确表示了他坚决反对蒋政权的鲜明政治态度。

1949年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

电文郑重宣布：

“……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指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4日晚，程潜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四野司令员林彪：

“潜等业经8月4日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为主任委员。临时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并决定第1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

8月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复电同意由程潜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仁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兼任

剿匪大纪实

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官。毛泽东、朱德还在电文中给予慰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当日下午，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138师进入长沙。

长沙和平解放后，陈明仁又兼任了新成立的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和长沙市军管会主任。

9月3日，毛泽东电邀陈明仁赴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陈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还到毛泽东住处做客“吃家乡饭”。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宽厚仁慈，令陈明仁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1949年10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第四野战军，同意将陈明仁起义部队的7.7万余人整编为一个兵团二个军六个师。至当年11月，正式颁令其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

第61节 长沙起义，陈部改编，十八万湘匪被宋希濂整编为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妄图靠匪力维持“湘鄂川黔边防线”。

长沙的和平解放，并不意味着湖南局势的稳定。早在长沙解放之前，蒋介石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贤“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三个暂编军、十二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

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全省境内的匪特武装（含国民党军反动地方部队和部分残余武装）约18万余人，百人以上集股行动的土匪就有170多股。土匪武装盘踞着湘西广大地区以及常德、邵阳、郴州、零陵、湘潭等地区的边缘地带，严重地阻碍着湖南人民解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长沙和平解放后，我军成立了湖南军区（由第12兵团兼）。军区领导认为，湖南各地解放后，肃清盘踞各地的土匪武装，乃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关键。同时，制定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执迷不悟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

在中共湖南省委统一领导和湖南军区的组织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47军和湖南军区地方部队以及广大民兵立即投入了剿匪战斗。

当时，我军剿匪作战的目标主要是进剿长沙、常德、益阳地区的大小股匪。

1949年七八月间，湘东北解放后，长沙、常德、益阳地区还有2万多土匪和国民党武装盘踞在山村、湖汊，骚扰抢劫，破坏交通。湖南军区决定以159师、160师、165师及“冀南南下支队”一部，分别组成长沙、常德、益阳三个军分区，迅速展开对土匪武装的进剿。

8月10日，159师奉命组成长沙军分区，迅速作出剿匪的部署和准备。

剿匪大纪实

14日，该师475团2营首先向活动于湘阴东港、茶壶潭一带的“湘鄂赣人民反共自救军”第三纵队万少鼎部200余人实施奔袭，战斗4小时，全歼该敌。

16日，375团6连奔袭岳阳小字洞李高峰股匪，予敌重创。李率残部窜至平江沙田铺一带，被我476团3营追击歼灭。

18日，475团一部又于湘阴锡安乡歼灭了刘铁峰匪部。

至9月初，经过10余次战斗，我军基本上歼灭了湘阴、岳阳两县境内的股匪。随后在保证重点进剿的同时，开始对长沙、醴陵、湘潭三县土匪的全面进剿，至10月中旬，股匪全部被歼。

9月12日，160师与“冀南南下支队”一部组成常德军分区后，会合湖南省游击队湘西突击总队，占领了滨湖各产粮区，随即派479、480两团进剿土匪武装。9月30日，479团主力奔袭桃源三板桥吕春初匪部，经过20多天的战斗，歼匪1500多人，并争取了吕春初、余千伍、郭武生、罗聿奇等股匪1380多人投诚。

与此同时，159师、165师各一部组成益阳军分区，同“湘中游击队”第一、第三支队进行了合编后，以三个团的兵力向安化、湘乡边缘以及雪峰山区尹立言、周永池、王逸之、朱世奇等股匪进剿。同时，分布在各县的部队开始进剿散匪。经过半个月战斗，歼匪40余股，共计4400余人。

湘东北地区从7月开始进剿，到10月底止，共歼匪1.29万余人。10月下旬，湖南军区召开长沙、常德、益阳军分区军政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强调“为顺利而迅速消灭

匪患，必须将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结合起来”，“造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会后，常德军分区集中 479、480 两团向匪情严重的慈利、石门开展军事进剿，消灭了蒋维新、向应东、陈金次等股匪 2000 余人。长沙、益阳军分区部队还就地展开政治攻势，号召匪徒交枪自首，对执迷不悟之顽恶匪首予以军事打击，并发动群众检举藏匪、窝匪、资匪者，争取了一些匪首向我投诚。12 月底，湘东北三个地区，除常德、慈利西部外，其余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

此外，在湘南地区，1949 年 10 月中旬，衡宝战役结束后，湖南广大地区基本解放。湖南军区先后以 162、165、160 师为主，同湖南游击支队会合，组成衡阳、邵阳、零陵和郴县四个军分区。当时，湘南地区匪特武装有 5.4 万余人。

11 月上旬，我 158 师（缺一个营）和邵阳军分区基干团四个连、独立团五个连的兵力，对盘踞邵北地区的国民党“新八军”尹立言部进行大合击。

11 月 4 日，474 团由南阳桥出发，先后在蓝田、丰山岭歼灭尹立言指挥部及其第 6 团 400 余人。与此同时，我 472、473 团将盘踞于太芝庙的敌人全部击溃。

11 月 6 日，各路进剿部队合击孙家桥周围几十里地区土匪。由于部队行动被土匪发觉，土匪分散隐藏起来了。于是部队就地展开，封锁要道路口，进行搜剿。13 日，我进剿部队经战斗，捕获了尹部第一旅旅长杨熙政以下 300 余人。

15 日，我军又以一部分兵力合击板子山地区股匪，歼敌 180 余人。

剿匪大纪实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中央军委决定第46军留在湖南。11月18日，第46军在衡阳召开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和湘南剿匪指挥部，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分别担任湘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剿匪指挥部正、副指挥。11月21日，湘南剿匪指挥部命令各军分区务于12月底以前，消灭本地区200人以上股匪。指挥部直接组织指挥了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和隆回战役。

嘉禾、蓝山、临武一带，活动着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指挥之下的1.3万多人的匪特武装。为了消灭这股匪特武装，湘南剿匪指挥部派出了136、137两个师和郴县军分区等部队共2万多人，采取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的战术进行围剿。

郴县军分区部队担负东线包围，137师担任西线包围，136师担负正面突击。至12月15日，共消灭王春晖等土匪武装1.2万多人，解放了嘉禾、临武、蓝山、江华4座县城。

在嘉蓝临战役开始的同时，我军158师及武冈独立团一个连向盘踞在隆回附近的陈光中、贺幼农、胡惕、刘建章、袁庆光等股匪4000余人发起进剿。

11月28日，474团由新化出发，奔袭陈光中匪部。29日7时在水车与陈光中匪部展开激战，贺幼农匪部闻讯由文田增援，遭我军猛烈阻击。经过半天激战，消灭贺匪两个团全部及陈匪一部，共800余人。贺匪另一团向西北方向逃窜，陈匪残部向冷溪山、黄泥井方向逃窜，我军跟踪追击。于12月4日在容溪将残匪全部围歼，并在武冈科书村活捉了匪首陈光中。

158 师之 473 团和 472 团一个营，沿邵（阳）安（江）公路进至桃花坪、黄板桥地区进剿胡惕等匪部，经几次合击，歼匪 300 多人，胡惕率小股残匪逃跑。

隆回战役至 12 月 10 日结束，共歼匪 2600 多人，刘建章、邓耀楚、刘科怒等股匪 700 余人向我军投降。

此后，我军又展开了湘西剿匪。

湘西是湖南省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全境有土匪武装 10 万之众。1949 年 9 月，为了配合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保证南下大军侧翼安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命令第 47 军归第 12 兵团和湖南军区领导，“进驻湘西，经营湘西，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第 47 军接受任务进入常德一线后，首先以 139、141 两个师歼灭了盘踞大庸的国民党正规军 122 军 5000 余人。

10 月上旬，二野大军由常德、桃源地区，沿湘黔公路和沅水两侧南下，沿途歼敌 8000 余人，并解放了沅陵、泸溪、辰溪、溆浦、怀化、麻阳、芷江、会同、靖县等 10 座县城及官庄、榆树湾、浦市、高村、江口、烟溪、底庄、安江、洪江等市镇，打通了湘黔、湘川两条公路线，开辟了进军川贵黔的道路。47 军随即进入沅陵，成立湘西军区，先后收降了国民党“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 1 军副军长汪援华等部 1.2 万余人，争取了陈渠珍部起义，稳定了湘西局势。但后来 47 军奉命以两个师配合二野入川作战，湘西土匪又嚣张起来。鉴于我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支援大军进军西南，湘西军区直属队和 140 师对公路两侧的杨永清、张玉琳、宋官荣等股匪开展了重点进剿。至 12 月，共歼灭土匪 1730 余

人，争取了 7400 余人向我投诚。此时，除沅陵、芷江公路两侧一部分中心地区为我军控制外，大部分地方还被土匪盘踞着，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第十六章 湘匪乱

第62节 乌龙巨匪，凶悍刀客，流窜湘黔，杀人如麻，血债累累。我军十面埋伏，毙其于偷渡船上。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播出，曾令全国观众大为瞩目，剧中匪首“钻山豹”因其狡猾、残忍、奸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该剧中的“钻山豹”原型就是湘西巨匪姚大榜。

姚大榜原名姚占彪，幼年时的姚占彪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深得父母疼爱，昵称其为“大膀”。由于“膀”与“榜”谐音，由此人们又喊他为“姚大榜”。

其父姚德钦，母杨氏，均是忠厚老实人家，务农为本，家有几十石谷田。姚大榜年幼时，一家7口，除父母外，一个哥哥早夭，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留在家中吃斋当老姑娘，一生没嫁。姚大榜年龄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视作独子，骄生惯养，少年时期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无所不沾，家里管他不住，父母为他费尽了心血。开始送他读私塾，识几个字，看些杂书，好的没学，却被那些江湖绿林好汉所启示，把抢劫杀人者尊称为“强人”。姚大榜自小便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因其不走正路，母亲死

剿匪大纪实

后，父亲恨他干些偷鸡摸狗，横行乡里的恶事，给祖辈丢脸，打骂也若无其事，后悔不该养这个不孝之子，一气之下疯了，时间不长，也离开人世。

姚大榜 16 岁时，在贵州讲武学堂学会了一套玩刀弄枪的本领，且练得健步如飞，登山如同平地，其父死后无人管教，更是流浪成性。一次，村中的地痞蔡建狗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找蔡退牛。蔡家人多势大，横蛮地对他说：“要退，只有拿刀子退你。”姚大榜见他们口出狂言，一怒之下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尔后，便相邀邻近的姚国安和姚本富结为一伙，并从当时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那里搞到 20 多条枪，开始了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丰，有些胆小，他曾到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打家劫舍，残害无辜，得了一笔横财后，回到牯牛溪，发展成为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从离县城不远的牯牛溪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扎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便于活动。不久，又用抢来的横财，在当地买田置地，修建一栋正屋、两栋厢房，又在不远的贵州玉屏县的雾程，新修一栋别墅，供霸占来的老婆蒋冠英寄居。而且先后抢了龙氏、黄氏、梁氏和彭氏四个民女，恣意玩弄。其家产由原来的 60 石田，发展到 1200 多石田，掌握有 200 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摇身一变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姚大榜之所以能为匪 50 余年，在他那片小天地里，自有他的护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

因此，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态发生，将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吴姓匪兵，在他管辖范围内杀死一个过路商人，外人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极了，追查姓吴的，吓得吴匪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当即跪下对姚作揖道：“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饶命。”姚大榜为了杀鸡儆猴，不再追问，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吴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起来转身刚走几步，就听到“叭叭”两声枪响，吴匪倒在了血泊里。

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带人去把潘桥桥等3人抓来，一面从中大饱私囊，要潘出500块银洋的“辛苦费”给他；一面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他又当着众人面把3人杀了。由于姚大榜凶悍成性，附近几个村子，连国民党也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给他钱，就可以搞定。乡里发生纠纷，也不惜重金，以酒肉相待，请他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管输赢，都由他说了算。岩上地方有一个叫妖婆的，家有万石谷田。一次，她出卖百多石田，先是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未等落实，因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又背地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他。因此，张杨两家发生争执。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诈取光洋200块，钱交清后，姚即把田判决给张家湾，并当着众人指责杨从中插手捣乱，挥手给了杨宗贵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冤仇。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姚大榜还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是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也认为

“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实际上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1918年，畏于姚匪势众，龙溪口商号的老板们想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于是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借此机会勾结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又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当局迫于无奈，只好对其进行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由此，姚大榜的队伍得以不断扩大，武器装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

玉屏县长岭乡的汪家溪，有国民党团防局在此。局长马玉书与姚大榜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鸦片路过此地。姚与马密商，欲将得来的鸦片均分，便设下埋伏，把鸦片抢了，挑鸦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杀。剩下的1人被姚大榜用马刀砍了一刀，滚下田坎，带伤逃脱。此人事后跑到铜仁专署去控告姚，国民党驻铜仁的白师长迅即派队伍捉拿姚大榜。姚猜到案发后肯定有人来捉他；早已躲藏，白师长的队伍扑了一场空。无奈，白师长怪罪团防局长马玉书管辖此地无方，治理不力，将马抓去坐牢，并押赴刑场赔斩。结果姚一人独吞了抢来的鸦片，马则惊厥瘫痪，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带着喽罗前往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他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其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骗够了枪弹的他又再一次拖枪上山为匪。

1936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晃县时，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他改邪归正，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姚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量屠杀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新合乡农民广志桥就因给红军带过路，而被其活活逼死。

国民党政府数次对姚招安，对他掌握的匪伙进行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对姚大榜采取清剿，派陆军独立1旅3团前往。一次，清剿队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赶去捉拿。昏暗的油灯下，姚正与女子打牌，捉拿队伍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给包围了。姚大榜听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推开那女子，掏出枪，迅速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无声奔跑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围房子的队伍，看见有个黑影从屋上掉下来，以为是姚大榜逃跑，大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扑去。趁慌乱之际，姚大榜又从屋子另一头，纵身一跳，待士兵们往这边扑来时，他已溜之乎也。这时带队的连长才知道中了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得报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刚亮便赶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顺

手抓起一顶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支驳壳枪放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成一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带队队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吧？”姚大榜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一换肩，粪水就往外溅，污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

他用手指着一房间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

清剿部队迅速围拢去，将房子团团围住。

过了两根田埂，姚大榜把粪桶一扔，掏枪在手，逃之夭夭。清剿队把他家里一搜，只见他的几个老婆和儿女。

队长问，“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

队长指着士兵喊：“还不赶快给我追。”

清剿队伍几经追剿，几经扑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儿女，将他抢劫得来的金银财物8担多全部抄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每晚睡觉总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警报器。待香烫手时，又另换一个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数处，这便是他为匪的护身符。

1942年秋，晃县爆发了“黔东事变”。组织者之一是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他先后联络玉屏和罗殿卿、马和林及晃县姚大榜等人，一同举事。此时，驻晃县酒店塘矿警队长秦宗炳手上，掌握有人枪百余，弹药更多。姚假意与秦共事，向秦索取大量金钱。晃县敦厚堂药店老板吴敦明是秦的女婿，家财万贯，秦以姚大榜为靠山，让吴敦明先付给姚大榜4万元，以作起事军费。姚表面答应祭旗出兵，暗地却通知玉屏县长李世家于祭旗之夜出兵镇压。于是，李让黄道乡乡长刘元藻率领

壮丁事先埋伏，计划于8月23日，姚大榜、罗殿卿、马和林、黄尚明等人带其队伍在玉屏县黄道乡鸡婆田杀猪祭旗时，开始行动。

姚心怀鬼胎，乘参加祭旗时故意说：“据说此旗经高人恩赐，法力无边，能避枪炮，让我试一试，此话是否当真？”说罢，拔出手枪，对旗便射，连打3枪，将旗击碎，并说：“看来，这是骗局，不信。”趁机将队伍撤出。刘元藻伏兵向罗、马、黄的队伍进行包围扫射，未经半小时战斗，罗、马、黄之队伍便被冲散。

秦宗炳见状，急催姚大榜出兵，姚又乘机向秦索款，秦先后共计付出7万余元，却仍然不见姚出兵，才发现姚的阴谋，气的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当时，国民党禁止纱布走私，不准湖南纱布运往贵州，这一规定损害了龙溪口各商号的利益，为此他们暗地寻找靠山，给姚送去大批钱物，要姚带人押运。而狡猾如狐、贪婪如狼的姚大榜，采取更阴险的手段，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往玉屏，天黑到达小地码头住宿。半夜，姚又另派手下一伙人把纱布抢了，并嫁祸于人，抓来一些与之毫无牵连的装卸工，硬说是他们所为，当着货主面，将他们全杀了，以消货主之恨。

姚大榜自知自己杀人越货，血债累累，不免产生疑惧心理，恐遭不测。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时也手不离枪。有一日他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去取手帕，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对方击倒在地。其他人拥进店，问姚为何将客商打死，他

气愤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发现原来是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

姚大榜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从芷江回晃县途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前去把狗抓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姚见状，卷起衣袖，箭步如飞地赶向前去，一会儿就将那狗抓回，旁人见了都赞叹不已。

在晃县，只有一人使姚大榜大伤脑筋，即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曾担任过国民党正规部队团长、旅长的晃县大湾罗毛溪人张本清。早年，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曾任蒋的警卫团长，后因联名反蒋，遭到蒋的遗弃，回到家乡晃县，担任省参议员。他在晃县参议会一次会议上说：“我决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鱼铺（酒店塘），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匪势没有多大发展。对张本清，县府官员、地方绅士都不敢得罪他，可见其势力之大，令人生畏。

姚大榜视张本清如眼中钉，但一时又不敢在虎口里拔牙，表面上与张和睦相处。1939年，两人联合击败了经营晃县酒店塘汞矿的张平刚后，开始合伙经营汞矿，一段时间来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县为匪作恶，又支持龙溪口商号纱布走私，遭国民党独立团的围剿。姚虽化装逃脱，但全家被抓入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姚请张本清出面说情。独立团得罪得起姚大榜，可得罪不起张本清。张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请，感谢张本清，并口口声声对

张说：“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

张本清开玩笑说：“杀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

姚大榜回答说：“我杀了人，就是打赢了官司，我的方法比你的来的快。”两人不欢而散。过后不久，二人共同经营的汞矿又因瓜分不匀，姚派姚锡昌当汞矿管办，而张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杨洪当管办，姚大榜暗地将杨洪杀了，于是，两人之间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久，张本清因要娶堂妹张善芝为妻，其前妻郭顺清愤而出走。张之举动被家族视为败坏家规门风，遭到家族的责骂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对此，姚大榜也不时对张进行讽刺。在一次宴会上，姚针对张娶其堂妹之事，当着众人说：“牛栏立在田坎上，粪水不落外人田。”张听了面红耳赤，心里十分忌恨姚大榜。

张回晃县后，为发其家业，在龙溪口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帮的房子，江西帮要求归还，张执意不肯。由于张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加上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税，夺了江西帮等各商号之财。江西帮因此对张怀恨在心，决意除掉张本清。可谁来于此事呢？姚大榜爱财如命，早为他们所掌握，是最合适的人选。江西帮不惜重金，暗给姚送去白纱布数十匹，银元数千块。芷江匪首杨永清也趁火打劫，极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张本清，并为他出谋划策。

1949年农历2月14日，正逢龙溪口赶场，人多拥挤，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亲信、分队长吴玉清出动。此人以前在张本清手下做过事，后暗投姚大榜，这次他带吴本军、吴本众、姚

应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龙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装潜入龙溪口。姚大榜还派人在进出龙溪口的必经之地——杨家桥的土地坳、龙溪口的坳上等地接应。没过多久，张本清果然带着一个警卫来到江西街。张指使警卫去办事，自己一人来到街口小摊买烟时，等候在这里的吴玉清，向前喊道：“张旅长，你买烟。”张刚回头，身着长袍的吴玉清，拔出枪对准张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窜出两个随从，在张的后脑勺和腰部又各开一枪，张顿时毙命。枪一响，街上一片混乱：“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吴玉清等人趁混乱逃脱。

张一死，姚大榜便实现了称霸晃县的美梦。不久，在一些绅士、商人的簇拥下，姚带其匪部进驻龙溪口。为壮声威，随即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一大队长。地位巩固后，这个狡诈阴险的老狐狸，转而又向跟随他多年的亲信吴玉清、姚国安开刀。吴受姚大榜的指使，带人刺杀了张本清，拔除了姚心头之患，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可他不曾想到，正是为了这个招来杀身之祸。姚借吴之手刺杀张后，心里时刻思忖着吴玉清连他的顶头上司张本清也敢杀，说不定迟早自己也会遭他毒手，此人不除终为后患，便借吴占人妻女之罪名将他杀了。姚国安因在外抢了别人的东西，也被姚当着众匪枪杀了。

1949年冬，我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在解放军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为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国民党芷江警备司令杨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要姚尽快发展，壮大匪势。杨、姚

二匪碰头后，密谋拼凑起“芷晃剿共游击总队”，由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此时，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曾对姚进行政治争取，利用进步人士、晃中教员胡秀琰劝其投诚，要姚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姚当时也看到处境不利，曾有过回心转意的打算。一次，经做工作，姚愿意吃罢早饭就动身下山，抬他的滑竿也准备好了。因姚素来爱吃鲤鱼，村里人的鲤鱼都要送给他。正在这时，一乡里人给姚送来两条活鲤鱼，每条约有二三斤重。送鱼人见面就喊：“姚公，鲤鱼！”狡诈多疑的姚大榜，一见到鲤鱼，脸色突变，大骂一声：“妈的，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

就这样，他对我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多次派人劝说，均加以拒绝。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接受进步思想，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以来，各地土匪纷纷落网，数次劝说姚不要再干下去了，放下武器，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而刚愎自用的姚大榜，谁也说服不了他，相反，还会遭殃。姚大榜见姚应科数次规劝，眉毛一竖，瞪圆双眼，露出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吃了你。”当即掏枪便打儿子姚应科。千钧一发之际，站在一旁的喽罗忙抬高姚握枪之手，“叭”的一声，子弹朝天飞去，姚应科一看势头不对，慌忙逃命。此后姚应科暗地将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给姚大榜的24条大小枪支交给解放军，到贵州任教去了。

1950年春，姚大榜趁我人民解放军驻晃部队主力往怀化

剿匪大纪实

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匪首率匪众 600 多人攻打晃县县城，被解放军 419 团守城部队击溃。

1950 年秋，姚大榜主要活动在玉屏的板山、黑岩场等地。有一次县大队抓到一名叫黄东生的土匪，黄供出姚的藏身处，并带路前去捉拿。县大队会同民兵百多人，连夜奔袭，赶到那里，才得知姚头一天已率部从酒店塘过河，逃往扶罗、新寨、凉伞方向去了。

8 月 30 日，湘黔边界 5000 多名土匪聚集凉伞，姚身任“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凉伞与我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然而这些乌合之众，哪经得住解放军一击。“雪凉合围”一役，数千名土匪被擒被歼，姚从驻地新寨的龙寨带匪逃往壕庆湾，我军乘胜勇追。壕庆湾一战，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他的儿子，匪营长、机枪射手姚应金被击毙。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舅佬龙永安等被活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趁乱逃脱，窜往中寨，后过禾滩，逃到波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舞水河，回到六龙山老巢继续作恶。

由于解放军和地方部队的跟踪追剿，姚等残匪疲于奔命，日夜溃逃，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狼狈不堪。

12 月 25 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当晚，姚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

“我们的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在此一举。”说罢，预感到末日来临，威风一世的姚大榜，不由从眼角里掉下串串浊

泪。

残匪们按姚的吩咐，连夜作渡河准备。晚12点，姚率残部开始偷渡。由于姚渡河的消息事先已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家坪河对岸已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土匪渡到河中时，堵截部队开枪射击，船上的土匪顿时慌作一团。一只船调头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打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10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上还挎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就是姚大榜。这只“钻山豹”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为匪50余年，死时68岁。此次战斗，标志着湘西晃县地区百年匪患的彻底清除。

第63节 拥兵万人，周旋帮会，以匪谋官，把持地方数十载，为患一方。

湘西剿匪斗争中，我军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根据各股土匪的不同情况开展了艰苦的政治瓦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湘西十几大股土匪中的瞿伯阶匪众就是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的。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乡人。祖父曾在前清中过举人，家里薄有田产，但到了其父一辈，家产已全部耗尽。到瞿伯阶手里，更只剩破屋数间。瞿伯阶1926年开始为匪，23年间，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

1947年，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曾将瞿部收编，任命瞿为行辕第一纵队司令，后改任为暂编第10师师长。

瞿伯阶被国民党由围剿而至招安，主要是因其势颇大。瞿手下共辖十五个支队，四个独立大队，五个特务大队。支队与大队的人数多少不等。支队最小的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从40多人至300人左右。总数约2万人，约有步机枪12000多支。

瞿伯阶辖1万多人枪，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其活动范围，遍及四省边境的16个县区，北至湖北之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之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之酉阳、秀山、黔江及贵州松桃之一角。他们平时在这个区域内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派捐派款、收鸦片烟、购买枪枝弹药等，胡作非为，一遇国民党派兵围剿，就在这个区域内到处流窜，进行顽抗。军队从湖北来打，他窜到四川；从四川来打，又窜到湖北；从湖南来打，或者窜到四川，或者窜到湖北。如果三面包围堵剿，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你来我分散，你走我集中。”国民党对之难以捉摸，束手无策，只好用烧房子、并寨、追逼当地居民的手段来对付。此举不但没有丝毫效果，反而越剿越多。所谓官逼民变，因老百姓常被国民党围剿部队以通匪、窝匪的罪名妄加杀害，故铤而走险参加为匪者日益增多。

1926年以前，湘西龙山地区共有两股土匪。一股为刘子良，一股为师兴五。前者系土匪巨魁，曾在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手下当过团长，后自称司令，系当地地主恶霸势力的代表，其武装也是在地方办民团逐渐发展起来的。先是龙山十六

个乡，刘子良占其十五，师兴五只据其一。二人各霸一方，各守各的势力范围，碍于“陈老统”（陈渠珍绰号）的面子，初时尚相安无事。因师兴五野心极大，力图扩充实力及地盘，久而久之，经常越界厮杀，与刘子良倾轧，兼并其地盘，由一个乡扩大为四个乡，而心尤未足，继续招兵买马，企图取刘子良而代之。

1926年，瞿伯阶以一个光棍之躯来到区公所当自卫分队长，担任区长瞿代亮之护卫。适值师兴五在二所乡扩充实力。乡长向树梅与师通同一气，而与区长瞿代亮不和。师兴五的扩展计谋常受瞿代亮梗阻，师便利用红帮大哥瞿列成与瞿代亮之矛盾借机将瞿代亮杀掉，瞿列成摇身当上了区长。瞿伯阶与瞿列成系五服内叔侄关系，而与瞿代亮虽系同宗，但不如瞿列成更亲，于是就投靠于瞿列成，从此开始为匪，经常私自带十几条枪越界到刘子良的势力范围内抢劫。

瞿列成当了区长，官匪是一家，对瞿伯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管束。而师兴五吞并刘子良蓄谋已久，瞿伯阶此举正合其意。因此瞿伯阶胆量越来越大，与其妻舅张明富合伙，靠30多条枪，继续在刘子良的势力范围内抢来抢去，实行倾轧兼并。一年后，其声势一天天扩大，便自成一股无人敢管的土匪武装了。

瞿伯阶肆无忌惮地在刘子良的势力范围内抢劫，刘子良既不能制止，又无法对付，只好报告陈老统。因属于师兴五范围，陈老统命师兴势力五对其予以剿除。师兴五不愿将这个实际上是在帮自己打天下的土匪被消灭，思前想后，认为还是要求陈老统将瞿伯阶和张明富两人收编为手下要好一些。陈老统

剿匪大纪实

同意后，任命张明富为连长，瞿伯阶为副连长。瞿伯阶心有不甘，认为师兴五不信任自己，一气之下，不服师兴五收编，与张明富分开，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枪，于1927年将队伍拖到湖北来凤去了。

来凤与龙山只隔一条河，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当地十几个乡均属匪首向作安管辖。向作安被恩施国民党政府收编，委以旅长之职。另外，那里还有一条地头蛇彭树安，掌握一部分人枪，勾结一些亡命之徒，占据白福乡，自称大队长为非作歹。向作安不让彭树安另树一帜，只得承认其为白福乡大队长，但又一直如鲠在喉，欲去之而后快。瞿伯阶跑到来凤，经其亲妹丈胡跛子介绍与彭树安接上头，被委任为连长。瞿伯阶就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卯涧的几个大山洞内住了下来，不时到师兴五的范围内去抢劫。师兴五派张明富去暗杀瞿伯阶不成，便捉了他的外甥，并杀了他妹妹的公公。瞿伯阶代妹报仇，率部围攻张明富，将张全部人枪消灭，扩充了自己实力，并亲手杀了张明富。瞿伯阶既与师兴五为敌，自然取得了彭树安的信任。后来彭树安被向作安杀了，瞿伯阶通过漫水乡乡长彭连城的介绍，又转而投靠了向作安，仍被委任为连长。

向作安在来凤为王，实力不小。师兴五在龙山扩展实力，到底把刘子良这股土匪兼并了，声势搞得很大。两人都有很大的野心，双方都想向外扩展势力范围，尤以师兴五野心勃勃企图兼并来凤，两人遂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展开了激战。瞿伯阶对师兴五一直怀恨在心，在这一场战斗中，自然充当了一个凶狠的打手。他打死打伤师兴五手下100多人，还捉去了不少人。因此很受向作安器重，奖励了他20几条枪，加强了他的

实力。

瞿伯阶充当向作安的打手，使师兴五吃了一场败仗，师兴五命瞿列成到来凤去找瞿伯阶讲和修好，许以要枪给枪，要名义给名义，只要不帮向作安而回到龙山来。这一着棋十分出乎瞿伯阶的意料之外，使他一时很难决策。但此事传开后，向作安的部属对瞿伯阶有了怀疑。瞿伯阶最后决计出走，一面将老婆儿子送至向作安旅部附近住起来，表示事出不得已，非有意叛离；一面利用夜晚率领部队拖向龙山。向作安在来凤所设的一座兵工厂，与瞿伯阶驻地毗连，瞿部连夜出发，兵工厂以为有情况，糊里糊涂也跟着一起拖走了。瞿伯阶发觉后，连忙叫他们回去。兵工厂内的枪枝、子弹，分毫未动。瞿伯阶一到龙山就派人给向作安送了一封信去解释，大意是“你的部属对我太怀疑了，此番拖走，情非得已，如果你不相信，和师兴五再打，我绝不为其卖命。”向作安接信后，同时又听说了他让兵工厂返回的事，于是派人将其老婆儿子送回龙山。

瞿伯阶回来后，师兴五并未履行其诺言，虽然给以副营长名义，枪却没有补充一条。原有的嫌隙未除，反更增不满。不久，师兴五病死了，其弟师兴周承接了他的衣钵。一晃几个月过去，倒也相安无事。

1935年，师兴周投靠陈老统，被任命为保安团长。其时，贺龙将军在湘鄂边区策应红军北上抗日，围攻龙山县城。国民党官匪勾结，堵击红军，派刘文华一个保安团及师兴周同守龙山。师兴周调瞿伯阶往守龙山之南门。龙山被围49天，弹尽粮绝。加之国民党空投技术太差，援救的子弹和粮食，全投到城外红军阵地上去了，守城部队饥饿难当，皮鞋底都煮食殆

尽。后因红军自动撤离前往参加长征，龙山才得解围。师兴周与其兄师兴五一样，刁滑阴险，龙山一解围就自我吹嘘，上报守城有功，邀宠于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遂行其笼络的惯技，派员前来颁发奖章。瞿伯阶满以为论功行赏，决少不了自己一块奖章，谁知师兴周却全部发给了他自己的亲信，由此，瞿伯阶深切地感到师家兄弟到底是一丘之貉，不能长期为伍，一夜之间，又从龙山县城把部队拖走了。

原来师兴周调瞿伯阶守龙山时，瞿伯阶闻知红军厉害，认定此去凶多吉少，但恐给人以怕死的笑柄，又不得不去，于是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到龙山去，准备被红军吃掉；另一部分由其胞弟瞿兴景及排长彭雨清率领，留在四乡抢劫。他打算在龙山失败之后，仍留有本钱，可以东山再起。龙山这一部分并未送掉，乃意外之喜，就拖出龙山，准备与留下的一部分队伍会合。当晚来到距城 15 里之喜罗乡，此地系师兴周所辖范围，乡公所有 20 几枝枪，亦为师兴周所有。为警告师兴周“瞿伯阶不是好惹的人”，他一下就收缴了这 20 几枝枪，拖到明溪乡与留下的队伍会合。这时瞿伯阶从 10 枝枪起家已经发展到了有 70 多枝枪了。

明溪乡有一股土匪，以王继安为首。王是从四川酉阳来的，有 80 多枝枪，投到师兴五手下，师委任给了他一个营长当。师兴五死了以后，他对师兴周不感兴趣。师兴周调他去守龙山时，他没有服调，在龙山对他大骂。此人与瞿伯阶曾有交往。瞿伯阶来到明溪乡，便把师兴周对王不满的话据实以告，既离间了他和师兴周的关系，两人又进一步建立了感情，遂焚香拜把，勾结得很紧。王继安还让儿子拜瞿伯阶为干爹。两人

共掌握 160 枝枪，在明溪、二所两乡活动，大有独树一帜之势。

瞿伯阶把匪部从龙山拖回二所乡，又与明溪乡王继安勾结，对师兴周很不利。有见于此，师兴周连忙托人通过瞿列成向瞿伯阶传话说：“我对瞿伯价决无二心，叫他不要误会！”并当即委瞿伯阶为营长。

但此刻，瞿伯阶已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

第 64 节 收编被骗，拖枪反水，国民党对其打打拉拉，养虎为患，匪势一天天严重。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要陈老统将其部队编成一个师，名义上说是交国民党军驻湘西的师长顾家齐带出湘西到淞沪前线参加抗日，实际上是想趁机收拾湘西土匪。

在龙山方面，陈老统命师兴周编两个营出去。师兴周按陈老统指示，以贾义昌及其亲侄子师秀章为营长编成了两个营，并命瞿伯阶编一个连配给贾义昌营。瞿伯阶口里答应，内心却根本不干，师兴周对此也莫可奈何。其实师兴周也只是阳奉阴违，应付差事，把好枪都留下来，一些枪机都打不开，根本不能用的，只好七拼八凑，凑了 300 多枝枪，编成两个营的番号带出去了，本人则仍留在地方不动。

瞿伯阶编成的一个连交其胞弟瞿兴景带出去。王继安也效仿瞿伯阶的办法，把部队编成一个连，由他的儿子王家仁带到保安团去。

事实上，国民党只是想以抗日为名来消灭湘西匪患，因此，所有受编部队，编的编散了，关的关起来了，杀的杀掉了。瞿伯阶和王继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个晚上，瞿兴景带出去的部队被包围缴了枪，人全部被看守住。另以一个连围住瞿伯阶，双方展开射击，打死了瞿伯阶的堂弟，瞿本人趁乱夺路而逃，但保安团仍捉去他的老婆及未满两岁的小儿子。瞿伯阶一跑掉，国民党就下令将其胞弟瞿兴景及带去的40多人，聚集在一个草坪内，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了。王继安的儿子王家仁带出去的部队，枪也缴了，只是没有杀他们，连同瞿伯阶的老婆儿子一起押送到龙山县城关了起来。

瞿伯阶和王继安上了国民党的当，遭了这次变故，几乎送掉性命。他俩从家里逃出以后，一直跑到四川酉阳的老寨亲戚彭继才家里。彭继才系当地的大恶霸地主，自任乡长，实力很大。两人就暂时躲在那里避风，等待时机攻打龙山，报仇雪恨。

1941年，蒋介石任命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部署军力肃清湘西匪患，维护公路交通治安。傅的总司令部驻四川秀山，以王严、朱鼎卿等师，并指挥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团队，在湘鄂川边区一带进行搜捕围剿。

瞿伯阶带领的几百人经不住傅仲芳部的围剿，在湘鄂川边境各处流窜。经过两三个月流窜的土匪，人困马乏，瞿伯阶拟向傅仲芳缴枪投诚，作为缓兵之计。遂通过二所乡乡长瞿兴孝对傅仲芳说：“瞿伯阶有意保命缴枪，不知总司令意下如何？”

傅仲芳想将湘西土匪人枪一网打尽，便对瞿兴孝说：“你

回去告诉瞿伯阶，不要缴枪，把他所有的人枪收拢来，编成队伍，由他派一个亲信的人带出去。”瞿伯阶虽无洗手不干之心，但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将计就计，把人枪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大队，以向家彦为大队长带出龙山县境去了。

瞿伯阶的人枪一带到沅陵，就被傅仲芳全部改编，傅仲芳还坚持说他的枪没有全部拿出来，追逼他继续缴。确实，瞿伯阶经过上次事变的教训，不仅枪没有缴完，而且人也没有全部带出去。傅仲芳不追不逼，瞿伯阶也没有安心缴，这么一追逼，不仅更决心不再缴了，而且还促使他立刻采取了措施：把留下的枪分散给亲信埋藏起来，留下的人也“爬壕”（隐蔽）成了农民，他自己带了老婆和几个随从亲信，跑到湖北鹤峰他老婆的老表家里去了。为此傅仲芳再次下令，到处搜捕他。

瞿伯阶到鹤峰以后，外面捕捉他的风声很紧，于是，他企图找一个有势力的人作护身符。正好当地有个大财主名叫王庆山，瞿伯阶过去认得他，遂登门求助，把前后经过对王直言不讳，并说傅仲芳搜捕甚紧，问他是否可以招呼一下。王庆山慨然允诺，对瞿伯阶说：“老弟，怕什么！他有清官，我有青山，在我这里住着，不要紧！”于是把瞿伯阶等人送到山上他的佃户家里隐藏起来。

瞿伯阶在鹤峰安然住了几个月，因带去的鸦片烟已经抽完，近处购买又恐走漏风声，便派人到宣恩沙道沟去买鸦片烟。他老婆的老表的堂兄弟张麻子是一个走江湖闯码头专做鸦片烟生意的人，为人阴险刁滑，其时正在沙道沟卖鸦片烟。瞿伯阶派去买鸦片烟的人被张麻子闯见了，认得是瞿伯阶身边的亲信，也知道各处搜捕瞿伯阶不着，国民党正在悬赏捉拿其归

案，一笔送上门的好事，岂肯轻易放过？于是向这人探问瞿伯阶的情况，瞿伯阶派去的这个人也没留心，据实一一告诉了他。张麻子立刻跑到鹤峰保安团一报，保安团连夜派了一个连把瞿伯阶包围了。瞿伯阶住的是半山腰里一间独立的茅草房。深更半夜突然见有人打门，侧耳细听，外面有轻言细语的人声夹杂着来往的脚步声，偶尔还听到铁器的碰击声。凭其多年为匪的经验，知道自己已被包围，外面打门一阵紧似一阵，他顾不得自己老婆，一面答应开门，一面和他两个亲信，拖出枪来，顶上子弹，把门一打开，三个人三条枪三梭子子弹一扫，打倒了几个叫门的人，趁对方措手不及，像猛虎一样窜了出去，突围逃跑了。保安连在那里闹腾了一夜，不仅没有找到一点影子，相反倒死伤了几个人，为此把瞿伯阶的老婆捉去了。事后查明瞿伯阶系王庆山窝藏于此，又将王庆山逮捕，一直关死在牢内。瞿伯阶的老婆怀有身孕，押解者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出不了事，也没严加看管，不想她竟趁机溜掉了。押解者交不了差，七打听八打听，追寻到瞿伯阶嫁在来凤的妹妹家里，把他寄居那里的儿子捉去顶罪。

瞿伯阶突围后到了来凤的卯洞，心想两次缴枪听编，两次都几乎送掉性命，可见国民党之不可信，决定抱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决心再干下去，又大肆进行招兵买马、积草囤粮的活动。

瞿伯阶回到龙山，声势更加浩大，各方面联系的书信往来不绝，前来投奔的人日益增多，并形成了犄角之势——瞿伯阶在湘西的龙山、来凤、鹤峰、宣恩等几处活动，杨树成则在川东黔江、酉阳、秀山一线活动，彭叫驴子在湖北的永顺、沅

陵、大庸、桑植中间地区活动。截至1943年，各股土匪都有很大发展。彭叫驴子有1000余人，从永顺开到龙山。瞿伯阶在龙山也有1000余人。两股集中后有2000多人，此后又开往四川与杨树成会合。这时杨树成已发展到2000多人了。三股会合，共有4000多人，羽毛已经丰满，瞿伯阶因此决心与保安团较量一番。

瞿伯阶等匪在四川会合后，首先一回马枪杀到来凤的卯洞，不费吹灰之力就吃掉驻守那里的一个保安营，缴了他们的枪，当官的都放走不要，士兵愿跟着一起干的都留下来。卯洞得手，接着兵驰龙山，把驻在达那乡的一个保安团包围一打，保安团不战而败。瞿匪缴了2挺重机关枪，100多条步枪，回过头来，又把驻四川溪口的一个保安营解决了，营长被打死，只跑掉一个连。稍加整顿，又转到永顺塔禾乡，把驻在那里的两个保安营包围，缴了一部分枪，把他们赶到永顺城里去了。这样一来，四川、湖北、湖南三省的保安部队都让瞿教训了一顿，同时搞到不少枪支子弹补充队伍的实力。瞿伯阶深知保安团吃了亏，国民党一定又要派正规部队来围剿，就和杨树成、彭叫驴子计议，决定各回原根据地，避免集中挨打，三股遂又分散了。

果然不出个把月，国民党再次派来3个师围剿湘西匪患。

事实上，国民党对湘西土匪一直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剿不掉就抚，抚不成又剿，交相进行。瞿伯阶为匪的20余年过程中，在羽翼没有长成以前，顾家齐、傅仲芳两次到湘西围剿，他曾两次投诚，又两次受骗。受骗一次，便倡乱一次，终于羽毛逐渐丰满。从此更遭国民党忌讳，几次兴师动众，围剿

瞿伯阶。瞿伯阶则率部抗拒围剿，实力虽然有起有落，但是终归养成了气候，成了一股巨匪。

自国民党军的三个师开入湘西剿匪以来，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对老百姓任意课以通匪、窝匪、从匪等罪名，吊打、枪杀，滥施刑法，烧房子，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参加为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所以土匪人数越聚越多，一下发展到 19000 多人。他们分别向各地乡、保借钱、借米、收鸦片烟，到处收买枪弹，使瞿匪发展到拥有 12000 多条枪。

第十七章 荡穷寇

第 65 节 越剿越多，剿抚难奈，湘西巨匪瞿伯阶部发展到近上万人枪，肆虐湘鄂川三省沿边地区。

国民党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对湘西土匪又打又拉，也曾组织过多次围剿，但其结果却是越剿土匪越多，而且剿一段，放一段，至使湘西土匪活动越来越猖獗。

瞿伯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将土匪队伍越拉越大，发展到上万人的队伍。

瞿伯阶虽有 1 万多人枪，但子弹特别紧张，为此下令叫手下在各处尽量设法收购。不久，接彭叫驴子报告说，国民党在辰溪有一个军械仓库，里面储存子弹很多，建议派人前往劫夺。他看完报告，欣喜若狂，连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立刻派人传讯各处组织力量。他和杨树成各派 1000 人，彭叫驴子派 2000 人，总共派出 4000 人，以 500 人为一支队，编成八个支队。以一个支队担任警戒，一个支队担任攻击，其余支队担任抢运。任务分配既定，全部轻装利用黑夜出发，到达目的地时，正值鸡叫头遍，警戒布置完毕，由黎世勇指挥攻击队，把守仓库的卫兵摸掉，一枪未放就把仓库打开了。几千人一拥而入，枪支背得很少，子弹箱堆积如山，各人尽力量背，

愿背多少就背多少，一下就搬了近 7000 箱出来。这时，天已经亮了，众匪兴高采烈地踏上归程。不想国民党当局获得情报，在众匪的归程上作了堵击的布置。

沅陵、永顺交界处，道路两侧为连绵不断的大山，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为匪必经之路。国民党军派出两个正规团和两个保安团，埋伏在两边山上，等 4000 余匪全部进入山沟，两边山上机关枪、手榴弹猛烈向土匪开火。瞿等匪首事先没有防备，突然遭到伏击，几千入一下乱了套，跑的跑，躲的躲，还击的还击，指挥不灵。好在众匪凭以往山地活动的经验，还是突围冲出来了，但是，人被打死不少，什么都丢得清光，抢的子弹一颗也没剩下，所幸队伍总算没有打垮，只是做了一次蚀本生意，只好暂时各回各地。

1943 年夏初，国民党又派 86 军朱鼎卿的部队围剿。

1943 年 10 月，国民党 86 军整个集中到龙山来了，几个乡都住得满满的。瞿伯阶知道来者不善，一面把队伍集中到龙山八面山，一面送信给杨树成，叫他到八面山集合，并决定暂时不和 86 军接触，准备等杨树成到达后，往永顺转移，避其锋芒。如果 86 军尾追，也不和他们打，而是凭借山地活动的经验，引导他们到处转，等把他们拖疲以后，再回击疲惫之师，以便稳操胜算。

国民党 86 军侦知了瞿部的行动，待杨树成一到，就把八面山团团包围起来。八面山山高势陡，地形险要，瞿伯阶和杨树成商量，决定据守。86 军发动进攻后，战斗一直在周围的一些小山头上展开，谁也攻不动谁。土匪守了 4 天，第 5 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化，落大雪，下大雾，对面不见人。里耶乡一

个大财主和土匪有仇，时刻想整瞿部，当 86 军想利用下雪天进攻瞿部的时候，就由他带路从里耶附近王家仁据守的卡子攻上山来。打了几个钟头，尽管进展不大，但攻势很猛。当天晚上，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认为这样困守，过于被动，终将陷于不利，决定向四川方面突围。第 6 天一清早开始突围时，又遭遇 86 军一个团在一处险要山隘占领的阵地堵击。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打了 3 个多钟头，由于 86 军所占地势优越，又挖有工事，众匪一时攻不动。

瞿伯阶急了，命令每个支队抽调精锐 300 人，共集中千把人，由他亲自率领打先锋，杨树成统率其余队伍随后策应。但是，三番五次地猛攻，仍没有奏效。打到下午，瞿伯阶惟恐 86 军增加援兵，更不易突出去，一再命令，非攻上去不可。从先锋队中又抽出精强力壮的 300 人来，分成 10 队，每 30 人为一队轮番向山头攻击，拼死一战。终于，86 军顶不住了，土匪们抢占了阵地，后面的土匪跟着上来，巩固了战斗成果。此时，瞿部死伤很大，300 人中死伤将近 1/3。为了扩大战果，又重新组织了 400 人一直向纵深突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瞿部终于全部突围冲出，到达湖北河东三堡。休息了一天，打算开到永顺去。

然而，瞿的意图又被 86 军得知，他们集中于龙山二所乡一带堵截匪部。匪部永顺没有去成，倒死伤了一二百人。瞿伯阶见死伤太大，同时几次战斗打下来，子弹消耗很多，与杨树成研究决定，不去永顺，暂时分散，杨树成仍回四川。

1945 年 3 月，历经半年多时间的清剿之后，86 军大部调走，只留下侯振汉一个团。风声显然不紧了，瞿伯阶又从里耶

镇瞿闵盛家里回到二所乡，才听说特务大队大队长夏亦清在湖北河东三堡一个山洞内病死了，队伍由彭雨清带着。瞿找到那里，见他们只有30多个人，问起1、3支队，他们都说不知道下落。这时，瞿波平在桑植八大公山，因为乡民久不知瞿伯阶消息，86军既已调走，也决定下山找他。回到二所乡，听说他在河东三堡，于是立刻找到那里。三支土匪队伍又合在一起，有150余人了。劫后余生，瞿伯阶一心想收集以前的残部，企图东山再起，带着这小股散匪到处游动，侯振汉一个团也奈何他不得。瞿伯阶到处收集原来的人马，除王家仁投诚后被关押于花园，其他投诚的被暗杀不少外，总算又收了300多人，从地下起出100来枝枪。他又把旗号打起，正式干起来了。

瞿伯阶的儿子原来寄在来凤他妹妹家里，侯振汉把他妹妹捉去杀了以后，便把他的儿子带走了。当时侯振汉驻扎湖北的白福寺。1945年6月，瞿伯阶忽然接到侯振汉的信，说：“我和你打了这么久的交道，算你是搞不起来了，现在你居然又出了头，我很佩服你。我要调往恩施，你的儿子在我身边，希望你接回去。但是有个条件，只要你把龙山策动去的2挺轻机枪和20几条步枪归还给我，你的儿子就退给你。”瞿伯阶看完这封信，几经考虑，认定儿子既然带在他处那么久，就是枪不退，他也不至于加害小孩，于是回了一信，说：“我的儿子如果你不便带走，就放他回来。你所提的条件不能照办，枪现不在身边，暂时不能还给你。我是儿子的生身之父，你是他的养身之父，我有骨肉之情，你有养育之恩，将来儿子长大，定会感恩图报，送回或带走全凭于你。有机会我们还会见面的。”

侯振汉接信一看，又写了一封信来，很客气地说：“你的儿子还是由我带去吧！我负责抚养，只是你现在年纪已经老了，将来父子恐怕不易见面。”侯振汉想的是以父子之情说动瞿伯阶，谁知瞿伯阶未为所动。他的儿子没有送回来，终被侯振汉带走了。

86军调走时，曾卖给地方上许多枪支、药弹。瞿伯阶旗号树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乡保要捐款，要鸦片烟，大肆收买枪支、弹药；第二件事就是和永顺、酉阳取联系。经过一段时间，枪支、弹药收购了很多，装备了队伍，然后开到酉阳找到杨树成，并与永顺彭叫驴子取得了联系。那时杨树成只剩60多枝枪，百多人，彭叫驴子却还有100多枝枪，300多人。这次联系后，三股并未集中会合，各人均在各地发展实力。瞿伯阶仍从四川回到龙山一带活动。

第66节 风雨飘摇，接受收编，程潜委其为暂编第10师师长，惊闻属下叛乱沉疴难起，临终授命族弟执掌指挥大权。

1947年1月，正值瞿伯阶一面抗拒国民党的围剿、一面发展实力之际，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派人前来联络收编。担任联络的人叫欧阳金，系青红帮分子，是长江流域宜沙段一个流氓头目。他坐滑杆到了瞿伯阶的家里，找到瞿伯阶说：“程颂公现任武汉行辕主任，有意想收编你，只要你接受，要什么名义给什么名义。”

瞿伯阶玩枪杆子，以为英雄可以造时势，其宗旨就是希望

剿匪大纪实

创立一个正式前程，找上门来的事情，岂有不答应之理，一听就欣然允诺了。但是提出为了收集队伍，剿匪部队必须撤出其势力范围。欧阳金得到这个答复，立刻回到来凤。因为和他一道来的卢鹏高职位比他高，不便直接与瞿伯阶接头，叫他先来试探，自己住在来凤等消息。卢鹏高听了欧阳金的报告，立刻打电报到汉口请示。汉口复电一到，又派欧阳金到龙山，对瞿伯阶说：“行辕同意只要你听编，部队可以调离开一点。”果然不几天，部队有了行动，瞿伯阶就正式开始收集队伍。

瞿的队伍集中以后，有 700 多人，400 多枝枪，开到招头寨，住了个把月，程潜派人前来点编。瞿伯阶曾夸口说有上万人枪，现在要见面，搞慌了手脚。于是派人到各乡各保，凡地方上的枪都借来应点，人也是一样，到处找老百姓，甚至在地里劳动的人也找来听点。结果点了千把人，700 多条枪。瞿伯阶暗想，这么一点人枪，只能编个把营，能要个什么大名义呢？他急中生智，利用一些乡保长到处放烟幕，说瞿伯阶的好枪都没拿出来，尚留有后路，还有好多好多人在山里住着，这次点编是向省里搞试探的等等。

派来点编的人叫蔡泽南。瞿伯阶放烟幕故弄玄虚，有意把谣传透露给蔡泽南听。蔡泽南大概是没有正式职务的人，在龙山住了半个多月，瞿伯阶送了许多鸦片烟给他，他明知其中有鬼，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加倍上报为 4000 多人，1000 多枝枪。不久得到程潜命令，队伍着调来凤。这是瞿伯阶的活动范围，他毫不考虑就开去了。住了半个月，又要调鹤峰，也没有什么犹豫地接受了。住了一个星期，又要调五峰。这次调动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瞿伯阶开始考虑了，召集支队长以上

人员商量，大家都说不动。瞿伯阶一想，刚接受收编，名义还没有给就不服调不好，决定试试看是真是假再说。

队伍开到五峰。住了半个月，又要调长阳、资丘，越调越远，不能不使人担心程潜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可是瞿伯阶却觉察到这样连续频繁的调动，是程潜在考验自己听不听话，服不服调，不会有其他用意。心想不服调，几百人终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他对手下头目说：“程潜是要用我们的，服调以取得信任，自己也可图个正式前程，还是老实一点好。”说服所属开到长阳、资丘等地。

此后，队伍没有再继续调动，但又要重新点编，以便发给被服装具。这下，瞿伯阶又遇到了难题。他连夜回去找人，这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那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连原有的一起，共有 1300 多人，700 多枝枪。这时，上边又传令瞿部带第 1 支队住在麻池一个高山上，第 2 支队住在长江边上的杨溪，3、4 支队随瞿伯阶住在资丘。当时安排分做三次点编，先点 1 支队，然后点 2 支队，再点 3、4 支队。为此，瞿要各支队互相约定，点到哪个支队，其余各支队的人枪全部开往应点。瞿部的名册上都是造的假名字，点名时，按假名字站队，准备他按名册点名。万一他不按名册点，瞿部也作了防备，把各人所顶的假名字写在每个人的手板心上，叫他们读熟，用心记住。两种准备，事先都作了练习。果然上边没有按名册点名，由于事先作了准备，这一关顺利通过了。但是，枪也要点，而点枪要看号码并作登记，难以做假。参谋长李国柱一看情形不对，在点瞿波平第 1 支队时，暗地告诉第 1 支队长瞿波平，叫他借故大发脾气，以阻挠他们看枪号码。点枪时，瞿波

平就故意发作了：“你们搞什么名堂？把人都搞疲劳了，肚子也搞饿了”；转过脸来对士兵说：“你们把枪都丢在这里，让他们去点，我们吃饭去！”果然这一招很有效，点验官见他这样一说，连忙阻止说：“既然累了，那就不看号码了，点一下数字算了。”仿照这个办法，各支队又过了点枪这一关。结果人枪都符合以前所报的数字。

点名以后，武汉行辕给了瞿伯阶一个直属第一纵队司令的名义，并按点编人数每人发了一套旧军服。瞿伯阶这次总算是被国民党收编了，也取得了正式名义。他对这个纵队司令虽然心里犹感不足，但从此有了进身之余地，可以力图进一步发展了。

1947年10月，瞿伯阶接行辕命令调往宜都，他又召集支队长、参谋长、参谋主任等人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过去几次调动，都是一些山区，进攻退守比较方便，这次调宜都，下了平原，遇有不测，就难以招架。

瞿伯阶说：“根据我的估计，正在用人之际，程潜不会骗我们，我以为只要不调过长江，调到哪里都可以，决无妨碍。”于是按照调令开到宜都油漆河。这里离宜都县城30里，瞿伯阶到达后，宜都县长蓝吉昌亲自带了一排人前来热情接待。

天气渐渐冷起来，行辕按瞿部上报人数发来新棉军服。根据瞿部的实有人数，要多出2000多套。瞿伯阶觉得太不像话，遂派人到来凤、桑植、保靖等地去招人，乱给名义，陆续招来1000多人。原程潜派来接头的欧阳金，任务完成后没有什么事，他在宜都一带很熟悉，也给了他一个支队长名义，叫他去招人。他到处一活动，上报说招了将近3000人，瞿伯阶很高

兴，派人去点编，实际只有 1800 多人。这时，瞿伯阶的实有人数毕竟已有 4000 多人了。

原朱鼎卿 86 军团长侯振汉因故离职，从恩施到了汉口，准备回山东原籍去。他打听到瞿伯阶在宜都，便写了一封信给瞿伯阶，叫他派人到汉口去接他的儿子，因为自己要回山东了，如不去接，把他儿子带到山东去，以后见面就麻烦了。

瞿伯阶立刻派了一个姓黄的参谋，写了一封信交他带到汉口去给侯振汉。信上说：“我接儿子是小事，听说你已离职准备回籍，如果你不嫌弃，接你到我这里来玩几天。”侯振汉真的被接来了。为此，瞿伯阶办了一个干训班，连长、排长、班长轮流调去受训，将侯任命为该班班主任。这时瞿伯阶迁住宜都城边，干训班与一支队仍驻油漆河。

武汉行辕派了一个叫刘子义的官员住于瞿伯阶处，他向瞿伯阶建议：“天快下雪了，这是个好机会，你给行辕下面那些人送点什么东西，联络一下感情。”宜都、长阳、渔阳关等地都出产木炭，所以瞿伯阶决定雪中送炭。总计收买了 5 万公斤木炭，由刘子义派人运往汉口，确定以 2.5 万公斤送行辕，另以 2.5 万公斤发卖。当时瞿伯阶力图扩充实力，大肆收购枪弹，急需款项，卖掉 5 万斤木炭，赚了不少钱，解决了部分问题。同时，还派人到龙山收买鸦片烟，运到宜昌一带卖，也获利不少，又解决了部分问题。另外，瞿伯阶还对全体官兵说明，除伙食零用，饷项暂时不能发下去，要扩充实力。于是，以饷项及空缺的钱，又解决了部分问题。这时，潘文华的川军部队的一个陈旅长和一个潘团长被编垮了，住在宜昌，留下的枪支、子弹很多，听说瞿伯阶正在收购，陈旅长派潘团长与瞿

伯阶接头交涉卖枪。有上述三笔财源，瞿伯阶一口气就向他们买了将近 2000 枝枪，约 20 万发子弹，将部队实力搞得十分雄厚。

可是，没过多久，武汉行辕又要派人前来点编部队。在宜都住得久了，瞿伯阶和蓝县长、党部李书记长等人的关系拉得很好，就向他们借人借枪应点，并特委李书记长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有了人枪，瞿伯阶有恃无恐，要求集中一次点完，以示无虚。一下点了 8000 多人，4000 多枪。点名以后，瞿伯阶正式提出要编一个师，程潜见他有这么多人枪，就给以暂编第 10 师师长名义，初步满足了他扩充实力的野心。然而，对瞿伯阶再三要求编为三个团，程潜却没有同意，只好暂编二个团。以 1、2 支队编为一个团，团长瞿波平，副团长贾松清；以 3、4 支队编为一个团，由彭雨清、向敬海分任正、副团长。另外给欧阳金以补充团长名义。参谋长李国柱有病，适值瞿闵盛来了，就以瞿闵盛接替为参谋长。其他参谋主任、参谋等都是瞿闵盛找来的人。由于参谋人员的待遇比部队高，部队很有意见，认为自己拼死拼活打来的天下，却让他们坐享其成，都心怀不满。司令部与团队之间发生了矛盾，预伏下以后的纠纷。

部队编完，武汉行辕便将宜都左右一百七十八里地的防线都交给瞿伯阶的暂编师防守，并且要调一个团到当阳清溪河去。兵力分配不够，由于训班派一部分人去了。他们派人回来要求便增派兵力，说共产党游击队的陈大脚在那里活动得很厉害，不增加人不行。瞿伯阶便派其族弟、第 1 团团长瞿波平带 100 多人赶去。清溪河住有国民党一个情报队，其中有一个队

员是潘文华的舅子，每天出入于一家财主家里。正好1团有一连长住在这家人家，他们两人遂成相识，常在一块吃喝。财主家有一女儿，这个情报队员企图强奸不遂，在他家吵闹不休。1团的连长见不像话，前来向瞿波平报告，问怎么办。瞿波平命将他捆到团部来。此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瞿波平一怒将他杀了，给瞿伯阶打了一个报告。

瞿伯阶当时说杀就杀了吧，以后将瞿波平调回，却对他说：

“你管那些闲事做什么？惹这么大的祸！国民党的特务是得罪不得的，何况他还是潘文华的舅子！”

“我的部队不住在那里，我管他干什么。但我的部队住在那家人家，他胆敢旁若无人地去强奸闹事，我就要杀他！”瞿波平道。

瞿伯阶无可奈何地说：“祸惹得大也好！”人杀了，情报队虽然提出要求惩办，但是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

1948年，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命瞿伯阶师开驻慈利王家厂。1949年2月，又由王家厂经慈利开赴大庸，要瞿波平第一团归还建制。瞿波平于是从龙山出发，与其大哥相遇于慈利，遂一道开往大庸。参谋长瞿闵盛在部队到王家厂时即去长沙，此时来信说有病在省就医，推荐侯振汉接任参谋长。部队到达大庸后，瞿伯阶命侯振汉正式就任参谋长一职。当时已是3、4月，收鸦片烟的季节到来，瞿伯阶有意开回龙山去收鸦片烟。往上报了一下，整个部队便从大庸开回龙山。此时师兴周正在毛儿滩一带活动，瞿伯阶派第一团往那里一驻，与师兴周争收鸦片烟。瞿伯阶一路上有病，到龙山后，在城里住了个

把月，才迁到太平山养病。副师长杨树成这时已回四川去了。瞿波平正在毛儿滩收鸦片烟时，瞿伯阶来信命他到城里去，部队仍在原地收烟。瞿波平一到城里，瞿伯阶便对瞿波平说：“副师长杨树成已回四川去了，我又要养病，我这次病恐怕很危险，部队要人掌握，你先代理师长职务，我死了以后，你再好好搞，千万莫脱离程潜。”就这样，瞿伯阶将兵权交给了瞿波平。

第 67 节 节节败退，群匪无首，宋希濂命其接防，程潜劝其弃暗投明，两相权衡，瞿波平决心交出队伍接受解放军改编。

程潜任湖南省主席之初，手下一点部队也没有，他想抓一部分实力，因此决定给瞿伯阶 1000 枝步枪，100 挺轻机枪。瞿伯阶派军需官，他的内侄田义汉到长沙去领枪，顺便给瞿闵盛去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瞿闵盛见信后顿起不良之心，将田义汉暗杀了，枪全部归他领得。瞿伯阶见田义汉久去不归，只接得瞿闵盛报告说枪领到了手，已经起运。他很怀疑，派特务营营长邓柏林赶到常德附近去接。邓柏林在常德遇到瞿闵盛。瞿闵盛对他说：“枪还没有完全领到手，只领到 10 挺轻机枪。”便把这些枪交给邓柏林，嘱其保管。邓柏林见瞿闵盛与第 2 团团副江大同和沅陵人陈子贤，经常在一块出出进进，风闻他要成立部队，枪全部领到了手，不准备交给瞿伯阶。于是便把 10 挺轻机枪带回龙山。他一走，瞿闵盛和十七绥靖区李默庵接好头，正式成立了一个旅。瞿伯阶见邓柏林没把枪带回去，知道

瞿闵盛自己领了枪成立部队，叛变了他，一气之下，病更沉重起来，当年5月病死于龙山。根据他的叮嘱，即由瞿波平接任暂10师师长。

1949年7月，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未给其属下的这个暂编师指示，消息不通。瞿波平遂与手下人商量，决定派军需主任黄保安到长沙联络。黄到后报告说：“到长沙交通已断，只能慢慢等机会。”将带去200两鸦片烟，就此吞没，人也未回来。这时宋希濂的部队从宜昌退到恩施。他的经理处长田直是龙山人，在宜昌被我人民解放军所俘，乘机逃跑，回到龙山，电告宋希濂自己已脱险，并准备去恩施。田直在龙山与瞿波平会见了一面，瞿波平问起当时的局势，他概略谈了一下解放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不利情况，然后对瞿波平说：“程潜已经起义，靠不到他了，你可以到宋主任那里去搞，我帮你去说，仍可以编给你一个师。”

龙山有一个省参议员叫陈静念，他很愿意给瞿波平出力，瞿波平就请他和田直到宋希濂那里去接头。两人到后随即电告龙山方面说，宋已经答应。8月，陈静念回到龙山，叫瞿波平往见宋希濂。瞿波平到恩施见到宋，宋任瞿波平为新编第10师师长，正式在那里就了职。就职后，瞿波平向他要点枪弹，宋通过田直只补充了该师20箱子弹（1万发），送了该师2挺马克沁重机关枪、2枝卡宾枪。

瞿回到龙山时，解放军已经进驻永顺。宋希濂的54师董惠部及298师傅碧人部开到龙山防守，瞿设宴为他们洗尘。席间，董惠以开玩笑的口气对瞿说：“你不要开口子啊！”言外之意，叫瞿不要随便把部队拉走，让解放军进来。

9月上旬，宋希濂准备逃往四川，来电话叫瞿到来凤去见他。瞿到来凤，宋交代瞿的部队归陈希平军长指挥。9月15日晚上，陈希平叫瞿去开会，说：“解放军已到龙山招头寨，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如何攻打这个地方。我军准备分四路进攻，瞿师长对这一带地方很熟悉，你看担任哪一路？”瞿说：“我部的武器不好，弹药不足，担任一路进攻，恐怕不能胜任。我建议由我派出部队协助担任进攻向导。”

“那也好，你回去作好这个准备，先编六个营，待命令再行分配。”随后陈希平又嘱咐瞿说：“我要到宋主任那里去开会，以后你部即由方瞰副军长指挥。”

9月18日，陈希平的一部分队伍在龙山县城到处挖工事，挖了一整天，但到半夜又全部撤走了。当时瞿波平还不知道，部属都跑来问师部怎么都撤了？瞿波平以为他们可能是进攻招头寨去了。实际上陈部撤完才命暂10师向来凤撤退。瞿波平到来凤见到方瞰，他很客气地对瞿说：“我们准备撤到四川去，这些地方你熟悉，你走后头，我们在四川弯圪等你。”瞿向他要子弹，他说部队都没得多少子弹了，以后再说。瞿在来凤等他们撤离后，即在后尾跟进。走到咸丰十字路，参谋长带部队走前面，瞿只带特务营和第二团一个营走后面，解放军追上来一打，吃掉一个营，部队垮了下来，与前面的联络切断了。瞿退到二平界，向四川弯圪追去。追上了参谋长，他建议还是往四川跑。一出发解放军又追上来了。参谋长带两个补充团走前面，已经过了公路，瞿把原跟他的老部队带在身边。但解放军还是吃掉了他一个补充团，只剩下向敬海的补充团。而参谋长侯振汉顾头不顾脚，朝前直跑，部队又失去联络，瞿波平无奈

中只好把部队拖回了龙山。

这时，瞿闵盛已回到里耶镇，师兴周也已搞了一些部队，他二人写信叫瞿波平到他们那里去商量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中如何搞法，并说我们现在应该合作。接到他们的信，瞿波平找杨树成、彭雨清、向敬海等人商量能不能去，他们认为可以去，与他们挂上钩，地盘要宽一点，力量也要大一些。于是瞿波平带了一个连到里耶去会瞿闵盛和师兴周。师兴周一见到瞿波平就说：“原来伯阶怀疑我，我是没有什么的。现在我们一路来搞，我的部队都交给你，你和瞿闵盛一起负责，我的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瞿闵盛说：“解放军搞不长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商谈以后，瞿波平就把部队调到里耶附近驻起来。这时四川有个它贡庭到里耶来活动。此人原是酉阳、秀山几县的专员。他声言声势要搞大一点，以资号召。于是瞿闵盛、师兴周、它贡庭和瞿波平在一块开会研究，结果众匪首同意成立湘鄂川黔纵队司令部，由师兴周、它贡庭分任正副司令，瞿闵盛当参谋长，瞿波平和杨树成任正副总指挥。陈子贤也到了里耶，即以他为政治部主任。就这样，几路股匪都驻在里耶。

一天，有情报说保靖的比耳驻有解放军一个连，师兴周要瞿闵盛和瞿波平带部队去打。瞿波平当晚从里耶过河，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到达距比耳还有上10里路的瞿闵盛的亲戚家里时，离拂晓尚早，部队停下来等候。快拂晓时，瞿闵盛对瞿波平说：“听说比耳的解放军走了，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先回里耶去，天亮以后，你再把部队带回里耶来。”谁知天刚一亮，解放军打过来了。瞿部一面还击，一面向里耶撤退，一下子死

伤30多人。解放军没有追击。后来有人告诉瞿波平，这是瞿闵盛设的圈套，想把他送掉，所以他派亲戚到解放军处报告，自己先溜走。瞿波平稳着没有做声，心想“你要整我，我总有机会报复你们的”。

瞿部仍驻里耶，师兴周、瞿闵盛、陈子贤等人极力拉拢他。瞿找他们借500块光洋，他们立刻派人送来，还假仁假义地慰劳瞿的伤兵每人两块光洋。但实际上他们是一心想利用瞿部和解放军作对，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胜，可把解放军赶走，败，可以借刀杀人。瞿将计就计，驻在里耶不动，要吃要喝，就向他们伸手。

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原是塔那乡乡长，解放军初来时就投了诚。他送信来说解放军调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准备攻打里耶，叫众匪注意。师兴周找瞿波平和瞿闵盛研究对策。解放军来打里耶，必须经过里耶旁边的岩窠路，守住那里就能保住里耶。师兴周和瞿闵盛向瞿波平灌米汤，说：“波平，只有你的部队能打，你又年轻，只有你能把这个地方守住。”

瞿波平想机会来了，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连忙向他们保证，“一个团我负责把他打回去，你们放心好了，守住里耶，我完全包下来。”第二天半夜，瞿波平就把大部分部队、家眷、伤兵都送到八面山去了，只带了200多人，全部轻装，守在岩窠路。第三天天刚亮，解放军果然来了，他命人打了几枪，连忙撤跑了。解放军一直冲到里耶，师兴周、瞿闵盛的部队被吃掉不少，差一点把他们都捉住，财物也丢掉不少。他们想整瞿波平，但他倒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

瞿波平撤到八面山西头，师兴周等人也退到八面山东头来

了。师兴周派人找瞿去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搞。瞿答复他们说：“我到二所乡把伤兵安置后再说。”接着瞿波平将队伍拉往桑植去了。瞿闵盛的部队只剩200人左右，缴枪投了诚。师兴周的部队由他侄儿师秀章领着分散了，他自己躲到一个秘密险要的山洞里去了。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这个洞里。一天晚上从洞里出来，想找点人到洞里去开会。没等他回去，解放军剿匪部队便把这个洞包围，和他留在洞里的部队发生战斗，洞被打开了，弄得人财两空。他只好带了几个人到处藏藏躲躲，后来还是被解放军活捉了。

解放军把师兴周、瞿闵盛搞掉以后，自然要集中力量来对付瞿部。瞿波平此时流窜于龙山、来凤一带，将部队分散活动。有些乡保长过去跟他搞在一起，眼下都投了诚。副师长杨树成带点部队回四川去了。1950年2月，因为瞿波平的部队分散，解放军找不到，瞿见解放军小分队十个八个地出来，就派兵拦路伏击。这样搞了几次，怕遭大部队包围，又把部队集中300多人，想拉到来凤的山内去。来凤的解放军堵着瞿就打，他只好又拖回二所乡。后来听说招头寨的解放军已经调走，瞿部就开到那里去收鸦片烟。这时，龙山所有的解放军都调到五崽乡喜东河去了，瞿就以新10师师长名义出布告安民，并招收队伍。参谋长侯振汉这时又找到龙山来了，他要瞿把名义搞大一点，以新10师为基础，改称“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号召力大些。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也闻讯前来投奔，瞿就给他任了个纵队司令。彭雨清、向敬海都任为纵队司令。龙山城当时仅驻有解放军一个连，由于解放军兵力少，土匪又猖狂起来，想攻占龙山。招头寨有白莲教的所谓神兵，说什么刀砍不

进，枪打不穿，传得神乎其神。瞿便把神兵头子丁大鹏找来，问他打龙山有无把握，有把握就去攻城。丁大鹏回去加紧训练了几天，说可以去攻城了，并说攻进城时，路上的枪和钱都不能捡。于是“神兵”把一面红旗子一打就走。到达龙山城门口，解放军很沉着，等他们走近，手榴弹一炸，神兵全都变成了死兵。瞿不敢再进攻龙山，退到招头寨附近的山上，在那里收鸦片烟税，招收人马。

1950年6月，解放军忽然又一下打进来了，瞿只得率众匪从招头寨撤退到来凤、桑植，以后又拉到四川去找杨树成。这里拖那里打，子弹打掉一颗少一颗，买不到了，只好和杨树成商量，两路仍分散各回各地。杨树成回四川后，被解放军一个师的剿匪部队打得待不住，又跑到湖南来。二人在明溪乡会面。解放军追上来，瞿的警卫营被打垮，突围时杨树成被打死。杨的部队瞿带了两天，仍叫他们返回四川去，不到20天，整个投了诚。瞿的部队只剩原来一、二、三支队的老底子向敬海和彭雨清的部队了。七打八打，只有七八百人，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买又买不到，只好分散活动。

以后实在不能出来活动了，瞿只带五六个人在身边。瞿此刻开始打主意，实在不得已时，到沅陵做生意去，混入商场解放军就捉不到他了。他满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和为匪者是死对头，不投诚要打，投诚也是死路一条。解放军宜昌军分区负责人曾写信劝瞿起义，瞿就没有敢接受。后来又听信谣言，说共产党见投降的就杀，吃鸦片烟的要杀，有此二杀就够了。同时投诚要缴枪，枪一缴掉就不是好事，那还不杀吗？何况还有二杀在前，所以拼死瞿也不投诚，决心和解放军对抗到

底。

正在这时，程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瞿波平记得瞿伯阶临死前交代要听程潜的话，见程潜叫自己缴枪投诚，瞿波平当时口里答应了，可是转念一想，程潜这个名字谁都可以写，图章谁都可以刻，不要是解放军骗自己，好解决掉自己。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他反复考虑，又叫瞿兴孝把信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因为信写得简单、唐突、毫不客气。信上写道：“波平弟，听说你在龙山一带作反动活动，因为我和你亲哥的关系，希望你把人枪交给当地解放军，即来长沙见我。”他想如果是解放军造的假信，一定写得很客气，这封信三言两语，唐唐突突，可能是程潜写的。这时他深感前途渺茫，已无出路，就下定决心听程潜的。于是说：“我相信他，他要我死，我就死嘛！瞿伯阶叫我不脱离程潜，他要卖我，我也值得，没有违背大哥的初衷。”正在这时，向敬海向解放军投诚了，更促使瞿波平不再犹豫，到二所乡老兴场，会见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接洽交枪事宜。叶司令员很客气，叫瞿波平自选地方，把部队收拢来。瞿波平就住在离他三四里处的田家寨。叶司令派了一个科长前来帮助瞿。瞿收一点就交一点，结果大部分人枪都收来交了。当时侯振汉和彭雨清二人不服收枪，瞿波平便将他们的住地及路线告诉了解放军。

根据程潜指示，部队交完枪，瞿波平就要求到长沙去。解放军永顺军分区叶司令员这时已经回永顺去了，只派了一个范参谋长在那里，接到瞿的要求，他打电报请示得到叶司令员同意，叫瞿先到永顺去。同时问瞿有些什么要求，需要什么东西，带些什么去。

瞿波平说：“什么要求都没得，就是要吃鸦片烟。”

范参谋长满口应承说：“你需要多少就带多少吧。”瞿熬了十几两熟膏子，三四两吗啡。参谋长问瞿够不够，瞿说：“够了，不久就要戒掉它。”

到永顺见到叶司令员后，他派人送瞿波平前往到长沙。在长沙住湘雅路联络部，见到李部长，瞿说要见程主席，这位李部长说程主席到北京开会去了。要瞿波平安心休息几天。过了一个多星期，开了一辆小汽车来接他去见程主席。一进程潜的面，瞿波平更放心了。程潜对他很客气，说：“波平，你来了，很好！湘西的人都不听我的话，只有你还听我的话；把鸦片烟戒脱后，再去学习学习，为人民做点事。”瞿波平见共产党对程潜这么大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如此厚待，一颗悬着的心也安稳了。从此，他抱着为“人民做点事”的信念认真学习，并被任命为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走了真正的新生之路。

第 68 节 杀人魔王，受封“师长”，抗拒解放，杀我干部群众，多行不义天怒人怨，“坐地虎”被追剿途中一枪毙命。

在湘西，除了瞿伯阶、瞿波平兄弟，还有一个叫张平的股匪头目。当地民谣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可见其凶残。当地百姓称他为“坐地虎”。

张平原名张大治，湖南古丈县李家洞张家坨人，生于1906年4月。他的祖父张朝玉，是张家坨的大财主，家有水

田 160 亩。张平出世时，其父张廷舟因科举不中，吞服鸦片身亡。其母向桂莲改了嫁。从此，张平由其祖父扶养。张朝玉对他娇生惯养，宠爱纵容，使张平从小野蛮成性。张平 9 岁在李家洞读书时，小小年纪便用砚池把老师向正学砸得头破血流。因品行恶劣，先后被李家洞、桐木溪、芭蕉冲等学堂开除。此后，张平在家不务正业，玩枪弄棍，寻衅滋事，成为李家洞地方的一个小恶霸。

1921 年，张平 15 岁时，娶沅陵桐木溪向和甲的女儿向丁丁为妻。婚后，向丁丁服侍稍有不周，张平便拳脚加身。一次，向丁丁被张平无辜毒打，走投无路，丢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张桃英，吞服鸦片自尽了。张平的姐姐张大妹只好代他抚养幼女，张桃英 3 岁时，张平叫姐姐滚蛋，张大妹从此音讯杳无。

1922 年，张平花 100 多块银洋买了一枝汉阳枪，成天扛枪游荡，狩猎打靶，当地百姓都不敢惹他。

1923 年，李家洞印家坨财主印培植以“保乡安民”的名义，买些枪支成立团防局，印培植自任局长，叫张平当副局长。印培植之弟印培林是张平的亲姑爷，也扛起汉阳枪。一次，召集甲长议事，张平不在家，印培林说了些瞧不起张平的话，张平得知后，一怒之下把印的汉阳枪抢了。印培植一家怕张平再下毒手，便收拾金银细软，连夜逃上金华山，在山上修碉堡，筑土墙，以防御张平袭击。张平从此自任团防局长。这时，18 岁的张平，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并且开始拉队伍，干起烧杀掳抢的勾当。

李家洞团防副局长张廷富，知道张平长期奸污自己的婢娘和绑架奸淫过路妇女，曾经劝导过张平。张平对其却怀恨在

心。

1924年冬月十九日晚上，大雪纷飞，张廷富一家围在火塘边烤火。张平邀集张大美等三人闯进张家，将张廷富夫妇及父母和小弟枪杀。张廷富的妻子已临近分娩，被打死时婴儿流产出来，也遭惨害。张廷富有个19岁的弟弟张廷胜，当时未被张平击中，昏倒在他父亲的尸体下，才幸留一命，妹妹躲在门角里，免遭杀害。张廷胜连夜逃到永顺石堤西，后来改名换姓，靠做工糊口。

张平杀害张廷富一家6口后，因当地群众议论纷纷，社会舆论很大，便跑到沅陵县桐木溪姑妈家避风。张平走后，经张朝玉出面安葬了死者张廷富等。张平在外鬼混了一年多，到1926年才重新回到李家洞。

逃到永顺县石堤西的张廷胜，请人写了状纸，上告永顺县政府。县府委派石门寨团防局长张兴楼设计擒拿张平。一天，张兴楼主动提出石门寨同李家洞合办联防局，张平不知是计，欣然同意。1926年4月，张兴楼带领几名团防兵，一路埋伏在白路界，一路到李家洞，假传召开保甲长会议，把张平的人都派下去喊人，张兴楼和张平靠在火床上吸鸦片烟。团防兵张敬柏趁机从门缝中对准张平连开两枪，不料竟都是“臭”子，这下，暗杀不成反被张平发觉。张平和张兴楼跳下床扭打起来，从房里打到堂屋，从堂屋打到坪场，张兴楼一个手指被打断，仍扭住张平不放，同时大叫张敬柏开枪。张敬柏左瞄右瞄怕伤着张兴楼，正犹豫时，张平乘机抽出小刀对准张兴楼的心窝就刺，张兴楼松手躲闪，张平趁机逃脱。

张平又逃到岩坳姑妈家。当时，岩坳属沅陵县，李家洞属

永顺县，沅陵不管永顺事，张平得以平安无事。他在姑妈家闲住七八个月，曾在芭蕉冲向国茂家读书，又经人撮合，与向国茂隔壁的向三妹订婚。到了冬天，张平见风平浪静，又窜回李家洞。

1927年，张兴楼探得张平的行踪，向永顺县府报告，加上已当上保安团参谋的印培植也告状，于是省里派出刘本洲保安团一个排的人马，从沅陵乌宿出发，由沅陵县利平乡几十名乡兵配合，到李家洞捉拿张平。

这天，姓罗的排长带人包围了张家坨，老百姓闻风而逃，张平还在睡大觉。枪声响了，张平才慌忙爬起来。一个保安团兵从窗口向他开了一枪，恰巧张平弯腰穿鞋，未被击中，只是在蚊帐上穿了两个洞。张平忙夺门出去，一阵乱枪之后，保安团士兵不敢上前。张平冲出重围后，躲进后山岩洞中。这时，洞中躲满了老百姓，大家要张平另找地方，张平黑着脸不言不语，抱着枪坐在洞口。保安团兵在张家坨杀猪宰羊，吃喝一顿后，罗排长便命士兵攻岩洞。一个团兵刚到洞门前，张平抬手一枪，团兵应声倒下岩坎，其他团兵见状均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朝洞里放枪，并烧辣椒烟熏洞。正紧急时，李家洞的麻脸保长张朝连领着六七人前来营救张平，罗排长不知虚实，下令撤到金华山。张平与麻脸保长会合后，仗着本地人熟悉地形，反转攻打金华山，保安团被打死打伤10多人，丢了几枝枪，撤退到沅陵乌宿。保安团退去后，张平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到头来免不了挨打，因此又离开了李家洞，外出另寻靠山。

1928年，张平经人介绍到国民党128师旅长舒安卿手下当副官，给舒安卿看守沅陵清水坪的庄园。

张平在清水坪舒安卿家守庄园时，暗中筹划对张兴楼报仇，得到舒安卿赞同后，张平买了一支套筒枪藏在李家洞，多次摸黑没有碰上张兴楼。一次，探得张兴楼去永顺县城开会，张平背上一斗荞粉粑粑，躲在吴家坪的后山坡，一连等了7天，终于等到了张兴楼和他手下的张廷胜。于是，张平将张兴楼击毙在稻田中，张廷胜被打伤后逃脱。

抗日战争中，舒安卿部在浙江嘉善、嘉兴一带抗日，同日军血战7天7夜，因缺乏弹药和粮食补给，几乎全军覆灭。舒安卿带着伤残兵员回到沅陵后，张平为舒安卿熬汤煎药，阿谀殷勤，博得舒的好感，被收为“义子”，并由舒安卿推荐当上了古丈县警察局巡官。不久，又当了警察中队长。

野心勃勃的张平，当上中队长并不满足，仍然为非作歹，竭力扩展势力。警察中队当时只20多人，他虚报10多人的薪饷，中饱私囊，又对城内旅社宿客，征收200文户口税。以抽壮丁、禁烟赌为名，攫取民财。打着“剿匪”的幌子排除异己，杀死保长石姜成。带领警察打麻溪乡村武装时，打死无辜百姓，抓去双伯球等人缴得10条枪，私藏花机关枪1挺。剿宋家寨向雪清时，打死保长向先银，捉去向雪清父子三人在古丈杀害。由于张平残害百姓，危害地方，百姓纷纷向永顺专署和沅陵专署告状。永顺专署布告各地通缉张平。1940年10月，张平被撤去警察中队长职务，他带着妻儿和心腹打手回到李家洞老巢，又重新为匪。

张平回到老巢首先做了三件事：第一，组织武装。他邀集宋太仁和“七阎王”向国万、“八阎王”向国年等，砍香盟誓，结拜28个老“弟兄”，纠合人枪100多，在金华山落草。第

二、在化江溪边悬岩绝壁上的岩洞里筑墙建屋，准备安全之地，防人暗算。第三，把老“弟兄”派出去放“边棚”（暗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张平的野心和打算是：当不上司令当草寇王，占不了古丈占李家洞。

张平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鸦片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这样，张平于1943年2月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由土匪头子一下成了国民党党员。

1943年调整县界，古丈县由7乡1镇扩充为12乡1镇，李家洞划为保安乡。张平给县长送了鸦片，于是当上了保安乡乡长。张平原名张大治，便是这时改叫张平。人称“坐地虎”。他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烟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而被杀害的有15人，逼得卖儿卖女的有12户，弃家讨饭为生的有13户。而张平家里则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张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土地捐、火坑捐、子弹捐、碉堡捐等，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搞猴儿抱桩、踩红犁头。张平特别爱吃猪舌头，沅陵县桐木溪有个向二老，因忘记给他留猪舌头，张平拿着刺刀说：“没有猪舌头，你的舌头也一样。”一刺刀戳进向二老的嘴巴，可见张平是何等的残酷歹毒。

1943年，张平用搜刮来的钱财，在李家洞修建住宅，建筑碉堡和石围墙，后来又重修金华山，在山上设碉堡、粮仓、

剿匪大纪实

水池和弹药库。张平强迫每户农民出7个白工，逼老百姓下自己屋上的瓦，拆自己的壁板，为他修建公馆。

这年10月，张平新屋上梁，大摆酒宴，晚上打夜靶。凉水坡财主瞿生振的儿子瞿永茂，打靶百发百中，此人是张平的外甥，又是胡小衡的女婿。张平见他枪法好，很是忌恨。第二天辞行后，在淘金溪界上，张平派人将瞿永茂击毙。

瞿生振怕张平灭九族，携带家小逃到沅陵控告张平。1944年3月14日，国民党74军一个连奉命来剿张平，刚到天台山，即被张平的匪徒打死一个排长。74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74军。同时，派人抬两缸鸦片到沅陵“酬劳”该部，74军以4箱弹药作为回赠后，收兵回省城。后来，有人说74军进剿，与下张家村向开运、向开国和土墙坡的向丁浩有关。张平便派人将向开国一家5口、向开运一家3口、向丁浩一家3口，以及陈道国等人全部杀害。

新任县长陈立谟为了在古丈站稳脚跟，决定利用和依靠张平的势力。1944年10月，古丈县成立清乡司令部，陈立谟担任司令后，便叫张平任副司令兼河防大队长。接着，又向省主席薛岳密荐张平为古丈县自卫团副官。在陈立谟的支持下，张平由匪为官如虎添翼。

1949年湘西爆发“三二事变”。事先，湘西各县军政头目在古丈开会。张平于2月上旬在古丈发难，占领县政府，赶跑县长王天龙。为掩人耳目，张平未马上接任，而由孙习林代理县长。接着，2月27日，张平自称司令，率1300余匪众，从古丈出发，经古丈河蓬、泸溪浦市到辰溪抢劫兵工厂，抢得步

枪 400 余支，机枪 10 挺、子弹若干和追击炮 3 门等。

4 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府决定进剿湘西土匪，派保安第 5 旅周笃恭部由沅陵向古丈进军。湘西各地方武装纷纷赶赴古丈，如乾城的梁光湘，保靖的徐世弟，永顺的汪援华和曹振亚、罗文杰等，对周笃恭部形成由南到西的弧形包围，战场拉开 30 余里，整天枪声不断，迫使周笃恭部撤离古丈。省府自认无力，不得不改变了对湘西用兵之举。“湘西事变”使张平得以“腾达”。1949 年 6 月，国民党委任张平为湘西自卫军沅（陵）、古（丈）、泸（溪）边区总指挥，得意忘形的他立即成立了由小队、中队、大队到支队的反动武装组织。并在沅陵、泸溪两县成立四个支队。总指挥部设在古丈张平的公馆内，下设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由手枪队、特务队、直属大队、游击队、六个常备支队和八个后备支队组成，共有 2800 余人，各种武器 1900 余件。

当年 7 月中旬，张平以武力迫使县长孙习林辞职。8 月 1 日，张平率手枪队占领古丈县政府，自封古丈县县长。国民党反动派土崩瓦解之时，张平被封为国民党“暂编第 11 师”师长，他将六个常备队扩编为三个纵队，面向沅陵方向构筑工事，布下所谓三道“防线”，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妄图与我进军湘西的解放军相对抗。

1950 年 3 月初，我湘西行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分军区，顺应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消灭地方匪患，派解放军分三路进军，合围李家洞，粉碎了张平的三道防线，围住了张平的老巢。农历正月十五，张平家里正在闹元宵，枪声一响，张平甩掉手上的酒壶和猪舌头，化装成老太婆，携带着金银和妻儿

剿匪大纪实

溜走了。但不久他又继续收买残部，制造谣言，暗杀我军政干部，杀害我人民群众。张平从李家洞逃到李家寨，遭到我军痛击后，又窜到保靖、龙山等地，连连碰壁之后，不得已又潜回李家洞。1950年7月10日，张平躲在李家洞附近的杨家岭小里溪，由于饥饿和鸦片瘾发作，他胁迫农民张学意去为他取饭、取鸦片烟。张学意假意顺从，并急忙要父亲张高升报告区人民政府。在我军和当地群众的包围下，张平在跳过田坎潜逃时，被我军民当场击毙在稻田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至此终于结束了他肮脏而罪恶的一生。

这样，我剿匪部队又为湘西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华东地区的剿匪，自 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挥师南进之日起，至 1953 年底基本结束，历时 4 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为肃清山东、浙江、福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等省区的土匪及海匪，华东军区和三野先后动用 5 个军部、19 个师、1 个旅又 5 个团和海军一部等兵力，取得了歼匪 24.6 万余人的重大战果。

第十八章 肃海匪

第 69 节 纵骑东南，席卷千军，三野大军分兵进剿苏皖浙闽诸省各路股匪，捷报频传。

渡江战役中，第三野战军第 8 兵团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被编为东突击集团，其四个军在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的指挥下，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凯歌声中，兵团 4 个军皆有不俗的战绩。

第 24 军：在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的指挥下，于安徽境内的姚沟至埂段渡过长江，占领顺安、铜陵、大通等地，并和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南逃的国民党 5 个军的重大战果。

第 25 军：在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的指挥下，突破敌江防后急插至郎溪、广德地区，截歼南逃之敌，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的战果。

第 26 军：在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的指挥下，由扬州、邗江的驷马、王圩等地渡江，在天王寺、目沛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第 312 师 4000 余人。

第 34 军：在军长兼政治委员袁仲贤指挥下，与第 35 军协同兄弟部队攻占瓜洲、浦镇，箝制南京、镇江正面国民党军，

并于4月23日，一举占领镇江。

在渡江战役中，我第8兵团仅作为三野东突击集团之一部（另一部为第10兵团），与中突击集团在江苏吴兴会师后，激战三天，在广德地区一举全歼国民党军5个多正规军，为三野的军旗和军威大大增色。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残存的100多万人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这时的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解放军的前进，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为此，他在上海至宜昌的长江防线上布置了两个重点防御集团。

一是“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的二十六个军共七十四四个师约50万人，主力置于京沪杭地带，以五十二个师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各桥头堡，其余二十二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

一是“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的二十二个军四十个师25万人，其中二十七个师担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十三个师配备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蒋介石还调集海、空军主力搭建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以镇江为基地的“第二舰队”辖舰艇89艘，归汤恩伯指挥，担任长江下游防务；以九江为基地的“江防舰队”辖舰艇44艘，受白崇禧指挥，担任长江中游防务。

对这些虚张声势的防御态势，刘伯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兵力少、江防宽等困难，蒋介石无法实行前进配备或后退配备来防守长江，他只能采取直接配备，即将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就是这样，他的兵力也是捉襟见肘。因此，自汉口

以下 1000 余公里漫长的江防线，实际上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3 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刘邓指挥二野三个兵团分由阜阳、沈丘、漯河地区，向湖口至贵池间的长江北岸挺进：3 兵团为左路军，由阜阳直开安庆；4 兵团为右路军，从沈丘径指望江；5 兵团为中路军，开赴桐城，紧随 3 兵团之后集结待机。并以 11、15 两军为先遣军，先期到达预定地域，为主力开辟渡江前进阵地。为箝制迷惑白崇禧，又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向安陆、应城、天门之线宽大地区机动作战，威胁武汉侧背，吸引白崇禧部分兵力西顾。

4 月 20 日下午，国民党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当晚，我军以第 7、第 9 兵团四个军组成的中集团第一梯队，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等地段展开渡江，午夜在南岸一举登陆成功。

4 月 21 日，我西、东集团在千里江面同时平行渡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指战员和水手们密切合作，渡船直冲对岸。当晚 20 时，渡江成功的十六个团控制了宽 100 余公里，纵深 5 至 10 公里的登陆场。至 23 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汤恩伯见其江防部队溃不成军，于 22 日下午下令总退却。当晚，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所辖三个军，纷纷从殷家江、东流和彭泽向浮梁、祁门、石埭（今石台）溃逃。安庆守敌 174 师也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歼于田铺地区。解放军乘胜进占青阳、高坦、至德（今东至）一线和马垵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

与此同时，三野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4月23日午夜，三野第8兵团一部经浦口渡江，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城。至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我百万大军顺利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1949年4月2日，是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便召来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要他们汇报一下长江防务的情况。参谋总长顾祝同当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长江防御计划作了汇报：

“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司令汤恩伯指挥，共有七十五个师，约45万人，我们已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很好。”蒋介石听着汇报，像给自己打气似地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顾祝同受了鼓励，又继续汇报：“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海空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相机反攻的跳板，关于具体方案，请汤司令谈谈吧。”

汤恩伯见该自己发言了，忙接过话头，介绍起来。

“你们这样安排是可以的，不过共军是狡诈多变的，关于

江面上有何安排？”蒋介石提起了自己最不放心的一件事。

“有的。”汤恩伯向前欠了欠身子：“为了加强防备共军渡江，我们已经抽调林遵的海防第二舰队的20几艘军舰和60几艘炮艇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安庆地段的江面，用炮火封锁江面防止共军突然渡江……”。

蒋介石对有海军舰艇封锁长江很感兴趣，不时地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汤恩伯的部署。

然而汤恩伯这里所提到的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却并非愿意为蒋介石继续打内战以及为保住蒋家王朝面卖命的人。

林遵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24年进烟台海军学校学习，后留学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后，历任国民党海军副舰长、布雷大队大队长，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谋，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由美归来，又担任了第二舰队司令。

林遵所率的第二舰队，此时被蒋介石推到了阻拦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第一线。在此之前，林遵曾寄希望于正在举行的和平谈判，希望能够就此平息内战，使早已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然而，他每天得到的消息却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断拖延把戏，以及积极备战的命令……

他失望了。他不再对国民党政权抱任何幻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的独立和完整！”

毛泽东的话，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

1949年4月21日黄昏，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蒋

介石寄厚望的江阴要塞不仅失守，连要塞司令戴戎光也当了俘虏，此外，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 25 艘舰艇“投共”了。

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听到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噩耗，立即瘫倒在地，连吐两口鲜血，一着急，竟昏厥了过去。站在一旁的蒋经国急忙喊来医生抢救，打强心针，服药，好一阵子才醒过来。他一恢复神智，即刻命人打电话通知军政要员速到杭州开会。

会后，李宗仁回南京又坐镇指挥了半天，4 月 23 日，他飞离南京赴桂林。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

4 月 25 日，蒋介石登上“泰康”号军舰，下令驶往上海。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与共军再作决战。

蒋介石和汤恩伯吹嘘的“决战宁沪杭”仅于两周时间内，即告灰飞烟灭。

至 1949 年 5 月 26 日，除汤恩伯率第 54 军约 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 15 万人全部被歼。上海战役我人民解放军共缴获大炮 1300 门，坦克、装甲车 110 辆，汽车 1100 辆。

渡江战役结束后，华东地区的剿匪斗争，即从 1949 年 5 月第三野战军向南进军时开始，至 1953 年底基本结束，历时 4 年多，共歼灭土匪 24.6 万多人。

华东地区，当时包括山东、浙江、福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这里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之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台湾时留下的许多残兵败将和反动骨干分子也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沿海岛屿，都一度匪患成灾。

1949年7月，全区陆上有土匪11.3万多人（不含7月份以前浙江境内已剿灭的2.9万人）。其中浙江省有4.7万人，福建省有4万多人，皖南、皖北地区约有1.5万人，苏南、苏北地区约有8600人，山东省境内约有3000人。土匪无恶不作，给华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为消除匪患，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先后动用五个军部、十九个师、一个旅又十五个团和海军一部等兵力，进行剿匪作战。

194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华东地区各级党政军机关，以加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为目标，采取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全面合围与分区奔袭、多路合击与分散驻剿、城市治安警备与乡村清剿相配合的方针，认真开展剿匪肃特工作。

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江、皖南为重点的华东大陆地区秋季剿匪作战。剿匪作战的方案为：

由25军主力和浙江的建德、监安军分区与皖南的宣城、徽州（今屯溪）军分区，负责剿灭杭州至徽州公路两侧地区的土匪，尔后向浙赣边区发展；

24军71师、三野骑兵团和皖北军区1个团，由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所率部队，进剿以金寨为中心的土匪；

苏南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炮艇队，继续剿灭太湖地区的匪特；

20军酌情协助苏州军分区，继续剿灭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地区的土匪；

剿匪大纪实

苏北和鲁中南军区，继续剿灭陇海铁路东段（含徐州至连云港）两侧地区的土匪特务；

以 35 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剿灭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区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土匪。其他各地的土匪，则由各地方部队负责清剿。

8 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剿匪作战方案。

8 月 9 日，华东军区和三野向所属军区和部队下达了秋季剿匪的作战命令。

从 1949 年 8 月 27 日起，剿匪部队陆续奔赴作战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重点进剿。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后，对处于我强大军事压力下的土匪武装，发动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的剿匪决心和政策，促使土匪投降自新。由于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收到了剿大股、警小股，打要害、制一般，剿一地、清一地，灭一股、少一股的效果。

参加大别山剿匪的第 24 军部队，在湖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与中南军区剿匪部队密切协同，自 9 月 5 日到 30 日，首先集中兵力把当地最大匪首汪宪的主要支柱岳岐山股匪打垮，然后在土匪分散活动地区进行梳篦式的逐村搜剿，并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剿匪政策，动员土匪家属规劝土匪自新。匪首汪宪、袁成英的妻子被说服后，带领剿匪部队活捉了汪、袁两匪首。经过 20 多天的剿匪作战，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共歼匪 3269 人，其中 71% 的土匪是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之下投降自新的。

8 月 25 日，剿匪部队在浙西山区，全歼主要股匪“皖浙边区游击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在

秋季剿匪作战中，浙江全省至11月底共计歼匪1.4万多人，连同7月份以前剿灭的2.9万人，共歼匪4.3万多人，基本上摧垮了浙江全省的大股土匪。与此同时，山东、苏南、苏北的剿匪作战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其中苏南歼匪7000多人，山东歼匪1400多人。至1950年1月，华东全区共歼灭土匪5.4万多人。除山东、苏北因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外，其余苏南、皖南、皖北和浙江境内的大股土匪被剿灭或击溃。金家寨、祁贵山区、闽浙赣边区、太湖地区的土匪基地均被摧毁，匪特的指挥体系及其部署也已被打乱，从而初步稳定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

随着我秋季剿匪作战的胜利进展，为巩固人民政权，华东军区所属各军区，相继建立和扩大了地方武装，沿海地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海防大队，为以后独立完成剿匪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1950年初，福建境内有土匪200多股，共3.5万多人，华东其他地区还有中、小股土匪500多股，计2.3万多人。当时，浙江、福建两省境内的解放军部队，正忙于解放舟山群岛和准备再次攻打金门，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进行剿匪，地方武装又初建不久，一时还难以独立担负剿匪作战任务。因此，华东地区的土匪势力又一度抬头，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时，台湾当局也派遣特务头子和特务武装，潜入大陆充当土匪骨干。3月6日，内窜的匪特就达155股，共3700多人。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操纵指挥下，土匪重新整顿队伍，并且利用春旱造成的灾荒，蛊惑群众，扩充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面的破坏活动。在山东、浙江、苏南、苏北境内，当年上半年增

剿匪大纪实

加土匪 6900 多人，福建境内当年增加的土匪达 1.1 万多人。新老土匪不断疯狂地破坏主要交通干线，袭击我乡村政权机构、群众团体和分散驻防的解放军部队。1950 年 1 月至 8 月，华东全区被土匪杀害和抓走的干部就有 2200 多人。有些土匪隐蔽身份，伪装进步，混入刚建立的乡政府和农会、民兵队伍中，充当内线，策划叛变。他们还利用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暴乱。当年春季，华东地区共发生反革命暴动达 210 起。

针对土匪活动的新动向，1950 年 1 月前后，华东军区和三野抽出 8 个主力团在福建境内全面展开剿匪，又决定以闽浙为重点，在华东全区进一步分兵进剿中、小股土匪。对福建、浙江、苏南等匪情严重的地区，以担任剿匪作战的野战军为主，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清剿；在浙闽边区和浙闽赣边区等股匪活动猖獗的地区，集中必要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清剿；在一般匪情地区，以地方武装为主，民兵和驻扎当地的野战军部队为辅，对小股土匪实施进剿。全区党政军民实行统一的部署和行动。华东军区和三野还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抽调主力部队的部分连队编入地方武装作为骨干力量，并清除混入地方武装中的坏分子，把部分主力部队转为地方武装力量。在山东与苏北、浙江与皖南之间的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以统一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指挥。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充分发挥了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使华东地区的剿匪作战再次出现了新的高潮。

闽北地区的剿匪部队，消灭了重要股匪“中华民族自救军

闽北总指挥部”。浙江、苏南、皖北等地区的剿匪部队也先后歼灭土匪“国防部第三纵队”、“苏皖军区第三纵队”，活捉土匪司令许均友、刘子貽等。

1950年3月至6月，华东全区共歼灭土匪2.7万多人。但是，由于有的剿匪部队存在轻敌情绪，没有掌握剿匪作战的特点，在执行政策方面又出现“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等情况的影响，华东地区的土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

为加强剿灭股匪，华东军区于1950年8月再次召开了剿匪作战会议。军区代理参谋长袁仲贤在会上分析了华东地区一年剿匪作战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政治部主任唐亮对剿匪作战的政策进一步作了阐述。会议决定，在重点清剿期间，要进一步把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剿匪和反霸、长期驻剿和分散清剿紧密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坚决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8月30日，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集中必要力量进行剿匪作战，并于1951年上半年以前肃清华东地区内陆的股匪。为此，华东军区决定抽调第22军65、66师，分别进驻浙江穿山半岛和象山半岛地区剿匪，第23军67师进驻浙江天台地区剿匪，将福建境内的剿匪兵力由八个团增加到十二个团。

各剿匪部队根据股匪时散时集、流窜不定的特点，确定以主要兵力对付主要股匪，以少量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对付小股土匪，点面结合进行清剿。一旦发现土匪，剿匪部队便昼夜

剿匪大纪实

兼程奔袭，进行包抄合击。对于被打散后潜入山中的土匪，坚持连续进行搜剿，不给土匪以喘息之机。

1950年10月5日，第32军95师283团获悉，有两股土匪在福建建瓯县梨山和莲花山地区活动，立即以七个连的兵力奔袭，经过反复搜剿，消灭土匪90多人，击毙匪首少将师长郑长吉。

11月，第29军85师253团和福建龙岩军分区警备团，对连城县境内的主要股匪“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进行19天的搜剿，歼灭土匪400多人，活捉匪首中将总司令唐宗。

我军剿匪部队在加速军事进剿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了大批土匪武装。1950年9月，32军96师287团2连和4连，在清剿股匪“突击司令部特务团”时，将土匪严密包围，组织工作组进村宣传剿匪政策，发动匪属和已降土匪做瓦解工作。在剿匪部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宣传的影响下，土匪团长林保才被部下打死，林保才的妻子和20多名土匪，抬着他的尸体向剿匪部队投降。10月中旬，该师286团一面不断发动清剿，一面多方开展政治攻势，在6天内瓦解7股土匪，争取“闽北自救军第二支队”副支队长以下140人携枪投降。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950年11月，命令解放军驻福建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地进行剿匪，并限定6个月内消灭全省成股土匪。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将福建的剿匪主力部队增加到五个师，组织福建省的党

政军民，再次发动剿灭股匪的大规模攻势，同时还抽出 1.2 万多名军队干部下乡，配合剿匪斗争与开展农村工作，使剿匪作战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反对恶霸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其他地区也同样采取有力措施，从而使华东地区分兵进剿股匪的斗争进入夺取全胜的阶段。

1951 年 1 月，福建军区会同浙江、江西有关地区，组织了对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股匪的联防会剿。

2 月，剿匪部队又全面展开搜剿残匪的斗争，捕残匪首匪，挖除匪根。匪情严重的福建浦城、泰宁、德化、长汀县所在的军分区，与临近省、县组成 4 个较大的联防区，对参与这一地区剿匪作战的五个团、六个营、十二个连和二十八个县独立营，实行统一指挥，使土匪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287 团 3 连在福建将乐、泰宁两县交界的盖竹洋大山，搜捕主要股匪“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司令廖其祥等匪首时，组织 19 人化装成乡民，翻山越岭，找到匪窝。班长金道漠冲上去堵住洞口，当场击毙外逃的 3 个土匪大队长、1 个中队长，打伤其情报参谋和上校军需参谋。匪首廖其祥被打伤后滚下悬崖逃跑，金道漠和其他战士立即纵身跳下悬崖，奋勇追击。廖其祥在逃跑途中死亡，其他土匪全部被俘虏。事后，华东军区授予金道漠“剿匪模范”称号。我剿匪部队经过 1 月至 3 月的联防会剿，先后歼灭“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 30 多股主要土匪，歼灭匪首 173 人、匪众 2700 多人，基本上肃清了闽、浙、赣三省边沿地区的股匪。为此，毛泽东主席于 1951 年 2 月和 4 月，两次致电嘉勉福建剿匪部队。与此同时，浙江省内的剿匪部队，在 1950 年中，也取得了歼灭土匪 3.6 万多

人的重大战绩。

华东地区剿匪部队的分兵进剿，至1951年6月结束，历时1年零3个月，共歼灭新老土匪11.45万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匪首1637人。股匪被全歼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广大城乡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华东大陆的股匪被剿灭以后，遵照毛泽东主席1951年2月26日关于“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的指示，华东军区于1951年6月确定，肃清残匪的工作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承担，同时发动群众检举匪特，瓦解匪众，消除匪患；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转入整训，并积极配合驻区人民政府清剿残匪。

在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各地仍然采取分区包剿和区间联防的办法，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情报网，配合公安部门，利用一切线索侦破和捕捉残匪。各地还组织化装“飞行组”和武工队，在残匪活动区进行追踪、缉捕。仅浙江省就建立了316个武工队，共计3000多人。由于有严密的联防组织，因此不管残匪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到1953年底，华东全区胜利肃清了陆上残匪，彻底根除了匪患。

第70节 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台湾当局认为时机已到，组织兵力窜犯大陆，海匪武装甘为蒋介石急先锋。

新中国成立初期，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利用朝鲜战争爆发，大陆对外要

支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抗敌，对内要抓紧时机进行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等项刻不容缓的重点工作，海防力量相对薄弱的时机，不断派遣兵力对大陆进行规模不等的登陆窜犯。

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较为集中进攻窜犯的目标，大多在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

其目的主要是，一是牵制我军解放沿海一些尚未解放的岛屿，二是企图夺回被我军解放的远岛、孤岛，以充做“反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由于当时我军在沿海地区防务初步建立，地方政权也刚刚成立，海匪的嚣张气焰没有受到打击，因此，国民党当局频繁派遣兵力对我海防守备部队进行登陆攻击。

如1949年12月下旬我军胜利结束广西战役后不久，1950年1月15日，国民党军即窜犯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半个月前，敌余汉谋部62军的3个师残部曾在此被歼一部，对这股企图“杀回马枪”的国民党军的窜犯，我军守备部队立即调集兵力，给予了狠狠的打击，除副师长陈洪良及160余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

10天后，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又派出以龙谈、龙岩“两龙”为首的“游击队”登陆，结果被我军聚歼于平和、南靖地区，捕获敌少将司令贺少良以下100余人。

3月15日，占据大陈岛的国民党军派出以王相义为首的所谓“浙南突击第一大队”900余人，乘船偷渡，在浙江省温岭县松门地区沿海登陆。发现敌情后，我温州军分区警备6团1营和该县县大队当即组织阻击，击毙击伤其100余人。战斗中，我军增援部队两个团赶到，将这股窜犯之敌打得落花流水，除少部分突围下海逃窜外，大部分被歼灭。

5月13日，由台湾乘船出发的“山东地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104人，在山东省胶南县大珠山地区登陆。他们一踏上大陆，即被百倍警惕的当地军民发觉，不等其站稳脚跟，便受到一阵猛烈火力的“款待”，17人被打死打伤，77人举手投降。

1950年上半年，我东南沿海军民在解放战争获得全面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对不论敌之小股登陆偷袭，还是敌之正规军的大规模武装窜犯，始终坚持了军民联防固守海防前线的作战方针，给登陆窜犯之敌狠狠打击。

1950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台湾当局的一系列军事动向，下达了“加强沿海各区警备，严防匪特登陆”的指示，同时还对敌占岛的国民党军实行“敌占我歼，再占再歼”的作战方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命令第7舰队及第13舰空队进驻台湾。朝鲜战场的复杂局面，使原来担心我军会渡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似乎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们调整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十二个军又六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

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退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年6月2日，浙江披山海匪首领吕渭祥率匪600余人，乘我军驻守部队换防之机，突然登陆对玉环岛坎门镇实施偷袭。

我守岛部队步兵74师220团8连及随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歼灭这股凶悍海匪100余人，其余海匪见我军防守严密，再战恐难脱身，只得仓惶逃往海上溃退。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及海匪的猖狂进攻，我军还多次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将其立足点——被占岛屿一一拿下。

1950年7月12日，我军步兵62师的2个营兵力分乘两艘登陆艇，在4艘炮艇的掩护下，乘敌从披山和一江山岛秘密调遣兵力增防大陈岛之机，利用黑夜渡海，攻上披山岛。此次战斗，我军共歼敌500余人，击沉敌炮艇1艘，缴获炮艇、机帆船各1艘，帆船2只。

这一年的夏季，我军驻浙部队还剿灭北麂岛敌守军600余人，而驻闽部队则进袭了西洋、浮鹰两岛，驻粤部队在进攻中攻占了南鹏岛。

解放军攻防结合的战术，使台湾当局借登陆窜犯扩大其政治影响，配合国际反共势力侵略朝鲜的玩火行动一再受挫。

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年11月20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及充实武器装备，又率800余

众，分兵3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海匪人多势众，气焰嚣张。经激烈战斗，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面对强敌进攻，我军少数兵力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两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七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军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61师183团的两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20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六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180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1951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指示他们要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在我军调整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匪特武装窜扰的形式进犯我边海防地区。

台湾军事当局清楚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不改变打法，最后下场也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他们

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高潮”。

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中为浙江的象山、乐清县和北至福建的惠安县的漫长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我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并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

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

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

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时，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二十三个连队、九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假扮民兵押解俘虏，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国剿军民揭穿其真面目而全部被俘。

“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世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1951年，国民党军事当局小股登陆、小股内窜等袭扰活

动均以惨败而告终。为此，自1952年开始，他们决定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1952年3月28日，驻防大陈岛的胡宗南部1000余人，突然进犯我临海县白沙山岛。该岛守备部队仅有一个排，但战士们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形势下，英勇阻击，毫不畏惧，终于坚持到增援部队赶来，歼敌200余人，保住了这个海防前哨阵地。

1952年6月10日，胡宗南亲自率领所部1200余人，突然袭击我温岭县黄焦岛。在国民党军10倍于我的情况下，驻岛解放军62师186团9连指战员，坚守要点，与进犯之敌激战18小时，并配合增援部队将未来得及上船撤逃的敌军及海匪全部消灭。这一仗，我军以伤亡46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310人的重大战果。

1952年12月14日，我驻福建漳浦县大鳌的某部边防排，在遭到十几倍以上的敌军偷袭中时，打得灵活主动，歼敌100余人，并与增援部队一道展开追击，杀得登陆之敌抱头鼠窜。然而，既然是“以大吃小”，国民党军也的确得手过。

1952年10月11日，驻防金门岛的敌14师和75师各派遣两个团并纠集海匪突击大队，以9000余人的优势兵力，在8架飞机的掩护下，大举进攻我南日岛，我守岛部队的一个连兵

力，面对强敌，激战了一整天，最后因寡不敌众，大部分人员壮烈牺牲，南日岛失守。

10月11日夜间，我增援部队赶到后，立即与占岛敌军展开浴血厮杀，虽毙伤敌数百人，但还是失利。在历时3天的激战中，我军共损失了1300余人。10月13日午夜，敌军害怕我军再度发起攻击，全部撤离南日岛。

战后总结这一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由于主观上轻敌麻痹，事先已得悉敌将进犯，但未及时处置。在敌登陆后，又发生判断错误，指挥不当且增兵数量不足，导致了被敌各个击破。当然，船只不足，通信联络不畅以及沿海地区缺乏机动道路，也是重要原因。

国民党军另外几次得手是袭击我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及雾城等地，使我军和当地群众先后受到一定损失。

“以大吃小”尝到了一点“甜头”之后，台湾当局自以为得计，公开向全世界宣布，1953年将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反攻年”。

1952年12月，国民党军在台湾召开过“战略会议”之后，从次年开始，果真次次使用这种战术。

1953年6月19日夜，胡宗南再度带领1600余名敌兵和海匪，分乘50余艘帆船和机帆船，在9艘炮艇的掩护下，对我羊屿、大小鹿山和鸡山等地区实施突然偷袭。

负责守卫羊屿的我公安50团9连3排和步兵60师野炮连一个班，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顶住了敌人8次冲击，并组织了6次反冲击，始终牢牢地坚守住了该岛的东北角阵地。

守卫小鹿山的我 179 团 1 连，在该岛多次阻击敌人的轮番冲击之后，因主峰阵地被敌占领，只得向大鹿山我军阵地后撤。小鹿山岛失守后，国民党军紧接着向大鹿山发动了 7 次进攻，但均被击退。

小鹿山岛失守后，我军指挥机关要求作战部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一定要坚守住大鹿山和鸡山两岛。并把兵力集中于羊屿岛，待守住该岛后，再抽调部队围歼占据小鹿山岛的敌军。

我增援部队登上羊屿后，很快与原守岛的部队一道将敌击退。

1953 年 6 月 21 日上午，我军从大鹿山向小鹿山发动反击，敌人见无法阻止我军的攻势，竟扔下担任掩护任务的两个排不顾，拔腿开溜。

这次战斗中，我军共歼国民党军及海匪 730 人，击伤敌舰艇 5 艘，击沉船只 12 艘，胜利保卫了这 4 座前沿海岛。

第 71 节 敌“以大吃小”，猛攻东山，我军坚守沿海前哨阵地狠狠打击海匪联合进攻。毛泽东盛赞东山岛之战是“全国的胜利”。

1953 年 7 月 15 日傍晚，敌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璉率国民党军 45 师主力、18 师 53 团和由海匪组成的第一、二突击大队等部，乘着暗夜乘舰艇悄悄出航。解放军福建军区侦悉敌人这一隐秘动态后，当即命令前线海防部队进入战斗准备，以应付敌之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犯。

福建军区第31军领导接到电令后，迅速派步兵91师272团赶赴漳浦旧镇集结待命。

此刻，我驻守东山岛的公安80团1、2营及迫击炮连也奉命进入阵地，岛上八尺门渡口的水兵1团1连，则积极开始输送部队进出岛和转移东山县地方人员出岛。

7月16日拂晓，受胡璉指挥的国民党正规军1万余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向我东山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激烈的战斗从凌晨4点多钟打响，到5点钟左右，进犯的敌军已从东山岛的亲营、白垵、湖尾等几处地方登陆。

金门国民党军部队登陆后，其主力立即兵分两路，向我守岛部队的核心阵地牛犊山和五爹山、公云山实施重点突击，其余兵力则向东山城和陈城方向进攻。

在进攻东山岛之前，敌指挥官胡璉曾作过周密的作战行动部署，决定动用伞兵部队参战，使这场战斗成为真正的“立体战争”。

战斗打响后不久，敌两个伞兵中队在东山岛后侧八尺门渡口附近的后林地区实施空降，妄图切断我军的退路并阻止我增援部队进岛作战。

担负守岛任务的我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在敌大举进犯面前，冷静分析了敌人的进攻态势，根据地形情况，决定指挥部队坚守待援。

游梅耀的作战方案得到了上级指挥机关的同意。第31军领导指示公安80团立即收拢部队，坚决守住岛上的核心阵地。并命令该军272团火速赶往增援。

7月16日晨6时，福建军区命第28军82师及军榴炮团、

军区高炮营等部队立即开赴战区。

当天，中央军委电令驻防广东黄岗地区的解放军第41军122师也北进增援。

东山岛守卫战牵动了福建、广东等大陆地区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心，他们组织车辆、船只、民工和大批物资支前，使我军的增援作战准备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按照我军上级指挥机关的部署，驻守东山岛的公安80团前沿分队，在滩头杀伤部分登陆敌军后，边撤边打，顽强抗击敌军的前进攻势。80团6连1排的一个班在南埔地区炸毁敌两辆水陆坦克后，安全撤回主阵地。这个排的其余战士在回撤途中被敌团团包围，战斗中，副班长黄飞龙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接过重机枪横扫敌群，掩护全排突出险境。子弹打完后，一群敌兵蜂拥而上，准备活捉这名“共军”射手时，他毅然拉响了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亲营地区，1连（欠一排）亦被10倍于己的登陆敌军包围，但为了给主力部队抗击敌人进攻争取时间，他们与围困之敌血战两个多小时，在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的情况下，依然死死地拖住敌军不放。

在港西地区，由东山县武装部长带领的一支民兵队伍，配合80团前沿分队行动，在敌人重兵冲击下，坚守阵地五个小时，直到增援部队赶到。

在东山岛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直到16日上午8点多钟，敌军方才接近公云山、五爹山和牛犊山我军核心阵地的前沿。

敌军从正面向我核心阵地推进的同时，敌伞兵部队也在我后方的八尺门渡口附近实施空降突袭。我军水兵1连在后林村

民兵的支援下，以机枪和步枪组成对空火力网，给敌伞兵以沉重的打击。

敌部分伞兵降落后，抢占了后林西面的一个高地，并组织火力和人员向渡口我水兵1连的阵地进攻。面对敌伞兵的疯狂攻击，我水兵1连顽强地进行了反击，始终将渡口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水兵们深知失去渡口就意味着切断了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条生命线被敌军控制。

由于八尺门渡口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6日上午10时半左右，奉命增援的第31军272团先头赶到的3营迅速登岛，一鼓作气拿下了对渡口安全威胁最大的59.3高地，并于当日下午1时30分在随后登岛的3连的配合下，将敌伞兵部队大部歼灭。

渡口保住了。我增援部队和作战物资源源不断登岛。但是，敌军并未因此而放松对我核心阵地的压力，相反拼命加快了进攻节奏。

16日傍晚，1000余敌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向公云山我军主阵地轮番攻击。守卫在这里的是公安80团2连，在10倍于己的敌军的三面围攻下，坚守堑壕和土木工事，连续打退敌18次冲锋，一直坚持到272团12连援兵赶到，仍继续与敌血战。

公云山战斗，我军这两个连队总共打退登岛国民党军的大小进攻31次，歼敌413人，取得了在该地区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此刻，向我牛犊山进攻的敌军主力部队，尽管曾一度攻占了我前沿地区的部分表面阵地，迫使我军转入坑道内进行抗

击，但却始终没能损伤我核心阵地。而我军 80 团 5 连的一班机枪组，则在战斗中创造了毙伤敌 200 余人，自己却丝毫未损的奇迹。

向五爹山进攻的敌军，其命运也与另两股敌军无二，虽然屡屡发起冲击，但就是无法向前突破。

16 日 23 时，敌指挥机构在三路主力部队进攻均无大的建树的情况下，决定加强兵力，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敌 53 团投入战斗，妄图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 3 处主阵地。

然而，台湾军事当局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7 月 17 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 272 团接替了公安 80 团的阵地，而第 28 军的 82 师和 41 军 122 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了东山岛。

第 41 军 122 师先头团——365 团登岛后，即于凌晨 5 时向五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第 28 军 82 师 244 团登岛后也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建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立刻命令登岛部队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为：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三路出击，最后聚歼登岛之敌于湖尾以西地区。

西路攻击部队由第 41 军 122 师 365 团与 121 师 361 团部队。

由于此方向的国民党军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部队回撤的作战任务，因此凭借险要地势拼死顽抗。

当244团追击到柯塘山时，遇敌两个连兵力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而该山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该团2连2排，两次发起冲锋后，仅剩下能够坚持战斗的9个人。再度攻击时，又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行动。

眼见攻击受阻，这个排的5班长张学栋，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决心与敌血战到底，不顾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端起机枪直扑敌阵，冲到距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张学栋随手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当他艰难向前爬动的时候，敌人的火力点的机枪又响了。这时，伤势严重的他，在手榴弹和机枪子弹全部打光了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面呼喊战友们勇敢冲锋，一面挺立起来，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塘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7月17日下午6点，我军三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和一帮带路的海匪，眼见大势已去，惟恐被我军歼灭，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军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7月17日下午7点，我军保卫东山岛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东山岛战斗，我军共歼国民党及海匪武装3379人，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伤亡、失踪1250人。东山岛战斗结束后，毛泽

东主席指出：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且是全国的胜利。

第 72 节 战舰破浪，海上歼敌，东南沿海岛屿在年轻的人民海军护卫下，海匪就歼，有力保证了共和国海上生产的安全。

除陆上匪情外，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1950 年 5 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 1 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 40 多个岛屿上。在台湾当局的支持和指使下，这些海匪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活动。1949 年 7 月至 1951 年 2 月，海匪在浙江沿海袭扰 507 次，内潜 4700 多人。仅 1951 年，就抢走渔船 110 艘，抓走渔民 800 多人。海匪的破坏活动，给沿海地区的群众安全、海上运输和渔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消灭海匪是我军剿匪作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 年 11 月 11 日，华东军区和三野针对海匪登陆内窜活动日益增多的情况，指示山东、苏北、苏南、浙江和福建等军区，把清剿陆匪和消灭海匪结合起来，分区包歼登陆窜扰的海匪。各沿海地区遵照这一指示，在所属的防区内，以海防警备部队为主，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门、民兵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对登陆海匪予以就地歼灭。从 1950 年夏季至 1952 年底，华东沿海地区军民先后阻歼登陆内窜的大小海匪 370 多股。仅 1951 年 1 月间，全区就击溃和歼灭登陆海匪 120 股，歼灭海匪 1500 多人。1952 年，浙江沿海歼灭登陆海匪 1613 人。

在歼灭登陆海匪的同时，海防巡逻部队和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还在海上展开歼灭海匪的英勇斗争。1951年上半年，海防巡逻部队在海上与海匪作战33次，歼灭海匪369人，俘获匪船26艘。海军剿匪部队在1951年内，单独进行剿匪海战56次，歼灭海匪246人，还配合陆军歼灭海匪298人，击沉、击伤和俘获海匪船52艘。

在消灭海匪的斗争中，华东军区注重主动进剿岛上海匪。1949年11月，华东军区先后派部队进剿浙江沿海的洞头、状元岙、高塘、南田等岛上的海匪。1950年6月，华东军区又命令各海防部队加紧进剿岛上股匪，进剿岛上海匪的斗争随即进入紧张阶段。6月6日至8日，淞沪警备区98师以4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华东军区海军6艘舰艇的配合下，联合进剿长江口外的嵎泗列岛和崎岖群岛的海匪，激战两天，歼灭海匪近1000人。11日和12日，21军186团2个营，在海军炮艇大队配合下进剿披山，歼灭“浙东人民反共救国军瓯江指挥部”及“瓯江总队”480人，其中俘虏海匪指挥官林卓以下410人，毙国民党玉环县县长林森以下70人。在6、7两个月中，华东海防部队共剿灭岛上海匪1100多人，接连解放了10多个岛屿。

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挽回败局，稳住阵脚，1950年10月又采取措施，重新整编浙江沿海海匪，并组织海匪同解放军争夺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的海匪也是这样。由于解放军在这些岛上的守备兵力不多，有的岛屿解放后没有设防，因此浙江和福建沿海的10个岛屿，曾相继被海匪重新夺占。为了打破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海匪争夺岛屿的企图，解放军继续以主力部队进剿岛上海匪。1950年12月，22军190团和193团各一部，

在海军配合下，进剿了南韭山、檀头山岛的股匪，歼灭海匪316人。解放军海防部队还在对一些岛屿的反复争夺中大量歼灭海匪。浙江军区的部队从1950年10月7日开始，先后4次打击袭占洞头岛的国民党军游杂部队和海匪，共歼灭“浙江保安纵队”少将副司令兼“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以下2754人，于1952年1月最后解放了洞头岛。

从1950年6月至1953年年底，华东军区沿海剿匪部队共歼灭海匪7800多人，解放大小岛屿50多个，为保卫海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配合陆军部队打击海匪之外，我年轻的人民海军还单独执行了多次的护航护渔作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卫航运和渔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与海上力量占优势的台湾国民党海军及海匪武装船队，展开了英勇顽强的一系列大小战斗。

1951年6月24日，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巡防大队411、413、414、416号4艘炮艇，为掩护我方3艘运粮船及大批渔船的航行安全，与4艘配备有火炮机枪的国民党军机帆船在白沙山以东海域展开激战，我方炮艇击沉敌船1艘，击伤3艘。

我军在歼灭大批海匪，粉碎国民党部队窜犯大陆阴谋后，坚持保卫海防，与国民党军队和海匪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在大陆剿匪斗争已基本结束后，仍进行了多年。

1954年2月15日，上海海运局“建成”号等4艘货轮在前往浙江海门途中，于猫头洋海域遭台湾海军3艘“永”字号扫雷舰炮击，“建成”号中弹后，被迫抢滩搁浅。16日1时，

我海军台州巡逻艇大队4艘炮艇赶往护航，将1艘攻击“建成”号的敌“永”字号扫雷舰击伤。并于当日下午16时又将另2艘攻击“建成”号的敌扫雷舰驱逐出该海域。

1954年3月18日上午，台湾海军护卫舰1艘、扫雷舰1艘、猎潜舰1艘窜入猫头洋渔场游弋。华东军区海军当即命令舟山基地战舰大队“延安”号和“兴国”号两舰出击，为我方渔业生产护航。我“延安”号舰在战区先敌开火，击伤敌扫雷舰尾部。不久，从大陈岛敌军港又驶来2艘敌护卫舰、1艘炮舰，妄图以优势兵力一举吃掉我方两舰。

我“延安”号舰和“兴国”号舰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向檀头山海域转移。这时，台湾空军出动4架F—47型战斗机对我舰实施轰炸扫射。危急关头，我海军航空兵迅速升空迎战，击落敌机2架，而我军赶往增援的6艘炮艇，也在战斗中击伤敌炮艇1艘、飞机1架。使台湾海军妄图以多胜少的战术遭到失败。

1954年4月20日上午，敌扫雷舰1艘、炮艇1艘，由一江山岛窜至猫头洋渔场，被我巡逻艇大队包围，敌扫雷舰中弹起火后狼狈撤退。

1954年4月28日清晨，我海军“瑞金”号舰、“兴国”号舰与窜扰猫头洋渔场的1艘敌护卫舰展开炮战。上午11时，敌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1艘扫雷舰赶来参战，并形成围攻之势。12时，我军“广州”号和“开封”号2艘护卫舰奉命增援，与另2艘我舰同时开炮轰击敌舰，使敌1艘护卫舰多处中弹。最后敌4舰被迫撤退回敌占岛军港。

1954年5月16日中午，我军“南昌”号等3艘护卫舰为

保卫渔场安全，主动寻找战机，对多次前来袭扰的台湾海军“太和”号护卫舰进行了两次突击，打得敌舰中弹冒烟，不敢再在猫头洋东部海域游窜。而隐蔽在头门山岛海域的我军“瑞金”、“兴国”两舰，也积极与敌一个海上护卫舰编队展开猛烈炮战，击伤其护卫舰1艘、扫雷舰1艘。敌编队在撤离战区东逃时，又与我军4艘炮艇遭遇，经激战，其一艘护卫舰又被我舰击伤。

当日下午，敌派出4架F—47型战斗机在头门山海域上空，向我台州巡逻艇大队的炮艇进行轰炸扫射。该大队当即组织对空火力还击，击伤敌机1架。

1954年5月17日凌晨，我海军“南昌”号等4艘护卫舰，组成一个海上护航编队，在猫头洋渔场南部的东矾山东北海面，截住敌护卫舰1艘、海匪机帆船2艘。双方顿时在海上展开炮战。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击伤敌护卫舰1艘、击沉机帆船1艘，俘获机帆船1艘。使敌海军从此不敢贸然到猫头洋渔场窜扰。

1959年2月2日，我海军海坛水警区护卫艇29大队4中队的565、566、567号3艘护卫艇，在福建省东部的海坛岛附近海域，一举将长期破坏我方渔业生产的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水上行动队63号炮艇击沉，毙敌11人，抓获其少校副队长以下12人。

1960年3月1日，海坛水警区565、566、567号护卫艇，在马刺岛海域再度夺得海战胜利，击沉敌“远征517”号炮艇，毙敌12人，抓获10人。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49年至1961年，我海军水面舰艇

剿匪大纪实

部队共进行护航护渔作战 25 次，共击沉敌艇船 6 艘、击伤 18 艘、缴获各种艇船 17 艘、击毙敌军 54 人、俘虏 220 人。取得了海上护航护渔战斗的一系列胜利。使台湾海军妄图利用海上优势破坏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窜犯沿海岛屿的海上“反攻”美梦彻底破灭。

自从 1962 年上半年台湾当局先后组织多次的大规模武装“反攻大陆”活动遭到失败以后，从 1962 年 10 月开始，又改变方针，以小股武装匪特乘船偷偷登陆对大陆实施破坏捣乱。这些小股特务船只，狡猾地选择我军防守薄弱地点，或乘月黑风高，或利用水浅礁多便于隐蔽，大搞摸哨兵、抓村民、抢财物、毁坏军用设施、速来速去，打了就跑的“两栖突击。”

由于敌匪特船的活动带有隐蔽性和突然性，因此，敌匪特船的袭扰曾在大陆福建、山东沿海地区几次得逞。

为此，海军领导机关向各舰队下达了一系列作战指示，使打击敌匪特船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其中主要战斗有：

南海舰队

1962 年 11 月 1 日、11 月 29 日和 12 月 6 日，先后对受命前往大陆实施“班超”、“海威”、“长风”袭扰活动的武装匪特进行海上打击。击沉敌“M1545F”号、“协进 8”号和“祥顺 1”号等 3 艘匪特船，歼敌 49 人，俘虏上校朱文杰以下 42 人。

1963 年 6 月 21 日深夜，南海舰队在珠江口外大横琴岛以南海面，击沉 1 艘执行代号为“一德计划”的台湾匪特船。

1963 年 11 月 23 日，南海舰队 4 艘护卫艇在广东碣石湾捕获敌“T3166M”号匪特船。

东海舰队

1963年10月24日，温州水警区护卫艇28大队3艘高速护卫艇，在南麂山岛以东海面，对混入渔船群的台湾匪特船“成功1号”进行三次突击，将其击沉。

1964年3月5日，东海舰队护卫艇31大队3艘护卫艇在福建平潭以北海域，捕获敌“成功4”号和1艘匪特船。

1964年4月9日，东海舰队护卫艇32大队556号艇又击沉1艘企图偷渡厦门的“成功”号匪特船。

1964年5月1日，台湾军事情报局派遣“海上突击队”的7艘“海狼艇”，组成两个分队，由东引岛出发，妄图混入渔船群中，以袭击浮鹰岛至飞龙岛航道上的过往船只。此时我军停泊在北礮海域担任警戒的29大队大队长马干率领3艘护卫艇执行作战任务。当日下午6时45分，我军担任警戒任务的2艘护卫艇，与来犯的4艘敌匪特船遭遇并展开海战。我护卫艇当即击伤并捕获其中1艘。

此时，我军3艘作战护卫艇在追击逃窜的3艘敌艇时，与台湾海军前来接应的驱逐舰“丹阳”号、猎潜舰“北江”号相遇，双方又展开炮战，在我军紧追不舍的打击下，在东引岛附近海域又击沉2艘敌匪特艇。

1964年7月8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派遣51名匪特，将分乘的“满庆盛”、“满庆升”号匪特船伪装成日本渔轮，准备偷袭江苏的吕四港。东海舰队派出2艘护卫舰、2艘扫雷舰奔赴作战海区。11日晚上23时，我护卫舰“衡阳”号发现“满庆盛”号，开炮将其打成重伤，该船被迫投降，但因船体受伤严重，在拖带途中沉没。与此同时，我扫雷舰“沙家店”

剿匪大纪实

号发现了“满庆升”号，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开炮将其击沉。这次干净利索的打击敌匪特船行动，击毙敌少校大队长以下8人，俘虏副大队长以下72人。

1964年7月11日晚，台湾情报局的“大金1”号和“大金2”号特务船，悬挂英国国旗，并分别改名为“欧渔1”号和“欧渔2”号渔轮，搭载45名匪特和29名船员，由南越的岬港驶返台湾。

我海军驻海南榆林基地派出以基地副司令员田松指挥的3个海上突击艇群前往拦截阻击。12日下午，我突击艇群捕捉到目标，识别清楚后，当即对这2艘匪特船进行攻击。战斗中，我军“扬州”号猎潜艇和538号护卫艇勇创敌船，使2艘伪装成英国船的台湾匪特船被击沉，歼敌少校指挥官以下14人，抓获敌特60人。

1964年11月18日，台湾海军3艘匪特艇拖带着1艘装有200公斤炸药的“爆破艇”，由马祖岛朝黄岐半岛航行，准备在碰上我军舰艇时，将其引爆，以吸引我军舰艇火力，然后乘机攻击。东海舰队2艘护卫艇突然切断敌艇后路，并毫不理会被引爆的“爆破艇”，对高速外逃的敌匪特艇一路穷追猛打，击沉其中1艘。

北海舰队

1964年6月1日，台湾情报局派遣16名武装匪特，从南朝鲜鹿岛出发，分乘“海兴51”号和“海兴52”号特务船偷袭我山东莫邪岛，遭我北海舰队派出的作战艇打击，在被击毙1人打伤多人后，被迫撤退。

据资料统计，1962年至1965年7月，我海军部队全歼敌

海上袭扰匪特 47 股、歼灭和击溃 13 股，共击沉匪特船 9 艘，“海狼艇” 3 艘、胶舟 6 只，缴获匪特船 7 艘、“海狼艇” 2 艘、胶舟等小型简易运载工具 11 只，击毙敌匪 100 人，俘虏 316 人。

附录

西北地区剿匪大事记

新疆

1949 年

9月28日21时至29日晨6时 驻哈密原国民党178旅533团、供应三局、边卡大队部分官兵，在特务、反动军官的煽动下，抢劫了中央银行哈密分行金库和民宅，抢去金银12箱，其中银元9102块，镍币60183元以及由兰州运来的黄金1.6万两，手枪4枝，汽车1辆，街道、商店和居民遍遭洗劫。事件发生后，陶峙岳于30日派警备总部政工处专员王德淦，会同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贾锐庭，人事室主任努斯热提等乘机前往哈密调查处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参谋长张希钦后奉命到哈密，组织第2军、6军先到哈密的指战员，将叛乱部队包围，解除武装，追回被抢黄金近万两。

10月4日 驻焉耆原国民党128旅部分士兵在李参谋和连长阎守华等人煽动下，进行武装抢劫，打死12人，30多家商铺和100多户家院被抢光、烧毁。和静县驻军骑兵团长昌生祥

于15日率领炮兵开进焉耆，制止叛兵抢劫。

10月6日 驻库车原国民党整编42师65旅骑兵团、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挽马3团团直1营部分官兵，在骑兵团副团长郭璧田、警察局长宋焕章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在库车大肆抢劫、烧杀，共抢649户，抢走黄金1027两，银器4927两，元宝79个，银元246块，各种绸缎7000多匹，服装4000多件，毡毯被褥2000多床；打死32人，打伤98人，烧房屋400多间。后由旅部派人会同该团团长刘承绪前去制止，将被劫财物送归原主，对受害群众给以救济和抚慰，并严惩了首恶分子。

10月7日 驻吐鲁番原国民党65旅194团1营营长李先锋胁迫两连官兵乘汽车到库米什一带，声言要到若羌的大山中打“游击”。后经驻焉耆的128旅王守智营堵截，大部返回，少数逃向博斯腾湖地区，为首分子李先锋被军法组抓获。

10月14日 驻乌什的国民党193团1营3连上士班长马连副率领武装士兵7人上街抢劫，经营长康庆福派军警监视劝阻，才得以平息。

10月15~18日 国民党驻轮台128旅382团的六个连，在团长杨升桂、情报主任王守仁和勤务连长柳建民的策划、煽动下，连续数天进行抢劫活动，先后烧死、活埋无辜群众23人，打伤、烧伤150多人，不少妇女被奸污。抢劫财物有元宝200多个，羊5000多只，牛600多头，马500多匹。解放军4师来轮台后，立即将叛乱部队解除武装，追查首恶分子，追回被抢的大部分财物，归还群众。

10月16日 解放军2军4师12团快到鄯善时，县长司马义带领群众准备出城欢迎解放军，被驻该地起义部队194团3

营营长丁少斋和副营长陈明带领的一伙叛兵开枪打死，并焚烧房子，进行抢劫。我2军4师12团在副师长吴子杰率领下，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将叛兵包围缴械，逮捕了营长丁少斋等4名主犯，派人救火安民，惩治肇事的犯罪分子。

11月18日 驻哈密七角井原国民党178旅533团两个营，将解放军东返兵车40辆劫至哈密，把押车的14名干部战士杀害，连夜构筑工事，图谋叛乱。24日晚，解放军以五个营兵力将其包围缴械，主犯予以惩处。

11月19日 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自新疆经甘肃逃至青海海西其满，鼓动当地哈萨克头人胡赛音发动武装叛乱，并在其满、阿克其两处勘测地形，计划修筑一个飞机场。胡赛音又派人绘制从镇西到甘肃、青海和取道西藏逃往巴基斯坦的路线，交马克南使用。12月17日，胡赛音派人护送马克南取道西藏去国外，在进入西藏途中，与当地部队发生枪战，马克南当场被乱枪打死。

11月23日 为争取乌斯满，王震派进疆人民解放军随军工作团团长艾买提·瓦吉地、副团长吴剑锋率扎里甫、乌布尔阿吉等哈密地区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携带着自己给乌斯满的信和礼物，从哈密前往镇西八墙子乌斯满部驻地，向他介绍了我军和平解放新疆的各项政策，并表示只要乌斯满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有很好的安排。乌斯满给王震回信以示感谢，并派代表库尔班巴图尔来哈与王震见面。半月后，乌斯满又派其弟卡那提巴依到迪化商议，受到王震的热情款待。

11月29日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国民党残余匪帮逃往国外越南等地问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窜逃匪军，

持有过问权力；容留匪军的任何国家政府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12月9日 驻镇西原国民党第78师178旅骑兵团三个连的官兵，在中尉排长王振华的煽动下发动兵变。他们枪杀1连连长，抢劫群众财物。事后，王震电示该旅新任旅长刘抡元到该地迅速查处。经劝说，叛兵归队，事态平息。

12月22日 新疆和阗副专员王肇智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00多人，组织“大土耳其共和国”，胁迫群众3800多人，成立“大头棒队”，准备血洗和阗，赶走解放军。一兵团2军5师15团神速进驻该城，匪乱得到平息，社会秩序初步安定。

12月31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在已经推翻了敌人的统治的地方，应当肃清土匪、特务分子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建立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1950年

1月13日 原沙湾县长哈里伯克胁迫哈萨克牧民1000多人从景化、迪化南山逃至和硕、库米什一带，并在前往若羌途中伏击解放军骑兵团，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解放军战士20多名。

1月14日 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决定第6师第18团及27师昌生祥团，由6师师长张仲瀚和27师师长陈俊统一指挥，

务必歼灭流窜于和硕、库米什一带的哈里伯克股匪。

2月5日 乌斯满趁我人民解放军忙于地方建党、建政、生产；整编起义部队之机，勾结国民党起义部队骑兵第7师内的一些反动军官，蒙骗、裹胁两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在奇台至镇西一带，突然发动武装叛乱。

3月5日 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指示，新疆军区组建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王震，参谋长张希钦，6军军长罗元发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剿匪的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股匪和骑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

3月5~25日 新疆军区派出16师46、47、48团及师直一部，步兵17师49团二个营、51团一个营，6军骑兵团，5军14团，战车第5团一个营等，共1.1万多人，出动了战车41辆，汽车200辆，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乌、尧股匪的战斗。

3月5~26日 国民党起义部队7师20团大部，19团、21团、师直各一部、26师骑兵团全部，共2000多人，在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等人的策动下，在昌吉、阜康、奇台、木垒河一带相继发动武装叛乱。驻木垒河县的两个连叛军，杀害我军派去的两名指导员。25日，罗元发军长命令17师副师长农学凯率49团一个加强营、51团3营，在战车团的配合下围歼这股叛军，经4次战斗，归降、俘虏、毙伤1200名，小部分逃散，另约600人投向乌斯满。

3月7日 新疆军区发布关于平定骑7师叛变事件的命

令，决定派6军陈海涵参谋长、17师袁学凯副师长统一指挥部队，平定驶昌吉之骑7师第20团四个骑兵连的叛乱。

3月12日 王震电令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派部队配合3军9师围剿甘肃马鬃山一带的土匪。

3月13日 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决定以6军两个连、5军一个连的兵力，统由6军炮工团政委张兴华指挥，向永丰渠、小渠子、白杨沟、大西沟、庙尔沟地区进剿发动叛乱的骑师20团第4连。

△中央军委电示一野指出：“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

△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

3月16日 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命骑7师20团代团长统士良、政委齐俊德、战5团政教王辉统一指挥昌吉的剿匪战斗。

△王震拟订围剿乌斯满作战计划，决定剿匪部队统归第6军军长罗元发指挥，战车团长胡鉴为参谋长，指挥所设在奇台。

3月19日晨 尧乐博斯带小老婆廖咏秋、儿子尧道宏、尧道明和秘书程仲实、副官司马益等11人，带长短枪11枝，分乘两辆小吉普车，叛逃至镇西橙槽沟。21日，窜到布尔泰（锅底山）和乌斯满、贾尼木汗等会合。

3月20日 16师46团2连由副营长胡青山带领进驻伊吾开荒生产，被尧乐博斯匪部包围，使2连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孤军奋战，英勇地坚守伊吾43天，击退敌人7次大规模进攻。5月3日，任书田率领46团的两个营、司马义诺夫率

5军40团3营前往增援，7日与2连会师，伊吾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战后，二连荣获“钢铁2连”称号，胡青山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5月19日，彭德怀特发来嘉勉电对2连指战员在伊吾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赞扬。

3月23日 为配合奇台以西6军17师等剿匪部队的行动，5军40团主力在团长玉素甫夫的领导下，从迪化出发，25日到奇台，直奔大、小红柳峡、黑山头（纸房）一线，与17师部队协同剿匪，击溃土匪400多人。5军40团3营（欠九连）奉命改编为骑兵两个连，在营长司马义诺夫、教导员伊拉洪的带领下，在镇西也参加了这次围剿战斗。

3月25日 国民党部队起义后改编成为的26师77团与骑7师特务营300多名官兵，在新疆木垒河叛变。在距县城10多里的新沟、50多里的白杨沟抢劫群众马80匹、枪8枝。事发后，师长韩有文等人星夜赶到县城联系驻军3连、4连堵击。经教育，次日，叛军从白杨沟全部归营。抢劫群众的财物，如数退回。

3月25日 17师副师长袁学凯率军分兵三路，以迂回包围的战术，在甘河子一带一举歼灭400多名叛军。

4月1日 贾尼木汗、乌斯满派匪40多人到七角井偷袭我军汽车。6军16师副师长罗少伟率5人乘小吉普车在七角井车轱辘泉隘路遭匪突袭，车上乘座的32岁的副师长罗少伟、机要秘书李玉庆、参谋马玉章、报务员宋万成、警卫员杨状元等5人牺牲。

4月3日 以乌斯满、尧乐博斯为首的股匪及叛兵3600多

人，步枪 1900 多枝，轻机枪 30 挺，六 0 炮 8 门，分散在伊吾、沁城、镇西南北山区。乌、尧匪首扎营于镇西西北大、小红柳峡地区。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向乌、尧匪巢大、小红柳峡围剿，取得胜利。

△孚远县红帮头子谭贵，暗中串通奇台县安岐峰，阜康县傅凤歧，勾结骑 7 师反对起义的机枪连连长冶生林和辎重连长马占林，还纠集 42 名叛匪，于夜半偷袭孚远县城，砸监狱放犯人，抢劫财物，并打伤孚远县工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委员副主席贾俊德，后潜入山中。4 月 13 日，被人民解放军 49 团击溃。

4 月初 尧乐博斯叛逃镇西后，与乌斯满、贾尼木汗，扫唐·谢力甫等数十人在塔尔苏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武装叛乱。随后，又成立了“哈萨克自治政府”，贾尼木汗为主席，乌斯满为总司令。

4 月 4 日 驻哈密人民解放军 48 团组织七个排的兵力共 269 人，由该团参谋长王稷如率领去解围伊吾。9 日到达离伊吾 6 公里处，王轻信向导报告的“匪情”，即令部队返沁城，沿途昼夜遭匪伏击 9 次，损失严重。

4 月 13 日 安岐峰与冶生林、马占林集结于奇台，成立所谓“人民革命骑五军”，将匪众编为一个团，共有匪众约 300 人，由马占林任总指挥，安岐峰任参谋长，冶生林任团长，开始攻打奇台县城。人民解放军驻城内官兵经过 4 小时的奋勇还击，击溃了敌人，保卫了奇台县城。

4 月中旬 胡尔曼等召集所属匪徒在塔木那克誓师反共，派匪徒到哈密南山口袭击解放军，破坏沿途电线、桥梁。与此

同时，加那布里等指挥匪数百人在哈密沁城至伊吾一带多次袭击解放军。

4月14~15日 剿匪部队全部占领乌斯满、尧乐博斯股匪匪巢大红柳峡，击溃匪主力400多人。

4月19日 新疆军区发布剿匪作战的预备命令。该命令决定6军16师主力集结镇西、哈密，17师剿匪部队由袁学凯副师长指挥，集结奇台——大石头线，以准备对乌、尧股匪的下一次围剿战役。

4月26日 新疆焉吉驻军79团7连、9连300多名官兵在薄如林（3营营长）、蒋鸣皋（9连副连长）的煽动下叛乱。经派兵包围、教育，大部劝回营房，少数外逃为匪。

4月29日 新疆军区发布追剿乌、尧股匪的作战命令。决定5月中旬追剿乌、尧股匪，剿匪部队统归6军罗元发军长，战车团胡鉴团长指挥，指挥所设哈密。镇西三塘湖地区各部队由16师吴宗先师长统一指挥，奇木线部队统由17师程悦长师长指挥。

5月初 胡尔曼等指挥匪徒协助尧匪在镇西县西遥泉、红山嘴、伊吾县达子沟一带袭击解放军。

5月14日 剿匪部队兵分三路向乌匪盘踞的黑山头、花儿茨、红柳峡地区实行第二次围剿。是役毙匪165人，俘乌匪秘书海来依以下846人，归降46人，解救了胁迫牧民约1.4万人。残匪乘隙窜向北塔山地区。

5月24日 西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新疆剿匪部队已分别攻占乌、尧股匪巢大、小红柳峡，受胁迫的万余名哈萨克族同胞均脱离乌尧股匪归向人民政府。

剿匪大纪实

6月1日 《新疆日报》报道，剿灭乌匪第二次战役自5月17日至23日止，已胜利结束。毙俘乌匪800人，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万余哈萨克族同胞觉悟来归。

6月2~5日在北塔山、板房沟和八大石追歼堵击的剿匪部队，冒着风雨穿过积雪没膝的深垒，一举攻占北塔山最高峰沙哈特，有400余顶帐篷归向政府。尧匪向哈密以东的孔都罗山窜去。

6月10日 扫唐·谢力甫、加那布里组织第二次武装叛乱，裹胁哈萨克族牧民160多户投奔尧乐博斯、乌斯满、贾尼木汗匪部。

6月14日 乌匪在苦水泉被打击后，参谋长哈拿提巴依，团长库尔班等亲信率部70多人向人民政府投降。

6月15日 新疆军区发布剿匪战报：宣布新疆剿匪部队自3月份东、西两路钳击乌斯满、尧乐博斯残余股匪后，其西线骑兵已沿北塔山一带向西清剿乌斯满残余匪徒，并在黑山头以东扫清了曾在七角井一带进行破坏的哈巴斯股匪。至此，又有受叛匪胁迫的2000名哈萨克族同胞获得解放。

6月28日 哈里伯克股匪流窜到且末九个达坂、沙依山一带，杀害牧民10人，抢走马、牛、羊等牲畜。

7月1日 46团4连、7连在镇西三、四道白杨沟围歼乌、尧叛匪，活捉匪首贾尼木汗。

7月5日 《新疆日报》报道，新疆军区司令部发表自3月5日起平叛剿匪以来截止6月25日剿匪总结战报。战报指出毙伤俘匪4700余名，争取10余部落来归，解放哈萨克族同胞1.6万余人。

7月22日 彭德怀就新疆军区剿匪部署致电中央军委，电文指出为防止迪化南山乌拉孜拜股匪经焉耆、库米什一带南窜甘新青藏边界地区与哈里伯克、胡赛音会合，焉耆方面应派部队在库米什一带堵击，迪化方面则应准备进剿准备叛乱的乌拉孜拜股匪。

7月24日 5军警卫营1排排长热合满诺夫纠集反动分子在伊宁秘密串连，发展成员，发动武装叛乱，扬言要打惠远城。8月17日，当地驻军奉命前去围剿，俘114名暴乱分子，反革命暴乱被平息。

7月25日 新疆军区发布乌匪逃甘、新边境后，有关剿匪任务的命令，要求迪化军区应不惜疲劳将乌斯满、尧乐博斯追捕归案，彻底肃清残匪，巩固甘新交通。同时准备对乌拉孜拜股匪实行进剿。驻若羌、且末部队则做好对胡赛音、哈里伯克股匪的追剿准备工作，随时协同青海、甘肃部队实行围剿。

7月26日 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并中央，提出乌拉孜拜股匪经我多方争取无效后，已组织兵力将于29日进剿，以争取大多数哈萨克族人民脱离反动头目，归向人民政府。

7月28日 6师骑兵团3营发现该团阿拉尔牧场遭胡赛音、哈里伯克等股匪抢劫，奉命投入追剿股匪的战斗，历时6天，于8月2日胜利结束。

7月底 乌斯满等股匪逃到甘肃敦煌，大肆抢劫。

8月3日 在迪化南山地区，以及昌吉、景化、绥来、吐鲁番、托克逊、焉耆以北的天山南北地区，又发生了景化县副县长乌拉孜拜、迪化自卫队大队长司迪克及副乡长瓦里纠集叛兵、叛匪发起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活动。他们以迪化南山为巢

穴，先后在各地抢劫公私马匹千余匹，牛、羊万余匹（只），杀害群众10多名，激起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愤慨。为保护人民利益，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命令进剿，调集9军26师一个营为右路；以6军骑兵团两个连、骑20团一个连为左路；以6军炮工团的两个步兵连、17师51团一个营为中路，共有1400多人，在景化、昌吉、绥来三地区分三路剿匪大军，于是日上午合围三道马场。匪首乌拉孜拜向城西沟方向流窜，军骑兵团4连、骑20团2连跟踪追击，初战告捷，被裹胁的9000人归向人民政府。

8月18日 以伊的利斯为首的230多人在昭苏叛乱，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平定。

9月4日 胡赛音派人将逃至青海的尧乐博斯等护送到青、藏交界处的克热盖那塔斯地方。1951年4月，尧乐博斯进入印度控制下的拉达克，不久便逃往台湾。

9月15日 《新疆日报》报道，新疆军区司令部发表战报，公布迪化南山剿匪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6日期间毙匪69名，俘匪700余人，向我投降者3000余人，帐房1000余顶，牛、马、羊、驼4.2万余只。

10月12日 驻新疆乌什193团3连给养员马连福伙同马连生等14名战士哗变，抢劫群众衣物首饰等。18日，马连福被就地正法，何占元等6人被判处3年徒刑。

11月20日 新疆军区人民军事法庭公审煽动与组织骑5师一部武装叛乱的马占林、冶生林等6名首恶分子。经当庭审判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1月30日 为争取在严冬前歼灭乌拉孜拜股匪，剿匪部

队追匪于淤泥泉以北地区，形成严密的包围，使匪难于活动，经政治争取，匪首派代表携降书于11月21日来淤泥泉与我军洽谈。乌拉孜拜、司迪克等匪首127人在哈萨寺向我投降。

12月7日 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签发进剿胡赛音、哈里伯克、乌斯满等残匪的命令。决定对胡赛音、哈里伯克、乌斯满等股匪，由新疆军区进至铁木里克之部队及青海1军、甘肃3军各组织600人左右骑兵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合击围剿，由3军军长黄新廷指挥，并务必在1951年1月底前完成围剿准备工作。

1951年

1月1日 《新疆日报》报道，新疆军区发布1950年一年来剿匪作战战绩的公报。一年来，共毙、伤、俘、降匪13566人，解救奇台、木垒河、镇西、哈密、阿山、福海、沙湾、迪化、昌吉、景化、绥来等地广大山区哈萨克族同胞11.6万余人。

1月29日 为围剿哈里伯克、胡赛音股匪，2军6师步兵一个营和骑兵一个营共1331人，附战车7辆、山炮1门、八二炮4门及运输汽车129辆，在剿指（3军黄新廷军长）统一指挥下，联合清剿。部队从若羌出发，在巴什考供集结后，分两路向铁木里克进剿。因气候骤变，致使部队冻死战士1名，冻伤137名。哈里伯克匪部逃往他处，会剿部队返回原地。

2月4日 新疆省人民法院组织临时人民法庭，公审匪首贾尼木汗。在公审大会上，各族代表和被害人家属纷纷控拆贾

剿匪大纪实

尼木汗血腥罪行。经公审后，法庭判处匪首贾尼木汗死刑，立即执行。

2月5日 鉴于盘踞甘、青、新交界之海子地区的新疆乌斯满、加那布里等8股土匪2210人；安南坝地区哈巴斯、毕善禄、铁有才等3股土匪250人；台吉乃尔地区的胡赛音等8股土匪1620人；杂斯、库兹塔什地区的哈里伯克等匪300多人，总计土匪20股、4380人（内有战斗力者1450多人），经常骚扰抢劫，待机逃窜西藏，西北军区调动第1军、2军、3军、4军的二十五个骑（步）连队，附战车多辆，于本日开始进剿，到3月24日胜利结束。经48天的英勇战斗，该地匪患基本平息。是役，计歼匪特1453余人，其中俘虏乌斯满、哈巴斯等694人，毙伤匪副司令加那布里以下39人，投诚720人。

2月29日 奇台县人民法庭开庭公审组织反动武装、勾结叛兵进行烧杀抢劫奇、孚、木三县各族人民的反革命叛乱案。当庭将罪大恶极匪首安岐峰、高天才、张富贵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月 为进一步巩固社会治安，从本月开始，迪化军区部署收缴东疆地区散落民间的武器工作。其中6军负责哈密镇西、伊吾3县；6军17师负责阜康、孚远、木垒河、奇台等4县；迪化军分区负责迪化、乾德、昌吉、绥来、景化等5县。到6月底。共收缴步、马枪4026枝、冲锋枪5枝、手枪71枝、轻机枪6挺、手榴弹661枚、各种子弹100483发、电台1部。

3月1日 2军6师骑兵团3营（除一个步兵连外）及战车23辆，沿青、新公路配合兄弟部队会剿盘踞在台吉努尔地

区的胡赛音股匪。

3月5日 新疆军区发出关于进剿谢尔德曼股匪的命令，决定着蔡福堂任北疆剿匪前线司令员兼政委，王树林任副司令员，率部队对谢尔德曼股匪进行追剿。

3月19日 新疆省人民法院组织临时人民法庭，公审司迪克、布仑加甫等4匪首。在公审会上，省、市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纷纷控拆匪徒们的滔天罪行。最后，依法判处司迪克、布仑加甫等4匪首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3月20日 新疆省人民法院在景化县城组织临时人民法院对匪首乌拉孜拜进行公审，各族人民控诉了乌拉孜拜股匪惨杀人民的血腥罪行，最后法庭依法判处乌拉孜拜死刑，执行枪决。

4月6日 6军骑兵团组织一个加强连，精选壮驼50峰，共105名战士，配电台1部，携带两个月的给养及防寒装备，由胡参谋长率领向孟卜拉克挺进，继续追剿哈里伯克股匪。

4月7日 《新疆日报》刊登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新疆省人民政府1950年工作总结及1951年的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对新疆一年来的剿匪肃特工作进行了总结：“摧毁了六个特务组织系统，一个潜伏站、七个潜伏组，逮捕继续作恶的匪特反革命分子369名，破获反革命案件66起，经人民司法机关依法分别处理了31起、共212人。各地共登记职业特务879名，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收缴及破获匪特武器计轻机枪4挺、长短枪531枝、炸药7箱、电台8部。”“在城市有重点、有步骤地建立起1730个治安小组，防匪盗窃，保卫生产。”

剿匪大纪实

4月19日 《新疆日报》发表题为“陶峙岳将军发表谈话”的消息。消息称：“新疆军区军法处接受广大革命士兵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要求，于3月20日在迪化判处首要反革命分子李祖唐、陈公辅、许进贤等12人死刑，并于同日执行枪决。”对此，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在谈话中说：“这些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顽固到底，不肯觉悟，继续公开或隐匿地进行破坏活动，坚决与人民为敌，其罪恶深为人民群众所痛恨。对于这些决心作恶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只有坚决予以镇压。”

4月29日 新疆省人民法院在迪化组织各族各界人民临时审判委员会，对匪首乌斯满等进行公审，依法判处乌斯满死刑，执行枪决。参加公审大会的8万余人对这一正义判决莫不欢呼称快。

5月1日 6军骑兵团以侦察排全部及9连6人，共计25人，配驼25峰，轻机枪1挺，携带20天给养，由9连连长王永明率领进剿潜伏于库孜尔塔什马五宗股匪，除匪首逃跑外，余匪归向人民政府。

5月6日 鉴于原流窜于青新交界一带的哈里伯克股匪逃往西藏阿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2团安志明副团长率280多人的侦察队由于阗出发，经长途跋涉，于28日到达阿里扎麻芒保。7月16日，该师2团1营营长贺景富率160多人的加强连由于阗出发赴阿里。7月底，在改则县岗龙附近一带击溃哈里伯克股匪。

5月初 胡赛音和扫唐·谢力甫率领亲信逃往克什米尔。

乌斯满之子谢尔德曼率残部由青海经甘肃安西潜回新疆镇

西县北山，继续进行叛乱活动。

5月20日 伊吾县各区群众代表300多名在县公安局大院内举行公审乌、尧匪首的忠实走狗、伊吾县叛乱匪首伊建中、李树贤等5名匪特大会，会后执行枪决。

5月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国外敌对势力派遣特务偷越我国国界，进至蒲犁大布达附近实施侦察，绑架和杀害数名边防战士。新疆军区命令守卫该地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在关隘、要道设兵伏击，捕获了数名越境特务，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6月6日 驻奇台49团1营、51团两个连分头向奇台、阜康南山进剿哈那提巴依、谢尔德曼等股匪，在木底沟以南地区将匪击溃。

7月14日 中央军委就新疆剿匪工作电示西北军区，指出胡赛音、哈里伯克等股匪不仅是专事破坏生产的流寇，而且到处杀人越货，实际上已成为西北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如果这些匪徒一旦与英国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取得联系，则危害更大。因此，考虑组织联合指挥部，以统一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边境剿匪的指挥。

8月上旬 为剿灭逃窜到阿山的谢尔德曼股匪，新疆军区决定步兵第16师、17师两个师组成4个步兵支队，组织第5军驻承化（今阿勒泰市）的骑兵第1团，迪化的步兵40团和步兵第25师、第26师各组成一个骑兵支队，共4658人，前后出动战车24辆，军马2096匹，民马1877匹、军驼440峰，汽车74辆，对该匪实施进剿。

8月下旬 为剿灭窜到西藏阿里的哈里伯克股匪，阿里剿

剿匪大纪实

匪指挥部在日土宗成立，安志明、贺景福任正副总指挥。

9月22日 中央电示王震：哈里伯克股匪200余人盘踞班古鲁（班公湖），离印度边境1华里左右，在不利股匪的情况下，必退入印度，并可能企图诱我军越境引起中印纠纷。因此，在无绝对把握围歼该匪而又不致超越国境的条件下，以暂时监视该匪为妥。但不管进行围歼与否，安志明必须再行通知毛力度那印度军队，告以哈匪如越境逃入印度，我军不会越境追击，但印度军队必须解除哈匪全部武装加以拘留，否则，对中印两国边境和平关系甚为不利。

9月27日 由青、新、甘窜到藏北班古鲁的哈里伯克、胡赛音残匪200余人，继续杀戮藏区同胞。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阿里剿匪指挥部在围歼土匪前，及时将这个情况通知印度边防哨卡。战斗中，我毙匪95人，俘1人，缴获牛、羊、驴14600头（只）。余匪90多人逃往印度。

9月底 谢尔德曼匪帮与惯匪哈那提巴依等联合，形成了一支拥有300多名骨干和800多名胁从的叛乱武装。在奇台、孚远、木垒、镇西一带山区以及奇台东南之大西沟、平顶山等地大肆进行抢劫活动。

10月13日 新疆军区发布关于追击哈那提巴依、谢尔德曼股匪的命令。迪化军区发布彻底歼灭谢匪之部署和命令：由17师师长程悦长、阿山分区副司令员震东统一指挥部队追剿。

10月28日 伊犁塔里木、马立克胁迫群众170多人在巩留县发动叛乱，抢劫解放军27师羊场，杀死巩留莫合吉尔尕郎农会主任，袭击公安派出所，南窜天山。2军奉命以5师13团一个营参加剿匪，在300多名各族群众的配合下，历时约一

个月，取得了胜利。其中俘塔里木匪首以下 140 多人，20 多名残匪被驻拜城部队全歼。

11 月 10 日 新疆军区发出《关于当前新疆军区部队剿匪工作上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股匪被我进剿，亡命奔逃，有的已逃到中印边境，有的可能逃到中蒙边境，不论是哪个国家，也不论是什么政体，我们都必须弄清情况，具实报告，所有涉及国际外交问题，凡事都要履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得擅自处理，都要严守国境，不能自行越境。”

11 月上旬 胡尔曼匪部窜到阿山地区，指挥匪徒 80 多名，抢劫驼商和可可托海贸易公司流动供销组以及附近牧民的牲畜。在可可托海还偷袭解放军，杀害战士多名，劫枪 30 多枝。本月中旬，胡尔曼匪帮又派匪骑 100 余，偷袭青河附近的解放军，并打进该县，火烧粮食仓库，劫狱放走犯人。

12 月中旬 胡尔曼又从奇台西窜，经阜康到阿勒泰，沿途大肆抢掠。本月下旬，解放军将胡尔曼匪帮包围在阿勒泰。匪顽抗乱窜。

1952 年

1 月中旬 胡尔曼等匪帮从阿勒泰回窜，经奇台到镇西，在镇西西山、青居吕山、北山一带流窜，继续顽抗。

3 月 3 日 大土耳其主义分子阿克不拜合如、艾尼巴图尔、阿不都拉大毛拉、阿不都拉等人，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党”，设三个大组，分散在巩留、巩哈、昭苏、特克斯 4 县活动。阴谋进行武装叛乱。是日，匪首召集 30 多人开会，被当

地驻军和公安机关侦破，全部逮捕归案。

4月17日 新疆吐鲁番、鄯善的封建恶霸地主艾木吐阿吉、阿不都拉哈满聚众90多人叛乱，烧毁乡长房屋，劫持1辆汽车，打死群众7人、伤8人，抢群众马91匹、羊40只、骆驼15峰。当地驻军与公安机关清剿，俘虏60人，余匪潜逃。

4月21日 新疆木垒河县帮会头子潘相太，反动分子马汗轩（税务局长）和特务分子安旭东，网罗特务、帮会、流氓及潜伏在人民政府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共25人，暗杀积极分子张振华、裹胁群众多人，企图攻打县政府，冲击监狱放出犯人。破案后，人民政府专政机关逮捕组长以上11人。

5月6日 谢尔德曼残匪从奇台、木垒河窜回阿山库尔图、苏布图草原，以保护宗教为名，成立了“宗教军”，煽动胡尔满部落哈萨克族约2000人掀起武装叛乱。13日，谢尔德曼在沙尔布拉克伏击人民解放军20团送马部队，抢走军马113匹。匪徒还派特务扎依布扎巴依，佯装为我军带路，将驻守在富蕴的五军骑兵独立团1营1连40多人诱至塔木拜勒其尔北面的山沟中杀害，并将其连长叶塞提巴塔拉打死，投入库尔图河。是月中旬谢尔德曼又出动匪徒400多人，突然包围了守卫库尔矿的解放军第21团4连。4连60多名指战员连续9次打退匪徒进攻。

5月中旬 阿山军分区根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关于“阿山军分区对匪进行军事进剿，并在进剿中做好政治争取工作”的指示，成立剿匪指挥部，军分区司令员何家产任总指挥。抽调搞生产的骑7师十五个连队和原北疆剿指部队三个连队共

1600人，组成了3个骑兵支队，对谢尔德曼股匪进行清剿。经过3个月的30多次战斗，计歼匪2539人，沉重打击了谢尔德曼股匪。

7月 据新疆军区司令部统计，1月25日至6月26日，在和硕、若羌、和靖、且末、承化、富蕴、哈密、红柳园、盐池、星星峡、伊吾、镇西等12个县区，零星土匪268人抢劫28次，干部亡8人、伤1人；群众亡15人、伤2人；抢去马651匹、牛21头、羊11008只。

9月5日 鉴于谢尔德曼股匪已遭重创，又被包围。阿山专署和军分区组成与谢尔德曼谈判代表团。团长阿布都热合曼（副专员），成员有傅恒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桑斯拜（专署公安处长）、沙德瓦阿斯毛拉（宗教上层人士）、瓦黑提台吉（民族上层人士）。7日，政府代表团带着各界人士联合写给叛匪的劝降信，来到沙尔布拉克，见匪方代表胡尔曼、尼合买都拉等，宣传了党的政策和转达了杨烈光政委的招降意见。9日，代表团成员桑斯拜、沙德瓦阿斯、瓦黑提一同前往谢尔德曼处。谢表示愿降，同时提出了八条要求。阿副专员原则上作了答复。14日，阿山专区又派出慰问团带着500公斤面粉及茶叶和方糖，到萨尔布拉克慰问降匪。15日，谢尔德曼一行10多人来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诚。

9月20日 伙同谢尔德曼一起叛乱的季奎、哈依沙、刹尼尔牙孜等49人在奇台县向我人民政府投降。

11月1日 新疆伊犁匪首乌力阿吉率匪徒130多名在新源、巩留、特克斯一带骚扰。27师80团奉命抽调2营营部、5连、6连、8连、机炮2连官兵前去清剿，共俘匪126人。

11月21日 新疆分局发出做好谢尔德曼、胡尔曼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要经由他们信赖的人物，经常宣传我方政策，进一步消除其顾虑，至于政治改造，不可操之过急，待他们完全稳定之后，再通过政策宣传及爱国教育逐步达到改造的目的。随后，新疆省人民政府和阿勒泰专区派人到甘肃将谢尔德曼等人家属接回阿勒泰草原定居。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胡尔曼任富蕴县畜牧科副科长。

甘 肃

1949 年

10月16日，临夏地区阿里马兔和马步芳残部马金山、马保等股匪纠集“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国民支队”铁秀戈、马积福部近千人围攻临夏、定西新生人民政权。

11月28日，解放军第1军第1师赶赴临夏、定西清剿，全歼阿里马兔等股匪2000余人。

12月初，解放军第4军第11、第12师和该军骑兵团相继开抵临夏、定西，经清剿，铁秀戈被俘、马保投降，残匪向青海化隆地区逃窜。

1950 年

5月，匪首马元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在平凉、化平

西北地区剿匪大事记

(今泾源)、固原等地组织起一支有十四个团番号、近万人的“忠义救国军”，拟于5月8日在平凉举行暴动，同时攻占西吉、海原、固原等县城。

5月9日，700余匪围攻平凉，被解放军甘肃军区警卫团击溃，活捉匪首马元山。

6月，西吉、海原、固原地区1000余土匪为策应平凉暴乱而举行的攻城被解放军彻底平息，歼匪900余人，匪首马保元及一部匪众被迫投降。

7月，新疆匪首乌斯满残部200余人窜至安西、敦煌地区，被解放军当地驻军歼灭。

8月，解放军平凉、庆阳军分区出动部队对河西地区马国援股匪进行清剿。

1951年

甘肃各股匪纷纷逃窜至甘、青、川边沿地区活动。

1952年

12月，西北军区召开剿匪会议，研究制订清剿盘踞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近5000股匪的作战计划。

1953 年

1 月，西北军区分别成立甘青、青南两个剿匪指挥部。

2 月，西北军区开始部署骑兵第 1 师、骑兵 1 团、甘肃军区独立团、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 2 团、西南空军 39 团一部（出动伊尔—12 型运输机 5 架），共 126 个连近 2 万兵力，在西南军区 5 个团又一个营的配合下，对马匪实施围剿。

3 月，清剿部队分左、中、右 3 路对马匪达成合围。

27 日，解放军 3 路大军发起全线攻击，一举歼灭马匪主力。

31 日，解放军清剿部队又先后歼灭马匪 1600 余人，取得了西北剿匪作战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青 海

1949 年

11 月，青海境内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先后在宁夏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地及西宁附近，有计划地发动一系列武装暴乱。

12 月

5 日，马英、马成彪股匪 6000 余人袭击围攻解放军驻大通、门源两地部队，并于当日围攻门源县卡子沟区政府。

5 日，西北军区命令驻青海解放军第 1 军出动清剿平息匪

乱。1军以第3师负责剿灭大通、门源之匪，第2师负责剿灭湟中、西宁附近之匪。部队于5日晚赶至大通等地，立即投入战斗。

6日，马匪攻占门源县城。

6日，韩海如股匪300余人攻占西宁市以东的平戎县、小峡地区。

6日，匪首马彦率匪近千人攻占湟中县。

23日，经半个多月的剿匪作战，第1军部队先后收复大通县城，西宁以东的小峡、平戎县地区和湟中，门源县城。

1950年

5月，西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要求所属各级军区总结剿匪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克服轻敌思想，同时命令部分担负生产任务的部队也转入剿匪作战。各地相继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各剿匪部队划分地区，分片包干，对土匪展开深入的清剿。

12月，新疆乌斯满、胡赛因等股匪800余人窜入青海柴达木盆地。

1951年

1月，西北军区决定抽调第1、第2、第3、第4军的骑兵团、骆驼兵团和步兵27团，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统一指挥对窜入青海境内的乌斯满、胡赛因股匪实施清剿。

3月，经近两个月的会剿，流窜于柴达木盆地的土匪大部

剿匪大纪实

被歼，俘获匪首乌斯满。

6—12月，青海境内的股匪，经我军1951年下半年连续不断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基本上被剿灭。

1952年

3月，青海贵德县昂拉地区藏民千户项谦，在国民党特务的指使下，率领1000余武装，公开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喜饶加错副主席（藏族）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其仍执迷不悟，继续率匪袭击我工作队，包围我青海驻军部队，并暗地策划更大的叛乱。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西北军区即命令第1军及青海军区的8个团，出击清剿。

5月

1日，剿匪战斗打响。

18日，昂拉地区匪部基本就歼，项谦向解放军进剿部队投降。

宁 夏

1950年

3月，投诚后被我军改编的贺兰县保安大队大队长郭永胜率部分人员叛乱为匪，连续袭击我基层政权，工矿企业，杀害地方干部，偷袭我军运输部队。

西北地区剿匪大事记

5月8日，西吉、海原、固原等地1000余土匪勾结甘肃马元山匪部同时围攻县城。

6月，西吉、海原、固原3县匪乱被我军平息。

8月，西北军区先后以骑兵第6师，骑兵4团、回民骑兵团、步兵第8师等部队1.5万余人，开赴宁夏贺兰山、西吉、海原、固原、隆德等地及河西走廊地区，反复清剿郭永胜，马彦彪、马国援等10余股土匪，歼灭2000余人，平息了上述地区的匪患。

9月

24日，匪首郭永胜落网。其自立的“宁夏军区”全军覆灭。

11月

19日，经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宁夏银川市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会将郭永胜、张怀忠、杨格娃、谢占奎4名罪大恶极匪首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

2月，贺兰山地区根据中央全国镇反指示，开始全面镇反。

5月，贺兰山地区先后逮捕300余名惯匪。

7月，连续两次召开万人大会，对17名土匪武装骨干成员执行枪决，另对20余人分别判处10至20年有期徒刑。

1952 年

4 月，经西北军区部署，宁夏军区在宁夏境内的清剿残匪作战全部胜利结束。

陕 西

1949 年

12 月，陕西解放后，原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收罗胡宗南部溃逃官员、惯匪及其他地方反动民团武装共 3 万人，编成新编第 4、第 5、第 8 军以及所谓“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部，窜至川陕边的大巴山，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顽抗。

当月底，解放军第 19 军 55 师奉命对其实施进剿。

1950 年

1 月

12 日，我军对王凌云 3 个“新编军”进行了连续 10 余次的围剿，全歼其匪部 8000 余人。

13 日，“陕西保安第 4 旅”等 3 股土匪武装被迫向我进剿部队投降。

14 日至 17 日，王部“鄂陕边自卫总队”被解放军陕西省

安康独立团和白河独立营全歼。

2月底，陕西南部20股计6000余匪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投降。

3月，在西北军区第1军第1师，第4军第11、12师、伊克昭盟骑兵第5师的协同下，陕西榆林军分区5团等部队分别对盘踞陕北的匪首高怀雄、张廷芝部实施清剿作战，在各部队的密切协同下，陕北地区聚集的陕、甘、青、宁等地各股土匪共2600余人至月底全部被歼。

8月，陕西军区与友邻地区组织了川陕鄂、川陕甘两个联合剿匪指挥部，并在省内靠近秦岭的关中各县，组成了多级剿匪委员会。

12月底，经省内军民的联合清剿，陕西全省又歼灭残匪1086人。

1951年

陕西境内已基本上无大股土匪武装出现，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展开，隐藏的匪特纷纷被揭发逮捕，零星匪特逃往深山老林藏匿。

当地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基本上被根除，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其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西南地区剿匪大事记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武装在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各地，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暴乱和骚扰破坏活动，为平息匪患，解放军第3、4、5、18兵团和1兵团的第7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又2个团的部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领导下，从1950年开始剿匪作战。

四 川

1950年

1月 驻川部队推迟进藏的准备工作，以第11、12军的六个师由川东军区（第3兵团兼）指挥，负责进剿川东地区土匪。

以第10、18军各三个师，和15军的二个师，共计八个师，由川南军区（第10军兼）指挥，负责进剿川南地区土匪。

以第60军三个师、62军和7军各二个师，共七个师，由川西军区（第60军兼）指挥，负责进剿川西地区土匪。

剿匪大纪实

2月1日 第60军开始清剿成都附近温江和眉山两县的6万余名土匪。

185师555团开抵雅安，对西康省的2万余土匪进行打击，先后粉碎土匪对雅安、天全两座县城的围攻，歼匪一部。

7日 第60军一举扑灭成都郊区龙潭寺、石板滩两处1000余名土匪的暴乱。

25日 第60军集中八个团兵力，围剿岷江两岸和郫县、温江、灌县（今都江堰市）等地的股匪。

25日 川东、川南军区剿匪部队歼灭了一些大股土匪。

28日 川东、川南、川西三个地区共计歼匪4.5万余人。

3月初 第62军指挥所率185师553团，186师556团和军骑兵团进驻雅安剿匪。

15日 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指示，要求西南剿匪部队采取“以集中对付集中，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对付较小的股匪”的原则，集中主力部队，有重点地展开进剿与围剿作战。

16日 川南军区集中五个营兵力围剿兜子山许亚殷匪部，其后又以十一个连兵力追歼螺观山土匪697团，将其歼灭。

18日 川西军区185师554团同绵阳军分区进剿起义后又叛变的原国民党军302师，在什邡县歼其1340人。

4月

川北地区土匪发动9次300余人以上的暴乱，经川北军区部队进剿，腹心地区匪乱基本上被平息。

15日 川西军区部队扑灭龙潭寺地区的1000余土匪暴乱，

后又对邛崃、大邑和双流县等地区的土匪实施了数次进剿。

5月

川东军区于4月6日起至5月15日，集中三十三个连的兵力，进剿集中在涪陵、巴县、南川三角地区的7股共8000余人的土匪，在这次作战中，共毙伤土匪424人，俘获3160人，并迫使4290名投降自新。

川北军区181师541团当月内歼匪6236人。

7月

川东军区所属部队对桐子山、南川、武隆、彭水以南地区之匪进行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泸州等地之匪进行会剿，至当月底，川东军区共歼灭匪特9.5万余人。

下旬，川北军区剑阁、达县两个军分区配合陕南军区部队，剿灭川陕边区土匪4000余人。

川西军区已歼匪5万余人，使平川和部分边沿地区的匪乱基本被平息。

川南军区经对所剿地区之匪的围剿，至7月底共歼匪14万余人，使川南匪特受到沉重打击。

8月

川西军区179师、54师、186师和雅安、康定（今甘孜）、茂州（今阿坝）、温江军分区的部队，对盘踞在川西汶川、灌县、彭县交界地区、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地区和懋功（今小金）、抚边、绥靖（今丹巴）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数股土匪进行了3次会剿，歼匪2.6万余人。

9月

川北地区经军区部队的连续打击，除仅剩1股较大的土匪

剿匪大纪实

外，已无百人以上的股匪，至 1950 年底，川北军区共歼匪 8 万余人，基本上消除了匪患。

川东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曾绍山为首的剿匪指挥部，指挥 11 军 31 师和川黔边的涪陵、酉阳、遵义、铜仁等地区军分区部队，对盘踞黔东北地区的股匪进行会剿。

川南军区集中 15 军三个师及毕节、昭通、宜宾、乐山、西昌 6 个军分区部队，由 15 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对窜扰川康黔滇边的 2 万余土匪多次会剿，将其全部歼灭。

22 日 指挥部以二十个营的 1.3 万人的兵力，包围合击盘踞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等 5 个县的股匪，经战斗、击毙“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总指挥史肇周以下 467 人，俘“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代总司令陈全、国民党 67 军副军长陈长捷以下 5452 人，并迫使 2.2 万余名土匪投降自新，共计歼灭土匪 2.8 万余人。

11 月

18 日 川东军区实施第二期会剿，以 10 个营兵力合围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 5 县境股匪，经 11 天战斗，歼灭匪“西南剿共总指挥部”总指挥周共光以下土匪 4113 人。

12 月

川东军区至此在全区内共歼灭土匪 19.3 万余人。

川南军区至此在全区内共歼灭土匪 29.3 万余人。

川北军区至此在全区内共歼灭土匪 8 万余人。

川西军区至此在全区内共歼灭土匪 8.3 万余人。

西康军区至此在全区内共歼灭土匪 1.5 万余人。

1951 年

1 月

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要求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充实地方武装领导，加强对仓库和交通线的守护，维护社会治安。

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地区匪特与川康甘青四省逃至该地区的地主及惯匪勾结，发动大规模暴乱。

2 月初

川西军区调集十三个连予以进剿。

3 月中旬

川西军区又增调二个营参战。

4 月中旬

川西军区剿匪部队平息靖化、懋功地区匪乱，歼匪“反共联盟军”副总司令刘野樵以下 3000 余人。

12 月

至此，川康两省军民共歼灭“川东北游击第 10 纵队”司令黄天祥以下土匪 7.77 万余人。

1952 年

7 月 西南军区所属部队在川西北进行会剿股匪战斗。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和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负责指挥，调集 9 个团（欠 2 营）和二一个山炮营，三个无坐力炮连、共 2.1 万余人，发起黑水战斗，至当年 8 月底，歼灭受台

剿匪大纪实

湾特务机关指挥，得到台湾空投接济的傅秉勋匪部 3000 余人，仅少数匪首漏网。

1953 年

3 月

西南军区集中四个团又二个营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南北夹击盘踞在川西北草地的股匪，将其全部聚歼。

云 南

1950 年

2 月

解放军第 4 兵团进驻云南后，即展开了剿匪作战。该兵团先后以二个军部、七个师暂时转为地方武装，并分别兼滇南、滇西等军分区的领导机关。

4 月

国民党军残部勾结当地土匪势力先后攻占新平、易门、牟定等县城。

5 月

暴乱土匪发展到 4.5 万余人，抢动群众财物，杀害区乡干部、袭击我基层政权。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云南军区决定自 5 月中旬起，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赴各地区清剿大股土匪。

6—9 月

驻滇南的第 13 军九个团、驻滇东北的 15 军 43 师和驻滇西的 14 军 42 师等部队，先后对盘踞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的股匪实施围剿，至 9 月底，歼灭杨永寿等主要股匪 8000 余人。

10 月

云南军区由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郭天民等组成剿匪委员会，指挥边沿地区的剿匪作战。

12 月

云南军区在全区范围共歼灭土匪 6.2 万余人，收复了一度被土匪占领的新平、镇雄、威信等 10 余座县城。

1951 年

云南境内残存的 1.3 万余土匪，绝大部分转移到省、县结合部及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在云南军区剿匪部队有力的不断打击下，土匪已无法在我腹心地区制造较大的暴乱活动。

贵 州

1950 年

1 月

解放军第 5 兵团率 16 军返驻黔境，并成立贵州军区，开始剿匪作战。

剿匪大纪实

3月

贵州军区召开剿匪军事会议，调整部署，决定主动撤离暂时不容易控制的23个县城，以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

4月

贵州军区集中一部分机动兵力，组成东西两个集团，负责重点清剿，东集团由46师138团和47师140团（欠2营）组成。西集团由47师第139、140、141团各一个营和45师135团3营组成，进行清剿作战。

5月

东西集团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3.9万余人。

6月

东西集团部队又举行两次围歼股匪战斗，共歼股匪9500余人，活捉匪首王福堂等60余名匪首。

7月—8月

贵州军区成立由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参谋长潘焱等组成的剿匪委员会，加强全区剿匪工作的统一领导，并先后发起3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股匪战斗。东集团部队和150、136团各一个营，137团一部及遵义军分区炮兵团等部队，发起对盘踞在石阡的“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匪部和“川黔湘反共自救军”吴清河匪部的合围进剿，经23天战斗，歼匪4200余人，活捉匪首吴登仁和吴清河。

9月

贵州军区部队与川西军区186师配合，在雷山地区对“黔东南绥靖司令部”谢世钦匪部合围进剿，经25天战斗，歼匪

7000 余人。

10 月

贵州剿匪部队活捉在雷山作战中漏网的匪首谢世钦。

11 月

10 日 贵州军区第 138、140、146、151 团等部队，开始对盘踞黔南长顺、紫云、惠水的“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曹绍华匪部和“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屠占庭匪部。实施合围。138 团 1 营配合兄弟部队奔袭屠匪总部及其三个团，在 6 天中追匪 280 公里，作战 25 次，歼匪总部及一个团 3000 余人，活捉匪首屠占庭。其后，又将屠匪残部压缩在合围圈内逐一歼灭。

11 日 140 团奔袭在长顺地区活动的曹绍华匪部 4000 余人。

13 日 140 团部队在斗篷冲地区分 3 路包围曹匪所部，经激战，全歼曹匪总部及所属第 1、3、4、5 师共 4000 余人，活捉匪首曹绍华。

12 月

贵州军区部队至此总共进行大小剿匪战斗 4000 余次，歼灭股匪 19 万余人。

1951 年

经 1950 年贵州军区部队的打击，贵州全省仅残存 2 万余土匪，其主要占踞在黔桂边册亨、望谟、罗甸、荔波等 4 座县城，其余部份则分散于滇黔、川黔边境及内地山区。经当年我

剿匪大纪实

军多次清剿，贵州军区与云南军区配合，共歼匪特 13 万余人，并将被土匪夺占长达 1 年的上述 4 座县城收复。

经过 1951 年至 1953 年的剿匪作战，川康云贵 4 省部队共歼灭 24 万余人，使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

中南地区剿匪大事记

中南地区各省的解放时间先后不一，因此匪患的严重程度各有不同。至 1949 年 7 月，在已获得解放的河南、湖北和江西地区，共有武装股匪 9.8 万余人。其中河南 3 万多人，主要活动在伏牛山区；湖北 3.3 万多人，主要活动在大别山区；江西 3.5 万多人，主要盘踞在赣南宁都县北部；而解放较晚的湖南、广东、广西，匪情更为严重。至 1949 年底，湖南有土匪 10 余万人，半数以上活动在湘西地区；广东有土匪 4 万多人，集中活动在珠江三角洲，北江和西江地区；广西有土匪 6 万多人，集中活动在瑶山、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等地区。

中南地区第一阶段的剿匪作战，是进剿大股土匪。此阶段从 1949 年 5 月开始，至 1950 年 3 月止，其中 1949 年底以前共歼灭大股土匪 33.6 万人。

中南地区各省剿匪战况如下：

河 南

1949 年

4 月

剿匪大纪实

趁解放军南下之际，直接听命于胡宗南的“豫西剿共总指挥所”2万余匪特，以卢氏县为中心疯狂活动，占据大片地区。

5月

解放军抽调主力部队开始剿匪作战。

7月

由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违武、第42军副军长赵东寰和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分别指挥第42军和第58军各两个师、河南警备2旅及七个独立团等共3.5万余人的部队进剿豫西土匪。

7月中旬

解放军北线第42军向卢氏县进逼，土匪西企图窜入秦岭。而此时土匪新1师、保6旅和代号为“黄河”、“绥远”两个特务支队等部共2000多人集结于卢氏县朱阳镇，被我军围歼一部后，西逃至崤山以南地区被全歼。

南线解放军第58军对土匪新2师、新3师实施进击，一部投降，一部被歼。

8月

解放军第42军125师和第58军追剿部队在卢氏县以南五里川地区将残匪集歼。部队开始向伏牛山主峰地区行进，将集中的股匪歼灭或打散。

10月

伏牛山区的股匪被我剿匪部队全部歼灭。

湖 北

1949 年 5 月

在白崇禧的策划下，1.8 万余人的土匪武装活动于大别山区以金家寨为中心的数十个县，组成“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妄图开辟“敌后第二战场”。

湖北军区奉命组织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由副司令员王树声任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剿匪部队，进剿大别山地区土匪。

第 42 军 126 师和地方武装部队组成北线部队，位于河南商城地区；湖北独立第 3 师等组成南线部队，位于罗田、滕家堡地区。南北两线部队在东线三野 24 军 71 师等部的协同下，以匪穴金家寨为中心实施分进合击。

9 月

剿匪部队以营、连为单位进行分散驻剿，经反复合击、追歼，大股土匪基本被围歼打散。

1950 年

3 月 金家寨地区匪特 1.5 万多人全部被歼灭。

江 西

1949 年

7 月

匪首黄镇中率匪众 2000 人盘踞赣南翠微峰，大修工事，将发电厂、碾米厂设备搬入险要山洞，扬言“要坚守 3 年”。

8 月

解放军第 48 军 144 师拟定歼灭黄匪作战计划。

31 日 144 师发起剿匪外围战斗。

9 月

19 日 攻占土匪部队外围据点，将土匪包围在几个孤立的山洞内。

23 日 剿匪部队发起总攻，经 7 个小时战斗，俘获匪首黄镇中，全歼土匪 1800 余人。

湖 南

1949 年

8 月

湖南军区在湘南地区以收编方式解决了 4.3 万余人的游杂武装。

10 月

47 军在湘西、湘东北地区先后开展剿匪作战。

11 月

46 军向湘南土匪发起进剿。第 47 军与第 46 军在一个月內基本歼灭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所率的交警“湘南纵队”、“保 1 师”和“湘赣反共救国军”陈光中等部股匪 2.1 万余人。

12 月

湖南全省共收编游杂武装 8 万多人，歼灭土匪 4.6 万多人。初步稳定了湘东北和湘南中心地区的社会秩序。

1950 年

1 月

19 日 国民党暂编第 1 军军长陈子贤召集匪首师兴周以八面山为中心建立“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解放军第 47 军 141 师 422 团一举攻上山头，歼匪 800 余人，土匪主力 3000 余人企图突围，除匪首陈子贤外，其余全部被歼。

2—3 月 1950 年初，湖南公开活动的土匪仍有近 10 万人，控制着湘南地区和常德、邵阳的边沿地区。为此，湖南军区集中第 46 军、第 47 军和二野驻湖南的 114 师及地方部队共 20 万人，全面进剿各大股匪。先后经八面山、长田湾、芷（江）怀（化）黔（阳）边界及麻阳、兴隆场、古丈、江垭地区和武冈地区的 8 次大合围和对湘东中心区的全面清剿，共歼土匪 2.2 万多人，解放了湘西 8 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地区。

4 月

湘南军区决定暂时放弃湘南、湘北及湘西边沿地区的剿匪工作，收缩主力部队，集中第 47 军和地方武装 4 万多人，对

剿匪大纪实

以沅陵为中心的湘西十四个县境内的2万多名股匪展开重点清剿。

6月

剿匪部队在搜剿战斗中击毙在八面山战斗中漏网的匪首陈子贤，歼匪1000余人，生俘国民党暂编第2军军长陈通焕以下5000余人，并迫使8000多名土匪投降。经5、6两个月的战斗，我军在湘西中心区共歼灭土匪1.5万余人，同时取得了在常德、邵阳等地剿灭股匪的胜利。

7—9月

剿匪部队基本肃清湘西中心区和常德、邵阳等地区的散匪，主力部队转入会剿湘西边沿地区股匪的作战。

10月

湘西边沿地区约有2.3万余名土匪，统一编为“反共救国军”，并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土匪政权。为此，湘南军区集中第47军主力，136师和地方武装4万多人，在河北、四川、贵州等省友邻部队的协同下，以湘西军区（第47军兼）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刘贤权担任指挥，集中十个团的兵力于当月15日围剿龙山地区股匪，经10余天的合围，将主要几股土匪击溃包围。

11月

10日 剿匪部队消灭湘西边沿地区土匪4000余人。盘踞龙山的“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等投降。此时，南线绥宁、靖县地区我军一举消灭“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5500余人，总指挥蒋燮琴被活捉。

12月

我剿匪主力部队在九龙山、凤凰、麻阳边沿和晃县（今新晃）边境及通道地区再歼土匪 8000 余人。值此，经 11 至 12 月的两次大规模会剿，共消灭土匪 2.3 万余人，基本肃清湖南特别是湘西带有历史性的匪患。

广 西

1950 年

8 月

毛泽东电示中南军区，要求在六个月内肃清主要股匪。

10 月

中南局指示广西省一切工作皆应以剿匪为主，一切服从剿匪需要。

11 月

8 日 中南军区指示广西军区务以瑶山（大瑶山）和桂南为剿匪重点。为加强力量，中南军区从湖南抽调 21 兵团 2 个军部，4 个师入桂参加剿匪，同时抽调粤西的 43 军 127 师到十万大山以南地区剿匪，使广西全省剿匪部队达到 15 个师、12 个独立团，近 20 万人。

1951 年

1 月

8 日 广西军区集中 14 个半团的兵力，由广西军区副司

剿匪大纪实

令员李天佑、省委书记何伟统一指挥，同时集中瑶山外围县区地方武装和数万民兵对瑶山进行拉网式搜剿。

至当月中旬，歼灭土匪军长以下 1.3 万余人，“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琮等顽固匪首被困死在深山中。

2 月

2 日 剿匪部队分路进剿瑶山、金秀、老山、圣堂山等地土匪，经 10 余天战斗，歼灭股匪 8000 余人，少数匪首被迫率亲信数人藏匿深山。

在整个 2 月份，经组织群众开展对土匪的监视、揭发、捕捉、规劝活动，瑶山地区悔过自新土匪达 7000 多人。其中对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国民党 126 军军长林秀山等人的镇压，更是震慑了匪众。至当月底，瑶山会剿共歼灭土匪 3.8 万余人，收缴枪支 6 万余支。

5 月

剿匪部队先后又消灭桂南地区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和灵山、永淳、钦州等重点地区的全部股匪。当月，广西全省共计歼灭土匪 33 万余人，如期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规定的剿匪作战任务。

广 东

1950 年

3 月

重点清剿英德、清远、阳山、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等地区

中南地区剿匪大事记

的股匪，经连续作战，至当年底，共歼匪 6.8 万余人。

1951 年下半年以后至 1952 年上半年，中南军区部队主要以发动群众深挖潜伏匪特为主，缉拿散匪及潜伏匪特匪首共 2500 多人，胜利完成了全区剿匪任务。

华东地区剿匪大事记

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上海

1949 年

5 月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挥师南进、沿途开始进行剿匪作战。

6 月 第 25 军在浙江境内歼匪 2.9 万余人。

7 月 29 日 华东局发出剿匪指示，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华东大陆秋季剿匪作战。

8 月 9 日 华东军区和三野向所属军区和部队下达秋季剿匪作战命令。

8 月 27 日 第 25 军主力和浙江建德、临安军分区与皖南的宣城、徽州（今屯溪）军分区开始进剿杭州至徽州公路沿线土匪。

24 军 71 师、三野骑兵团和皖北军区 1 个团开始进剿以金寨为中心的土匪。

苏南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炮艇队，对太湖地区土匪实施围剿。

第 25 军协助苏州军分区剿灭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土匪。

剿匪大纪实

苏北和鲁中南军区对陇海铁路东段两侧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

第35军协助浙江军区对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区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

8月 第25军在浙西山区全歼主要股匪“皖浙边区游击队”，击毙匪首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

9月5日 第25军对大别山地区汪宪股匪进行清剿。

30日 第24军剿匪部队活捉匪首汪宪、袁成英，歼灭3269人。

11月 第25军剿匪部队又歼匪1.4万余人，基本上摧垮浙江全省的大股土匪。

12月 我剿匪部队在苏南歼匪7000余人。

我剿匪部队在山东歼匪1400余人。

1950年

1月 因山东、苏区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苏南、皖南、皖北和浙江境内大股土匪亦被剿灭或击溃，金家寨、祁贵山区、闽浙赣边区、太湖地区的土匪基地均被摧毁，初步稳定了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

1月 华东军区和三野决定抽调八个团兵力在福建境内全面剿匪。

3~6月 由于浙江、福建两省我军忙于解放舟山群岛和再次攻打金门，地方武装初建不久，华东地区土匪势力又一度抬头，台湾当局向大陆派遣特务武装达155股，共3700余人

充当土匪骨干。这期间山东、浙江、苏南、苏北境内，共增加土匪 6900 余人，福建境内增加 1.1 万余人，新老土匪云集，共发动反革命暴动 210 起。为此，华东军区再次掀起剿匪作战新高潮，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闽北地区剿匪部队消灭了重要股匪“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

浙江部队消灭土匪“国防部第三纵队”；

苏南、皖北地区部队消灭了土匪“苏皖军区第三纵队”活捉匪首许均友、刘子贻等。

华东军区 3 至 6 月共歼匪 2.7 万余人。

8 月初，华东军区召开剿匪作战会议，军区代理参谋长袁仲贤分析作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了今后的作战方针及政治争取策略。

8 月 30 日，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集中力量进行剿匪作战，务于 1951 年上半年前肃清华东地区内陆的股匪。

9 月

三野 22 军之 65、66 师分别进驻浙江穿山半岛和象山半岛剿匪；23 军 67 师进驻天台地区剿匪，同时将福建境内剿匪部队由八个团增加至十二个团。

第 32 军 96 师 287 团 2 连和 4 连将匪“突击司令部特务团”包围，在军事压力及政治争取下，该团团长林保才被部下打死，其妻和 20 余名土匪投降。

10 月 5 日 第 32 军 95 师 283 团以七个连兵力奔袭福建建瓯县梨山和莲花地区之匪，歼匪 90 余人，击毙匪首师长郑长

吉。

10月15日 第32军96师286团在6天内瓦解7股土匪，争取“闽北自救军第二支队”副支队长以下140人携枪投降。

11月

第29军85师253团和福建龙岩军分区警备团对连城县境内之“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进行了19天的搜剿，歼匪400余人。活捉匪首中将总司令唐宗。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命令驻闽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剿匪，限定6个月内消灭全省一切成股土匪，华东军区遵令将剿匪主力部队增加到五个师，并抽调1.2万余名军队干部下乡，配合剿匪斗争及开展农村工作。

1951年

1月 福建军区会同浙江、江西有关地区，组织对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股匪的联防会剿。

2月 福建泰宁、德化、长汀县所在军分区与邻近省、县组成4个联防区，对参与这一地区剿匪作战的五个团、六个营、十二个连和二十八个县独立营实行统一指挥，使土匪陷入重重包围。287团3连在将乐、泰宁两县交界的盖竹大山，搜捕主要股匪“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司令廖其祥等匪首，击毙其三个大队长、一个中队长。廖其祥逃跑途中被打死，匪众全部被捕。

3月 剿匪部队歼灭“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30多股主要土匪，歼灭匪首173人，匪众2700余人。

1—12月 浙江省内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3.6万余人。

1952—1953年

华东军区在华东地区全面肃清了陆上残匪，根除了匪患。

